

沙俄侵华史

二〇一(26)

K1.49 008513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说 明

本书第三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参加编写工作的有余绳武、刘存宽、徐曰彪、吕一燃、张左系、郑绍钦、章伯锋、薛衔天、杨诗浩、谢本书（云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1—4
第一章 中国古代西北疆域	5—76
第一节 汉代西域都护府及其辖境	6
第二节 三国至隋各王朝对西域的经营	15
第三节 唐朝的西北疆域	18
第四节 五代辽宋时期的西域	26
一、几个割据政权并立时期	27
二、西辽时期	30
第五节 元、明两代的西域	31
一、元政府对西域的统治	31
二、明代的西域	38
第六节 十八世纪中叶确定的清朝西北疆域	40
一、厄鲁特准噶尔部贵族的割据和清政府统一西北地区	40
二、清政府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管辖	49
三、清政府对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70
第二章 一八六〇年以前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	77—157

第一节	十七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沙俄	
	对中国西北的侵略	77
一、	窥伺中国西北的开端	77
二、	妄图煽动巴图尔和僧格叛国投俄	82
三、	勾结叛匪噶尔丹，阴谋分裂中 国领土	86
四、	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两次军事“远征”	89
五、	庇护准噶尔部叛匪，妄图阻挠清政 府平定叛乱	98
六、	侵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额尔齐斯 河上游，窥伺斋桑湖	102
七、	逐步吞并哈萨克，进窥中国巴尔喀 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106
第二节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对中国西北 地区侵略的加紧	112
一、	武力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112
二、	图谋变中国南疆为沙俄的“保护国”	129
三、	对新疆的经济侵略和《伊犁塔尔巴 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	138
四、	塔城人民的抗俄斗争	151
第三章	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 中国西北大片领土	159 - 216
第一节	中俄《北京条约》有关西部边界条款 的掠夺本质	159
第二节	塔城会谈前夕沙皇政府的侵略部署	167
一、	密谋策划，制定新的割地方案	168

二、抢占据点，以武力侵逼支持外交勒索	177
第三节 一八六二年塔城谈判	182
第四节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191
一、沙俄加紧武装挑衅，以“打”逼“谈”	191
二、《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及其基本内容	202
三、《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三个子约	210
第四章 沙俄武力逼签中俄《改订条约》	218--293
第一节 沙俄觊觎南疆和强占伊犁	218
一、向中亚的殖民进军和对南疆的侵逼	218
二、强占伊犁地区及其殖民统治	227
三、俄英争夺南疆的加紧	237
第二节 关于交还伊犁的最初交涉和《里瓦吉亚条约》	247
第三节 中俄《改订条约》的签订	264
第四节 中俄《改订条约》的五个子约	284
第五章 沙俄扩大对新疆的侵略和违约霸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294—336
第一节 《改订条约》缔结后沙俄在新疆侵略势力的膨胀	294
第二节 沙俄窥伺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开始	303
第三节 沙俄武力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帕米尔地区	308
一、八十年代后半期、九十年代初帕米	

尔的形势	308
二、武力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 米尔地区	310
第四节 中俄帕米尔划界交涉	322
第五节 俄英瓜分帕米尔	330
第六章 沙俄对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地理 考察”	337—381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沙俄对中国 西北边疆的“考察”	339
第二节 沙俄在中国西部和北部“考察”活动 的继续加强	354
附录一 中文参考书目	382
附录二 俄文参考书目	387
附录三 西文参考书目	399
附录四 俄汉人名对照表	404
附录五 俄汉地名对照表	412

地图目录

沙俄割占中国西部领土示意图	158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示意图	217

插图目录

库车汉代烽燧遗址	8
“汉归义羌长”铜印	9
班超	11

目录

“司禾府印”	14
唐碎叶城大云寺遗址	25
杜环《经行记》关于碎叶大云寺的记载	25
伊西洱库尔之战图	48
《西域图志》中的伊犁西路图	54
布鲁特人	56
《新疆识略》中的塔尔巴哈台舆图	64
额尔齐斯河	78
阿勒坦淖尔	102
沙俄占领下的科帕尔	114
伊犁河	117
沙俄强建的维尔内堡	120
特穆尔图淖尔	121
沙俄强建的帕米尔哨所	320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西藏考察路线目测图”	372

前 言

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叶的长时期中，沙皇俄国对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侵略。由太平洋岸到帕米尔高原，无处不受到哥萨克铁蹄的践踏。关于沙俄鲸吞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和蚕食蒙古北部土地的过程，前两卷已作了详细论述。在本卷中，我们将叙述沙俄侵略中国西部、特别是武力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经过。

十九世纪末以前沙俄侵略中国西部的历史，以中俄《北京条约》为界限，可以划分为两个大段。

第一大段是开始窥伺中国西部和逐步侵占沿边土地的时期。当时俄国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侵略动因主要出于农奴主和商人阶级掠夺领土、财富的贪欲；进入十九世纪后，资本主义在俄国逐渐发展，对华侵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的要求。本大段又分三期：

（一）一六〇六——一七五七年。 本期正值明末清初，中国西部为准噶尔贵族所割据。沙俄认为有机可

趁，不断派小股哥萨克沿额尔齐斯河向南推进，占领了从巴拉巴草原到铿格尔图喇(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的准部领地。同时，沙皇政府还向准噶尔派出许多“使团”，妄图煽动准部首领叛国投俄。一七五七年清军平定天山南北，有力地挫败了沙俄的侵略阴谋。

(二) 一七五八——一八四〇年。 清政府统一西部地区后，沙俄的扩张活动暂时有所收敛，但仍不放松蚕食土地的机会。一七六〇年，俄军趁这一地区的秩序尚未完全恢复，悍然侵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同时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强筑布赫图尔明斯克堡。进入十九世纪后，沙俄更侵入斋桑湖一带，并开始窥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三) 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 继西方列强从海上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沙俄在漫长的陆地边界上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在西部地区，本期中沙俄武装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强行修筑科帕尔和维尔内等堡垒，建立联结西伯利亚堡垒线和这些侵略据点的“新西伯利亚堡垒线”，并多次窜犯楚河上游和伊塞克湖一带。这些扩张活动，为沙俄鲸吞整个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铺平了道路。

与此同时，沙俄还通过逼签《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攫取了在伊、塔贸易免税等特权，为俄国商品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倾销打开大门。这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第二大段是沙俄吞并整个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并进一步向中国西部腹地渗透的时期。随着一八六一年的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进一步发展，俄国资产阶级夺取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贪欲与日俱增。在这一背景下，沙皇政府在中亚发动了继征服西伯利亚之后规模最大的殖民进军，短短几十年中全部征服了哈萨克草原、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土库曼。中国西北地区位于中亚细亚的东部，沙俄对这一地区的侵略，正是它征服中亚总部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大段也分三期：

（一） 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 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款强行规定两国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境内常驻卡伦及斋桑湖、伊塞克湖等处硬指为分界标志。一八六四年，沙俄借口履行《北京条约》，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更恶毒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该约和其后订立的几个子约，沙俄共割占中国领土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

（二） 一八七〇——一八八四年。 本期中，沙俄利用新疆少数民族封建势力分裂割据和阿古柏入侵所造成的混乱局势，进一步扩大对中国西部的侵略，一方面出兵占领伊犁地区，建立了赤裸裸的刺刀统治；另一方面竭力和英国争夺南疆，企图把这一广大地域变成第二个浩罕。一八七七年清军消灭阿古柏匪帮，粉碎了沙俄吞并南疆的计划，但沙俄侵略军仍赖在伊犁不走，并借此向清政府

大肆敲诈。一八八一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俄《改订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俄国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和斋桑湖以东等处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攫取了在新疆全境进行免税贸易和增设领事等特权，并勒索了大宗赔款。

（三）一八八四——一八九五年。本期沙俄的中心目标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加紧控制新疆，同时占领帕米尔高原，作为进窥喀什噶尔等地和英属印度的桥头堡。一八八四年沙俄迫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把帕米尔分成三块：西北部划入俄国版图，东部留给中国，中部作为待议地区。九十年代初，俄军大举入侵帕米尔，进一步违约占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总计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巧取豪夺，共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同时，它还进一步加强对天山南北各地的政治控制和经济侵略，并派出许多“地理考察队”，深入中国西部和北部刺探情报，图谋吞并“从恰克图到喜马拉雅山”的广大地域。

第一章

中国古代西北疆域

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一带古称西域。在我国先秦的作品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十分丰富，如《尚书》、《逸周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尔雅》、《山海经》、《管子》等书，都留下了不少有关西域与中国联系的记载和传说。西域的特产，“昆山之玉”早为中原人民所熟悉。

西域在古代是东西方贸易的要道。当时中国输出的物品以丝绸最负盛名，古希腊人因此称中国为“赛里斯”，意即丝国。公元一世纪罗马著作家白里安（二三——七九年）的名著《博物志》记载：“赛里斯国”产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①这些中国丝绸正是经西域运到欧洲的。

东周时期，秦穆公（公元前六五九——前六〇八年）“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当时的秦国

① 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年北平出版，第1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31—32页。

② 《史记》，第5卷，《秦本纪》。

实际上是我国西北地区民族融合的一个中心，声威远及西域等地；直到汉代，匈奴和西域等地人民，仍把汉人称为“秦人”。^① 中亚出土康居古文书称中国为“秦斯坦”，^② 古埃及、罗马的史学家称中国为“秦”。^③ 中外历史文献证明，远在先秦时期西域与中国的联系已相当密切。

第一节 汉代西域都护府及其辖境

西汉(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八年)初年，天山以北是乌孙等族的游牧地，天山以南聚居着许多农业部族，史称“西域三十六国”。^④ 此时中国北方的匈奴族开始强盛，至公元前一七六年前后，势力已由蒙古草原扩展到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当时它正处于奴隶制时期，经常侵掠西域诸国，“得人以为奴婢”，并不断南下骚扰，给汉帝国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讨伐匈奴奴隶主成为西汉的当务之急。

① 《史记》，第123卷，《大宛传》；《汉书》，第94卷，《匈奴传》；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第33—35、99—102页。

②③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35—36页；第2册，第571页，《支那名号考》。

④ 西域地区各部，有的“有城郭田畜”，以农业为主，称城郭之国，有的“随畜逐水草”而居，其中除乌孙、大宛较大外，余则多者数万人，少者仅千余人或数百人，通称为三十六国。实际至西汉末年已分裂成为五十余国。详见《汉书·西域传》。

汉武帝(公元前一四〇——前八七年)为了对匈奴作战,动员了巨大的军事力量。自公元前一二九年至前一一九年,他多次派卫青、霍去病等人,率大军连连出击匈奴,夺回秦时的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建立朔方郡、五原郡,并迫使居于河西地区的匈奴昆邪王降汉,陆续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①控制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河西走廊。公元前一三八年和公元前一一九年,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在阿姆河流域)和乌孙(在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费尔干纳盆地以东地区)等国,夹击匈奴。张骞建立了与乌孙的联盟,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任务,为统一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纷纷遣使来汉,汉使赴西域者也“相望于道”,关系日益密切。^②

公元前一〇八年武帝首次出兵西域,击败亲附匈奴的楼兰(后改名鄯善,遗址在今罗布泊西南)、姑师(即车师,在吐鲁番一带)。公元前一〇四至前一〇一年,汉武帝又两次派李广利征伐大宛(在费尔干纳盆地),西域诸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③公元前一〇一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第一个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使者校尉,并建立许多烽燧亭障。^④近几十年来,在罗布泊北岸和库车等地都发现了汉代的烽燧遗

① 《汉书》，第6卷，《武帝纪》。

② 同上书，第96卷，《西域传》上；第61卷，《张骞传》。

③ 《史记》，第123卷，《大宛传》。

④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上。



库车汉代烽燧遗址
(采自《新疆出土文物》)

址。^①

公元前七二年匈奴侵掠乌孙，乌孙求救于汉，汉与乌孙联合出兵大败匈奴，确立了汉帝国在西域的优势。公元前六〇年，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同年，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策大雅），^②管辖乌孙、大宛、无雷（在帕米尔地区）、休循（在阿赖谷地）及西

域其他各部。

都护是汉朝中央政府派驻西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其下有副校尉、丞、司马、侯等属官。自设西域都护起，至西汉末年计八十余年，历任都护十八人，可考者有：郑吉（公元前六〇——前四九年），韩宣（公元前四八——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第127、195页；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北平研究院出版，第105—107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197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文物》杂志，1975年第7期，图版8。

②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上；第70卷，《郑吉传》。

前四六年),甘延寿(公元前三六——前三四年),段会宗(公元前三三——前三一年、前二一——前一九年),廉褒(公元前三〇——前二八年),韩立(公元前二四——前二二年),郭舜(公元前一二——前一〇年),孙建(一——三年),但钦(四——一三年),李崇(一六——二三年)等十人。^①李崇的私印,已在新疆沙雅县裕勒都司巴克地方发现。^②西汉政府还直接派官员到西域巡视,新疆出土的西汉木简中即有“都吏”巡行西域的记载。^③



“汉归义羌长”铜印(采自《新疆出土文物》)

除了设置都护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进行管辖外,西汉在西域的地方行政组织,仍保留了原来的名称和统治形式,任命原来国王为王。“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④国王必须服从西汉中央政府的各项政令,定期供献方物,遣子入侍。遇有战事,汉中央

①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80—183页。

② 《文物》杂志,1975年第7期,第29页。

③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89页。

④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下。

政府和西域都护有权征发诸国兵马出征和平叛。^①王位更迭，须经中央政府批准或指定人选。例如，宣帝（公元前七三——前四九年）时乌孙王室内部不和，西汉政府分立大、小昆弥（乌孙王称号），各颁发印绶，派长罗侯常惠为其划分“地界人民”。成帝（公元前三二——前七年）时，乌孙内讧，大昆弥为小昆弥刺杀，西汉政府又特派中郎将段会宗（曾两次任西域都护）前往惩办祸首，对失职乌孙官员予以处分，有功者予以奖励。段会宗多次被派往“安辑乌孙”，死后“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以示怀念。^②

西汉末年，中原地区社会动乱，汉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大为削弱，南匈奴势力复起，^③控制西域，“敛税重刻”，各族人民深受其害。公元二五年东汉王朝建立后，莎车王康“率傍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④东汉政府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统领西域地区；公元三三年又赐大将军印绶。莎车王借汉威权，对各部“重求赋税”，“诸国愁惧”，不堪其扰；四五——四六年，车师前

①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下载：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年）“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资治通鉴》第24卷载：本始三年（公元前七一年）校尉常惠发各国兵四万及乌孙兵七千，攻龟兹，责其杀赖丹之罪。

②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下；第70卷，《段会宗传》。

③ 公元前三六年北匈奴瓦解后，南匈奴占领漠北蒙古草原。公元四八年南匈奴第二次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降汉。

④ 《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

部、鄯善、焉耆等十八国向东汉政府再三请派都护。^①

七三年东汉政府派窦固、耿秉等率军分四路出塞，大败匈奴，“取伊吾卢地（今新疆哈密），置宜和都尉以屯田”。^②并派班超联络南道诸部，迅速挫败鄯善、于阗、疏勒等地匈奴势力。第二年，窦固再次打退匈奴的反扑，平定车师前后部，于是东汉政府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金满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关宠为已校尉屯柳中（今鲁克沁）。^③七五年匈奴又派兵围攻金满、柳中，这时正值汉明帝亡故，东汉政府忙于内部事务，无

暇顾及边陲，下令罢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并令班超由疏勒回京。西域诸国大震动，疏勒都尉犁弇以死挽留。于阗王侯大臣抱住班超的马腿哭泣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④班超在西域诸部坚决要求下终于留疏勒未



班 超

（采自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

① 《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

② 同上书，第2卷，《明帝纪》；第88卷，《西域传》。

③ 同上书，第19卷，《耿恭传》；第88卷，《西域传》；第2卷，《明帝纪》。

④ 同上书，第47卷，《班超传》。

走。七七——九一年间，班超团结南道诸部，展开了抗击匈奴的斗争，巩固了东汉在天山南路的统治。

八九——九一年，东汉政府派窦宪率军于蒙古草原屡败匈奴，有力地支援了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九一年，东汉重新设立都护府，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它乾城（今新和县境），以徐干为长史屯驻疏勒，并于车师前部高昌壁（在吐鲁番）置戍校尉，车师后部侯城（即金满城）置戍部侯。九四年，班超率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破焉耆，降危须、尉犁，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①

班超在西域住了三十年，一〇二年才返回洛阳。在他任西域都护时期，东汉在西域的统治，恢复了西汉时期的盛况。

一二三年，班勇（班超之子）任西域长史，驻屯柳中。自此至东汉末年，汉政府在西域未再设都护。

屯田是两汉经营西域的重要措施之一。公元前一〇一年汉武帝征大宛后，即开始在渠犂、轮台一带屯田，“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屯田士兵多时达一千五百余人。^②公元前七七年，汉政府又在鄯善伊循城（今若羌县米兰附近）屯田，置伊循都尉以领其事。^③近年在新疆若羌县米兰发现汉代灌溉系统，有总闸、分水闸、干渠、支渠等，^④

① 《后汉书》，第47卷，《班超传》；第88卷，《西域传》。

②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上、下。

③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上。

④ 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载《文物》杂志，1975年第7期。

这应是伊循屯田的遗址。《水经注》载，汉以“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大修水利，“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横断注宾河”，拦河筑坝，“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另据考古调查，在今轮台县克子尔河畔汉代古城遗址，“古时沟渠田界痕迹，尚显然可见”，^① 沙雅县境内有长达一百余公里汉代古渠道，至今人们尚称“汉人渠”，沿渠有古城和农田遗址多处。^② 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汉简七十余枚，内容大多与屯田有关。^③ 西域都护府成立后，屯田地区更扩展至乌孙赤谷城。地处天山南北交通要冲的车师前部，是西汉屯田的中心。公元前四八年在交河城（今吐鲁番交河故城遗址）增设戊己校尉，专领车师境内屯田部队。^④ 后又在姑墨（今温宿、阿克苏一带）开辟屯田区。^⑤ 七三年东汉开始在伊吾（今新疆哈密）屯田，设宜禾都尉，^⑥ 车师前部的柳中、高昌壁和车师后部的金满仍为重要屯田地区。^⑦ 一九五九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发现一颗东汉时期的“司禾府印”，^⑧ 证明东

①②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1、25页；孟池：《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

③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105—108、179—220页。这批木简有年代记载者，最早为黄龙元年（公元前四九年），最晚为元延五年（公元前八年），简文反映了屯田士卒的来源和生活状况等等，内容多系史书所未载。据此亦可印证《水经注》有关汉在楼兰屯田之记载。

④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上；第19卷上，《百官公卿表》。

⑤ 《汉书》，第96卷，《西域传》下。

⑥⑦ 《后汉书》，第88卷，《西域传》；第19卷，《耿恭传》；第77卷，《班勇传》。

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

汉政府曾在这一地区设有屯田机构。两汉在西域屯田，对建设边疆起了巨大作用。



“司禾府印”(摘自《新疆出土文物》)

两汉政府在西域的长期经营,使中西经济、文化往来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当时中西交通的主要干线。这条道路分为南北两道,南道从阳关西行,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至莎车,然后越过葱岭,至大月氏、安息。北道从玉门关西行,经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至疏勒,踰葱岭,到大宛、康居等地。中国的丝织品经这些道路运往西方。而中亚的许多农作物品种,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内地。几千年来,“丝绸之路”对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贸易的发展,汉政府铸制的货币五铢钱,在西域各地广泛流通,在今新疆许多古代遗址中,经常有所发现。^①

^① 例如,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第70页记载:在孔雀河沿岸方圆不及一里的一块地面上,即“拾五铢钱约六百枚”。斯坦因的考古报告也说,仅在和田约特干遗址一处,就拾得五铢钱四百七十余枚。散布之广,由此可见。

两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实行有效管辖,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从这时起,西域地区的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三国至隋各王朝对西域的经营

三国时期,在天山南路主要有鄯善、于阗、龟兹、疏勒,天山北路东有车师后部,西有乌孙。

曹魏平定河西的地方势力后,开始复通西域,在高昌和海头(今罗布泊楼兰遗址)分别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①“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并遣子入侍。^②魏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为魏守侍中、大都尉,颁给印信。^③西晋继续经营西域,二九二年封兰戾为大宛王。^④和田出土有“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王”等字样的木简,^⑤说明鄯善等五国受晋册封、同有上述封号。有些木简是魏晋西域长史转发中央政府指令“罗捕”罪犯的公文及政府签发的“过所”(通行

① 《魏略·西戎传》,引自《三国志》,第30卷,《乌丸鲜卑东夷传》注;《三国志》,第2卷,《文帝纪》;罗振玉:《流沙坠简》,王国维序。

② 《魏略·西戎传》,引自《三国志》,第30卷,《乌丸鲜卑东夷传》注;《三国志》,第3卷,《明帝纪》。

③ 《魏略·西戎传》,引自《三国志》,第30卷,《乌丸鲜卑东夷传》注。

④ 《晋书》,第3卷,《武帝纪》。

⑤ 罗振玉:《流沙坠简》,《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第3、4简。

证)。① 罗布泊海头遗址还出土署有“建兴”、“景元”、“咸熙”、“泰始”、“永嘉”等魏、晋年号木简。从简文所记,知西域长史属下有“帐下将”、“假司马”、“郎中”、“兵曹”、“铠曹”、“水曹”、“功曹史”②等职官。当地驻军一面执行守卫任务,一面屯田积粟、兴修水利。如:将张僉、梁襄两部兵四十七人,种田八百亩,筑堤人数一次多达五百。③其他有关屯田、筑堤、灌溉的木简数量很多。据此可知魏、晋在罗布泊地区驻军屯田的梗概。

十六国时期(三〇四——四三九年),河西走廊先后出现前凉、后凉、北凉等王朝,它们都曾在西域设立行政管辖机构。

三二七年前凉在车师前部设高昌郡,任命太守管理,并设伊吾都尉、西域校尉、西域都尉等职官。④ 三三五年沙州刺史杨宣率军征讨龟兹、焉耆,于是西域诸国“并遣使诣姑臧(今武威)奉贡”。⑤

三七六年前秦苻坚灭前凉,任命梁熙为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杨翰为高昌太守。三八二年车师前部王和鄯善王要求复置西域都护。苻坚命吕光率兵七万,出师

① 罗振玉:《流沙坠简》,《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第1、17—20简。

② 罗振玉:《流沙坠简》,《屯戍丛残考释》;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25页。

③ 罗振玉:《流沙坠简》,《屯戍丛残考释》,戍役类,第31、32简。

④ 《魏书》,第101卷,《高昌传》;第99卷,《张骏传》;《十六国春秋》,第75卷,前凉录六。

⑤ 《十六国春秋》,第72卷,前凉录三,《张骏传》。

西域，“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寔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率其国兵为光向导”。^①吕光降服焉耆、龟兹，西域诸国“不远万里皆来归附”。^②三八六年，吕光在河西地区建立后凉，派其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③

四〇三年后凉灭亡，河西地区为西凉、北凉所割据，他们继续经营西域，先后据有伊吾、高昌等地。

四三九年北魏灭北凉，结束了北方长期混乱的局面。四四五年和四四八年北魏出兵降服鄯善、焉耆、龟兹，命万度归镇守焉耆，^④又以韩牧驻鄯善，“领护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镇之，赋役其人，比之郡县”。^⑤

五世纪六十年代，北魏由盛转衰，对西域的控制也因之削弱，柔然、高车、暎哒等游牧民族进入塔里木盆地与吐鲁番一带。高昌地区为汉族人建立的地方政权所控制。五〇〇年，汉人麴嘉据高昌为王。史书称麴氏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⑥“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其刑

① 《晋书》，第114卷，《苻坚载记》下。

② 同上书，第122卷，《吕光载记》。

③ 同上。

④ 《魏书》，第4卷，《世祖纪》；第102卷，《西域传》。

⑤ 《资治通鉴》，第125卷，元嘉二五年条；《魏书》，第102卷，《西域传》。

⑥ 《北史》，第97卷，《高昌传》。

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① 麹氏高昌对北魏、北周始终保持臣属关系，北魏并封高昌王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泰临县开国伯”。

隋初，西突厥、吐谷浑控制西域和青海等地。六〇九年隋军大败吐谷浑部，“由西平（今青海西宁县）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② 隋即在西域设鄯善、且末等郡。^③ 同年，伊吾“献西域数千里之地”，^④ 于是隋又置伊吾郡。^⑤ 六一一年西突厥内乱，居于乌孙故地的处罗可汗率部众降隋。^⑥ 吐鲁番地区的麹氏高昌国也“遣使贡献”，其王“麹伯雅来朝”称臣。^⑦

第三节 唐朝的西北疆域

六一八年唐朝建立。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均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盛大局面。唐帝国的西北疆域，比两汉至隋有更大的扩展。

① 《周书》，第50卷，《高昌传》。

② 《隋书》，第83卷，《西域传》。

③ 同上书，第3卷，《炀帝纪》上。

④ 同上。

⑤ 《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州伊州地志残卷》。

⑥ 《隋书》，第84卷，《西突厥传》。

⑦ 同上书，第3卷，《炀帝纪》上。

六三〇年唐太宗降服东突厥，控制漠南广大地区，声势大振，从而为统一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西突厥伊吾城主举所属七城来降。^①六四〇年唐军讨平高昌麹氏政权，其王麹智盛降。^②居于多逻斯川（今额尔齐斯河）的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也率部归附。^③唐先后在伊吾、高昌及天山北部设立伊、西、庭三州和安西都护府，迈出了统一西域的第一步。^④

当时西突厥连年内乱，势力渐衰，但仍控制西域大部地区。焉耆、龟兹依附西突厥，对抗唐朝。六四四年唐派兵讨焉耆，六四八年又派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大军灭龟兹，“遣使者谕降小城七百余，西域震惧”。^⑤接着，唐政府移安西都护府（后改为大都护府）于龟兹，“统于阗、碎叶（今苏联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疏勒，号四镇”，^⑥并设龟兹都督府。^⑦嗣后又陆续设立焉

① 《旧唐书》，第198卷，《西戎传》；《新唐书》，第221卷，《西域传》。

② 《新唐书》，第221卷，《高昌传》。

③ 同上书，第215卷下，《突厥传》；第40卷，《地理志》。

④ 庭州治所在金满县，即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遗址。安西都护府此时设于西州。

⑤ 《新唐书》，第221卷，《龟兹传》；《旧唐书》，第198卷，《龟兹传》。

⑥ 同上。按：设四镇之初，即有中亚碎叶。六七九年安西都护王方翼扩建碎叶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成为远近闻名的中西交通贸易中心（《旧唐书》，第185卷，《王方翼传》）。《新唐书》《地理志》置碎叶于焉耆，误。详见卫江：《碎叶是中国唐代重镇》；吴震：《从吐鲁番出土“汜德达告身”谈唐碎叶镇城》，载《文物》杂志1975年第8期；伊瀛仙太郎：《西域经营史的研究》。

⑦ 都督府为民政机构，镇是军事机构。

耆、疏勒、毗沙(于阗)三都督府,均属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这些重大措施,使唐在西域的统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

六五一年阿史那贺鲁发动叛乱,“建牙于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遂统咄陆、弩失毕十姓”。^①六五七年,唐政府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由金山进兵,右屯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②自西州进兵,分进合击,于金牙山大破贺鲁所部,跟踪追至楚河,击溃其余众,最后在石国(今苏联塔什干)擒获贺鲁,^③西突厥十姓部落居地全部归入唐朝版图。唐置昆陵、濠池两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管辖今新疆北部及巴尔喀什湖以南直至楚河一带;以阿史那步真为濠池都护,管辖楚河以西至咸海的广大地区。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昆陵都护府下设匏延、温鹿州、洁山、双河、鹰娑、盐泊州、阴山、大漠州、玄池州、咽面州、轮台州等二十三个都督府。濠池都护府也设有若干州府,其名已不可考。

同一时期,唐政府还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地域,设立贵霜、休循、安息、木鹿、佉沙、南谿等州及康居、大

① 《新唐书》,第215卷下,《突厥传》。六三五年后西突厥分为十部,其五咄陆部落为左厢,居碎叶河(今楚河)以东;五弩失毕部落为右厢,居碎叶河以西,称十姓部落。千泉,在今苏联伏龙芝西灭尔基。

② 阿史那弥射和阿史那步真都是西突厥室密点可汗后代,贞观十三年率部归附唐朝。

③ 《新唐书》,第215卷上,《突厥传》;《旧唐书》,第83卷,《苏定方传》。

宛、姑墨州等都督府，在帕米尔地区设立至拔州、乌飞州等都督府。^①

唐在今新疆东部伊、西、庭三州和隶属沙州的罗布泊一带，实行与中原完全相同的州、县制度，户口直接上报户部。三州共辖伊吾、高昌、金满、轮台（今乌鲁木齐北）等十二县，县下有乡、里、保等基层组织。^②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都在上述地区普遍推行。

西域其他地区实行都护府、都督府制度，归安西大都护府管辖。七〇二年唐又于庭州设北庭大都护府，濠池、昆陵两都护府改归北庭管辖。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是唐在西域最高军政机构，设有大都护、副大都护、都护、副都护、长史、司马等官，贯彻执行唐政府各项政令。

在两大都护府辖区内，唐政府任命当地的酋长或国王担任都督、州刺史等职，授予王、公、大将军、中郎将等爵衔。^③有些部落首领，还由唐政府发给固定俸禄。遇有战事，西域各国义务服从唐政府的征调。七三九年西突厥突骑施黑姓部酋长吐火仙据碎叶、怛罗斯（今苏联江布尔）叛，北庭大都护盖嘉运率军征讨，调拔汗那、石国、史国兵从征，迅速收复两城，擒吐火仙等送京师。^④唐政

① 《旧唐书》，第40卷，《地理志》三。

② 在吐鲁番等地出土唐文书中，乡、里名称屡见，以高昌为例，即有武城、太平等十三个乡，安义、归化等二十个里的名称。见（日）西域文化研究会编：《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第156页。

③ 《册府元龟》，第964—965卷。

④ 《新唐书》，第215卷下，《突厥传》；《旧唐书》，第9卷，《玄宗纪》。

府因此“册石王为顺义王，加拜史王为特进，显赫其功”；并册封拔汗那王为奉化王。^①西曹国王哥罗仆罗也上书唐政府说：“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②

在货币制度方面，西域各地遵唐钱法形制铸钱流通，伊塞克湖北岸曾出土铸有突厥文、汉文合璧的西突厥货币。^③唐朝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近年在新疆各地和苏联托克马克均有发现。^④

唐为加强对西域的统治，建立了一整套军事机构，在安西、北庭辖境内各重要地区和交通要道，设有军、镇、守捉等军事单位，分布于天山南北各地，“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⑤负责守卫边疆及稽查行旅。七〇二年唐在西域设节度使。开元时，安西、北庭两节度使统率的驻军共有四万四千人。其中安西四镇二万四千人；北庭二万人。^⑥在帕米尔地区设有葱岭守捉。在碎叶镇置保大军驻守，瀚海军、天山军也一度调驻该地。^⑦碎叶镇守使多由都护兼任，如安西都护王方翼、杜怀宝，

① 《新唐书》，第215卷下，《突厥传》；第221卷下，《西域传》。

② 同上书，第221卷下，《西域传》。

③ 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第191—192页。

④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06—108页；三上次男等：《中国文明与亚洲大陆》，第211—212页。

⑤ 《旧唐书》，第196卷上，《吐蕃传》。

⑥ 同上书，第40卷，《地理志》三；《通典》，第172卷，州郡二，“镇西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注。

⑦ 《新唐书》，第40卷，《地理志》；《唐会要》，第78卷。

北庭都护吕休璟都曾兼任此职。

屯田也是唐政府加强西域地区军事建设的重要措施。唐设四镇后“岁调山东(指华山以东)丁男为戍卒,缿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①安西、北庭两都护自开元以后,均加“营田使”职衔,^②各军镇广开屯田,远及塔拉斯河流域。^③据记载:西域屯田有“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④以每屯平均四十顷、每顷百亩计,共达二十多万亩。^⑤在唐政府的大力经营下,西域广大地区呈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龟兹附近“数十里悉为良田”,^⑥“轮台、伊吾屯田,禾菽相望”。^⑦

唐代,西域和中原地区的各族人民往来频繁,于阗尉迟氏、疏勒裴氏、龟兹白氏以及“昭武九姓”(即康、安、曹、石、米、何等国)流寓长安,人数相当可观。^⑧他们促进了

① 《旧唐书》,第196卷,《吐蕃传》。

② 同上书,第103卷,《郭虔瓘传》;第104卷,《封常清传》。

③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2集,丁谦著《元耶律楚材西游录地理考证》。

④ 南宋本《唐六典》,第7卷,《屯田郎中》条注。现通行明刊本脱落此条。转引自(日)《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编纂》,第1辑,《南宋本店六典校勘记》。

⑤ 《唐六典》,第7卷:诸军州营屯“大者五十顷,小者二十顷”。另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物中有“天山屯营田五十顷”,“柳中屯营田三十顷”的记载,见(日)《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第127页。

⑥ 《全唐文》,第233卷,《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元振)公行状》。

⑦ 《新唐书》,第216卷,《吐蕃传》。

⑧ 《资治通鉴》,第232卷,唐贞元三年条:“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并

西域文化在中原的传播。同时，汉族人民也大量入居西域。玄奘途经怛逻斯附近时，亲见有汉人三百户筑城而居。^⑨ 随着汉族人民进入西域，中原文化在当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解放前后，新疆出土唐代文献中有汉文佛教经典、经史诗文、历书、医书、道教典籍等，数量相当可观。在库车地区出土唐写本《汉书·张良传》残页，^⑩ 吐鲁番地区发现唐写本《毛诗》、《尚书》、《孝经》、《文选》、《论语》^⑪ 及《张文仲疗风方》、《神农本草经》、《焉婆五脏论》、《诸医方髓》^⑫ 等书残页或残卷。一九五九年在若羌县米兰古城遗址还发现唐元和十年（八一五年）、十五年（八二〇年）回纥族人《坎尔曼诗签》两件，一件是坎尔曼自作的汉文诗，一件是白居易的《卖炭翁》。其自作诗《忆学字》云：“古来汉人为吾师，为人学字不疲倦。吾祖学字十余载，吾父学字十二载，今吾学之十三载。李杜诗坛吾欣赏，迄今皆通习为之。”^⑬ 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了唐代中原文化在西域普及的程度。

事及西域使人”“留长安久者，或四十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共有四千人之多。非“奏事”“使人”而居长安者，尚不在内。

⑨ 《大唐西域记》，第1卷。

⑩ （日）《西域考古图谱》，下卷，转引自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第64页第18图。

⑪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第17—24页，图报1—4。

⑫ 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中央亚细亚出土文书四种》。

⑬ 《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发掘简报》；郭沫若《〈坎尔曼诗签〉试释》，载《文物》杂志，1972年第2期。



唐碎叶城大云寺遗址

(采自苏联《吉尔吉斯考古——民族志考察团著作集》第2集)

唐时佛教盛行，武则天崇佛，于六八九年“令诸州各置大云寺”。^①龟兹、疏勒和碎叶等地也按诏令建大云寺。^②玄宗时，庭州、龟兹、于阗等地又按诏建龙兴寺。唐以前人都是西域僧侣入中原住寺传教，唐代多数是中原地区僧侣入西域各地住寺传教。今库车库木土拉千佛洞为唐龟兹佛教圣地，洞内题记多用汉文，^③有的佛洞四壁为

扶以石甲厥川邑碎葉崑崙中者二嶺好一
 多來國肯各西居葉川空春盡千南大真
 小自人專有接零城其萬夏經餘是良珠
 麥三鎮相兵石落天川切常胡里大馬
 稻月即勞馬國昔寶東轉雨境其唐又河
 禾至天掠數約交七頭墮雪而水北云一
 碗九寶以萬長河年有者故入籍界碎名
 豆月十為城于公北熱莫日北南嶺葉質
 畢天年奴堡餘主庭海却雪海梳北國河
 豆無高婢間里所節茲所海又者是從西
 飲雲仙其雜川居度地在中北盡安西北
 補兩乏川日中止使寒教有行過歟西
 荷皆軍西尋有之王而達細數中騎西北
 括以敗頭千異處正不嶺道日國施北
 盡雪之有戈姓建見凍北道度而南千地
 酒木地城凡部大溝故行傍雪歸界餘平
 酪種從名是落雲伐日千往海東南有廠
 乳田此已農有寺城熱餘往其海嶺南多
 宜至仰人異猶壁海里有海嶺至敦果
 西羅皆姓存權又至本在北慈達寶
 極斯擇察其毀有碎孔山流嶺出

杜环《经行记》关于

碎叶大云寺的记载

(采自朴佑：《通典》第193卷)

往来汉僧留名题记，“刻划汉字殆遍”，并有“大唐大顺五

年(八九四年)”等字样。^④

七五五年“安史之乱”发生,唐政府将派驻西域军队大部调入内地作战,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与唐中央政府之间道路阻绝,但仍坚守西域地区达三十余年,至七九〇年吐蕃攻陷北庭,不久安西也失陷,回纥继之而起,在西域建立了政权。

第四节 五代辽宋时期的西域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分裂、动荡的时期,直到元朝才重新统一。在这期间,西域地区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几个割据政权并立的时期,时间从唐朝灭亡到十二世纪;第二阶段是西辽统治西域的时期,时间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二十年代成吉思汗统一西域为止。

① 《旧唐书》,第6卷,《则天皇后纪》。

② 杜佑:《通典》,第193卷,《边防》九,杜环《经行记》。按: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苏联考古工作者在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发现一座规模巨大的唐代古城遗址。古城西南部佛庙被确定为七至八世纪的建筑物,具有古代中国佛庙建筑的独特风格。一般学者认为该城即唐代碎叶城,该寺即碎叶大云寺。参看克兹拉索夫:《1953—1954 年对阿克别希姆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见苏联《吉尔吉斯考古——民族志考察团著作集》,第2集。(日)三上次男、获雅夫、佐久间重男:《中国文明与亚洲大陆》,第211—212页。

③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载《文物》杂志,1962年第7、8期。

④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13—17页。

一、几个割据政权并立时期

唐朝灭亡前后，西域出现了几个政权，如在八拉沙衮^①和西州有回鹘人建立的政权，在伊州有汉人建立的政权。

回纥是维吾尔族的祖先，远在北魏时就以袁纥的名称活动在历史舞台上，^②隋代称乌护、韦纥或乌纥，^③唐代称回纥。^④回纥原来生活在色楞格河流域，^⑤北魏时，逐渐向南扩展，到六、七世纪，鄂尔浑河和土拉河一带，都成了他们游牧的地方。^⑥还有一部分回纥人，居住在伊吾以西，焉耆以北，白山(天山)之傍。^⑦

唐朝贞观(六二七——六四九)初年，回纥和薛延陀是蒙古草原北部最强盛的部族。六四六年，回纥著名的首领吐迷度与唐军相配合，大破薛延陀，“并其部曲，奄有其

① 八拉沙衮，唐代称为“裴罗将军城”，西辽称“虎思斡耳朵”，金代称“骨斯讹鲁朵”，元代称“谷则翰儿朵”，或简称“古八里”(“八里”，蒙古语，意为“城”)。唐贾耽《皇华四达记》说：“裴罗将军城，又西四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根据碎叶城的位置可知八拉沙衮在今苏联托克马克附近。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4卷《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

② 《魏书》，第2卷，《太祖纪》；第103卷，《高车传》。

③ 《隋书》，第84卷，《铁勒传》。

④ 《旧唐书》，第195卷，《回纥传》。

⑤ 王静如：《译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载《辅仁学志》第7卷第1、2合期，第214页。

⑥ 《魏书》，第103卷，《高车传》；《隋书》，第84卷，《铁勒传》；《新唐书》，第217卷上，《回鹘传》。

⑦ 《隋书》，第84卷，《铁勒传》。

地”。^① 同年，回纥归降唐朝，奏称，“愿归命天子，请置唐官。”^② 唐政府召见诸部首领，“以唐官官之，凡数千人”。^③ 六四七年，唐朝在回纥部建立瀚海都督府，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并设长史和司马等官。从此以后，回纥每年向唐朝缴纳貂皮，作为赋税。^④

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回纥发生内乱，将军句录末引黠戛斯兵十万骑攻破回纥可汗城，杀死可汗，回纥汗国灭亡。有十五个回纥部落在驸马率领下西奔葛逻禄。^⑤ 据《新唐书》记载，这时葛逻禄居于“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罗斯诸城”。^⑥ 所谓“十姓可汗故地”，就是西突厥五咄陆部和五弩失毕部的故地。这支回纥人西迁后在八拉沙衮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史家称喀喇汗国。十世纪后期，喀喇汗国波拉汗竭力扩大疆土，喀什噶尔、喀喇昆仑、福拉卜（讹打刺）都归他统治。他和他的继承者还远征阿姆河流域，攻取布哈拉城等地，确立了对阿姆河北的统治。^⑦ 当时，喀什噶尔是汗国的第二都城，也是主要的文化中心。

喀喇汗国占据喀什噶尔以后，于阗便成了它的毗邻。

① 《旧唐书》，第195卷，《回纥传》。

② 《新唐书》，第217卷上，《回鹘传》。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旧唐书》，第195卷，《回纥传》。

⑥ 《新唐书》，第217卷下，《回鹘传》。

⑦ 白来资乃德：《中亚中古史研究》，第1卷，1910年伦敦出版，第252—253页。

这时统治于阗的是“自称唐之宗属”的李圣天。^① 九三八年,后晋派遣张匡邺持节至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② 十一世纪初,于阗被喀喇汗国攻灭。^③ 从此,于阗与宋朝的关系也就是喀喇汗国与宋朝的关系。一〇六三年,北宋封于阗王为特进归忠保顺砺鳞黑韩王。^④ 由于唐朝皇室曾多次把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为妻,所以,于阗王在表文中称宋朝皇帝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⑤

于阗的北方是西州回纥。唐末回纥汗国被黠戛斯攻灭时,有一支回纥人离开蒙古草原来到北庭。八六六年,北庭回纥首领仆固俊“尽取西州、轮台等城”。^⑥ 此后,他们就以西州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政权。宋朝称这个政权为“西州回纥”,辽朝称“和州回纥”。

西州回纥从九〇七年开始向辽太祖阿保机进贡。九二四年,阿保机“遣兵踰流沙,拔浮图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尽取西鄙诸部。”^⑦ 从此辽朝的势力达于西域,西州回纥成了辽的属国。辽朝在西州回纥设置高昌国大王府,^⑧ 任命克直普尔为大王府太师、大丞

① 《宋史》,第490卷,《于阗传》。

② 《新五代史》,第74卷,《于阗传》;《宋史》,第490卷,《于阗传》。

③ 斯坦因:《古代和阗》,1939年北平影印本,第180页。

④ 《宋史》,第490卷,《于阗传》。按:于阗称金翅鸟为“砺鳞”。

⑤ 《宋史》,第490卷,《于阗传》。

⑥ 《新唐书》,第216卷下,《吐蕃传》;第217卷下,《回鹘传》。

⑦ 《辽史》,第2卷,《太祖本纪》;第70卷,《属国表》。

⑧ 同上书,第46卷,《百官志》,“北面属国官”。

相。^①

西州回纥的东边是伊州，当时处于唐将陈氏后裔的统治之下。^②

二、西辽时期

十二世纪三十年代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西辽。

耶律大石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八代孙，精通辽、汉文学，文武兼备。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屡遭金兵沉重打击的辽朝，已经面临绝境。一一二四年，耶律大石脱离辽朝，自立为王，率领部众辗转西行。一一三〇年，耶律大石兵到和州（吐鲁番），回纥王毕勒哥表示“愿质子孙为附庸”。^③随后大石继续西进，一路上“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军势越来越盛。这时，喀喇汗国已趋衰微，当耶律大石的军队抵达八拉沙衮时，喀喇汗国的统治者不战而降。接着耶律大石又派兵征服了喀什噶尔、于阗、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和起儿漫等地。^④

一一三一年，耶律大石在起儿漫^⑤即皇帝位。一一三三年建都于八拉沙衮，命名为“虎思斡耳朵”。^⑥这个政权

① 欧阳玄：《圭斋文集》，第11卷，《高昌契氏家传》。

② 王延德：《高昌行记》。

③ 《辽史》，第30卷，《天祚皇帝本纪》。

④ 《中亚中古史研究》，第1卷，第228—229页；《辽史》，第30卷，《天祚皇帝本纪》。

⑤ 起儿漫，即今苏联的卡尼麦赫。

⑥ “虎思”，契丹语，“有力”的意思。“斡耳朵”是“宫帐”或“宫殿”的意思。

自认是辽朝的继续，史称“西辽”或“后辽”，也称“契丹”或“喀喇契丹”。

西辽存在八十多年，它的辖境北达额敏河流域，南抵喀喇昆仑山脉，东至哈密，西界阿姆河。境内有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和锡尔河等著名河流，还有阿里麻里、塔拉斯、海押立、撒马尔罕、喀什噶尔、叶尔羌、于阗、龟兹和别失八里等重要城镇。^①撒马尔罕是其中最大的城市，西辽在这里设置河中府，^②城中居民十万家，有回纥人、契丹人和汉人等。^③

西辽使用汉文和契丹文，历代统治者都采用汉文的尊号、谥号和年号，职官名称也多用汉文。耶律大石相当重视汉族文化，十三世纪二十年代随成吉思汗在西域住过多年的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曾写诗赞扬说：“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振，百年名教垂”。^④

第五节 元、明两代的西域

一、元政府对西域的统治

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崛起，

^① 《辽史》，第30卷，《天祚皇帝本纪》；《中亚中古史研究》，第1卷，第228—229页；《多桑蒙古史》，第62—63页。按：阿里麻里，在今新疆轮台县西北。海押立，在今苏联科帕尔。

^②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第4卷，《再用韵记西游事》。

^③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④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第12卷，《怀古一百韵寄张敏之》。

先后打败塔塔儿、篾儿乞和克烈等部，成了蒙古草原上最强大的一支力量。一二〇四年，铁木真进攻分布于杭爱山、阿尔泰山之间和额尔齐斯河一带的乃蛮部，杀死乃蛮部首领塔阳汗。^①塔阳汗的儿子屈出律被迫西奔八拉沙衮，依附于西辽古儿汗直鲁古。^②一二〇六年，铁木真即大汗位，称成吉思汗。第二年，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招服了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斡亦剌部和吉利吉思（吉尔吉斯）部，唐努山一带的秃巴思部（即唐努乌梁海人），托博尔河一带的失必儿部等。^③这样，贝加尔湖以西直至托博尔河都处于成吉思汗的统治之下。

成吉思汗的强大，震撼了西辽的统治。一二〇九年，西辽属部畏兀儿（即西州回纥）归附成吉思汗。^④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招服巴尔喀什湖以南一带的西辽属部合剌鲁。阿里麻里和撒马尔罕也脱离西辽的统治。同年，屈出律篡夺了西辽的汗位。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出征西域，迅速消灭了屈出律，于是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城“皆望风降附”。^⑤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攻占锡尔河中游右岸的讹答剌城。翌年，他挥军横渡锡尔河，攻

① 《元朝秘史》，第7卷，四部丛刊本，第25—45页。

② 同上书，第8卷，第5页。

③ 同上书，第10卷，第16—17页。

④ 《元史》，第122卷，《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第124卷，《哈剌亦哈赤北鲁传》和《岳璘帖穆尔传》。

⑤ 《元史》，第120卷，《曷思麦里传》。

一二五二年，蒙哥为了削弱窝阔台系，把他的封地分割成小块，封窝阔台的儿子哈丹于别失八里，蔑里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孙海都于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海押立一带，脱脱于额敏河流域。^①

一二五九年蒙哥去世。翌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西域的统治。

一二七五年元政府在伊犁一带建置阿里麻里行中书省和行枢密院，一二七六年在和阗建立元帅府，并派兵镇守。^②一二八〇年，在别失八里设置北庭都护府。^③一二八一年，以辅国上将军綦公直为宣慰使兼都元帅，镇守别失八里。^④随后，元政府又在别失八里、和州等处设立宣慰司、提刑按察使司和交钞提举司。^⑤

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元政府在西域大兴屯田。一二八二年，命怀远大将军李进领兵“屯田别失八里”。^⑥一二八七年，派汉军屯田哈密。同年，又派兵屯田车尔成。^⑦一二八八年，命戍军屯田于阗，并派忽撒马丁“督斡端（于阗）可失合儿（喀什噶尔）工匠千五十户屯田”。^⑧一二九

① 《元史》，第3卷，《宪宗本纪》。

② 同上书，第126卷，《安童传》；第127卷，《伯颜传》。

③ 同上书，第11卷，《世祖本纪》。

④ 同上书，第165卷，《綦公直传》。

⑤ 同上书，第11、12卷，《世祖本纪》。

⑥ 同上书，第154卷，《李进传》。

⑦ 同上书，第14卷，《世祖本纪》。

⑧ 同上书，第15卷，《世祖本纪》。

三年，调吉利吉思七百户到喀什噶尔屯田。^①

忽必烈还在西域设立许多驿站。一二七四年，在于阗和叶尔羌两城设立十三个水驿。^②一二八一年，从山西雁门以北的太和岭至别失八里，设置三十个新站。^③一二八三年和一二八五年又先后在畏兀儿境内设置十处驿站。^④

在元代，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往来比前更加频繁。一二五九年元朝派往西域的官员常德叙述沿途所见说，从乌伦古河到别失八里附近，“近五百里，多汉民”。在伊犁果子沟“有关曰铁木尔忒察，守关者皆汉民”。在阿里麻里城，“回纥与汉民同居”。“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山西并水和汾水）人”。^⑤在西域其他地方，同样有许多汉人居住。^⑥

随着大量汉人西迁，汉族文化在西域广为传播。耶律楚材在布哈拉就见到了“素袖佳人学汉舞”的情景。^⑦长春真人邱处机在别失八里也见到“侏儒伎乐，皆中洲人”。^⑧为了满足维吾尔人阅读的需要，有些汉文书籍，如

① 《元史》，第17卷，《世祖本纪》。

② 同上书，第8卷，《世祖本纪》。

③ 同上书，第63卷，《地理志》；第11卷，《世祖本纪》。

④ 同上书，第12、13卷，《世祖本纪》；第63卷，《地理志》。

⑤ 刘郁：《常德西使记》。

⑥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元史》，第100卷，《兵志》。

⑦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第4卷，《赠蒲察元帅七首》，其五。

⑧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资治通鉴》，也由元政府组织人员译成维文，于一二八二年刊行。^① 佛教经典，也多从汉文译成维文；有些地方的僧人，甚至直接“诵汉字佛书”。^② 在科学技术方面，如火药等，也在这时传入西域。汉族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也由汉族劳动人民带到西域，元政府还“设立冶场于别十(失)八里，鼓铸农器”。^③ 从汉族地区传入的生产技术，受到西域人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赞扬说：“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就是当地人对汉人的称呼。^④

象汉人、蒙古人移居西域一样，西域各族移居内地的也相当多。不少西域人在元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中担任重要官职。在河北、河南、湖北、云南等地，都有维吾尔或合剌鲁的驻军戍守。

这些迁徙到中原地区居住的维吾尔、合剌鲁或其他族人，由于受汉文化的熏陶，“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⑤ 定居河南南阳的合剌鲁人马易之，^⑥ 便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人。元人危素曾为马易之的《金台集》作序，说：合剌鲁自归附成吉思汗后，“至今

① 《元史》，第12卷，《世祖本纪》。

② 乌古孙口述、刘祁笔记：《北使记》。

③ 《元史》，第12卷，《世祖本纪》。

④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⑤ 戴良：《丁鹤年集序》。转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4卷，第53页，励耘书室丛刻本。

⑥ 马易之，即葛罗禄易之。“葛罗禄”，突厥语，意为“马”。因此，葛罗禄易之也叫做马易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3卷，第36页。）

百有余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往业诗书而工文章”。^①可见象马易之这样喜爱汉文学的合刺鲁人是很不少的。在维吾尔族中，以文学著称的也不乏其人，小云石海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工于诗文，又是书法名家，“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牘，如获拱壁”。^②元代纂修《辽史》、《金史》、《宋史》，也都有维吾尔人参加。

移居中原的西域人，还带来了别具一格的西域文化，为中原地区的科技艺苑增添了新的光彩。医学方面，元政府在太医院中设广惠司，掌管“修制回回药物及和剂”。大都和上都设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③天文学方面，忽必烈广招西域天文人才，在一二七一年设置回回司天台（一三一四年改为回回司天监），应用西域天文知识和仪器观测天体。^④回回历法《万年历》，也在一二六七年由忽必烈“稍颁行之”。^⑤在军事技术方面，“回回炮”早在元初就传入内地。“回回炮”也叫“西域炮”，又称“巨石炮”，是一种发射石头的抛石机。^⑥元政府设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管理回回炮手工匠。^⑦

① 乃贤：《金台集》，第2卷，《危素金台后稿序》。

② 《元史》，第143卷，《小云石海涯传》。

③ 同上书，第86卷，《百官》。

④ 同上书，第90卷，《百官》；第48卷，《天文》。

⑤ 同上书，第52卷，《历法》。

⑥ 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1954年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5—58页。

⑦ 《元史》，第86卷，《百官》。

总之，在元代，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大大地加强了。

二、明代的西域

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就着手经营西域。从一三七一年起，明政府在嘉峪关以西先后设置了曲先、安定、阿端、罕东等卫所，管理上述各地的军政事务。^①一三八〇年，都督濮英率兵西进，“开哈梅里（哈密）之路，以通商旅”。^②哈密统治者原元朝威武王忽纳失里向明朝纳款投诚。忽纳失里死后，弟安克帖木儿继位。一四〇四年，明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赐金印，“使守其民，绥抚其民”。^③不久，安克帖木儿被鞑靼别部鬼力赤毒害，其侄脱脱袭忠顺王爵。一四〇六年，明政府为了加强统治，建哈密卫，以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使、千户、百户和镇抚等官。同时任命汉人周安为长史，刘行为纪善，辅助脱脱。^④到了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察合台后王统治下的吐鲁番逐渐强盛。开始侵扰哈密，并于一四七二年抢走忠顺王金印。一五三〇年，哈密终于为吐鲁番所并。由于受到察合台后王的阻挠，明朝未能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西域仍然处于察合台后王的统治之下。

① 《读史方舆纪要》，第64卷，第2768页；万历《明会典》，第107卷，《西域》；张雨：《边政考》，第6卷，《西域》。

② 《明史》，第330卷，《哈梅里传》。

③ 《明太宗实录》，第29卷，第11页，“永乐二年六月甲午条”。

④ 同上书，第41卷，第10页，“永乐四年三月丁巳条”。

察合台后王从十四世纪末开始同明朝建立联系。一四一六年，察合台后王马哈木去世，明朝派中官李达前往吊祭，并封马哈木嗣子纳黑失只罕为王。^①一四一八年，纳黑失只罕为其从弟歪思所弑。这时分布在哈密、别失八里以北的瓦剌逐渐强大，曾多次南下侵扰别失八里。歪思汗为了避开瓦剌的锋芒，便把都城西迁到伊犁河谷的亦力把里。从此，这个政权便称“亦力把里”。^②

在亦力把里察合台后王统治下的居民，除了蒙古人和维吾尔人外，还有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等族。

吉尔吉斯自古游牧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九世纪中叶是吉尔吉斯最强盛的时期，其辖境东至贝加尔湖附近的骨利干部，西南与葛逻禄为邻，南至天山北麓。^③从元朝开始，吉尔吉斯人大批离开叶尼塞河上游向西域迁移，到十六世纪初，吉尔吉斯人已分布于天山南北，西达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

哈萨克是一个出现较晚的民族，由蒙古人和突厥人等融合而成。十五世纪初，原金帐汗国的白帐兀鲁思（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西）和昔班兀鲁思（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北直至托博尔河流域）联合建立了月即伯（乌兹别克）汗国。由于统治集团争权夺利，汗国经常发生内乱。在阿不勒海儿汗统治时期（一四二八——一四八八年），大

① 《明太宗实录》，第100卷，第4页，“永乐十四年三月壬寅条”。

② 同上书，第109卷，第7页，“永乐十六年二月庚戌条”。

③ 《唐书》，第217卷下，《黠戛斯传》。

批牧民脱离月即伯汗国，逃到察合台后王境内，在楚河和塔拉斯河两岸游牧。^①从此，这些人便称为哈萨克。一五〇〇年，月即伯汗昔班尼打败帖木儿的后裔，^②占领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地。哈萨克人乘昔班尼汗南征之机，逐渐据有他原来的领地。后来，哈萨克分成三个不相统属的玉兹，即大、中、小三部。

十六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准噶尔盆地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一带为瓦剌、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所占，察合台后王被迫退往南疆。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察合台后王在南疆的统治被厄鲁特准噶尔部推翻。

第六节 十八世纪中叶确定的 清朝西北疆域

一、厄鲁特准噶尔部贵族的割据 和清政府统一西北地区

厄鲁特是蒙古族的一支，元代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厄鲁特”或“额鲁特”，也称“卫拉特”。

① 海德尔：《拉什德史》，英译本，1895年伦敦出版，第82页；帕利哥夫等著，张吾译：《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57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第24页。

② 帖木儿（一三三六——一四〇五年），原是察合台后王属下官员，一三七〇年在撒马尔罕建立政权，自称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其后不断向外扩张，建成一个包括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在内的庞大帝国。帖木儿死后，帝国渐趋分裂，十六世纪初为月即伯所灭。

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斡亦剌居于叶尼塞河上源一带。^①一二〇七年，成吉思汗派遣长子术赤北征“林木中百姓”，斡亦剌忽都合别乞首先率众归附。成吉思汗命他管理各部斡亦剌人，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②此后，斡亦剌的统治者与元朝皇室世代联姻，地位尊崇，是元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元朝灭亡后，明朝称“斡亦剌”为“瓦剌”。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派官吏携带敕书前往诏谕瓦剌诸部酋长。^③当时瓦剌分为三部，分别属马哈木、太平和把秃孛罗管辖。一四〇八年，马哈木等派人来朝贡马，并“请印信封爵”。^④一四〇九年，明成祖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封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封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并赐给印诰。^⑤此后，明朝还任命瓦剌诸王属下的各级头人为都指挥使、都指挥僉事、指挥使、千户、百户和镇抚等官。从此，瓦剌各部成为明朝的臣属，每年向明朝纳贡。^⑥一四一六年，马哈木

① 拉施德《史集》记载说：“斡亦剌部族的帐幕和游牧住扎地在八河流域。在古代，沿着这些河流居住着秃马惕部族。八条河从这里流出，汇合成一条河，这条河叫做谦河。谦河流入安加拉河。”（该书，第1卷，第1册，1952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18页。）按：谦河即今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汇流处以南的叶尼塞河。

② 《元朝秘史》，第10卷，四部丛刊本，第16—17页。

③ 《明太宗实录》，第18卷，永乐元年四月壬子条。

④ 同上书，第59卷，永乐六年十月丙子条。

⑤ 同上书，第59卷，永乐七年六月癸丑条；《明史》，第328卷，《瓦剌传》。

⑥ 《明史》，第328卷，《瓦剌传》。

去世。一四一八年，明成祖命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①约在一四三七年，脱欢杀死贤义、安乐二王，兼并其众。一四三九年，脱欢死，子也先“继承祖父爵位。”^②

也先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瓦剌首领，他羽翼丰满之后，便以武力威胁蒙古诸部，东破兀良哈三卫，西攻哈密，并曾一度劫持明英宗，南逼京师。一四五四年，也先被属下杀死，^③瓦剌势力开始衰弱，逐渐西迁，大部分移居天山以北。也先弟伯都王和侄兀忽纳等移居哈密。一四五九年，明朝命伯都王为都督佥事，兀忽纳为指挥佥事。^④

十六世纪时，厄鲁特开始分为土尔扈特、和硕特、准噶尔和杜尔伯特四部，号四卫拉特。此外，还有隶属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最初四部“聚牧天山之北，阿尔泰山之南”，^⑤后来逐渐向西北发展。十六世纪六十年代，上尔扈特部已在额尔齐斯河一带游牧。^⑥十六世纪末，厄鲁特牧地已北达伊希姆河、鄂木河流域和鄂毕河上游一带。^⑦

① 《明太宗实录》，第110卷，永乐十六年四月甲辰条。

② 《明英宗实录》，第75卷，正统六年正月甲子条。

③ 关于也先卒年，《明史》作景泰六年（一四五五年）。《明英宗实录》第246卷景泰五年十月甲午条载：“也先为阿剌知院杀死”。今从《实录》。

④ 《明英宗实录》，第327卷，天顺五年四月甲申条。

⑤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9卷，《厄鲁特要略一》。

⑥ 《蒙古源流》记载：一五六二年，蒙古俺达汗侄孙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行兵四卫喇特，于额尔齐斯河征剿上尔扈特，击杀喀喇博郭罗”，“将锡木必斯土尔扈特存留一半，安置其地”（《蒙古源流笺证》，第6卷，第22页）。

⑦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1964年莫斯科出版，第152—153页。

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准噶尔的一些部落。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在鄂毕河与托木河之间,在托木斯克城与库兹涅次克堡之间,也都有厄鲁特部落游牧。^①

厄鲁特四部之间有松懈的联盟,蒙语称为“丘尔干”。四部首领各有自己的统治中心,“绰罗斯(准噶尔)治伊犁,和硕特治乌鲁木齐,杜尔伯特治额尔齐斯,土尔扈特治雅尔(即今苏联乌尔扎尔)。”^②十七世纪初,准噶尔部哈喇忽喇台吉积极扩大势力,威逼邻部。二十年代,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被迫率众离开自己的牧地,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一六三四年,哈喇忽喇死去,子和多和亲继位,称巴图尔珲台吉。一六三七年,和硕特首领图鲁拜琥率部东迁青海;四十年代初,其侄鄂齐尔图带领所属部众进入西套(阿拉善地区)。准噶尔和杜尔伯特二部仍在西域游牧。

一六四四年清朝建立全国性政权后,和硕特首领图鲁拜琥派人到北京称臣纳贡。一六四六年,清朝赐图鲁拜琥甲冑弓矢,命他统辖诸厄鲁特。^③此后,图鲁拜琥每两年向清纳贡一次。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也附名在图鲁拜琥之后,向清纳贡。^④一六五三年,清朝封图鲁拜琥

① 巴德甫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1919年伦敦出版,第91—93页。

② 魏源:《圣武记》,第4卷,《乾隆荡平准部记》。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9卷,《厄鲁特要略一》。

④ 同上。

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简称“顾实汗”），并“赐金册印”。①一六五六年，顾实汗去世，“鄂齐尔图嗣，为卫拉特首”。②

自从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和硕特部东徙青海以后，准噶尔部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在七河地区和楚河流域游牧的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清代称为布鲁特）都处于准部的统治之下。③叶尼塞河的吉尔吉斯人也成为准部的属民。到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称汗，胁迫厄鲁特各部遵其号令。④一六七九年，噶尔丹进兵天山南路，推翻察合台后王的政权，把南疆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此后数年中，噶尔丹的军队渡过楚河，征服了天山布鲁特人，并占领费尔干纳和赛拉姆（位于今苏联江布尔西南）等地。⑤

一六八七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一六九〇年进一步向漠南蒙古进犯，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的要求，⑥妄图把蒙古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清政府

①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9卷，《厄鲁特要略一》。

② 同上。

③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1957年阿拉木图出版，第233页；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1926年列宁格勒出版，第637页；帝俄《大百科全书》，第76卷，第805—809页。

④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9卷，《厄鲁特要略一》。

⑤ 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2卷，第650—651页。

⑥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第7卷，第34页。

屡次劝阻无效，决定出兵讨伐。一六九〇年和一六九六年，清军两次大败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旺阿喇布坦臣服清朝，乘机占据阿尔泰山以西之地。一六九七年，清兵北出宁夏至狼居胥山麓，噶尔丹众叛亲离，不久死去。

噶尔丹败死后，策旺阿喇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相继担任准部台吉。这时准噶尔又渐强大，北起额尔齐斯河中游和巴尔喀什湖，南达兴都库什山，东至哈密，西踰楚河和塔拉斯河，都在准部的辖境之内。

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去世，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继位。此后，准噶尔贵族内部互相倾轧，战乱不止，一七五〇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尔被杀，其兄喇嘛达尔札篡位。不久，喇嘛达尔札的堂兄弟达瓦齐联合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杀死喇嘛达尔札，自立为汗。接着，达瓦齐又与阿睦尔撒纳互相攻战。一七五四年，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打败，率领二万余人投降清朝。前此不久，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和策凌蒙克也归附清朝。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三策凌归附”事件。^①在厄鲁特各部纷纷归附的形势下，清政府认为统一西北地区的条件已经成熟，决计命将出师，消灭准噶尔贵族割据政权。

一七五五年春，清政府两路出兵。北路以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以陕甘总督永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1卷，第6—8页。

常为定西将军，萨拉尔为定边右副将军。这两个副将军都是厄鲁特人，率领前锋先行，沿途招降。由于达瓦齐的残暴统治，“所属人众，无不离心解体”。^①因此，清军所至，远近望风归附。六月，“大兵至伊犁，部众持羊酒迎犒者络绎载道，妇孺欢呼，如出水火”。^②达瓦齐南走乌什，被乌什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获。从清政府出师到俘获达瓦齐，仅费时一百多天，可见人心所向，统一符合准部人民愿望。

擒获达瓦齐之后，清朝加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但阿睦尔撒纳妄图充当四卫拉特的总汗，并制造舆论，“谓不立阿睦尔撒纳为汗，准部终不得安”。^③一七五五年九月，阿睦尔撒纳因野心不能得逞，公然发动叛乱。清政府先后派策楞、成衮札布、兆惠、富德等为将，带兵平叛。一七五七年四月，兆惠率兵长驱直入，攻占伊犁，阿睦尔撒纳投奔沙俄，不久病死异域。

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同时，天山南路爆发了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兄弟的叛乱。大、小和卓的父亲玛罕木特，原是南疆的统治者，因企图摆脱准噶尔的羁绊，被噶尔丹策零擒往伊犁。玛罕木特死后，大、小和卓仍被拘禁于伊犁。一七五五年清军向伊犁进发时，波罗尼都和霍集占相继投诚，并恳求返回南疆，招服叶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9卷，第8—9页。

② 《西域图志》，第12卷，《疆域》。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4卷，《圣武述略四》。

尔羌、喀什噶尔人众。^①清政府同意波罗尼都回叶尔羌招抚旧属；同时，令霍集占留在伊犁，管理当地维民事务。阿睦尔撒纳叛乱时，霍集占曾与阿睦尔撒纳相勾结。清军将至伊犁时，他掉转矛头袭击阿睦尔撒纳以图掩饰，随后便回到叶尔羌。一七五六年五月，定西将军策楞令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派定一人入覲，并命其速定贡赋章程，”^②霍集占拒不遵行。十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派遣副都统衙阿敏道等赴阿克苏、库车、乌什等处招抚维吾尔人众。一七五七年，霍集占把阿敏道及其随从百余人全部杀害，自称巴图尔汗，公开发动叛乱。^③

一七五八年二月，清政府宣布大、小和卓的罪状，命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带兵讨伐。九月，清军攻下库车，霍集占逃逸。清政府命兆惠代替雅尔哈善指挥作战。不久，清军连克沙雅尔、阿克苏、乌什和和阗等地，乘胜直逼叶尔羌城下，霍集占弃城西奔。波罗尼都回到喀什噶尔，纵火焚毁庐舍，胁迫男妇出城从行。一七五九年八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回民扶老携幼跪迎，争献牛酒，且言：‘吾曹受准噶尔残虐数十年，赋繁役重，民不聊生，久思归附圣化，而两和卓木负恩背叛，钳制我等，莫由自通，使我田不得耕种，畜不得游牧，……今一旦去汤火，得安衽席，世世子孙，为大皇帝编氓’”。^④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14卷，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33卷，第3—4页。

③ 同上书，第49卷，第8—9页。

④ 《西域图志》，第17卷，《疆域》。



伊西洱库尔之战图（原件藏故宫博物院）

波罗尼都、霍集占西逃后，清军一败之于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再败之于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小和卓逃到伊西洱库尔附近，据山而守。清军一面攻夺山峰，一面树立维文旗帜招降。被波罗尼都兄弟胁迫而来的维民，不顾拦阻，蔽山而下，向清军投降者计有一万二千多人。波罗尼都兄弟带领随从三、四百人，狼狈逃入巴达克山。清军遣使至巴达克山，要求交出波罗尼都和霍集占。巴达克山素勒坦沙擒杀二人，交出霍集占首级，大、小和卓之乱至此平定，^① 结束了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

二、清政府对巴尔喀什湖以东、 以南地区的管辖

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的叛乱后，清政府把西域称为新疆，并立即进行地理调查和地图测绘。

当时主持地理调查工作的有参赞大臣鄂容安和大学士刘统勋等，主要任务是“把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考古验今，汇为一集”。^② 后来，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编入了《西域图志》。

测绘地图的工作实际上早在一七五五年即已开始准备。这年七月乾隆帝指示说：“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载入皇舆全图”，^③ 并命令左都御史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85卷，第1页。

② 《西域图志》，卷首，《谕旨》；《清高宗实录》，第482卷，第19页。

③ 《清朝文献通考》，第256卷，《象纬考》。

何国宗、钦天监五官正明安图和副都统富德，带领两名耶稣会士，携带测绘仪器，前往伊犁等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及一切形势，悉心考订，绘图呈览”。^① 一七五六年二月，又加派三等侍卫努三到伊犁参加这一工作。^② 测绘范围包括天山以北的喀喇乌苏路、塔尔巴哈台路、伊犁东路和伊犁西路等地。在巴尔喀什湖、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楚河、塔拉斯河等处，都测定了经纬点。^③ 俄国地理学家谢苗诺夫主编的《美丽的俄罗斯》一书也记载说：十八世纪下半叶，“中国政权便在天山南北路确立起来，中国的测量深入到这些地方，在伊塞克湖西南面北纬四十二度十七分地方，有中国人所确定的中国天文点”。^④

天山南路的测绘工作从一七五九年六月开始。当时大、小和卓的叛乱即将平定，乾隆帝下令“照平定伊犁之例，绘画地图”。^⑤ 领导这次测绘工作的是新任钦天监监正明安图。他是蒙古族人，对天文、数学都有精湛研究。参加测绘工作的还有在钦天监任职的外国耶稣会士傅作霖和高慎思等。^⑥ 经过实地勘查，明安图等测定了喀什噶

① 《清朝文献通考》，第256卷，《象纬考》。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24卷，第4页。

③ 《西域图志》，第6卷，《晷度》；《清朝文献通考》，第261卷，《象纬考》。

④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1885年彼得堡—莫斯科出版，第343页。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72卷，第7页。

⑥ 同上。

尔、叶尔羌、色勒库尔、鄂什(今苏联奥什)等许多地方的经纬点。^① 据记载,天山南路的测绘比天山北路更为完善,因为天山北路准噶尔游牧区没有城廓,而南路“诸回部咸有城廓可凭,各就治所起数方隅道里,尤称准得云”。^② 一七六〇年五月,明安图等完成测绘任务,回到北京,得到了乾隆帝的奖赏。^③

除以上两次测绘外,清政府还命当地官员,各就所辖地区,分别绘制地图,与何国宗、明安图等绘制的地图互相校勘,然后编入《西域图志》和《大清一统舆图》。^④

通过调查和测绘,清政府把西北边疆的山川地理载诸图籍,昭示中外,这对于明确清朝的西北疆域和边界所至,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是直属清朝中央政府的省级行政区,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称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他管辖下的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地区各设参赞大臣,乌鲁木齐设八旗都统。其他各地如叶尔羌、阿克苏、和阗、乌什、库车、英吉沙尔、喀喇沙尔、库尔喀喇乌苏和吐鲁番等地,分别设置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同时,清政府考虑到新疆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差异,采取各种不同形式的管理方法。例如,在维吾尔族聚居区设阿奇木

① 《清朝文献通考》,第256卷,《象纬考》。

② 《西域图志》,第7卷,《晷度》。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卷,第2—3页。

④ 《西域图志》,第1卷,《图考》。

伯克等官管理；在蒙古族游牧区设扎萨克管理；在布鲁特游牧区也任命各部落头人为官，管理本部落事务。在新疆东部以汉人为主的地区，则一律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州、县制度。这种因俗而异的统治办法，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管理系统。

新疆地处我国西陲，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三个地区，分别与俄国、哈萨克、浩罕和巴达克山连界。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治所设在雅尔。^①一七六三年，清政府在雅尔建肇丰城。后因该地冬季雪大，难以驻兵，加上近城地亩不敷屯田兵丁耕种，所以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治所东迁到风雪较小、田土肥沃的楚呼楚（位于雅尔以东二百里），并在这里建筑新城，命名“绥靖”。同时把地区名称改为塔尔巴哈台，简称塔城。^②

塔尔巴哈台北面与俄国接壤。乾隆时人椿园记载说：一七七一年，土尔扈特首领乌巴锡率领部众离伏尔加河返回新疆，俄将带兵追赶，“乌巴锡人众已逾坑格勒图拉（即铿格尔图喇，今苏联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而南，已入中国地界，济纳拉喇引兵还”。^③明确地指出铿格尔图喇以南就是中国领土。徐松《西域水道记》也写道：额

① 《西域图志》，第11卷，《疆域》第8页载：雅尔“旧为准噶尔伊克明阿特游牧之所”。

② 《西域图志》，第11卷，《疆域》；《清高宗实录》，第767卷，第8—9页。

③ 椿园：《西域闻见录》，第6卷。按：“济纳拉喇”系俄语“将军”的音译。

尔齐斯河“又东北流，布克图尔玛河注之，……又东北流达俄罗斯界，……又东北流过铿格尔图喇”。^①由此可见，当时两国交界处位于俄国边堡铿格尔图喇以南，布克图尔玛河口以北。苏联早期的历史著作也承认：“在塔尔巴哈台区，中国人建成了塔城，它是该区行政中心，这一地区延伸到布赫塔尔玛河（布克图尔玛河）和阿尔泰与俄国领土接壤”。^②

从铿格尔图喇往西，中俄以哈尔满阿林为界。^③哈尔满阿林也称喀喇玛岭，即今苏联卡尔宾山。一七五七年，阿睦尔撒纳逃入俄国，清将军富德曾带兵“在喀喇玛岭驻扎”，并于岭西“古尔班察尔一带，俱安设卡伦防守”。^④古尔班察尔即今苏联恰尔河一带。从铿格尔图喇至喀喇玛岭和恰尔河一线，是当时新疆与俄国接壤的唯一一段边界线。

塔尔巴哈台的西北部以爱古斯河与哈萨克为界；^⑤西南部与伊犁地区连接。

伊犁地区分为东西两路，霍尔果斯以东称伊犁东路，霍尔果斯以西称伊犁西路。伊犁西路“北至巴勒喀什淖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5卷。

② 库尔茨：《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与中国的殖民政策》，载苏联《新东方》杂志，1927年第19期，第203页。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23卷，《北徼山脉考》。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45卷，第25页。

⑤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4卷载：“爱古斯河……河东距塔尔巴哈台四百余里，与哈萨克以此河为界”。



《西夷志》中西域圖

尔(即巴尔喀什湖)接左哈萨克界”。^①《西域图志》记载伊犁所属的河流和湖泊时写道:“巴勒喀什淖尔,周回八百余里,伊犁全河,经流千里,屈折至此,百川万派,于焉归宿,盖准噶尔西北最大泽也”。^②《清朝通志》也写道:“(巴勒喀什)淖尔之北为哈萨克界”。^③可见,巴尔喀什湖当时是伊犁所属的边境湖泊。伊犁西路“西至塔拉斯河”接右哈萨克界,“西北至吹河(即楚河)接右哈萨克界”。^④楚河下游的和尔衰一带,塔拉斯河下游两岸,伊犁河南的古尔班阿里玛图(今苏联阿拉木图)等地,都是清朝的领土。^⑤楚河东北的伊尔该图鄂拉(今苏联热利陶山),塔拉斯河西南的阿克库勒淖尔(今苏联阿克库里湖)和必库勒淖尔(今苏联必利库里湖)也是伊犁境内的山脉和湖泊。伊尔该图鄂拉以北接左哈萨克界;必库勒淖尔以西接右哈萨克界。^⑥

伊犁西路南面与喀什噶尔所属的布鲁特族地区相接。

布鲁特分东、西两部分,东布鲁特有五部,西布鲁特

① 和坤等:《大清一统志》,第415卷。按:“巴勒喀什淖尔”是准噶尔语(蒙语)，“巴勒喀什”是“宽广”的意思，“淖尔”是“湖”。

② 《西域图志》，第2卷，《天山北路》。

③ 《清朝通志》，第27卷，《地理略》，第6899页。

④ 和坤等:《大清一统志》，第415卷。

⑤ 《西域图志》，第13卷，《疆域》。

⑥ 《西域图志》第13卷载:“伊尔该图鄂拉,北逾山接左哈萨克界”。又第26卷载:“必库勒淖尔,在阿克库勒淖尔西北二百里,围广亦如之,又西行入西哈萨克界”。在这里,“西哈萨克”指右哈萨克,也就是大玉兹。



布鲁特人(采自《皇清职贡图》)

有十四部。在准噶尔贵族统治时期，布鲁特人为逃避残酷的奴役和剥削，被迫离开自己原来游牧的特穆尔图淖尔和纳林河流域等地，迁往安集延和布哈拉边境一带。清朝平定准噶尔以后，各部布鲁特陆续东归。一七五八年，东布鲁特萨伊克部(即萨尔特部)和萨喇巴哈什部(即萨尔巴噶什部)首先归附清朝。并说：“我等久欲为大皇帝臣仆，被准噶尔阻隔，今始如愿，不胜欣悦”。^① 萨伊克、萨喇巴哈什部归附以后，清政府即派遣官员到布鲁特各部招抚。至一七六〇年，东西布鲁特全部归附，成为清朝的臣民。清政府任命各部头人或忠诚效力的布鲁特人为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56卷，第4—6页。

官，受喀什噶尔、叶尔羌大臣等节制。^①

从纳林河上中游一带，南至瓦罕帕米尔，是布鲁特游牧或垦种的地区。

萨伊克部居于纳林河中游北岸珠木罕（也称“朱穆翰”，即今苏联朱姆戈尔河流域）一带。萨喇巴哈什部居于珠木罕以南的图占斯塔老一带，西与安集延连界。^②

额德格讷部居于浩罕以东。一七六二年，浩罕侵占额德格讷部的鄂什等处，清政府要求归还，浩罕即从鄂什等处退出。^③后来，浩罕再次侵占鄂什，并继续向东扩张。额德格讷部退居噶布兰岭和苏提布拉克岭一带，并以此二岭与浩罕为界，“岭东为回部（即新疆南部），岭西为霍（浩）罕”。^④

希布察克部游牧于阿赖等处。^⑤

在清朝所属的帕米尔地区，居住着希布察克、奈曼和提伊特等部的牧民，西与巴达克山属部什克南连界。一七五九年，清军追歼大小和卓时，由“屯官长保、瑚什等领兵五百在淖尔（指伊西洱库尔湖）以西通拔（巴）达克山要隘堵截”。^⑥这说明清朝与巴达克山交界处在伊西洱库尔

① 《清高宗实录》，第678卷，第18—19页。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56卷，第4—5页；第58卷，第7—9页。

③ 《清高宗实录》，第683卷，第1—2页。

④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1卷。

⑤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0卷，第5—6页。

⑥ 同上书，正编，第79卷，第1页。

湖以西。平定大小和卓后，清政府在该湖北岸建立一座“平定回部勒铭伊西洱库尔淖尔碑”，记述平叛经过。从此，当地居民就把这个地方叫做“苏满塔什”，意即“写着字的石头”。嘉庆《大清会典》也记载说：“伊西洱库尔诺（淖）尔，在喀什噶尔西，上有高宗纯皇帝圣制碑，为伊犁极西境”。^①

上述帕米尔地区是清朝领土，这一事实许多俄国学者也是明确承认的。例如，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写道：“到一七五九年，满洲人就成了远达帕米尔、伊塞克湖和布赫塔尔玛河的全部领土的占有者”。^②巴托尔德院士也写道：“天山和帕米尔的吉尔吉斯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国的臣民。”^③

清政府对斋桑湖南北、巴尔喀什湖、特穆尔图淖尔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以及帕米尔等边境地区的管辖，突出地表现在实行定期的巡边制度，征收贡赋，设置卡伦，兴办屯田等方面。

（一）建立巡边制度

一七五八年，定边将军兆惠、副将军富德等，开始巡查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兆惠巡查了特穆尔图淖

① 嘉庆《大清会典》，第10卷，户部，第40页。

② 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中国西部旅行记》，第2卷，1899年彼得堡出版，第121页。

③ 巴托尔德：《吉尔吉斯史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1963年莫斯科出版，第528页。

尔和善塔斯等处。富德巡查了楚河、塔拉斯河和沙喇伯勒(位于伊犁河以西,伊塞克湖西北至楚伊犁山一带)。明瑞巡查了巴尔浑岭、造哈岭(也称招哈,在伊塞克湖南)、纳林河、直至天山南脉。^①一七五九年,副将军策布登扎布率领乌里雅苏台兵丁一千名,越阿尔泰山西行,“巡查额尔齐斯河、塔尔巴噶(哈)台、巴尔哈(喀)什淖尔等处”。^②一七六〇年,参赞大臣阿桂派遣副都统伊柱巡查了特穆尔图淖尔、巴尔浑岭和纳林河等地。^③这些巡查带有临时的性质,尚未成为定制。到一七六一年,阿桂奏准每年派兵巡查塔尔巴哈台地区一次,“有越界者照前驱逐”。^④一七六四年,伊犁将军明瑞也奏准,伊犁西边一带,“每年巡查一次”。^⑤这样,巡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边境开始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此后,每年秋天,由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分别派出领队大臣和数百名官兵,分路巡查。巡查伊犁西部地区的路线有三条,都从伊犁出发:一条“自特穆尔图淖尔之南,由巴勒浑岭至塔拉斯、吹地方”;一条“沿伊犁河,由古尔班阿里玛图至沙喇伯勒”;^⑥一条“越阿勒坦额默勒(今苏联阿尔滕埃麦利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59卷,第13—14页。

② 同上书,第68卷,第18页。

③ 同上书,续编,第7卷,第4—5页。

④ 同上书,第13卷,第6—8页。

⑤ 《清高宗实录》,第721卷,第3页;《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7卷,第2页。

⑥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3卷,第1页;《清高宗实录》,第696卷,第4—5页。

山)，巡查勒布什、招摩多(位于巴尔喀什湖东、爱古斯河下游南岸)一带”。^①后来，由于勒布什河以东属塔尔巴哈台管辖，伊犁官兵便巡查至勒布什河西岸为止。巡查塔尔巴哈台边境的路线有东北和西南两条，东北路从塔尔巴哈台出发，巡至斋桑湖以北、额尔齐斯河左岸的辉迈拉扈(今苏联巴特附近)，与科布多的巡边队伍会哨；西南路从塔尔巴哈台出发，巡查阿拉克图古勒淖尔(今苏联阿拉湖)一周，至勒布什与伊犁的巡查队伍会哨。^②

(二)向境内哈萨克、布鲁特牧民征收赋税和摊派差役

在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时，哈萨克的牧地分布在巴尔喀什湖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区。一七五七至一七五八年，哈萨克左、右两部先后向清朝“称臣奉贡”，但清政府并不把当时哈萨克的居地作为自己的领土，同时，也不允许哈萨克人越界放牧。一七六〇至一七六一年，哈萨克人越过巴尔喀什湖，进入勒布什、沙喇伯勒、阿勒坦额默勒、哈喇塔拉、库克乌苏等地游牧。为此，乾隆帝敕谕左、右部哈萨克首领说，“尔哈萨克游牧颇属宽广，理宜守其旧界，不可妄思逾越”，要他们令属下之人“移回故地”。^③从一七六〇至一七六五年，清政府曾多次把越

^① 《清高宗实录》，第727卷，第2页。

^②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4、5卷。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3卷，第4—5页；第9卷，第5—7页。

界游牧的哈萨克驱逐出境。^①但此后哈萨克人仍然常常违反禁令，私自进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游牧。面对这种情况，一七六七年清政府接受了哈萨克的请求，允许他们进入境内，于卡座附近过冬，“每牲百只抽一，交卡上官员收取，以充贡赋，春季仍行遣回。”^②一七九四年，清政府又下令说，哈萨克人冬季躲避风雪，可于塔尔巴哈台或伊犁“卡外指给一处，暂令游牧，照过冬例收纳官马后，仍令移出界外”。^③这样，哈萨克人就大批进入巴尔喀什湖以南一带游牧。后来，这些哈萨克人获准在这个地区长久居住，每年向清政府缴纳贡赋，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一八三三年浩罕强要向上述哈萨克人收取马租，清政府立即谕令哈萨克：“尔在特穆尔图淖尔海迤西，及吹、塔拉斯等处游牧，皆系天朝勘定地界，每年应交纳租马，仍当照常输纳。”^④

同哈萨克人一样，在特穆尔图淖尔至帕米尔一带游牧的布鲁特，也向清政府缴纳马匹牛羊作为赋税。《西域闻见录》记载：伊犁“岁檄领队大臣一员，领兵五百，巡查哈萨克、布鲁特一次，即收取其赋税，牛马百取一，羊千取一。”^⑤《瀛环志略》也载：“卡外之哈萨克、布鲁特诸部，岁

①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8卷，第1—2页；第9卷，第14页；第30卷，第1页。

② 《清高宗实录》，第780卷，第34—35页。

③ 同上书，第1444卷，第10—11页。

④ 《清宣宗实录》，第244卷，第39—40页。

⑤ 格园：《西域闻见录》，第1卷，《新疆纪略》，伊犁条。

以牲畜供赋役。”^①

布鲁特人除了缴纳马租之外,还要随军从征,守卫边疆和担负差役。^②希布察克布鲁特和冲巴噶什布鲁特就因“奋勉当差”、“在军营出力”和剿捕叛人有功,而受到清政府的奖赏。^③蒙额勒多尔部布鲁特玉托伊马斯,也以修造纳林桥有功,而被授为七品官。^④这座桥位于今苏联纳林城东一俄里处,^⑤是清政府为伊犁和喀什噶尔换防官兵行军需要而修造的。一八六七年,沙俄谢维尔佐夫率领的“探险队”曾从此桥经过,他称之为纳林河上的“中国桥”。^⑥

清政府向境内哈萨克人、布鲁特人征收赋税和委派差役的事实,在沙俄的一些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十九世纪中叶到过新疆的俄国间谍瓦里哈诺夫记载说:“一七六三年,根据吉尔吉斯(这里指哈萨克。——引者)使者的请求,中国皇帝颁发诏书,允许吉尔吉斯人在准噶尔人留下的荒芜的土地上,即巴尔喀什湖和准噶尔阿拉套之间的草原上游牧。为此,中国人要求吉尔吉斯人交税:马每百匹交一匹,牛每百头交一头,羊每千只交一只。每年从

① 徐继畲:《瀛环志略》,第1卷,第5页。

② 《新疆识略》,第12卷。

③ 《清高宗实录》,第925卷,第39—40页。

④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5卷。

⑤ 贾姆格尔贝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259、355页。

⑥ 谢维尔佐夫:《土尔克斯坦地区旅行记》,1947年莫斯科出版,第238页。

伊犁派出两支军队，从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各派出一支军队，收取这一赋税”。①一八八三年，窜入我国帕米尔地区的沙俄普佳塔上尉也说：郎库里和阿克塔什的布鲁特居民，“有义务向喀什噶尔提供传递文件的骑手”。清政府“对居民征收两种赋税：牲畜税（视牛羊头数而定）和骑手税”。②

（三）设置卡伦、鄂博和石碣

早在平定准噶尔的过程中，清政府就开始在善塔斯和斋桑湖以北布昆河、霍呢迈拉扈等处驻兵设卡。③一七五八年，定边将军兆惠提出在伊犁河南的格根河、哈尔奇喇河（今苏联卡尔卡腊河）、特穆尔图淖尔等处安设卡伦的计划。一七六一年，参赞大臣阿桂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地区选择了设卡地点，他在奏摺中报告说：“查勘应设卡伦，自辉迈拉扈至爱古斯（今苏联阿亚古斯）、招摩多（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岸、阿亚古斯河下游南岸），自阿勒坦额默勒至伊犁河岸十七处，立木为记；对伊犁河四处，垒石为记。”④至于特穆尔图淖尔迤西，楚河、塔拉斯河一带“地处极边，一时不能拨兵屯种”，暂且“每年派兵巡查一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1962年阿拉木图出版，第313页。

② 《1883年普佳塔上尉考察纪要》，载《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第10卷，1884年彼得堡出版，第51—52页。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51卷，第12页；第55卷，第11—12页。《西域水道记》，第5卷，第3页。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7卷，第7页。



《四库全书》中《济南府图》

次，俟将来续行筹办”。^①阿桂没有实现他的设卡计划便离职而去。一七六三年，伊犁将军明瑞对阿桂的计划提出异议，他说：“原议周围安放卡伦二十一处，每处派兵二十五名，共需兵五百余名。此项卡伦与哈萨克交界甚近，而去伊犁、雅尔河二处近者二三百里，远者千里，派兵往守，有鞭长莫及之势，恐不足以资防范”。因此，他建议，“与其将五百名分于各处，莫若停止周围所放卡伦以集兵力，……所余之兵，即交领队大臣裹带口粮，于周围地方从容巡查，方为有益”。^②此后，新疆卡伦的设置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方针。这就是伊犁、塔城、喀什噶尔所属卡伦，一般都不设在边远地区的原因。

清政府在塔尔巴哈台地区安设卡伦二十九座：从塔城西南至伊犁地区，设置卡伦八座；从塔城东北至斋桑湖以北额尔齐斯河左岸设卡伦二十一座。^③其中设在斋桑湖以北额尔齐斯河左岸的有辉迈拉扈卡伦（位于今苏联巴特附近）、扎哈苏淖尔卡伦（位于扎哈苏湖畔，今苏联卡兹纳科夫卡附近）、策克德克果勒卡伦（位于扎哈苏淖尔卡伦西南八十里、额尔齐斯河西岸）等。在斋桑湖西面有和通卡伦（位于今苏联大布昆河南岸）、喜泥乌苏卡伦（位于大布昆河南伊万诺夫卡附近）、阿布达尔摩多卡伦（位于今苏联科克彼克特附近）、布占什卡伦（今苏联布加兹河北岸的布加兹）、哈喇布拉卡伦（位于今苏联卡腊布加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4册，第18-19页。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3卷，第13-15页。

③ 《伊犁总统事略》，第9卷，《卡伦》。

河畔)等。所有这些卡伦,都归塔尔巴哈台协办领队大臣管辖。^①

伊犁地区共设卡伦九十三座。^②霍尔果斯以西有四十多座,由索伦达斡尔领队大臣、锡伯领队大臣和厄鲁特领队大臣分别管理。

索伦达斡尔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分布于霍尔果斯以西,伊犁河北。它们是:奎屯卡伦(设在奎屯河以西,图尔根河东岸,即今苏联克伊滕)、博罗胡吉尔卡伦(设在奎屯卡伦以北三十里图尔根河河源北岸,即今苏联哥鲁包夫斯克)、崆鄂罗鄂伦卡伦(位于今苏联科内罗连)、套来图卡伦(设在今苏联卡腊莫尔达附近)等等。

锡伯营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分布于伊犁河南,格根河北;东起古尔班托海,西至察林河和特穆尔里克河(今苏联捷米尔利克河)东岸。它们是:古尔班托海卡伦(在惠远城西九十里)、安达拉卡伦(今苏联杜邦)、达尔达木图卡伦(今苏联达尔达姆特)、春济卡伦(今苏联琼贾)、塔木哈卡伦(今苏联朔沙奈附近)、头勒克卡伦(设在察林河与伊犁河汇合处三角洲上)、察林河渡口卡伦(设在捷米尔利克河与察林河汇合处北四十里)等等。

厄鲁特领队大臣管辖的卡伦,分布于伊犁河以南,特

① 新疆卡伦及其位置见《西域图志》、《伊犁总统事略》、《新疆要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大清一统舆图》、《中俄边界详图》,以及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12年彼得堡出版)等书。

② 《新疆识略》,第11卷,边卫。

克斯河源以北，格根河源以西至特穆尔图淖尔一带。它们是：特穆尔里克卡伦（位于捷米尔里克河上游南岸图尤克附近）、特穆尔里克渡口卡伦（位于捷米尔里克河与察林河汇合处南岸）、雅巴尔布拉克卡伦（位于特穆尔里克渡口卡伦以西七十里，察林河南岸）、额尔格图卡伦（位于察林河东岸）、扎拉图卡伦（位于察林河与格根河汇合处北岸附近）、哈尔奇喇渡口卡伦（位于今苏联卡尔卡腊河与格根河汇合处）、格根卡伦、沙喇雅斯卡伦（位于格根河南岸支流沙喇雅斯河西岸，即今苏联萨雷贾兹）、哈尔奇喇卡伦（位于卡尔卡腊河中游西岸）、善塔斯卡伦（位于今伊塞克湖以东的桑塔什）等等。

驻卡官员有侍卫、佐领、防御和骁骑校。每座卡伦驻兵数名至数十名不等。卡伦侍卫由清朝中央政府选派，三年更换一次。佐领、防御、骁骑校以及各卡伦兵丁由当地委派，三个月更换一次。^①设置卡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稽察行人，缉拿逃犯，管理地方治安。但因各卡伦所处环境不尽相同，所负担的任务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侧重于管理游牧，有的侧重于传递公文，有的则是专门为了保护屯田、巡视矿山或监督贸易而设。在额尔齐斯河左岸的辉迈拉扈等卡伦，还负有“讥禁俄罗斯之通商者”的任务。^②

在没有设置卡伦的一些边远地方，清政府则建立了石碣和鄂博。一七六三年，伊犁参赞大臣伊勒图带兵巡

① 《伊犁总统事略》，第9卷，《卡伦》。

②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5卷。

边时,曾“在塔拉斯建立石碣,并在塔什霍尔欢悬挂木牌,上书蒙古字记”。^①十九世纪下半叶,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勒奇在阿乌利耶-阿塔(即塔拉斯,今苏联江布尔)东面三十英里处的小山丘上,发现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满文,记载着一七五八年清军战胜准噶尔的经过。^②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爱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等地,也有清政府在乾隆年间建立的鄂博。^③

(四)兴办屯田、建设铅厂和开采盐湖

十八世纪初期,清政府开始在哈密、巴里坤和吐鲁番等地垦荒屯田。^④中叶以后,新疆驻军增加,粮食需要量随之增多,于是清政府下令在新疆各地普遍开展屯田。

新疆屯田有“兵屯”、“回屯”、“商屯”、“旗屯”等形式。“兵屯”由绿营兵耕种。“回屯”由维吾尔族农民耕种。“商屯”即“户屯”,由商人雇工耕种。“旗屯”由八旗兵丁耕种。据《圣武记》记载:至一七七二年,新疆屯田已达二十八万八千亩,分布于天山南北各地。^⑤下面略举数例,说明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屯田情况:

额尔齐斯河屯田区,位于斋桑湖以北的额尔齐斯河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4册,第19页。

② 斯凯勒:《土尔克斯坦。俄属土尔克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犁旅行札记》,第2卷,1876年伦敦出版,第122页。

③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2册,第15页。

④ 《皇朝藩部要略》,第15卷,《回部要略》。

⑤ 魏源:《圣武记》,第4卷,《乾隆荡平准部记》。

滨河一带。一七五四年，杜尔伯特亲王策凌和贝勒策凌蒙克派遣宰桑率领兵丁到这里屯垦。亲王策凌曾亲自来此督察屯田。^①

雅尔屯田区，位于今苏联乌尔扎尔一带。一七六三年，伊犁将军明瑞到雅尔一带巡视，决定在这里兴办屯田。^②第二年，参赞大臣绰勒多从乌鲁木齐带来绿营兵六百名，正式建立这个屯田区。^③

达尔达木图屯田区，位于伊犁河南，察林河东，即今苏联达尔达姆特一带。这个屯田区始建于一七八九年，由五百名维吾尔农民耕种。“耕作时，派伯克二、兵四十前往驻防。收获后，离田五十里内筑小城，令其移驻”。^④

春济屯田区，在今苏联琼贾一带，建于一八〇四年，由维吾尔农民耕种，“每年交纳小麦二千石，以供铜、铅厂夫口食。”^⑤清代著名地理学者徐松在《新疆赋》中有“集耕回而齐赴，增沃壤于春稽（春济）”之句，说的就是调集维吾尔农民到春济等处垦荒屯田的事情。

楚河屯田区，位于伊塞克湖以西楚河流域。乾隆时人褚廷璋记载说：“自图斯库尔（即伊塞克湖）北岸，傍吹河西行五百里，总名曰吹，今屯种之所”。^⑥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5卷。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23卷，第13—15页。

③ 《伊犁总统事略》，第10卷，《塔尔巴哈台事略》。

④ 《清高宗实录》，第1461卷，第17页。

⑤ 《伊犁总统事略》，第7卷，《屯务成案》。

⑥ 褚廷璋：《笥心书屋诗钞》，第3卷；和瑛：《三州辑略》，第8卷。

一七九五年，伊犁将军保宁还在格登山以西、格根河以北建立铅厂。^①此外，清政府并在格根河以南的达布逊淖尔（准噶尔语，意为盐湖）开采食盐，供附近居民食用。一八六二年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杜加美尔曾说：“中国人永远不会把格根河盆地让给我们，因为他们在那里有一个供给附近全体居民食盐的湖泊和正在开发的银铅矿”。^②由此可见，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沙俄侵占该地以前，清政府一直没有停止对上述铅矿和盐湖的经营。

三、清政府对乌梁海地区的管辖

乌梁海地区分为三个部分，即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和阿勒坦淖尔乌梁海。

从十六世纪末起，唐努乌梁海属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硕垒乌巴什珙台吉及其后裔管辖。和托辉特首领的辖地当时还包括叶尼塞河的吉尔吉斯地区。一六五五年，清政府在喀尔喀建立八扎萨克的管理体制，硕垒乌巴什的儿子俄木布额尔德尼被封为八扎萨克之一。^③俄木布额尔德尼死后，其子罗卜藏台吉额琳沁袭扎萨克职。一六六七年，罗卜藏被准噶尔僧格台吉俘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4卷。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12—213页。

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3卷，《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

获。^①一六八六年，康熙帝派尚书阿喇尼至扎萨克图汗部，封额琳沁的堂兄弟根敦为扎萨克，命他管理唐努乌梁海及其以北地区。^②根敦去世后，其侄博贝承袭扎萨克辅国公。一七五六年以后，清朝改变了唐努乌梁海的管理体制，按照八旗制度把这里的乌梁海人编为五旗四十六个佐领。其中五旗二十五佐领直属乌里雅苏台将军，十三个佐领属喀尔喀赛音诺颜部，五个佐领属扎萨克图汗部，三个佐领属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③

唐努乌梁海的东部和北部的一部分以萨彦岭与俄罗斯为界，然后边界线横越西萨彦岭至沙宾达巴哈。这段边界是一七二七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确定的。沙宾达巴哈以西的中俄边界，当时没有正式划定。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西北，设有二十四号界牌一座。沙宾达巴哈以西，居住着赛音诺颜部所属的十三佐领和乌里雅苏台将军直辖的十佐领。赛音诺颜部所属十三佐领“南依鄂尔噶汗山”，“西与科布多所属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接”，北至阿穆哈河（今苏联阿巴干河）和察罕米哈河（今苏联切罕河）汇合处与俄罗斯为界。^④乌里雅苏台将

① 噶尔丹时，额琳沁逃出准噶尔，避居西藏。一六九二年，由西宁至京，康熙帝封他为辅国公。一六九六年，随军征剿噶尔丹，死于军中。见张穆《蒙古游牧记》第10卷。

②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第3卷，《外蒙古喀尔喀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第10卷。

③ 嘉庆《大清一统志》，第532卷，《乌里雅苏台流部》。

④ 嘉庆《大清一统志》，第532卷，《乌里雅苏台流部》；嘉庆《大清会典图》，第132卷，《唐努乌梁海图说》。

军所属的十佐领游牧于唐努乌梁海的西北部,“跨阿尔泰山(即阿勒坦河,今苏联比亚河)、阿穆哈河”而居,北至阿勒坦河和哈屯河(今苏联卡通河)汇合处与俄罗斯为界。^①

唐努乌梁海以西是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阿尔泰山乌梁海地区。在这一带居住的乌梁海人,原属准噶尔管辖。一七五四年,清朝在平定达瓦齐之乱时,曾进兵哈屯河上游察汗乌苏和推河等地,居住在这一带的乌梁海宰桑察达克、图布慎、车根、雅尔都、赤伦等部,纷纷降附。^②一七五五年,哈屯河流域和哈屯河与萨雷斯河之间汗山等处的乌梁海宰桑郭卓辉、鄂木布、哈尔马什、玛济岱等也相继率众归附。^③清政府把他们编为七旗二十五佐领。^④这些乌梁海人居住于阿尔泰山、斋桑湖以东及额尔齐斯河上游右岸一带,^⑤总称为阿尔泰山乌梁海。

游牧于阿勒坦泊周围和哈屯河一带的乌梁海人,在准噶尔统治时期,每户每年按例纳貂皮一张。一七五七年,他们在宰桑特勒伯克扎尔纳克等的率领下归附清朝,“输纳税赋”。^⑥清政府把他们编为二旗四佐领。^⑦这部分

① 嘉庆《大清一统志》,第532卷,《乌里雅苏台统部》;嘉庆《大清会典图》,第132卷,《唐努乌梁海图说》。

②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4卷,第2—4页。

③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5卷,《征乌梁海述略》。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第17卷,第3—4页。

⑤ 嘉庆《大清会典》,第10卷,《户部》;第52卷,《理藩院》。

⑥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44卷,第39页。

⑦ 同上书,续编,第17卷,第3—4页。

乌梁海人，自称为特凌格特乌梁海，清朝称之为阿勒坦淖尔乌梁海。^①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东和东北与唐努乌梁海接壤，西至额尔齐斯河与塔尔巴哈台连界，南达哈屯河上源推河与阿尔泰乌梁海接壤，北至恰雷什河支流白河（今苏联比勒亚河）与俄国为界。一七五六年，清军追捕汗山、哈屯河乌梁海逃人时，曾到过白河北岸“俄国现有卡伦处”，向俄国要求引渡。一七五七年，俄国政府致清理藩院大臣的复函中说：这些乌梁海人“逃往俄国前哨地方，该地位置在国界之白河岸上”。^②明确地指出白河是当时中俄两国的边界河流。

清政府为了管理上述三部分乌梁海人，在唐努乌梁海的唐努旗、萨拉吉克旗（萨尔吉格旗）、陶吉旗（托锦旗）、库布苏库勒诺尔旗、奇木奇克旗（肯木次克旗）各设总管一人。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二旗，设总管二人。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四旗，右翼三旗，设总理七旗副都统一人，左右两翼散秩大臣各一人。副都统、散秩大臣兼理本旗总管事务，其余四旗各设总管一人。^③唐努乌梁海官员的任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奏请皇帝批准。阿尔泰乌梁海和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官员的任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9卷，第37—39页；恩华：《唐努乌梁海图说略》。

② 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1936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第178、305页。

③ 嘉庆《大清会典》，第52卷，《理藩院》。

免，由科布多参赞大臣奏请皇帝批准。^①

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和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的副都统和总管，都由清政府发给俸禄。副都统每年俸银七十七两五钱，总管年俸六十五两，^②由乌里雅苏台将军发放，“年终咨行户部核销”。^③

由于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与俄国接壤，清政府从一七六〇年起派遣官兵定期巡查所属额尔齐斯河、哈屯河、阿勒坦泊等处。^④起初每三年巡查一次，一七七一年以后，改为一年一次。^⑤每年五月，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派杜尔伯特协理台吉一员，兵八十名；阿尔泰乌梁海章京一员，兵十名；喀尔喀扎萨克一员，兵二十名，前往上述地方巡查。^⑥

清政府还在乌梁海地区设置数十座卡伦，例如霍呢迈拉扈、库兰阿古尔格和那林卡伦等。霍呢迈拉扈卡伦设有侍卫一人，兵五十名，位于额尔齐斯河右岸的那玛岭（今苏联纳雷姆山），与塔尔巴哈台设置在河西的辉迈拉扈卡伦隔河相望。库兰阿古尔格卡伦和那林卡伦各设

① 嘉庆《大清会典》，第36卷，《兵部》。

② 《理藩院则例》，第13卷，《乌梁海等总管俸银》；《科布多政务总册》，第7页。

③ 《平定准噶尔方略》，王编，第50卷，第10页；《理藩院则例》，第13卷，《乌梁海等总管俸银》。

④ 《清高宗实录》，第617卷，第17—18页。

⑤ 同上书，第888卷，第32页。

⑥ 《科布多政务总册》，事宜，第11页。

兵四十名，受霍呢迈拉扈侍卫管轄。^①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乌梁海人有服从调遣的义务。皇帝每年赴木兰“打围”（打猎）时，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所属的乌梁海总管，各分为四班，轮流赴木兰“随围”。^② 参加“随围”的乌梁海“官员每人各赏官用缎一匹，兵丁每名各赏银六两”。^③

乌梁海人还必须向清政府缴纳赋税。按照清朝规定，纳税以户为单位，有马匹牲只的为应纳贡赋人户；无马匹牲只但年齿尚壮的为暂缓缴纳贡赋人户，待其“生计较裕，再令纳贡”；老幼残废又无牲只的为免纳贡赋人户。^④ 在纳赋户中，又分为纳貂户、纳灰鼠户和纳狐皮户。“貂皮每户二张，狐皮每户四张，灰鼠皮每户八十张”。^⑤ 每年征收赋税时，由佐领负责向各户收取皮张，呈总管检验，再由总管派人送至科布多或乌里雅苏台，最后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把这些毛皮送至清朝中央缴纳。^⑥

无论唐努乌梁海人、阿尔泰乌梁海人或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人，都必须遵守《理藩院则例》的规定，违则逮捕法

① 《理藩院则例》，第63卷，俄罗斯事例，第14页，《奖惩卡伦官员兵丁》；《朔方备乘》，第26卷，“额尔齐斯河源考”。

② 《理藩院则例》，第16卷，《朝覲》。

③ 同上书，第22卷，《扈从事例》。

④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49卷，第15页；第50卷，第10页。

⑤ 嘉庆《大清会典》，第11卷，《户部》。

⑥ 《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第66卷，第5—6页；《科布多政务总册》，第10页。

办。死刑案件由乌里雅苏台将军或科布多参赞大臣审理，并奏请皇帝批准。例如，一七七五年，乌梁海人偷盗哈萨克马匹，经查实后，奏准“将为首之搭奔即行正法，其为从之阿木图、巴图尔、贝克等发往烟瘴地方”。^①又如一七九九年，阿勒坦淖尔乌梁海人偷盗马匹，首犯阿布都勒即行正法。^②乌梁海人必须服从清朝法令，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俄国东正教上著名汉学家俾邱林写道：由阿尔泰山起，沿唐努山脉往东，直到叶尼塞河发源地的乌梁海人，“都服从中国《理藩院则例》中对蒙古规定的法律，听从其牧区所在地的总司令的统辖。”^③这个“总司令”，就是乌里雅苏台将军。苏联学者耶祖伊斯托夫也明确地承认：“在图瓦（即唐努乌梁海）境内实行了中国法律”。^④

① 《清高宗实录》，第999卷，第33—34页。

② 《科布多政务总册》，第15页。

③ 俾邱林（亚金甫）：《厄鲁特人的历史概况》，第135页。转引自卡鲍：《图瓦的历史与经济概述》，第70页。

④ 耶祖伊斯托夫：《从封建的图瓦到社会主义的图瓦》，1956年克孜勒出版，第23页。

第二章

一八六〇年以前沙俄 对中国西北的侵略

第一节 十七世纪初至鸦片战争前 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

一、窥伺中国西北的开端

沙皇俄国觊觎中国西北边疆始于十七世纪初叶，它是征服西西伯利亚的继续。如本书第一卷所述，一五八一年，哥萨克殖民者翻越乌拉尔山，迅速征服西伯利亚汗国。一五八七年，沙俄在额尔齐斯河和托博尔河的汇流处建托博尔斯克城。一五九四年，在额尔齐斯河下游建塔拉城。一六〇四年，在鄂毕河的支流托木河畔建托木斯克城。此后，他们一面以极快的速度继续东进，一面即把贪婪的目光转向中国西北地区。当时，中国厄鲁特蒙古族领地的北缘是在鄂木河一带，“厄鲁特人的牧区除了西蒙古本部以外，还包括额尔齐斯河左岸从斋桑湖到现在的西伯利亚铁路线（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新西伯利亚城之间）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同时占有额尔齐斯河



额 尔 齐 斯 河

(采自阿特金森:《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

中游左、右两岸的草原。”^① 沙俄权威性的地理著作《俄国地理详志》强调指出:“巴拉巴草原位于额尔齐斯河和鄂木河的河岸之间,属于卡尔梅克人。”^② 一七〇一年雷米佐夫所绘《西伯利亚地图》中,更明确地把上述草原标为“卡尔梅克草原地区”。^③ 由于我国厄鲁特地区毗连西伯利亚西部,所以这一广阔的地域特别是额尔齐斯河中、上游一带,便首先成为沙俄觊觎的目标。沙皇政府力图把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118页。

② 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8卷,1903年彼得堡出版,第370页。按:卡尔梅克人即中国厄鲁特蒙古族。

③ 俄国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移民局编:《俄国亚洲部分地图集》,1914年彼得堡出版,第3图。

上述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把厄鲁特的王公和首领们变为俄国的臣民，把隶属于这些王公和首领的居民变为俄国的纳贡者，把他们居住的地域变为俄国的领土。”^①

一六〇六年，沙俄殖民者从塔拉悍然侵入额尔齐斯河中游的草原地带。当地厄鲁特人奋起抵抗，予敌重创。不久，沙俄侵略军数百人再次闯入草原，企图强占。厄鲁特诸台吉集合人众，一举击溃来犯之敌。这两次武装入侵，揭开了沙俄窥伺我国西北边疆和我国厄鲁特蒙古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序幕。

武力侵略不能得逞，沙俄侵略者便企图对厄鲁特诸台吉实行政治收买。一六〇七年，塔拉统领加加林奉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一六〇六——一六一〇年）之命，派遣军役人员到厄鲁特地区，妄图诱骗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两部缔结臣服条约，年年纳贡，接受“沙皇的崇高统治”。^② 这些沙俄“使者”花言巧语，到处游说，但是台吉们不为所动，严厉拒绝了他们的狂妄要求。

沙皇政府还竭力搜集和扩大我国蒙古族各部之间的矛盾，以便操纵利用。一六〇八年，塔拉统领穆萨尔斯基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168页。

② 加塔乌林鄂编：《1607—1636年俄蒙关系文件集》，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1—2件。十七世纪时，西伯利亚各地沙俄统领有权直接向邻近国家和地区派遣外交使节，这种情况在早期中俄关系史上屡见不鲜。当时沙皇政府正忙于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暂时无力在东方总揽一切，因此把上述权力委托给西伯利亚殖民当局。参看谢宾科夫：《十七世纪前半期的中俄关系》，载《历史研究》杂志，1958年第5期。

听说厄鲁特诸台吉与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和托辉特首领硕垒乌巴什（俄国人称为“阿勒坦汗”）不睦，认为有机可趁，连忙向莫斯科报告。沙皇政府获悉后，即下令派人往见厄鲁特各台吉，答应提供军事“援助”，“保护”他们不受硕垒乌巴什侵犯，条件是要求台吉们“臣服”俄国。一六〇九年三月，穆萨尔斯基遵照沙皇指令，向厄鲁特地区派出以戈鲁宾为首的“使团”，要求诸台吉宣誓效忠沙皇，经常纳贡，并缔结保护条约。厄鲁特诸台吉集议，一致拒绝了沙俄的要求。戈鲁宾还向各台吉“慷慨”地许诺，如果他们表示臣服，俄国就“准许”厄鲁特人沿额尔齐斯河和鄂木河游牧。台吉们严正回答，这些地方本来是厄鲁特人的牧地，他们“愿意在哪里游牧，就在那里游牧”，俄国无权过问。^①戈鲁宾等人到处碰壁，一无所获地返回塔拉。

但是，沙俄侵略者决不肯就此罢手。一六一〇年六月，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下令再派“使者”前往厄鲁特地区，要求各台吉“归顺”俄国；如遭拒绝，“就从西伯利亚各城堡出兵攻打他们，并将他们的妻子儿女捉走。”^②这道杀气腾腾的诏令充分暴露了沙皇政府的强盗面目。只是由于当时俄国在西伯利亚的兵力有限，这一武装入侵计划才没有付诸实行，但西伯利亚殖民当局不断派出小股兵力，蚕食额尔齐斯河中游一带的厄鲁特牧地，侵

① 加塔乌林娜编：《1607—1636年俄蒙关系文件集》，第10件。

② 同上。

占附近盐湖，并劫掠和杀害厄鲁特牧民。一六一二和一六一三年，塔拉统领戈都诺夫两次派遣军役人员数百名侵入亚梅什湖地区，蓄谋侵占这一著名的盐湖。他们残酷地迫害沿湖一带的中国厄鲁特牧民，“杀死了许多人”，并捕捉大批妇女儿童押送到莫斯科充当奴隶。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个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一六一三——一六四五年）曾为此传旨嘉奖有“功”人员。^①

一六一六年，托博尔斯克统领库拉金奉莫斯科之命，派彼特罗夫和库尼增前往厄鲁特地区，“同卡尔梅克台吉们联系，使其归顺沙皇，”^②结果又遭失败。他们在搜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地理、人口、物产和宗教的情报后返回俄国。据库拉金给沙皇的报告说，彼特罗夫等人在厄鲁特地区遇见许多由“大明可汗”（指明万历帝）派来征收赋税的官吏，“每个台吉年交二百只骆驼和一千匹马。”^③

沙俄侵略者明知厄鲁特地区属于中国，但仍处心积虑要侵吞这片中国领土。一六一七年，库拉金奉命再派萨维利耶夫等人前往杜尔伯特部，“邀请”该部的首领达赖台吉臣服沙皇。达赖台吉拒绝接待来“使”，也不提供住处，以致这些沙皇的“使者”被迫裹着毡子和皮袍露宿野外。^④他们诱骗厄鲁特人“归顺”俄国的阴谋又遭挫败。

① 加塔乌林娜编：《1607—1636年俄蒙关系文件集》，第13件。

②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41页。

③ 同上书，第37页。

④ 同上书，第43页。

一六二三年，沙俄西伯利亚殖民当局又派贵族士官契尔卡索夫赴厄鲁特地区进行收买活动，并企图限制厄鲁特人游牧的范围。台吉们愤怒地回答说：“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游牧，不是在沙皇的土地上游牧。我们决不接受沙皇的统治。”^① 据十八世纪的俄国历史学家米勒尔记载，契尔卡索夫由于要求诸台吉“宣誓效忠”沙皇而“几乎被他们杀死”。^②

二、妄图煽动巴图尔和僧格叛国投俄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厄鲁特四部中的准噶尔部日益强大，成为我国西北的一大割据势力。从此，沙皇政府便加意笼络准噶尔部的封建领主，力图煽动他们叛国投俄，从而实现其吞并我国西北地区的狂妄野心。

一六三五年，巴图尔珲台吉成为准部首领。就在同年，托木斯克统领罗莫丹诺夫斯基派遣军役人员五名前往准噶尔部，企图诱骗巴图尔“归顺”俄国；第二年，沙俄当局又派彼特罗夫到准噶尔进行分裂活动，两次均未得逞。

一六三九年，沙皇政府采取贿赂手段，特派专人向巴图尔赠送金色锦缎、呢绒和高脚杯等礼品，以示“关怀”。一六四〇年，沙皇政府又派托博尔斯克贵族士官明索

① 加塔乌林娜编：《1607—1636 年俄蒙关系文件集》，第 61 件。

② 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 2 卷，1941 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 95 页。

伊·雷米佐夫向巴图尔赠送各种银器、宝石、呢绒和绸缎。在举行赠礼仪式时，雷米佐夫竟要求巴图尔“恭敬地起身接受沙皇的赏赐”，巴图尔断然拒绝，端坐不动。雷米佐夫指责巴图尔“无礼”，巴图尔驳斥说：“我不懂俄国人那一套礼节！”^①雷米佐夫还喋喋不休地吹嘘沙皇的“恩德”，要求巴图尔效忠沙皇。巴图尔嗤之以鼻，第二天以嘲讽的语气答复说：“仿佛记得你来了，送来了沙皇的礼物，并且说了许多话。可是你说的我全无印象，因为当时我喝醉了”。^②他还严厉地指着雷米佐夫说：“你明索伊带着沙皇的礼物来我这里，而另一方面，沙皇的人却在进攻琿台吉的属民！”^③这番话戳穿了沙俄侵略者的伪善面目，使雷米佐夫无词以对，狼狈不堪。

不久，一六二七——一六二八年间，远徙伏尔加河流域的厄鲁特族土尔扈特部因不堪沙俄压迫，在和鄂尔勒克的领导下起兵抗俄。沙皇政府采取利用厄鲁特人打厄鲁特人的毒计，于一六四四年派哥萨克百人长克列皮科夫前往准噶尔部，建议巴图尔会同俄国出兵攻打土尔扈特。巴图尔不愿骨肉相残，严词拒绝。^④沙俄还向和硕特部的阿卜拉依台吉提出类似的建议，同样遭到拒绝。

一六五〇年，沙皇政府又派克列皮科夫到准噶尔部

① 戈利曼、斯列沙尔楚克编：《1636—1654年俄蒙关系文件集》，1974年莫斯科出版，第47件。

②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23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188页。

④ 戈利曼等编：《1636—1654年俄蒙关系文件集》，第69件。

活动，“但仍旧一无所得”。^①巴图尔积多年的经验，深知沙俄侵略者口蜜腹剑，居心叵测，因此于一六五一年向俄国“使者”巴依加切夫声明，他不愿再和俄国人有任何往来，要求沙皇政府今后不要再派使者来准噶尔。总计在巴图尔统辖准噶尔部期间，沙俄为了对他进行收买，先后派到准部进行“正式谈判”的重要“使者”共有九人（此数尚不包括许多较小的角色在内）。^②然而所有这些阴谋活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六六三年巴图尔逝世，^③次子僧格继任准噶尔部首领。他对俄国侵略者深恶痛绝，坚决抵制沙俄侵略。由于这一原因，沙皇政府未敢立即向准噶尔重派“使节”，但是它并非放弃了既定的侵略方针，而是在窥测方向。到一六六五年，沙皇政府决定一试，指派贵族士官布别诺依携带水獭皮、狐皮和布匹等“礼品”来到准部，妄图收买僧格，大言不惭地要求他“热忱效忠沙皇，接受其崇高统治”。^④僧格在盛怒之下逮捕了布别诺依，将他拘留一年才释放回国。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26页。

② 戈利曼等编：《关于十七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俄蒙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讯》，第76期，1965年莫斯科出版。

③ 契米道尔热耶夫：《十七——十八世纪蒙古与俄国的相互关系》，1978年莫斯科出版，第54页。说巴图尔死于一六五三年，参看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27页。

④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77页。

一六六六年秋，俄国政府又派库尔文斯基等六人携带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件和礼物，往见僧格及其叔父楚琥尔台吉，“敦促他们归顺俄国”。^① 库尔文斯基到达准部后，正值僧格外出，便往见楚琥尔，狂妄地要求他行臣属之礼，“恭立接受大君主的信件和礼品”。^② 楚琥尔断然拒绝，派人通知他们立即离境。库尔文斯基接到驱逐令后，借口等待僧格，硬赖在准部过冬。到一六六七年四月，楚琥尔又派人催促他们离境，说：“你们为何至今还留在兀鲁思中？……楚琥尔台吉命令你们立刻离开兀鲁思回托木斯克，沙皇的信件和礼品也可以同时带走。我方的台吉们——楚琥尔乌巴什、他的儿子巴噶满沁和侄子僧格——决不能恭立接受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就是侮辱自己。”^③ 五月上旬，楚琥尔再次当面痛斥这一伙沙俄侵略分子说：“难道我是沙皇的臣属，应该以对一位台吉来说很可耻的方式，卑躬屈膝地站立接受他的礼物？你们全给我滚出兀鲁思，回托木斯克去！”^④

同年六月僧格回到驻地，库尔文斯基前往会见。他抱着侥幸心理，又要求僧格“毕恭毕敬地接受大君主的信件和礼物”；但是“僧格台吉摇摇头，坐着接过沙皇的信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80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82页。

件”，“未向沙皇问候”，即将来“使”斥退。^①沙俄侵略者费尽心机，蓄谋以“礼物”为诱饵，引诱僧格和楚琥尔行臣属之礼。因此，表面上这似乎是赠礼仪式之争，实际上却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僧格和楚琥尔识破侵略者的奸计，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有力地挫败了沙皇政府吞并我国准噶尔部的阴谋。

三、勾结叛匪噶尔丹，阴谋分裂中国领土

一六七〇年末僧格去世，巴图尔的第五子、反动喇嘛噶尔丹夺取了准噶尔部统治权。他蓄谋扩大割据势力，吞并天山以南地区、青海和喀尔喀蒙古，建立一个以准噶尔为中心的“帝国”。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噶尔丹竟不惜认贼作父，投靠沙俄，走上了背叛祖国的罪恶道路。另一方面，沙皇政府也对噶尔丹加意扶植，力图利用他来实现其分裂中国领土的狠毒计划。

早在七十年代初期，沙俄已开始和噶尔丹眉来眼去。一六七一年夏，噶尔丹致函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统领苏马罗科夫，奴颜婢膝地表示同意俄国向巴拉巴草原等地的准噶尔属民征收贡税。一六七二年，他又以护送出使中国的阿布林回国为由，公然派遣“使臣”去莫斯科，向沙俄表示亲善。沙皇政府立即响应，指示西伯利亚殖民当局向准噶尔部派出“友好使团”，同时下令今后如噶尔丹派

^①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84页。

人来俄，不得阻挠。接着，它又决定尔后如有准噶尔部牧民逃入俄境，应立即交还噶尔丹，并宣布准噶尔部领主可以使用西伯利亚南部草原上的牧场。对沙皇政府的这些“优待”，噶尔丹受宠若惊，感激莫名。从此，沙俄和噶尔丹往来日益频繁，互相派出的“使者”不绝于途。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七十年代，沙皇政府就派过四个“使团”到准噶尔部，同期噶尔丹派赴俄国的“使团”更多达六个以上。

到八十年代，沙俄和噶尔丹的勾结更进一步。一六八三年，清军追歼窜扰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入侵者，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噶尔丹“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摩擦的消息”，^① 连忙派遣两名“使者”到莫斯科去，同沙皇政府进行不可告人的密谋。

一六八八年初，正当清政府从雅克萨主动撤军，准备同俄国举行边界谈判的时候，沙皇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戈洛文突然出动军队，向中国喀尔喀部猛烈进攻。与此同时，噶尔丹“扬言借俄罗斯兵且至”，^② 引兵三万由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部，结果使喀尔喀军民腹背受敌，给清政府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康熙帝之所以在中俄边界谈判前夕决定将尼布楚让给俄国，同当时喀尔喀地区的形势有很大关系。

如本书第一卷所述，沙俄侵略军和噶尔丹同时进攻

① 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198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32页。

② 魏源：《圣武记》，第3卷，《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喀尔喀绝非巧合，而是有预谋的联合行动。为了加强同噶尔丹的“合作”，当时戈洛文还向沙俄外交事务衙门建议，由托博尔斯克派遣专人去噶尔丹处，正式建立俄国和准噶尔的“军事同盟”。他认为这样俄国不仅可以完全把噶尔丹控制在手中，以遂其吞并准噶尔地区的野心，而且还可以迫使“许多蒙古台吉投归(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永为臣民”。^① 一六八八年十一月，噶尔丹也派“使者”到伊尔库次克，就订立“军事同盟”一事与俄方会谈。此后，他又就这一问题多次同沙俄进行密商。直到一六八九年七月，即中俄尼布楚谈判前夕，噶尔丹还派佐克图为“使”，再次到伊尔库次克去同俄方商订同盟。沙俄侵略者一面表示愿同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另一面却在暗地里和噶尔丹加紧勾结，阴谋对中国下毒手。这种两面三刀的作风，正是沙俄外交的一大特点。

一六九〇年三月，戈洛文又和噶尔丹的“使者”达尔汗就订立军事同盟问题在伊尔库次克进行密商。达尔汗丧心病狂地向戈洛文说：“阿尔巴津建寨的地区原本是蒙古的，不是博克达汗(指清朝皇帝)的，统辖蒙古人和这个地区的是他——博硕克图汗(指噶尔丹)，倘若沙皇陛下有意在这里重建城堡，博硕克图汗愿将这片土地让给陛下，博克达汗同这片土地无关。”^② 戈洛文也派人去见噶

①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1972年莫斯科出版，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尔丹，阴谋再一次约噶尔丹共同出兵，把中国喀尔喀地区一口吞并。但这时沙俄正集中全力夺取黑海出海口，无力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尼布楚条约》订立未久，沙皇政府不愿轻易放弃该约给俄国带来的重大利益，因此戈洛文出兵喀尔喀的意图没有实现。

四、对中国西北地区的两次军事“远征”

噶尔丹的长期叛乱不仅给喀尔喀地区造成严重破坏，而且也削弱了准噶尔部，从而使沙俄在中国西北边疆获得可趁之机。十八世纪初期，俄国的殖民浪潮迅速地涌向叶尼塞河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以前，沙俄殖民者在额尔齐斯河上最南的据点是切尔诺卢次卡雅村（位于鄂木河与额尔齐斯河汇流处以下约六十公里的地方），而在十八世纪头二十年中，额尔齐斯河流域大部分均被沙俄逐步侵占。叶尼塞河上游许多地方此时也被沙俄占据，而在一七〇一年时，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以南还没有俄国人的足迹。这一殖民浪潮同时也从托木斯克迅速涌向鄂毕河上游一带。一七〇九年，沙俄在比亚河口附近强建比斯克堡，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唐努乌梁海地区。

沙俄殖民势力的扩张使准噶尔部牧区急剧缩小，激起了准部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七一〇年，准噶尔军民一举摧毁沙俄在比亚河与哈屯河之间强筑的堡寨，表示了反抗沙俄侵略的坚强决心。一七一三年夏，沙俄西伯利

亚总督加加林亲王派伊万·契雷多夫到准噶尔，要求继噶尔丹担任准部台吉的策旺阿喇布坦惩罚抗俄军民，同时停止在巴拉巴草原地区征税。对上述第一项要求，策旺阿喇布坦答称：俄国人的堡寨建在准噶尔部领地上，所以予以摧毁，今后不准俄国在该地再建堡寨。对第二项要求，策旺阿喇布坦回答说，巴拉巴人一向是准噶尔的属民，俄国无权过问。

沙俄侵略者见外交讹诈不能使准部屈服，便决定动武。早在一七一二年，加加林听说中国“埃尔克特”（即叶尔羌）地方盛产黄金，就馋涎欲滴地连忙上奏彼得一世，并自称目睹布哈拉商人从该地带来的沙金。他建议沙皇政府出动军队，从亚梅什湖到叶尔羌建筑堡垒线，将该地强行占领。^①一七一三年，加加林不等沙皇政府批准，急不可待地先派托博尔斯克贵族特鲁什尼科夫前往西宁和甘肃省大坝，去寻找盛传一时的叶尔羌金矿的中心。^②一七一四年六月初，正在喀琅施塔得策划对瑞典作战的彼得一世，为掠夺中国金矿的贪欲所驱使，亲自批准了加加

① 加加林在给彼得一世的报告中说，根据他的情报，溯额尔齐斯河上行几个星期即可到达叶尔羌。参看曼考尔：《俄国与中国》，1971年哈佛大学出版，第363页。当时沙俄侵略者显然完全不知道叶尔羌的方位，竟认为该地位于额尔齐斯河上游附近。

② 俄文是 Селим 和 Даба，通常认为即西宁和大坝。参看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中译本，第135页；曼考尔：《俄国与中国》，第363页。这又一次说明沙俄侵略者茫然不知叶尔羌所在，竟以为西宁和甘肃省大坝属于叶尔羌地区。

林提出的武装侵华计划，下令由布霍列茨中校率领远征军去占领叶尔羌。同年八月，布霍列茨从莫斯科出发，十二月抵托博尔斯克，一七一五年七月带领全副武装的侵略军二千九百多人，^①乘坐大小木船五十九艘溯额尔齐斯河上驶，^②并有若干商人及从瑞典战俘中挑选的采矿专家和工程人员随行。十月，沙俄侵略军到达亚梅什湖，强行修筑亚梅舍夫堡，随即在该地过冬。

沙俄军队的到来引起准噶尔部的震惊。尽管加加林口口声声说俄军并无侵略目的，但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面临敌军压境的严重形势，策旺阿喇布坦开始积极备战，以防不测。一七一五年十二月，布霍列茨报告彼得一世说，准噶尔部正向亚梅什湖调集军队，准备一战；俄军“人数过少”，难期安全到达叶尔羌，希望增加兵力。彼得在泊于哥本哈根的“英格尔摩兰”号军舰上接到这份报告，马上复信说，关于确保远征军的安全问题，他过去曾向加加林作过必要的指示，现在已给加加林发出了补充指示。

布霍列茨一面向沙皇呼吁增援，准备扩大武力侵略；一面还大搞“和平”外交，企图麻痹准噶尔部军民的斗争意志。一七一六年初，他特派中尉特鲁勃尼科夫持函往见策旺阿喇布坦，“保证”俄军前来并无敌意，妄图说服准噶尔部放下武器。这种虚伪的“保证”自然不会使策旺阿

① 一说为四千五百人，见曼考尔：《俄国与中国》，第212页。

② 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8卷，第370页。

喇布坦上当受骗。同年二月，加加林也派哥萨克百人长瓦西里·契雷多夫前往准噶尔部，指示他劝诱策旺阿喇布坦“归顺”俄国，沙皇政府可以向准噶尔提供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策旺阿喇布坦断然拒绝接见来“使”，使沙俄的阴谋归于失败。^①与此同时，策旺阿喇布坦的部将策凌敦多卜率领准噶尔军队一万人直逼亚梅什湖。一七一六年三月上旬，策凌敦多卜致函布霍列茨，坚决要求俄军从亚梅什湖撤走。布霍列茨拒不答复，于是策凌敦多卜下令包围俄堡。加加林闻讯，急忙从托博尔斯克增派援军，他们在中途遭到伏击，死伤累累。亚梅什湖的沙俄侵略军被准噶尔军队紧紧包围，四面夹攻，伤亡极大。同年五月，俄军残部七百人平毁了堡垒，乘船向额尔齐斯河下游逃窜。但他们贼心不死，在逃抵鄂木河口时，又筑了一个堡垒，这就是鄂木斯克城的由来。^②十二月，布霍列茨在鄂木斯克留下一部分兵力，自己返回托博尔斯克。由于亚梅什湖一役的失败，他随后被召到彼得堡，受到严厉审讯。

一七一六年末，彼得一世在赴阿姆斯特丹途中接到亚梅什湖的败耗，立即亲自致函策旺阿喇布坦，妄图用花言巧语诱使他停止抗俄斗争。信中提到，俄国已决定“在斋桑湖和额尔齐斯河上游寻找银矿、铜矿和金矿，并在需

① 策旺阿喇布坦下令逮捕契雷多夫，拘留了五年才放回俄国。

② 鄂木斯克位于巴拉巴草原和哈萨克草原的边缘，它既是沙俄往后进攻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的重要基地，又是向哈萨克扩张的军事据点。

要建城的地方建筑城堡。”接着说，“我们希望你不要妨碍筑城，并给予急需的帮助”；“虽然上述地方属于我们的西伯利亚王国，我们愿意赏给你恩典，准许你和你的属民在这些地方自由居住”；“如果你态度恭顺，丝毫不妨碍筑城和探矿，……我们将下令保护你们不受外敌侵扰。”^①彼得一世无视中国的主权，在这里公然把斋桑湖和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中国领土指为俄国的殖民地，把中国准噶尔部人民视为俄国的殖民地奴隶，要求他们俯首贴耳地供沙俄入侵者驱使，真是嚣张已极。一七一七年三月，沙俄贵族维利亚诺夫携带彼得一世的信函前往准噶尔部谈判，加加林也给策旺阿喇布坦写了一封内容相似的信，交使者一并带去。七月上旬维利亚诺夫到达目的地，随即将上述侮辱性的信件面交策旺阿喇布坦。策旺阿喇布坦阅后怒不可遏，立即下令将维利亚诺夫拘捕，直到次年才予释放，并命令他带回一封复信，严正要求沙俄停止向准噶尔部的属民强征贡税，拆除在准噶尔部领地上强筑的城堡。

维利亚诺夫的使命失败后，彼得一世悍然决定再次使用武力。一七一九年，他先派大尉乌拉索夫、中尉索莫夫潜赴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②下游一带侦察。^③接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345—346页。

② 即斋桑湖东面的一段额尔齐斯河。

③ 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1963年海牙出版，第24页；舒金娜：《中亚细亚地图是怎样绘制的》，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21页。

着便命令近卫军少校利哈列夫率武装部队侵入准噶尔地区，要求他尽可能在斋桑湖畔建立堡垒，并“调查从斋桑湖通往叶尔羌的道路，两地相隔多远，是否可能到达”，等等。^①一七二〇年五月，利哈列夫率领四百四十名俄军和俄国科学院的两名地形测量人员，携带野战炮三十门，臼炮六门，乘坐平底木船三十四艘，从托博尔斯克窜到斋桑湖，并进一步溯喀喇额尔齐斯河上驶了十二天。^②斋桑湖一带的准噶尔牧民见俄军深入腹地，连忙报警。不久，一支六千人的准噶尔军队^③在策旺阿喇布坦的长子噶尔丹策零率领下兼程赶到，于八月二十二日向俄船发起猛攻，万箭齐发，予敌重创。沙俄侵略军力不能支，第二天派人向噶尔丹策零求和。噶尔丹策零勒令俄军立即退出斋桑湖一带。利哈列夫不敢违拗，只得向额尔齐斯河下游撤退。但是沙俄殖民者的侵略本性不改，在经过铿格尔图喇地方时，又强筑了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堡。在此以前，沙俄还于一七一七至一七一八年强筑了热列金斯克堡和塞米巴拉金斯克堡，并重建了亚梅舍夫堡。这条沿额尔齐斯河建筑的军事堡垒线，称做额尔齐斯堡垒线，又名西伯利亚堡垒线，它是沙俄进一步“向准噶

① 舒金娜：《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绘制的》，第22页。

② 阿布拉莫夫：《斋桑湖及其周围地区》，载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第35卷，1865年伦敦出版，第65页。

③ 一说有两万人。六千之数系根据温科夫斯基的记载，他在一七二二年曾亲至准噶尔部。参看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62页，注1。

尔——吉尔吉斯草原腹地进攻”的重要基地。^①

与利哈列夫武装侵入准噶尔地区同时，沙皇政府为了谋取广泛的商业利益，于一七一九年四月派遣伊兹玛依洛夫出使北京。^② 俄国外交委员会坚持侵略立场，在训令中蛮横地规定：如果清政府反对俄国在亚梅什湖一带建筑城堡，伊兹玛依洛夫应声明亚梅什湖和斋桑湖地区均“属于西伯利亚”，俄国在该地区修建城堡是为了“防范卡尔梅克人的侵袭”，这些地方距北京甚远，因此“对中国毫无损害”！^③ 针对俄方的蛮横态度，清政府后来在谈判中曾向伊兹玛依洛夫明确指出，中国准备“在额尔齐斯河建立堡垒和驻扎军队”。^④ 这一声明反映了中国人民维护主权的决心，同时也是对沙俄侵略者的严重警告。

鉴于布霍列茨和利哈列夫两次“远征”的失败，彼得一世决定改换侵略手法。一七二一年一月，他向枢密院下了一道诏令，一方面要求加固亚梅舍夫要塞和增派驻军，另一方面命令与策旺阿喇布坦“媾和通商”，派遣商队前往西宁、大坝和拉萨等地。诏令特别强调说：派出这些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44页。

② 详见本书第1卷。

③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1882年喀山出版，第87页。

④ 同上书，第451页。

商人“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派出一批干练的人员随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有哪些道路可通,能否设法到达并占领该地。”^①彼得一世为了实现他的黄金梦,竟打算借“通商”之名进行领土掠夺活动,可谓用尽心机。关于这道诏令的具体执行情况,各书俱无记载,不知其详。

一七二二年初,彼得一世为了侵吞中国西北领土和掠夺资源,又向准噶尔部派出一个重要的“外交使节”——炮兵大尉温科夫斯基。沙皇政府在训令中规定:温科夫斯基应向策旺阿喇布坦赠送厚礼,“创造一种融洽的气氛”,以便说服他归顺俄国,缔结臣服条约。训令还规定:策旺阿喇布坦应同意俄国在准噶尔地区驻军,割让一部分土地供俄国建筑堡垒线,并承认俄国有权在准噶尔开采金矿。训令要求温科夫斯基向策旺阿喇布坦详细“说明”:俄国在准噶尔地区开矿将给策旺阿喇布坦及其属民带来许多“好处”,“他(指策旺阿喇布坦)将得到这一事业的一部分利润,而他的属民则可受雇为工人和矿工。”^②此外,训令第五条还着重写道:如果策旺阿喇布坦“归顺”俄国,“俄皇陛下将恩准保护他不受别国侵犯,如同保护自己的臣民一样。俄皇陛下可以先致书中国皇帝,令其不要欺凌俄皇的臣民琿台占(指策旺阿喇布坦)。

① 这道诏令原载《1649年以来俄罗斯帝国诏令大全》,1830年帝国秘书厅刊本,第6卷,第313页。

②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第214页。

如果该中国皇帝竟不听命，俄皇陛下将设法以武力迫其顺从。”^①在这一训令中，沙皇政府提出一整套鲸吞中国西北领土的计划，甚至准备对清政府采取战争行动，心狠手毒，无以复加。正如曼考尔所说，这个训令“具有明显的当代色彩”，“他们是想搞一个俄准互助和经援条约”，它反映了“俄国自从黑龙江上的军事冲突以来对清帝国所采取的最极端的立场”。^②一七二二年三月，温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启程，十一月到达策旺阿喇布坦驻地，随即按照上述训令进行谈判。清政府获悉沙俄的侵略阴谋后，立刻召见俄国驻北京代表郎克，就这一事件提出质问，不久更宣布将郎克和俄国商队驱逐出境，以示抗议。与此同时，策旺阿喇布坦也拒绝接受俄方的毒辣要求。温科夫斯基在准噶尔部活动了很久，没有得逞，一七二四年四月空手返回莫斯科。

一七二五年一月彼得一世死后，他的继位者叶卡捷琳娜一世继续把侵略目光盯住中国西北地区。一七二五年九月，沙皇政府向受命使华的萨瓦发出训令：如果清政府坚持在额尔齐斯河建堡和驻军的权利，萨瓦“就应向他们宣告，额尔齐斯河自古以来就为俄罗斯帝国所有，在那里建有西伯利亚城市托博尔斯克，并建立其他许多堡垒与村镇。因此大女皇陛下无论如何不能容许他们中国人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354页。

②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第214页。

在俄罗斯帝国领域内建立堡垒。”^① 这条训令清楚地表明沙皇政府图谋“把额尔齐斯河掌握在自己权力之下，作为以后进攻行动的牢固基础”。^②

五、庇护准噶尔部叛匪，妄图 阻挠清政府平定叛乱

一七二七年策旺阿喇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任准噶尔部首领。他不断扩大割据势力，发动武装叛乱，并丧心病狂地向沙俄乞求军事援助。沙皇政府口头上表示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实际上站在“对准噶尔有利的”立场。^③一七三一年二月，沙俄外交委员会特别指示伊尔库次克副总督，注意对噶尔丹策零采取“亲善的态度”，保持“友好的毗邻关系”，因为中国西北地区的分裂割据状态“对俄国很有好处”。^④一七三一至一七三二年，沙皇政府曾派遣以乌格里莫夫少校为首的外交“使团”往见噶尔丹策零，进行了一系列不可告人的挑唆和收买活动。

一七四五年噶尔丹策零病死，准噶尔封建贵族为了争夺汗位而互相残杀。沙皇政府利用准部内讧和随后清政府出兵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时机大肆活动，庇护准

① 斑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451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44页。

③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376页。

④ 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78页。

噶尔部叛匪，妄图破坏清朝政府统一中国的正义事业。

早在一七五一年，准噶尔贵族达瓦齐及其支持者阿睦尔撒纳在与噶尔丹策零的长子喇嘛达尔札争夺汗位失败后，逃到哈萨克中玉兹阿布赉汗处。沙皇政府得知这个消息，即于一七五二年九月向奥伦堡总督涅普留耶夫和将军切夫凯列夫发布命令说，达瓦齐是“目前指望统治全准噶尔的人”，阿睦尔撒纳是“过去准噶尔统治者的堂弟”，俄国政府考虑到“将来的机会”，决定对他们“尽可能加以招抚，并邀请他们到奥伦堡来”。^①涅普留耶夫和切夫凯列夫接到命令后，即派雅科夫列夫大尉前往中玉兹。但当他赶到时，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已潜回准噶尔。沙俄这一计划暂时没有实现。

如前所述，一七五三年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袭杀了喇嘛达尔札，接着在他们之间又发生内战，阿睦尔撒纳失败后投归清朝。一七五五年清政府出兵进讨达瓦齐，迅速实现了西北地区的统一。但不久阿睦尔撒纳又发动武装叛乱，于是清政府再次出兵讨伐。

在清政府征讨叛匪阿睦尔撒纳、统一西北地区的过程中，沙俄一直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蓄谋破坏。早在一七五六年夏，当阿睦尔撒纳败局已定时，克雷完等地沙俄殖民当局就公开煽动叛匪“归顺”俄国，先后接纳十一名参加叛乱的准噶尔宰桑“加入俄国国籍”。清

^①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435页。

政府根据中俄《恰克图条约》要求引渡上述逃犯，沙俄竟拒不交出，甚至胡说以前准噶尔人“不属于任何国家”，因此中国的要求“违背睦邻友好之道”！^①

不久，匪首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中玉兹。奥伦堡总督涅普留耶夫获悉后，立即函邀阿睦尔撒纳去奥伦堡，并特派卡斯基诺夫前往迎接。卡斯基诺夫于一七五六年九月到达中玉兹，但这时阿睦尔撒纳已窜回塔尔巴哈台山区，纠集残匪，妄图作垂死挣扎，并派人向沙俄求援。一七五七年六、七月间，阿睦尔撒纳的“代表”达巴到达彼得堡，请求沙俄出兵干涉。当时沙俄正忙于争夺欧洲霸权的“七年战争”，抽不出兵力对中国作战，因此没有满足达巴的要求。但是沙皇政府表示，阿睦尔撒纳可以在俄国得到安全的避难所，保证“在吃、穿和其他救济方面都使他称心如意”；如果他愿留在准噶尔“为占有卫拉特的汗位”继续干下去，俄国也“决不妨碍他”这样做。^②同时，沙俄边境长官先后四次致函，劝诱他投奔俄国。清政府缴获这些密信后，于一七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照会俄国枢密院，对此提出强烈抗议。^③但沙皇政府竟置之不理。

同年八月上旬，阿睦尔撒纳在清军的毁灭性打击下，带领少数残匪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沙俄当局如获至

① 班第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266—267页。

② 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第458页。

③ 班第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274页。

宝，立即送到托博尔斯克窝藏起来。清政府深知沙俄收留叛匪，必将“抚而用之”，“为患边境”，^①因此坚决要求引渡。沙俄当局百般推诿，先则诡称阿睦尔撒纳已在额尔齐斯河“落水身死”，继而更由枢密院致函理藩院，荒谬地声称：“准噶尔人是自主的民族”，“他们有权……在俄国寻找避难场所”，“按照条约和情理，不应要求俄国交出这些准噶尔人”，如此等等。^②这些包庇叛匪的无耻谰言，当即遭到清政府严厉驳斥。一七五七年九月，乾隆帝召见俄国使者布拉吉谢夫，亲自谴责了俄方招降纳叛的行径。但沙皇政府站在敌视中国的侵略立场，始终拒绝交出叛匪。直到一七五七年十月，阿睦尔撒纳在托博尔斯克患天花死去，沙俄在清政府的强硬交涉下，才把尸体送到恰克图，交中国官员验视。至于其他叛国投俄的重要匪首如舍凌、罗藏扎布等人，清政府多次要求引渡，沙皇政府一直拒不交还。

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平定，保卫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对于蓄谋鲸吞中国西北地区的沙俄侵略者是一个沉重打击。

① 《清高宗实录》，第547卷，第22页；第555卷，第6页。

②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第281页。按：中俄《恰克图条约》第二条明确规定：“嗣后逃犯，两边皆不容隐，必须严行查拿，各自送交驻扎疆界之人”。沙俄违约包庇逃犯，却反诬中方要求引渡逃犯是“违约”，纯属颠倒黑白。



阿 勒 坦 淖 尔

(采自阿特金森:《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

六、侵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额尔齐斯河上游,窥伺斋桑湖

清政府平定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后,沙俄仍不停止对中国西北的侵略活动。它决定趁这一地区的秩序尚未完全恢复之机,派兵侵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中国领上。

一七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西伯利亚总督兼沙皇政府秘密顾问索依莫诺夫致函枢密院和外交委员会,建议将额尔齐斯堡垒线从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向南延伸到布赫塔尔玛河,再由布赫塔尔玛河继续向东北延伸到阿勒坦泊(捷列茨科耶湖),把中国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的大

部分土地圈入俄国版图。^①沙皇政府采纳了索依莫诺夫的建议，指派少校桑斯基率“考察队”从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前往布赫塔尔玛河口，少校安敦和工程兵大尉普鲁托夫率另一支“考察队”从比斯克出发，经阿勒坦泊、敖尔汉河（楚勒什曼河）和巴什库斯河等处，前往布赫塔尔玛河上游，“察看从布赫塔尔玛河到捷列茨科耶湖建筑要塞和多面堡的地点。”^②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沙俄政府当年便在布赫塔尔玛河右岸距河口不远的地方设立了布赫塔尔明斯克哥萨克村，一七六三年又派中将施普林格尔率领俄军在该地建筑了同名的要塞。^③同时，俄国殖民者还侵入哈屯河和阿勒坦河（比亚河）上游一带，并“逐步向阿尔泰腹地推进，将土著居民越来越远地挤到南方去。”^④

沙俄蚕食中国西北领土的活动引起清朝政府的高度警惕。一七六〇至一七六三年，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等多次上奏清廷，详细报告沙俄侵略军在额尔齐斯河

① 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史纲》，1951年莫斯科出版，第180页。

② 同上。

③ 戈鲁别夫：《阿尔泰：关于阿尔泰山区经济和民政发展问题的历史—统计汇编》，1890年托木斯克出版，第10页。关于布赫塔尔明斯克堡的建成年代，此外还有两种说法。一说建于一七八一年，见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8卷，第421页；一说建于一七六〇年，见格拉西莫夫：《在布赫塔尔玛河谷》，载《帝俄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塞米巴拉金斯克支会会刊》，第5期，1911年塞米巴拉金斯克出版，第5页。

④ 格拉西莫夫：《在布赫塔尔玛河谷》，载《帝俄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塞米巴拉金斯克支会会刊》，第5期，第5页。

上游、库克乌苏河(哈屯河上游)、卫满河(即鄂依满河,哈屯河上游)、色毕河(今苏联恰雷什河上游)及阿勒坦泊擅自“设立标记”和“造屋树栅”的情况。为此,乾隆帝于一七六〇年九月颁发谕旨,命令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阿桂“酌派副都统一员,带兵数百名,至额尔齐斯地方”;另“拣派扎哈沁杜尔伯特兵一千名,度阿尔台,前往额尔齐斯地方,两路会哨,巡察阿勒坦诺(淖)尔等处。果有设立标记,即行拆毁。如有屯驻人等,即行驱逐。”^①一七六三年九月,乾隆帝再颁谕旨说:布赫塔尔玛河等地是“准噶尔地方,此时均已内附,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②并指示成衮扎布派厄鲁特、乌梁海兵各一百名,“前往库克乌苏、色毕等地方,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③一七七一年七月,清政府为防止沙俄继续侵入哈屯河等地,决定加强巡边制度,“将三年稽查一次之处,改为每年稽查一次”,如查获擅自越境屯垦的沙俄殖民者,“即行斥逐”。^④这些措施多少限制了沙俄的领土扩张活动。

沙俄侵略者不仅侵入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和额尔齐斯河上游等地,而且还企图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湖据为己有。早在一七五六年,“俄国人就想要占据额尔齐斯河河源和

① 《清高宗实录》,第617卷,第16—18页。

② 同上书,第692卷,第1—2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888卷,第32页。

斋桑湖。”^①当时，奥伦堡总督兼枢密大臣涅普留耶夫曾明确指示“占据直到斋桑湖的地方”。^②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以后，沙俄更急不可待地“企图占领整个额尔齐斯河，直到斋桑湖。”^③一七六四年，西伯利亚边防长官施普林格尔派遣中尉盖涅杰尔和工程师杰列诺夫率“考察队”到斋桑湖侦察。这伙人不仅测绘了斋桑湖，而且溯喀喇额尔齐斯河上行了七十俄里。^④清政府十分注意沙俄的动向，“沿那林河至卡尔宾山脉的南支构筑了一系列堡垒，以阻止俄国人向南推进”。^⑤正是由于这一严密的防御措施，才使沙俄侵吞斋桑湖的计划暂时没有实现。

进入十九世纪后，中国国势日衰，边防废弛，沙俄侵占斋桑湖的野心迅速膨胀，并恣意展开掠夺该湖水产资源的活动。沙俄侵略分子巴布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在《北京条约》订立以前斋桑湖始终在中国的版图内，但是我国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利用中国人的爱好和平，自由地在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上捕鱼”。^⑥此项掠夺水

① 库尔茨：《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与中国的殖民政策》，载苏联《新东方》杂志，1927年第19期，第204页。

② 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史纲》，第180页。

③ 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8卷，第152页。

④ 舒金娜：《中亚细亚地图是怎样绘制的》，第24页。

⑤ 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8卷，第152页。

⑥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9页。

产的活动始于一八〇三年。最初，捕鱼限在布赫塔尔玛河口以南、那林河口以北的额尔齐斯河上进行，捕鱼人多为非军事人员。一八二二年，西西伯利亚总督卡普采维奇公然下令建立军人渔场，专用哥萨克军队从事捕捞。^①同时，捕捞的范围也迅速扩大到斋桑湖，更进而扩大到喀喇额尔齐斯河。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沙俄哥萨克竟然溯喀喇额尔齐斯河而上，深入到哈巴河、布尔津河和奇兰河一带非法捕鱼。^②这一活动为日后武装占领中国斋桑湖地区奠定了基础。

七、逐步吞并哈萨克，进窥中国 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沙俄一面溯额尔齐斯河而上，不断侵入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一面还逐步侵占哈萨克草原，进而窥伺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沙俄就迈出了征服哈萨克草原的第一步。一六二〇年沙俄在乌拉尔河下游建雅依茨克堡（今乌拉尔斯克），一六四五年又在该河河口建古里耶夫城，这是沙俄在哈萨克西部最早建立的两个侵略据点。

① 谢苗诺夫、波塔宁：《李特尔亚洲自然地理学》，第4卷，《俄罗斯帝国内和中国边境的阿尔泰—萨彦山系》，1877年彼得堡出版，第51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60页。总计在一八〇三至一八四五年间，沙俄从这项捕鱼活动中共捞得五十多万卢布。

到了十八世纪，沙俄对哈萨克的侵略又进一步。一七一六年强建的鄂木斯克堡和一七一八年强筑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堡，不仅是侵略中国西北地区的重要据点，也是从东北方进攻哈萨克草原的前哨阵地。彼得一世曾经写道：“吉尔吉斯部（即哈萨克）……是通向亚洲各国各地区的锁钥和门径，因此，该部需置于俄国的保护之下，”^①说明了沙俄处心积虑吞并哈萨克、并经由哈萨克草原侵入中国西北和中亚诸汗国的野心。在沙俄的武力逼迫下，哈萨克中、小玉兹的一些苏勒坦先后于一七三一年和一七四〇年“臣服”俄国。但这种所谓臣服纯粹“徒有其名”，^②“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奥伦堡堡垒线的建立。一七三五年，沙皇政府在奥尔河口建奥伦堡（今奥尔斯克），^④一七四三年建特洛依茨克堡，一七五二年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堡，再往东延伸到兹维林诺戈洛夫斯卡雅哥萨克村，这样就形成了一条从里海北岸沿乌拉尔河和乌依河直到鄂木斯克附近的弧形堡垒线，并与西伯利亚堡垒线相连接，对哈萨克草原基本上

① 别克马汉诺夫：《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121页。

② 《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和陆军大臣米留金关于对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政策上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条陈》（俄历1864年11月20日），载基列耶夫等编：《十八——十九世纪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1771—1867）》（文件与资料集），1964年阿拉木图出版，第518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2页。

④ 奥伦堡于1743年迁至萨克马拉河口，今名奥卡洛夫城。

构成三面包围的形势。

十九世纪上半叶，沙俄对哈萨克的侵略进入了新阶段。一八二二年沙皇政府悍然颁布《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取消了中玉兹汗的权力，由沙皇政府指派官吏管理。《条例》还明文规定：“西伯利亚堡垒线在防卫的意义上不是永久的设施，随着在吉尔吉斯人土地上的秩序解

忙躲避。伊犁将军庆祥立即将沙俄入侵的情况报告清政府，指出：“向例查边至勒布什河止，勒布什河外五百里始为爱古斯河边界，勒布什内七百里为哈喇塔拉，离博洛霍济尔（博罗胡吉尔）卡伦仅四百里，彼处断难令其侵占”。^①十一月十五日道光帝颁发谕旨，指示庆祥说：“俄罗斯素形骄悍，……该将军务当严饬卡伦员弁兵丁加意防守，勿致稍有疏虞，”并命令“理藩院行文萨纳特衙门（即俄国枢密院）查询。”^②一八二六年一月，理藩院遵旨照会俄国枢密院，义正词严地指出：“我朝自平定准噶尔后，厘定疆界，凡爱古斯、勒布什、哈喇塔拉均立有鄂博，是哈喇塔拉系我朝戡定疆土，舆图所载甚明。今俄罗斯越境远来，盖房侵占，经我查边领队大臣查出。……特此行知萨纳特衙门，即询问尔国属下头人因何擅越边界，建盖房间。此处距我卡伦仅四百里，断难令其侵越，应即饬令尔国守边头目速行拆毁。”^③沙皇政府接到抗议照会后，知事已败露，顾虑这一入侵事件会影响到“给国库带来千百万关税收入的俄国恰克图贸易”，^④因此躲躲闪闪地咨复清政府说：俄兵曾否在哈喇塔拉建房，“并未呈明国王；即兵丁等建盖土房数间，自系因当时暂避风雨起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2册，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0—11页。

③ 同上书，第15—16页。

④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2页。

见，凉不日亦坍塌。现已札知驻边大臣，令其详加察看，俟咨复到日，如有可疑之处，即行停止。”^①一八二六年秋，新任伊犁将军长龄派领队大臣恩绪再往哈喇塔拉察看，查明自去秋以后“俄罗斯实未再来”，所盖土房“坍塌过半”，当即下令“将所存残毁基址概行拆去。”^②

在入侵哈喇塔拉的同时，舒宾还指派军官纽哈洛夫率领哥萨克兵五十人，于一八二五年六月侵入巴尔喀什湖以南的特穆尔图淖尔地区，向我国布鲁特族布库部落的头人宣读了西西伯利亚总督卡普采维奇的信件，公然要求布库人接受俄国的“保护”。^③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抗议，这一分裂活动“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④

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沙俄窥伺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一八三一年，两股沙俄侵略军分别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和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南下，在中国和哈萨克的分界河爱古斯河（阿亚古斯河）中游北岸建筑了阿亚古斯堡。这样，在巴尔喀什湖地区就出现了沙俄陈兵边境的严重形势。接着，沙俄侵略者更窜到中国境内进行频繁的侦察。一八三四年四月，沙俄“探险家”费奥多罗夫从阿亚古斯堡出发，窜到勒布什

①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第2册，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③ 越特金等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1963年伏龙芝出版，第280页。

④ 同上书，第281页。

河口测定了经纬度。^①从一八三七年，沙俄更着手绘制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包括楚河流域的详细地图，沙皇政府并在同年“提出把南部国界移往楚河的问题”。^②由于哈萨克人民发动反抗沙俄统治的大规模起义，打乱了沙皇政府的部署，才使这一侵略计划暂时搁置。一八三九年，西西伯利亚总督哥尔查科夫亲王还曾派阿桑诺夫率领一小股哥萨克部队前往巴尔喀什湖，“调查建立渔场的可能性”。^③当年九月，阿桑诺夫等自阿亚古斯堡出发，顺爱古斯河下行，到达巴尔喀什湖北岸，然后沿该湖东岸进行实地调查，直到勒布什河口为止。由于他们只找到数量很少的弓鱼和鲈鱼，只好放弃建立渔场的打算。

一八四〇年以前沙俄对中国西北领土的蚕食，归根到底只算是俄国熊的餐前小吃。它已经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湖写进菜单，但由于当时中国还有一定力量，俄国熊暂时未能得到大嚼一顿的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清朝的积弱愈加暴露。沙俄于是进一步加快了侵略步伐。辽阔的中国西北边疆，从此陷入了更严重的危机。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英译本，1879年伦敦出版，第173页。

② 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8卷，第152页。

③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英译本，第173页。

第二节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侵略的加紧

一、武力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获得进一步发展,沙俄的侵华野心随之急剧膨胀。它利用同中国边界相连的便利条件,左右开弓,同时加紧了对中国西北和黑龙江流域的武力掠夺。^①

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是沟通中西陆上交通的门户,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很久以来就成了外国侵略者觊觎的目标。进入十九世纪后,清朝国势日衰,政治腐败,边防空虚,沙俄、浩罕^②得以乘机蚕食;英国也在窥测时机,步步进逼。加之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封建贵族互相争

① 关于这一时期沙俄对中国黑龙江地区的侵略,详见本书第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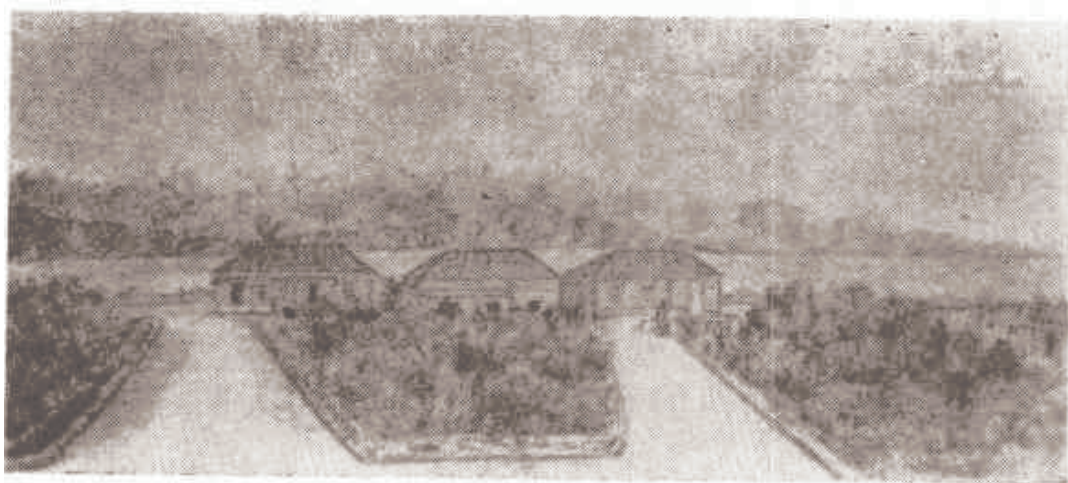
② 浩罕位于帕米尔高原以北以西。十八世纪上半叶,成为封建汗国。十八世纪后期开始,不断向外扩张。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其侵略锋芒已伸到中国楚河流域、伊塞克湖盆地和伊犁河一带。它曾多次煽动、支持新疆地区一小撮民族败类背叛祖国,是南疆几起武装叛乱的策源地。它甚至公然出兵侵袭塔什库尔干、喀什噶尔、英吉沙尔等地,企图将中国南疆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浩罕的扩张活动,转移了清政府对沙俄入侵的注意力,加剧了中国西北的边疆危机。在侵略中国西疆的过程中,沙俄与浩罕迎面相抗,势不两立。当然,浩罕不仅不是沙俄的竞争对手,相反,它本身也摆脱不了被俄国宰割的命运。一八七六年,浩罕被俄国吞并。

斗，内江迭起，削弱了团结御侮的力量；其中个别头目，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翦灭异己，竟屈身事外，引狼入室。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海疆之危骤起，门户洞开，清政府穷于应付，顾此失彼，形势于沙俄入侵极为有利。

西西伯利亚是沙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的主要基地。鸦片战争前夕，西西伯利亚总督哥尔查科夫便已决定，要把俄国的“假定国境线”推向楚河一带；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进犯的武装哥萨克，已经深入斋桑湖地区，前锋逼近巴尔喀什湖东北岸。与此同时，在中亚西部，奥伦堡总督派出的远征军，逐步向东推进。这两支兵力，密切配合，遥相呼应，不仅包围大片哈萨克草原，威胁中亚诸汗国，而且在战略上越来越明显地形成了对中国西北地区分进合击的局面。

武装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哈喇塔拉河一带，切断中国自伊犁通向该湖的巡边路线，是这一时期沙俄入侵中国西北地区的首要步骤。早在一八四一年，鸦片战争的战火未熄，沙俄就以护送自然科学家卡列林“考察”为名，派炮兵军官阿巴库莫夫带领小股哥萨克，由阿亚古斯潜入巴尔喀什湖以东勒布什河和阿克苏河上游、阿拉套山区侦察，于当年冬天在科帕尔河附近擅自修筑冬营，^①蓄谋久占。一八四四年秋，阿巴库莫夫又带领炮兵百人，携

^①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1946年莫斯科出版，第77—78、81页。参看斯凯勒：《土尔克斯坦。俄属土尔克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犁旅行札记》，第2卷，第153页。



沙俄占领下的科帕尔

（采自《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卷）

炮六尊，侵入阿拉套山，在科帕尔附近的一个山口构筑工事，设营盘踞。此后，一批沙俄高级军官和参谋人员，又窜到这里，为建立堡垒选择地址，制定方案。^①经过长期准备，一八四六年八月，西西伯利亚总督哥尔查科夫派遣哥萨克数百名，沿阿亚古斯河南侵，很快越过勒布什河，到达哈喇塔拉河上游以北、科帕尔河附近事先选定的地点，强行筑堡。^②第二年堡垒建成，取名科帕尔。

科帕尔是中国哈萨克族的游牧地，因十八世纪准噶尔头人科帕尔曾在该地设置游牧点而得名。该地北距阿亚古斯三百八十余公里，南至阿拉木图（古尔班阿里玛图）三百七十余公里，地扼军事要冲。沙俄占据了科帕

① 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的旅行》，1860年伦敦出版，第90—95页。

②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88页；俄国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移民局编：《俄国亚洲部分》，第1卷，1914年彼得堡出版，第34页。

尔，就是控制了由塞米巴拉金斯克通往喀什噶尔、浩罕、塔什干等地的孔道。一八四七年四月，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上奏尼古拉一世，极言占据大玉兹哈萨克游牧地南翼，即哈喇塔拉河一带的重要，强调“为了最终确立俄国对大玉兹的影响”，“扩大我们同中国西部特别是同喀什噶尔和部分中亚地区的贸易”，必须立即向科帕尔移民，建立行政机构，巩固并扩大占领。^①同年，有二百名武装哥萨克陆续从托木斯克省的比斯克“防线”移驻科帕尔。^②一八四八年一月，沙皇政府又悍然决定，在科帕尔设置“大玉兹监护官”，由校级军官充任，负责“管理”七河区的哈萨克人，统率驻地周围的俄军和哥萨克移民。^③至此，科帕尔成了沙俄设在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重要据点。

沙俄的武装入侵，激起了当地牧民的强烈反抗。他们拒绝向哥萨克供应建筑材料和畜牧产品，袭击外出侦察滋扰的侵略者。科帕尔堡建成不久，牧民们又自动集

① 基列耶夫等编：《十八——十九世纪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文件与资料集），第334—335页。参看别克马汉诺夫：《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第134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0、153页。

③ 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编：《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第1卷，第349页。七河，俄国人所指不一。一说是爱古斯、勒布什、巴斯坎、阿克苏、库克苏、哈喇塔拉和伊犁河，一说指勒布什、巴斯坎、萨尔次、阿克苏、比延、哈喇塔拉和库克苏河，又说是勒布什、巴斯坎、阿克苏、比延、克兹尔—阿加奇、哈喇塔拉和库克苏河。上述河流都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并注入该湖。见巴托尔德：《土尔克斯坦文化生活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320页。

合起六七千人之众，向该堡发起进攻。^①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打击了敌寇的凶焰，使侵略者痛感“任何急速向前的运动和更快地占据地方，都是极端困难的。”^②

沙俄入侵科帕尔使清政府感到震惊。一八四九年，道光帝得悉俄军“私入边界”，在哈喇塔拉河以北“扎营收租”，无理“阻拦查边道路”，立即命理藩院向俄国政府提出抗议。^③照会指出，科帕尔一带是中国领土，俄国头目、兵丁不得越界居住，该处哈萨克赋税，应由中国当地政府收取，入侵俄军应立即“全数撤回”。^④狡诈的沙俄政府接得来照，一面磨刀霍霍，密令西西伯利亚总督采取措施，向科帕尔堡及其他前哨据点补充粮食、增派军队；^⑤一面玩弄外交手腕，复照清政府，胡说“哈萨克俱为敝国所属”，“自应由敝国办理”。^⑥数月后，沙俄又照会清政府，重弹“哈萨克地方属俄应由俄管”的旧调，硬说它在科帕尔“设立营寨”，派兵驻守，是应哈萨克人“恳求”，为了“保

① 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的旅行》，第296—297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9页。

③ 《清宣宗实录》，第473卷，第12—13页；第475卷，第29页。

④ 《理藩院给俄罗斯国咨文》（道光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1849年12月4日）。

⑤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55页。

⑥ 《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咨复》（道光三十年八月十一日，1850年9月16日递到）。参看《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始末》），咸丰朝，第3卷，第1页。

护伊等”，^①一口拒绝从霸占的中国领土上撤回。面对侵略者的挑衅，忙于镇压正在兴起的人民革命的清政府，除了循例继续派员往西北查边、与侵略者进行口头交涉外，无力采取坚决的自卫措施，致使沙俄更加肆无忌惮。

当时沙皇政府正在考虑沿锡尔河构筑堡垒线并将西伯利亚堡垒线向前延伸、在锡尔河畔合围的广泛计划，蓄谋将俄国的国界推到锡尔河。^② 一八四六年俄军占领科帕尔和一八四七年在咸海东北岸强建赖姆堡，只不过是实现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因此，哥尔查科夫于占领科帕尔以后，立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伊犁河以南地区。



伊 犁 河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① 《俄罗斯国萨纳特衙门咨复》（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1851年2月21日递到）。参看咸丰朝《始末》，第4卷，第3页。

②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1906年彼得堡出版，第88页。

一八五〇年四月中旬，哥尔查科夫借口浩罕人经常在伊犁河谷地活动，威胁商队安全，命令总参谋部大尉古特科夫斯基率领步兵五十名，哥萨克一百七十五名，配备轻炮两门，从科帕尔出发，窜犯伊犁河南岸。^①五月，俄军进攻位于伊犁河支流大阿拉木图河和卡斯克连河之间的塔乌丘别克堡，^②遇到当地哈萨克人和守堡浩罕人的顽强抵抗，一人毙命，七人受伤，不得不向科帕尔撤退。数千哈萨克人乘胜追击。一些已被俄国人视为“自愿效忠”沙皇的哈萨克苏勒坦和部族头人，也投入抗俄斗争，“对派遣队采取公开的敌对行动”。^③这是对沙俄津津乐道的“自愿臣服”论的讽刺！

一八五一年，加斯弗尔德继哥尔查科夫任西西伯利亚总督，他十分强调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的重要性，认为“俄国势力向亚洲腹地扩展的途径，可能就在这里”，^④到任后立即亲赴科帕尔视察。就在这时，哥萨克上校卡尔贝谢夫奉命率领一营步兵、五连哥萨克，携带大炮六尊，再次侵犯伊犁河南岸地区，攻占并平毁了塔乌丘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89页。一说侵略军由步兵五十人，哥萨克一个连组成，见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4页。

② 塔乌丘别克是哈萨克族一个头人的名字；塔乌丘别克堡是一八四九年浩罕人在中国土地上非法建立的。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6—19页。

④ 《俄国地理学会会员谢苗诺夫的札记》，载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附录，第569页。

别克堡。^①但是，俄军在溯卡斯克连河继续南侵途中，又陷入了当地群众的包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向伊犁河撤退。^②

与此同时，彼得堡正在紧张地策划新的入侵。一八五一年，侍从将军安年科夫重新向尼古拉一世提出了构筑锡尔河堡垒线并与西伯利亚堡垒线联结的建议。^③沙皇表示赞赏，强调这是俄国“最重大的事业”。^④加斯弗尔德也表示赞同，并认为当务之急是侦察楚河。为此，他于一八五二年先后派舒尔茨少校等人三次潜往楚河侦察，搜集军事、经济情报。^⑤

根据沙皇政府的统一部署，奥伦堡方面的俄军于一八五三年侵占了锡尔河畔的浩罕要塞阿克麦吉特（后改称彼罗夫斯克要塞，即今苏联克孜尔-奥尔达），并在该河下游强行构筑卡扎拉等堡垒，正式连成了锡尔河堡垒线。同年五月，加斯弗尔德为建立新西伯利亚堡垒线，命令“大玉兹监护官”佩列梅什利斯基少校率军从科帕尔前往伊犁河南岸，“寻找”合适的建堡场所。命令要求，这个地点应在交通方便、既可“溯伊犁河前往山野吉尔吉斯人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89页。一说俄军另有两营炮兵参战，见越特金等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第337页。

②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43页。

③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13-214页。

④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1960年莫斯科出版，第141页。

⑤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1868年彼得堡出版，第145页；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31页。



沙俄强建的维尔内堡

(采自谢苗诺夫:《天山游记》)

地区和喀什噶尔,又可经皮什别克到达浩罕的地方选定”。^①佩列梅什利斯基等侵入阿拉木图河等地侦察后报告:“我们发现阿拉木图一带采伐木材方便,有大片肥沃的、沟渠纵横的可耕地,以及远胜于伊塞克—塔尔加尔河的牧场。因此,可以认为阿拉木图是未来移民的处所。”^②事后,俄军一股即留在阿拉木图河以东塔尔加尔河畔过冬待命。^③

一八五四年初,沙皇根据加斯弗尔德的建议,召开有西西伯利亚总督、奥伦堡总督和陆军大臣参加的特别会

① 山野吉尔吉斯人地区即布鲁特族地区;皮什别克(今苏联伏龙芝),是一八二五年浩罕在中国土地上非法设立的堡垒。

② 别克马汉诺夫:《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第135页。

③ 越特金等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第338页。

议,通过了占领伊犁河南岸和楚河上游地区、并在阿拉木图河旁建堡的决议。^①同年春,佩列梅什利斯基带领一营步兵、三连哥萨克南侵。八月,在伊犁河以南七十余公里、阿拉木图河上游、土地肥沃、风景如画、素称“苹果之乡”的地方,强建外伊犁堡;次年,更名维尔内(今苏联阿拉木图)。侵略军沿山麓继续西进,被大批哈萨克人包围堵截,不得不缩回碉堡。^②一八五五年,大群哈萨克人又



特穆尔图淖尔

(采自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

① 阿·波波夫:《征服中亚史片断》,载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集刊》,1940年第9辑,第200页;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32页。

②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51页。

围攻维尔内，^①虽然没有将它摧毁，但狠狠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维尔内堡的建立，切断了中国伊犁驻军定期巡查伊塞克湖（特穆尔图淖尔）盆地的道路，控制了中国南疆与中亚诸汗国交往的重要门户，奠定了俄国“占领外伊犁地区的基础”。^②至此，西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部队，把俄国的“假定国境线”从阿亚古斯推到了伊犁河南岸，西伯利亚堡垒线从阿亚古斯向南，经科帕尔抵维尔内，在中国境内延伸了七百五十多公里，沿线每隔二十至二十五俄里设有一个哨所，^③正式形成了新西伯利亚堡垒线。维尔内很快取代了科帕尔的地位，成了沙俄设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主要侵略据点。

按照既定的侵略方针，沙俄窃据维尔内后，立即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伊塞克湖和楚河上游一带。恰在这时，历来游牧于伊塞克湖周围的中国布鲁特两大部族——萨尔巴噶什部和布库部的封建上层之间的矛盾激化，一八五五年，双方发生了流血冲突，游牧于西南岸的萨尔巴噶什部将布库部从北岸、南岸驱赶到东北岸，直至特克斯河和格根河一带。沙俄决定乘机渔利。当年九月，佩列梅什利斯基打着“帮助”布库人的幌子，派哥萨克少尉卢特舍夫率部侵入格根河。由于萨尔巴噶什部的坚决抵制，这

①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45页。

②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121页。

③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50页。

一小股俄军不久便被赶回维尔内。^①

一八五六年初，新任“大玉兹监护官”霍缅托夫斯基上校向加斯弗尔德提议，利用布鲁特族内部的尖锐矛盾，对伊塞克湖进行新的军事远征。加斯弗尔德立即批准这一计划，下令扩充外伊犁地区的兵力，给维尔内调拨大炮。这次入侵分前后两个阶段，目标先是伊塞克湖东岸，后是伊塞克湖西岸和楚河上游。

第一阶段：五月下旬，霍缅托夫斯基亲自率领一连哥萨克，携带大炮两门，从维尔内出发。^② 参加者还有以西利维尔格利姆少将为首的地形测绘人员。^③ 此外，沙俄利用哈萨克与布鲁特的矛盾，唆使叛国投俄的哈萨克头目带领骑手，作为俄军辅助部队，一起开向伊塞克湖。六月间，他们以“保护”布库人免遭萨尔巴噶什人排挤为名，经察林河窜入伊塞克湖以东善塔斯山口，直至土布河附近。不久，霍缅托夫斯基应召返回维尔内，余部四十余人由中尉雅诺夫斯基率领，经伊塞克湖东岸潜入该湖以南、纳林河上游扎乌喀山（招哈山）口。由于萨尔巴噶什部的坚决反抗，俄军不敢继续深入，也未能在伊塞克湖立足。但是，在历时两月的东侵途中，他们测绘了地形，搜集了当地政治、贸易、自然条件、交通状况，特别是关于喀什噶尔

① 贾姆格尔契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155页。

② 越特金等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第342页。

③ 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35页。

的很有价值的情报，^①为继续入侵准备了条件。

第二阶段：九月中旬，由霍缅托夫斯基指挥步兵和哥萨克各两个连，^②携炮两门，沿外伊犁阿拉套山北麓西进，越卡斯帖克山口向楚河上游的萨尔巴噶什部聚居区发动猖狂进攻，在托克马克附近古尔根巴什地方杀害当地居民四十人，并抓去多人。^③萨尔巴噶什部被迫西撤。沙俄总参谋部大尉索洛夫佐夫率部追踪，侵入塔拉斯河一带后，因不识路径，被迫折返。英勇不屈的萨尔巴噶什部乘机实行反击，在楚河上游毙伤侵略者二十人。^④俄军侵占伊塞克湖盆地的图谋又未能得逞。

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在近东战场上受挫的沙俄，决意在中亚和中国东北、西北取得补偿。一八五六年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趁火打劫，加紧武装入侵，同时积极展开外交攻势，相继派遣普提雅廷、伊格纳切夫来华，蓄谋割取更多的中国领土。在中国西北地区，它一面极力巩固对科帕尔、维尔内等地的武装占领，一面与奥伦堡方面进攻中亚的行动相呼应，继续向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卷，1961年阿拉木图出版，第395—402、414—415页；贾姆格尔契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159—160、164页。

②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45页。一说俄军为步兵一连，哥萨克三连，见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112页。

③ 巴托尔德：《吉尔吉斯史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534页。

④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46页。另说俄军伤亡十七人。见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112页。

南扩张，力图把楚河、塔拉斯河和伊塞克湖一带连同锡尔河以北的广大中亚地区，统统圈入俄国版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连接新西伯利亚堡垒线和锡尔河堡垒线，于是，夺取处于这两条堡垒线之间东西宽约五百公里的开阔地带，就成了沙俄的当务之急。

一八五八年十二月，奥伦堡总督卡捷宁向沙皇政府提出了继续向中亚扩张的具体纲领，其中第一项就是要求立即占领处于彼罗夫斯克堡和维尔内堡之间的地区。与此同时，加斯弗尔德也极力强调必须占领楚河上游皮什别克一带，使之成为建立“未来边界的据点。”^①为此，一八五九年一月，沙皇在彼得堡召集最高咨询会议，外交大臣、陆军大臣、西西伯利亚总督、奥伦堡总督、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等出席讨论。二月初，会议悍然批准占领皮什别克和托克马克。^②由于缺乏关于该地区的情报，决定先实行武装侦察。

一八五九年五月，总参谋部大尉维纽科夫奉命率领步兵和哥萨克各两连，携带火炮四门，离维尔内开向楚河上游。^③行前，命令他对这次侦察的最终目的——占领皮什别克“绝对保密”。^④六月间，维纽科夫一伙在维尔内以西约八十公里的战略要地卡斯帖克山口，建立了同名堡

① 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1965年莫斯科出版，第112页。

② 阿·波波夫：《征服中亚史片断》，载苏联《历史集刊》，1940年第9辑，第205页；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44页。

③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45页。

④ 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第114页。

寨。俄军侵入楚河上游地区后，继续西进，到达塔拉斯附近。他们沿途侦察骚扰，搜集了有关当地地形、交通、物产、贸易和民族分布的情报，并测绘了托克马克和皮什别克平面图。^①

七月初，俄军返回维尔内。加斯弗尔德根据侦察结果，立即拟就了入侵楚河上游的计划。年末，沙俄陆军部正式决定占领托克马克和皮什别克。为了准备这次远征，加斯弗尔德特意在维尔内集结了军队。一八六〇年二月，他再次派出两股俄军，前往伊塞克湖地区。由连长热列比亚季耶夫率领的东队，计哥萨克七十人，窜到伊塞克湖东岸土布河扎营，以便在当地建立殖民机构，“最终确立”俄国对伊塞克湖沿岸地区的非法占领。^②五月，沙俄驻阿拉套地区的军政头目科尔帕科夫斯基（旧译廓尔帕柯斯克依）上校亲赴伊塞克湖东岸，督令哥萨克南越招哈山口，侵入纳林河上游。科尔帕科夫斯基一面下令拘押拒不服从的布库部头人，一面以西西伯利亚总督名义，向“愿意臣服”者“赠送礼物”，将其中最有影响头人“请到”维尔内，作为人质。同月，以维纽科夫为首的西队，经卡斯帖克山口侵入伊塞克湖西南岸后，遇到萨尔巴噶什部的坚决抵抗。侵略者大施淫威，绑架人质，押往维尔内。萨尔巴噶什部被迫向天山深处和塔拉斯河转移。^③

①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第127页；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121—152页。

② 费姆格尔契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179—181页。

③ 同上书，第182—184页。

与沙俄侵略军在伊塞克湖四周猖狂进攻的同时，加斯弗尔德命令总参谋部上校齐麦尔曼率军赴维尔内，加强哈喇塔拉河至伊犁河各哨所，给这一地区的俄国移民发放武器，拘捕哈萨克人作人质。六月下旬，加斯弗尔德亲自赶到维尔内进行作战部署。

经过充分准备，一八六〇年九月，齐麦尔曼率步兵六连、哥萨克六连、炮兵二连共约二千人，大举入侵楚河上游，攻占了托克马克和皮什别克。十月初，加斯弗尔德上奏亚历山大二世，吹嘘这次战役“彻底确立了我国在外伊犁地区的统治，完全保障了我们哥萨克人在该地区的定居。”^①然而，由于当地居民的反抗，沙俄未能在楚河上游立足。俄军很快撤回维尔内，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伊塞克湖周围敢于坚决抗俄的布鲁特人。屯驻卡斯帖克、维尔内等地的侵略军，常常开到伊塞克湖以南捕捉妇幼，焚掠村庄，抢劫财物和马群，无恶不作。^②

伴随武装侵占范围的扩大，沙俄在新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机器也日益强化。一八五四年十月，建立了隶属西西伯利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强行将科帕尔和维尔内一带划归该省管辖。一八五六年末，沙皇政府又批准设立军政合一、以维尔内为中心的阿拉塔夫州。与此同时，

①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第129—130页。

②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1卷，第258—259页；贾姆格尔契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213页。

俄国殖民者有计划、有步骤地涌进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到五十年代末,在这里先后建立了勒布辛斯克、乌尔扎尔(乌占)、大阿拉木图、小阿拉木图、阿拉善、伊犁斯克、库克苏、萨尔坎、卡拉布拉克、纳杰吉斯克、索菲斯克、柳鲍夫斯克等哥萨克村屯。^①移民由武装哥萨克和农民两部分人组成,事实上这些农民“全是改了称呼的哥萨克。”^②迁入的哥萨克来自西伯利亚军团第九、第十团。他们是新西伯利亚堡垒线的基干力量和沙俄在当地进行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

沙俄“移民用的土地是靠疯狂地损害土著居民的地权而得来的”。^③这种地权转移的过程,也就是残酷剥夺当地居民土地的过程。沙俄侵占科帕尔后规定,每一哥萨克可无偿获得一百俄亩土地。^④实际上侵略者完全“无视哈萨克人的权利和需要”,夺走了他们所有有灌溉设施的良好田和牧场,甚至连放牧必须通过的道路也据为己有。^⑤世世代代在这里劳动、生息的哈萨克人,还必须向哥萨克殖民者交纳繁重的草原放牧税、林区放牧税、牧畜过境

① 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9卷,1913年彼得堡出版,第321页;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267页。

② 谢维尔佐夫:《土尔克斯坦地区旅行记》,第153页。

③ 列宁:《移民问题》。《列宁全集》,第18卷,第81页。

④ 巴托尔德:《土尔克斯坦文化生活史》。《巴托尔德文集》,第2卷,第1分册,第320页。按:1俄亩=1.09公顷。

⑤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267页;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9卷,第321页。

税、伐木税和其他苛捐杂税。^①至于哥萨克图财谋利、抢劫哈萨克人的财物和牧群、虐杀哈萨克人的暴行，更是层出不穷。这种无比黑暗的殖民暴政，不能不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遇有适当机会，他们“总是要做到以牙还牙。”^②一八五六年夏，对沙俄侵略者满怀仇恨的哈萨克人，曾在维尔内以西五十余公里的地方愤怒袭击沙俄殖民强盗，杀死哥萨克十二名，^③这样的例子在沙俄占领区不胜枚举。

二、图谋变中国南疆为沙俄的“保护国”

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沙俄觊觎南疆，早在彼得一世时期即已开始。到了十九世纪，沙俄逐渐形成了夺取喀什噶尔的基本构想：在经济上，替俄国资产阶级在这一亚洲心脏地区开辟其他列强不易进入的销售市场；在政治上，把它变成俄国控制下同英国角逐中亚的前哨阵地，进可以经帕米尔、克什米尔威胁英属印度，退足以阻遏英国向北的扩张。

沙皇政府一向认为“浩罕是入侵喀什噶尔的最好途径。”^④十九世纪初，沙俄就已企图获得一条经浩罕到达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268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35—37页；附录，第573页。

③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51页。

④ 阿·波波夫：《征服中亚史片断》，载苏联《历史集刊》，1940年第9辑，第200页。

喀什噶尔的商业走廊。一八四七年，沙俄外交部明确提出：“喀什噶尔作为商业中心，有许多超过恰克图的优越性；此外，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①正式要求清政府开放喀什噶尔通商。这是沙俄为打入中国南疆进行的初步尝试。在遭到清政府拒绝后，沙俄一面加紧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强占土地，直接威胁南疆，一面利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处境，玩弄政治阴谋，企图把整个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一八五三年十二月，俄国外交大臣通告西西伯利亚总督：由于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中国西部各省“免不了发生骚乱。其结果不仅喀什噶尔，就连伊犁地区，……从中国分离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他透露，“俄国政府已为此作好准备。”^②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一八五七年四月，逃亡国外的原喀什噶尔和卓张格尔的侄子倭里汗，在浩罕汗的策动下，潜回南疆发动叛乱，占据了喀什噶尔。沙皇政府认为时机已到，决定采取行动。五月间，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授意亚洲司司长科瓦列夫斯基起草了题为《喀什噶尔的时局和我们的态度》的报告，强调：喀什噶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地当要冲，“在政治上，不论对俄国还是对英国，都有重要意义。”

① 阿·波波夫：《征服中亚史片断》，载苏联《历史集刊》，1940年第9辑，第199页。

② 阿·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85—186页。

对那里的事态，俄国不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应当在占领黑龙江地区的同时，“特别注意中华帝国的西部疆域。”可以设想，“在喀什噶尔建立了脱离中国独立的汗国”（由张格尔的后裔或其他政权觊觎者执政），并“将它置于俄国庇护下”之后，我们即可“完全统治中亚”。报告人认为，为了不失时机，必须立即派遣“一位干练可靠的官员”前往喀什噶尔搜集情报。^①随后，沙俄总参谋部办公厅又向沙皇提出相同的建议。亚历山大二世审阅了报告，于九月三日亲笔批示“同意”。^②

接着，陆军大臣苏霍扎涅特于九日向西西伯利亚总督发布训令，指出：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起，俄国政府“对于同喀什噶尔建立政治或贸易联系一直表示关切。”一八五一年曾力争在喀什噶尔设立贸易站，“没有成功”。现在必须抓住时机，利用喀什噶尔的事态，“重新作出努力”。为此，依照“陛下谕旨”，决定：

一、以中亚人组成的商队为掩护，“派遣一名干练可靠的人员”前往喀什噶尔侦察。此人身份须严加保密。只能给予口头指示，以免从他身上发现足以表明其地位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565—566页。按：在维谢洛夫斯基一九〇四年编辑出版的《瓦里哈诺夫全集》中，上述报告误为加斯弗尔德所写，致后来有些学者如瓦加尔（《吞并中国土尔克斯坦》，载《斯拉夫评论》，第14卷，1935—1936年伦敦出版，第119页）、拉铁摩尔（《亚洲的枢纽》，1950年波士顿出版，第28页）、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5—1895）》，1963年伦敦出版，第35页）在引用时以讹传讹。

② 同上书，第737页。

和官职的任何纸片。

二、“加强我国在外伊犁地区的驻军。”如有必要，不但可陈兵中国爱达尔库木地方和察林河上，而且可将部队从维尔内堡向喀什噶尔推进。

三、“如果在喀什噶尔恢复了较少依赖于中国的旧王朝”，其代表向俄国求援，“不要拒绝他们的请求”。要善待“新政权的来使”。同时，应根据面临的局势，“准备给予协助”。^①

这份训令清楚地表明，沙皇政府企图通过派遣间谍、武装挑衅、扶植傀儡等手段，来达到其罪恶目的。

这时，加斯弗尔德根据俄国驻伊犁领事札哈罗夫的情报和谢苗诺夫的建议，积极主张插手倭里汗事件。他接到上述训令后，即于十一月十一日向陆军大臣报告：由于“目前中国政府处境困难，可以满有把握地等待喀什噶尔从中国分离出来。”但是，“必须及时给予援助”，才能“巩固”它的“独立”；否则，由于喀什噶尔当局和中华帝国力量对比悬殊，“它的存在不能持久。”^②他还要求乘机吞并伊犁，认为这“不仅是在这一地区确立俄国政权的第一步，而且也是对整个中亚施加俄国决定性影响的第一步。”^③最后，报告提出了支持倭里汗匪帮和派专人前往喀什噶尔侦察的具体计划。沙俄外交部和总参谋部办公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567—568页。

② 同上书，第568—569页。

③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第109页。

厅对加斯弗尔德的提议表示赞同，主张立即行动。^①由于中国军民迅速平定了倭里汗的暴乱，沙俄的上述计划没有实现。

然而，沙皇政府野心不死，仍然决定派遣密探潜入喀什噶尔刺探情报。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中旬，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分别通知加斯弗尔德：经沙皇批准，派遣计划“应尽快付诸实施”。^②

关于间谍的人选，加斯弗尔德担心由俄罗斯人充任容易被中国识破，因此根据谢苗诺夫的推荐，^③指派哈萨克苏勒坦、骑兵中尉乔坎·瓦里哈诺夫担任。

瓦里哈诺夫是中玉兹哈萨克末代汗瓦里的孙子，沙俄豢养的鹰犬。一八五三年参加西西伯利亚哥萨克军服役；一八五五年随加斯弗尔德到科帕尔、维尔内等地活动；一八五六年升任中尉，同年夏参加霍緬托夫斯基上校对伊塞克湖地区的武装侵扰；八、九月间奉命到伊犁进行“外交”活动。因善于侦察中国边疆情况，一八五七年被选为俄国地理学会会员。倭里汗暴乱发生后，他伪装穆斯林商人，潜往伊犁附近搜集情报，终于成了一名老练的

① 马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与事业》，载《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卷，1961年阿拉木图出版，第63页。

②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571—572页。

③ 谢苗诺夫从天山“考察”返回鄂木斯克后，曾向加斯弗尔德吹嘘瓦里哈诺夫是一个“天才的年轻人”，并“坚决请求”派瓦里哈诺夫去喀什噶尔。见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53—54、249页。

职业特务。

为了掩护瓦里哈诺夫，一八五八年初，西西伯利亚总督特派古特科夫斯基上校到塞米巴拉金斯克负责具体部署。经过精心准备，一支由四十三人组成的特别商队，于六月下旬离塞米巴拉金斯克南下。这时瓦里哈诺夫装扮成浩罕人，化名阿里姆巴依，^①正在科帕尔附近待命。

沙俄外交部唯恐瓦里哈诺夫不了解自己的使命，行前特地指示他牢记：“此行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商业性的。”^②七月间，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在给沙皇的奏折中也强调：“由于我国领土已扩展到伊犁河彼岸，使我们同喀什噶尔汗国更接近了，它臣属中华帝国并与西藏、克什米尔及英国统治下的拉合尔相邻”；因此，外交部很重视这一地区，此次派人去喀什噶尔目的“是搜集外交部感兴趣的边区的详细情报。”^③为了保证瓦里哈诺夫一行的安全，沙皇政府特别命令阿拉套州代理长官科尔帕科夫斯基少校派部队护送。

七月中旬，瓦里哈诺夫与“商队”会合后，一起离科帕尔南下，横渡伊犁河，八月上旬到达伊塞克湖以东哈尔齐

① 马占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与事业》，载《瓦里哈诺夫选集》，1958年阿拉木图出版，第48页。

② 马占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与事业》，载《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卷，第65页。

③ 阿·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7页。

拉河谷收购物资，进行休整。这里是两年前他随霍緬托夫斯基东侵到过的地方，因害怕当地居民认出，他总是躲在帐篷里不敢露面。^①一个月后，“商队”继续南行，经善塔斯、招哈山口（护送的哥萨克由此折回维尔内）、纳林河上游、阿克赛高原，于十月八日通过铁列克山口进入喀什噶尔地区。当“商队”接近乌湖素鲁克卡伦的时候，为逃避中国官员的检查，瓦里哈诺夫把详细记载沿途见闻、画有许多地形草图的日记本，偷偷埋入地下。^②

十月十三日，瓦里哈诺夫随“商队”混进喀什噶尔城。他们冒充安集延商人，以认乡亲、送礼物等手段，很快取得了浩罕驻当地监督商务官的信任和庇护。之后，瓦里哈诺夫以经商为名，广泛开展“社交”活动，刺探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和乌什六城情报，同时搜罗古代文物和艺术珍品（如和卓族谱手稿、古钱、陶瓷、玉器等），历时五个月之久。他供认：“我在喀什噶尔逗留期间，曾采取一切手段，尽可能搜集有关该地区特别是小布哈拉（指天山南路）政治状况的准确情报。为此，结识了各民族、各阶层和各团体的人……”。^③

① 马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与事业》，载《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卷，第65页。

② 瓦里哈诺夫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写道：“现在我急忙将这本日记埋进地里，若上帝保佑我们平安回来，本子不为潮气毁坏，我们一定使它重见天日。”充分暴露了作贼心虚的丑态。见《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710页。

③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263页。

这时正值清朝平定倭里汗之乱不久，盘查较严。一八五九年二月，瓦里哈诺夫从英吉沙尔返回喀什噶尔，得知外界已风传“商队中有一个俄国间谍”，感到事情不妙，便决定从速回国。^①三月二十三日，他随“商队”出城西走，绕道纳林河畔的库尔特喀，于四月中旬在招哈山口与前来接应的哥萨克会合。不久，经维尔内回到鄂木斯克。由于担惊受怕，瓦里哈诺夫在回国途中就病倒了。

早就焦急地等待瓦里哈诺夫归来的沙俄外交部，当时正策划派遣伊格纳切夫使团来华。三月一日，它指示即将启程的伊格纳切夫说，外交部对与俄国邻接的“两个领地，即准噶尔和喀什噶尔”的意图，是使它们比满洲、蒙古“更早一些脱离中国”；在条件成熟时“把它们置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为此，“应当努力对这些领地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②但是，他们苦于缺乏第一手情报，作为开展活动的依据。瓦里哈诺夫平安回国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沙皇政府异常兴奋，立即命令西西伯利亚总督将他的侦察报告上呈。

于是，在古特科夫斯基协助下，瓦里哈诺夫带病整理他的“报告”。最后，经加斯弗尔德定稿，取名《阿尔蒂沙尔或中国天山南路（小布哈拉）东部六城的状况》，以总督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248页。

② 阿·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9页。按：这里说的“喀什噶尔”（Кашгария）泛指新疆南部，非仅指喀什噶尔城（Кашгар）。

名义用“急件”寄往彼得堡。加斯弗尔德在给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的信中写道：“这篇报告，在许多方面对政府、对学术界都是最值得重视和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十分明晰地介绍了这个陌生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贸易情况，指出了以前寥寥可数的几个地理学者在这些方面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而他们提供的资料，至今还是我们工作的依据。”^①

沙俄外交部、陆军部对瓦里哈诺夫的报告极为满意。总参谋部办公厅在呈沙皇的报告中说：“这是迥非寻常、极有价值的著作”，它对于俄国占领楚河上游、整治哈萨克、扩大对浩罕的影响，“都是有益的”；“可以设想”，在俄国的帮助下，南疆能够脱离中国“独立”！^②这份报告在沙俄政界、军界和地理学会中广为传阅，成为他们制定和推行侵华政策的重要依据。

一八六〇年三月，瓦里哈诺夫应召抵彼得堡，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四月，晋升骑兵上尉，获得一枚勋章和五百银卢布奖金。在彼得堡期间，他曾到总参谋部参与绘制《巴尔喀什湖—阿拉套山脉之间区域图》、《中华帝国西部边界图》、《一八五六年伊塞克湖考察成果附图》和《伊犁城平面图》，并为地理学会编写关于哈萨克斯坦和中亚的地理、民族状况等资料，继续为沙俄侵华效力。他还应聘到外交部亚洲司兼职，“在俄国兼并南哈萨克斯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584页。

② 同上书，第591页。

坦和中亚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①

瓦里哈诺夫的使命完成了。但这仅仅是沙俄侵略中国南疆的序幕,更大的阴谋还在后头!

三、对新疆的经济侵略和《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

沙俄在侵华过程中实行领土掠夺与经济扩张双管齐下的政策。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很久,沙皇政府在垄断恰克图陆路贸易的同时,就图谋扩大通商范围,把经济侵略的触角伸向中国西部。一七九七年,沙俄颁布赫塔尔明斯克与中国西北地区“通商条例”,把该地作为开展对华贸易的新据点。^②六年后,又在该处设立了海关。^③一八〇五年一月,商务大臣鲁缅采夫上奏亚历山大一世,要求清政府准两国商人在布赫塔尔明斯克以至整个额尔齐斯河一带通商。^④同年七月,沙皇政府在给即将使华的戈洛夫金的训令中规定,他应请求清政府允准俄国“不只是在恰克图一处,而是在整个中国边界上开展贸易”,让俄国货物在中国内地销行。^⑤戈洛夫金的使命失败后,西伯

① 马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与事业》,载《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卷,第76页。

②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1857年喀山出版,第414—415页。

③ 兰斯德尔:《俄属中亚细亚》,第1卷,1885年伦敦出版,第132页。

④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俄国外交部文件集),第1集,第2卷,1961年莫斯科出版,第297—303页。

⑤ 马尔坚斯:《俄国与中国》,1881年彼得堡出版,第33—34页;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1959年布拉戈维申斯克出版,第45—46页。

利亚独立军团司令格拉泽纳普少将命令商人涅尔平在靠近中国卡伦的列姆巴科夫斯克村设立商站，开展对塔城的贸易。^①一八一一年，为了扩大经布赫塔尔明斯克同中国的贸易和搜集有关的情报，格拉泽纳普又派遣翻译官普蒂姆采夫到达伊犁。^②一八二五年，鄂木斯克城防团医生齐别尔斯坦因也被派往伊犁，搜集商业情报。^③

与此同时，沙俄无视清政府的禁令，^④利用中国方面允许中亚商人前来新疆通商的机会，鼓励俄商伪装中亚商人，潜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非法贸易活动。一八〇七年，俄商穆尔塔金带领一支五百匹驼马的商队，首次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前来塔城。^⑤一八一一年，经布赫塔尔明斯克向中国西北边境输出了价值约十五万卢布的货物。^⑥一八二一——一八二四年间，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波波夫和托博尔斯克商人皮连科夫奉西伯利亚当局之命，曾

①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1973年莫斯科出版，第111页。

②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415—416页。

③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1974年莫斯科出版，第211页。

④ 清政府鉴于俄国已经独享恰克图陆路贸易特权，在很长时期内不准俄国人到中国其他各地通商。一七九七年重申：“俄罗斯除在恰克图交易外，其霍尼迈拉呼（扈）卡伦（位于斋桑湖以北、额尔齐斯河右岸。——引者），俱不准通商。”见何秋涛：《朔方备乘》，第62卷，《北徼事迹表下》。

⑤ 札瓦利申：《西西伯利亚记述》，第3卷，1867年莫斯科出版，第83页。

⑥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第211页。

带领一支颇大的商队，冒称安集延人，到达伊犁和喀什噶尔。^①

早期俄国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的据点，除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布赫塔尔明斯克之外，还有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特洛依茨克和奥伦堡。^②俄国输出的货物有鞣制皮革、毛织物、呢绒和金属制品，此外还有鸦片。^③中国主要出口茶叶。

应当指出，俄国对中国的贸易，如同对中亚各地区的贸易一样，并不是正常的商品交换，而是实行对外侵略的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卷，第304、602、673页。

② 一八四五年，奥伦堡所属的特洛依茨克鞣制商人开辟了由奥伦堡堡全线直达塔城的商路。见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269页；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426页。

③ 早在一八三四年，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就已开始向伊犁、塔城等地输出鸦片（谢格洛夫著，古村柳里译：《西伯利亚编年史》，1943年东京出版，第605页；古列维奇：《1839—1842年中英战争期间俄国对鸦片问题的政策》，载苏联《亚洲民族研究所简讯》，1963年第56期，第135—136页）。清政府下令禁烟后，俄国枢密院于一八四一年五月照会理藩院，一面自欺欺人地说什么“迄今为止，在进行相互贸易各处地方，我国商人尚无鸦片交易之事”，一面假惺惺地表示，它已下令“严禁一切俄罗斯属民人等去中国领域内公开或秘密贩卖鸦片。”（《全俄罗斯帝国政府枢密院致中国理藩院咨文》，1841年5月13日。参看《清宣宗实录》，第353卷，第29—30页）事实上，一八四一年后的一个很长时期，俄国商人继续从布哈拉、浩罕等地贩运鸦片到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换取白银和茶叶（阿特金森：《黑龙江上、下游地区的旅行》，第159页）。进入五十年代后，俄国还明目张胆地向伊、塔出口吸鸦片的烟具（《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152页；马丁·古尔伯特：《俄国历史地图》，1972年伦敦出版，第59页）。十九世纪后半叶，还在七河省种植罂粟，炼制鸦片，运销中国西北（谢苗诺夫主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9卷，第454页）。

手段。苏联学者瑟切夫斯基在《十九世纪三十一——六十年代末中俄贸易的变动》一文中指出：“沙俄政府首先从政治利益着眼来看待同中国的贸易”，“它不得不注意到越来越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各种要求，而它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政治军事实力。贸易只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手段。”^① 罗日科娃也曾指出，俄国政府“力图利用俄国商人和他们的雇员作为间谍”以搜集东方各国的情况，“希望俄国商人特别是他们的贸易伙伴们能够掩护它向中亚推进，并为俄国政府广泛的征服政策服务。”^② 殖民征服为俄国资产阶级夺取新的市场，商业活动又反过来为新的殖民征服开辟道路。这是沙俄向亚洲扩张的重要特征，也是它积极开展对华贸易的基本原因之一。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随着沙皇军队不断向中亚推进和俄国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沙俄强烈要求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开辟新市场。一八三六年五月尼古拉一世批示：必须“用武力在东方为俄国商业开辟新的道路”，“为俄国的工业垄断东方市场。”^③ 同年，根据沙皇诏令成立了亚洲贸易公司。坎克林在为该公司拟定的章程中规定，沿奥伦堡堡垒线、西伯利亚堡垒线到布赫塔尔明斯克

① 转引自罗日科娃：《俄国同中亚的经济联系（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1963年莫斯科出版，第201页。

② 同上书，第214页。

③ 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波克罗夫斯基选集》，第3卷，1967年莫斯科出版，第105—106页。

是该公司三条主要贸易通道之一。^①与此同时,沙俄舆论界要求同新疆贸易“合法化”的聒噪声也甚嚣尘上。^②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税等侵略权益。俄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遇到了西方国家的激烈竞争,恰克图贸易一度出现停滞和下降趋势,威胁着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减少了沙皇政府的国库收入。面对这种不利处境,沙俄力图向新疆实行经济扩张。一八四四年四月,驻北京东正教会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尔普)正式向沙皇政府建议在新疆开辟“新市场”。^③九月,外交部亚洲司向财政部提出进一步发展中俄西部地区贸易问题。^④同年末,经沙皇批准,外交部决定派亚洲司副司长柳比莫夫前往伊、塔调查俄国商品在当地销售情况,特别是调查通往喀什噶尔、中国西北各省和西藏的道路。训令要求柳比莫夫行动要“格外谨慎”、“绝对保密”,“以免被中国人识破”。为此,外交部规定他改穿亚洲人的服装,冒充商人(特地给他颁发了化名霍罗晓夫的身份证),与塞米巴拉

①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194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241页。

②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第114页。

③ 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北京传教士团和俄中贸易》,载苏联《红档》杂志,1932年第53卷,第165—166页。参看本书第1卷,第288页。

④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中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东方学》杂志,1956年第2期,第100页。

金斯基的商队同行。^①

一八四五年六月，柳比莫夫离塞米巴拉金斯克南下，先后到达塔城和伊犁。当年回彼得堡后，他立即向外交部详细汇报，指出英国商品已经从中国沿海经内地运到喀什噶尔销售；为了发展同中国西部的贸易，必须与清政府谈判，建立与伊、塔以至喀什噶尔的“合法”贸易；同时应采取如下具体措施：加速提高俄国产品质量，“接纳”沿边地区居民为俄国“臣民”，夺取哈喇塔拉等据点，以保证商道和货栈的安全；从塞米巴拉金斯克派商队去喀什噶尔，但“不必声张”；要减低茶税，以吸引商人参加贸易，等等。他认为只要这样办了，便能“可靠地达到政府希望的目的——发展俄中贸易，为俄国工业开辟巨大的源泉。”^②

涅谢尔罗迭接到报告后，立即于一八四六年二月指示佟正笏向理藩院施加影响，使他们“认识”俄国的上述意图对于中国的“好处”，以便日后正式提出要求时，他们乐于接受。^③六月，涅谢尔罗迭又和财政大臣符隆钦科进行磋商，一致认为，在西欧各国竞相开展对华贸易的情况下，俄国只在恰克图一处同中国通商是“危险的”，恰克图贸易萧条的延长，可能引起俄国某些工厂倒闭。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开展对中国西部的贸易。两人提议通过在

①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 and 俄国资产阶级》，第341页。

② 同上书，第340—341页。

③ 同上。

华东正教传教士团就上述问题同清政府谈判。与此同时，他们与西西伯利亚总督哥尔查科夫商定：派军队到乌尔扎尔；在哈喇塔拉河方面，“为避免中国的抗议，暂且逐年往那里增派军队，以便逐渐使汉人和哈萨克人对俄军感到习惯。”他们还提议在明年春季派遣有武装保护的商队“毫不声张”地前往喀什噶尔。接着，亚洲司命令佟正笏以“极其谨慎”的态度与清政府谈判缔约。^①在这里，沙皇政府把武装入侵、经济扩张和外交诈骗等卑劣手段，一齐使用出来对付中国。

一八四七年七月，佟正笏受权向理藩院要求在塔尔巴哈台、伊犁和喀什噶尔“三处通商”。清政府以“所请与例不符”，加以拒绝。^②但是，沙俄由于对哈喇塔拉河一带的入侵已经得手，造成了向新疆实行经济渗透的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所以，对清政府的答复并不理会，反而采取各种措施，向既定目标迈进。一八四七年末，沙俄外交部指示佟正笏向清政府官员行贿，说：“为了你的成功，你不应吝惜礼品。”^③一八四八年初，涅谢尔罗迭又指示“大玉兹哈萨克监护官”，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保俄国商队经七河区前往伊犁和喀什噶尔等地的安全。同年六月，

①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第342页。按：沙俄拟议中的这支商队因一八四七年中国南疆发生“七和卓之乱”而没有成行。

② 《清宣宗实录》，第443卷，第7—8页；咸丰朝《始末》，第1卷，第7页。

③ 同①，第342页。

佟正笏奉命向理藩院重提旧议。一八五〇年一月末，护送第十三届传教士团来京的科瓦列夫斯基又向理藩院转递枢密院来照，“仍请在伊犁等三处通商”。^①如此等等。

清政府明知沙俄要求在“三处添设贸易，其心本属叵测”，^②但因俄方一再催逼，又怕“径行拒绝，致激事端”，为祸更烈，^③便决定满足俄国部分要求，开放伊犁、塔城。由于伊、塔历史地理条件与买卖城不同，清政府认为不能仿照《恰克图条约》办理通商，需另行“妥议章程，以期日久无弊。”^④一八五〇年五月，清政府正式通知俄方，同意在伊、塔“暂行贸易”，并请于明春派员前来伊犁会谈。^⑤次年一月，俄方来照同意谈判，清政府遂授权新任伊犁将军奕山与俄国代表会谈。

一八五一年三月初，沙俄外交部正式委派刚从中国归来的科瓦列夫斯基少校为全权代表，前往伊犁，并于五月初发给训令，规定他的基本任务是：一、不仅要求中国开放伊犁、塔城，而且要求在喀什噶尔通商，即使试行也可；二、获得在伊、塔设置领事的权利；三、伊、塔贸易免税；四、仿照东西伯利亚总督与库伦办事大臣联系办法，建立西西伯利亚总督与伊犁将军之间经常的直接的联系。^⑥

① 咸丰朝《始末》，第1卷，第7页。

② 《清文宗实录》，第31卷，第2—3页。

③ 《清宣宗实录》，第475卷，第29—30页。

④ 《清文宗实录》，第7卷，第4—5页。

⑤ 咸丰朝《始末》，第1卷，第8—9页。

⑥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东方学》杂志，1956年第2期，第100页。

六月下旬，科瓦列夫斯基离塞米巴拉金斯克，取道科帕尔，经博罗胡吉尔卡伦，于七月十九日到达伊犁。随员有满语翻译札哈罗夫（旧译杂哈劳），医生塔塔里诺夫等，另有骑兵三四十名。^①

七月二十二日，谈判开始。奕山令协领图们泰、佐领哈布齐贤出席，说明喀什噶尔不能开放的理由。科瓦列夫斯基硬要开放喀什噶尔，说什么“我国原请三处通商，因只许两处，故复有试行之请”；“初试并不求利，历久自必有益。”双方“相持数日，莫能折服。”最后科瓦列夫斯基“知是必不准行”，乃作罢论，但仍声称：“请俟数年后，或数十年，再看机会，（在喀什噶尔）试行通商。”^②野心始终不泯。关于伊、塔通商的具体办法，俄方要求按照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图市约》办理。^③昏庸的

① 《俄罗斯帝国署固毕尔那托尔致大清国伊犁将军咨文》（1851年6月递到）。固毕尔那托尔，此处指西西伯利亚总督。

② 咸丰朝《始末》，第5卷，第5—6页。

③ 《恰克图条约》签订后，因俄方屡次违约，不断怂恿俄人越界抢劫，挑起边境事端，清政府曾被迫多次停止恰克图贸易。一七八五年恰克图闭市后，俄国官商两界每年约减少三百五十万卢布的收入，沙皇政府对此极为不满，曾有出兵中国之议；后因忙于西方战事，无力东顾，只得向清政府谋求妥协。一七九一年秋，俄国枢密院行文理藩院，要求“复准开市。”一七九二年二月，库伦办事大臣松筠等与西伯利亚总督皮利、伊尔库次克省长纳基利等在恰克图会晤，订立《恰克图市约》五条，规定俄方应对本国边民“严加管束，杜其盗窃；”有关通商事宜，“一切仍照旧章，”即仍按《恰克图条约》有关条款办理。于是，恰克图贸易恢复。参看何秋涛：《朔方备乘》，第37卷，《俄罗斯互市始末》；福斯特：《莫斯科人和清朝官员》，1969年美国出版，第312—315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第29—30页。

奕山等人不知《市约》究为何物，竟然认为“恰克图既已行之多年，伊犁不能不仿照办理”，贸然同意“按旧章定议”。^①八月六日，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和科瓦列夫斯基分别在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上签字；“除喀什噶尔通商案外”，奕山“接受了俄国的所有提议。”^②

《通商章程》有满、俄两种文本，共十七条。^③沙俄通过该约从中国取得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权益。主要有：

一、片面设领。条约第二条规定，俄国得在伊、塔设置领事。这是沙俄在中国设领的开始。俄国领事不仅是“专派管贸易”之官，而且充当“外交代表”兼高级间谍，极力为掠夺中国领土和各种侵略权益效劳。伊犁、塔城的俄国领事馆事实上是沙俄侵略势力伸入中国新疆地区的合法据点。

二、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伊、塔开市后，“遇有两边商人之事，各自秉公办理”（第二条）；“两边商人遇有争斗小事，即着两边管贸易官员究办”；来伊、塔之俄商，如不在指定地点放牧，或有践踏田苗等行为者，“即交俄罗斯管贸易官究办”（第七、九、十一条）。这就是说，俄国商

① 咸丰朝《始末》，第5卷，第6—7页。

② 布纳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页》，载苏联《苏联东方学》杂志，1956年第2期，第100页。

③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8—80页。

人在上述两地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是俄国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的开始。

三、贸易免税。条约第三条规定，两国商人贸易，“彼此两不抽税”。表面上这一规定仿照《恰克图市约》，但《市约》规定，“免税贸易”在中（买卖城）俄（恰克图）边境双方同时施行，因而是对等的；而《伊塔通商章程》规定，免税仅在中国境内实行，俄国并不开放相应的通商口岸，中国也不派商队去俄国。就连曾任俄国驻塔城领事的博戈雅夫连斯基也承认：中国人根本“不能够享受这种（免税的）权利”。^①西方学者评论说：“中国商人即使间接地也不得享有这些利益。”^②俄国攫取的这一特权，后来不仅在中俄《北京条约》（一八六〇年）、《陆路通商章程》（一八六二年）、《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一八六九年）等不平等条约中得到重申，而且扩大了实施范围。这一条款为俄国商品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倾销打开了大门，给中国民族工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四、设置商站。条约第十三条规定，俄商可在伊、塔自费建造“贸易亭”（即商站，或称货圈、贸易圈地、买卖圈子），“以便住人、存货”。次年两地先后动工，一八五三年落成。商站占地范围，起先各为三里余，共建屋九十九

①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1906年彼得堡出版，第333页。

② 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195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4页。

间。^①此后俄方擅自扩充,占地日广。住站俄人,“自有俄罗斯贸易官管束”,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和司法系统管辖之外;站内还存放枪枝等违禁物品,^②并有俄国兵丁守卫,^③它与英、美等国在中国建立的租界相比,无其名而有其实。后人曾痛切地指出:“夫租借地犹有租借之名,此则并租界之名而无之,是与割让何以异!主权丧失,莫此为甚。”^④

中俄《伊塔通商章程》是继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之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不平等条约,也是沙俄逼签的第一个中俄不平等条约,它使沙俄掠取中国西北地区经济贸易特权的宿愿成为现实。条约签订后,涅谢尔罗迭兴高采烈地向沙皇祝贺:“该约对俄国工业利益至为重要,它必将给俄国在亚洲的贸易以巨大的推进。”尼古拉一世也满怀喜悦,批示道:“这是一项新的成就,我国整个商业界对它的真实意义将给予应有的评价。”^⑤后来,许多沙俄侵华分子都曾满意

① 咸丰朝《始末》,第5卷,第31页;第7卷,第2页。

② 一八五五年塔城商站被焚后,发现站内存有枪銃五百余杆。见《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等奏俄罗斯夷商与民人启衅情由并自请严议折》(咸丰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855年9月1日)。

③ 《俄罗斯国西锡毕尔致大清国伊犁将军咨文》(咸丰五年十月二十日,1855年11月29日递到)承认:西西伯利亚当局曾派出少数兵丁“保护买卖亭子”。

④ 杨增新:《补过斋文集》,第3编,第5卷,外交上,第10页。

⑤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第343页。

地指出:《伊、塔通商章程》是“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间俄国同中国缔结的一系列辉煌条约的开端,”“在中亚贸易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把握有大量资本的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这里”。^①“应该承认,一八五一年伊犁条约是个转折点”,^②“不仅在商业方面,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给继续向中亚深处进攻以有力的推动。”^③总之,他们一致欢呼“这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④

《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沙皇政府“为了避免英国对俄国在亚洲扩张的注意”,对该约一直秘而不宣。^⑤直到一八六一年三月,即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重新确认并扩大了“章程”的不平等条款后才予公布,前后保密长达十年之久。^⑥

清政府对于《伊、塔通商章程》带给中国的严重危害,不无注意。条约刚订立,国子监祭酒胜保就曾指出,俄国政府“意在贪利”,日久必生“边衅”,“不可不防”,并要求咸丰帝“严定限制”,“弥边患于未然”。^⑦咸丰帝急忙下令

①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269、323页。

②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315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33—134页。

④ 格里戈里耶夫:《论俄国在中亚的政策—历史概述》。转引自斯凯勒:《土尔克斯坦》,第2卷,附录,第414—415页。

⑤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1558—1899)》,1900年伦敦出版,第71页。

⑥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323页;黑尔瓦尔德:《俄国人在中亚》,英译本,1874年伦敦出版,第9页。

⑦ 咸丰朝《始末》,第5卷,第13页。

军机大臣等妥筹“防患未然、经久无弊”之方，^① 但为时已经晚了。

一八五一年《伊、塔通商章程》签订后，沙俄在中国西北边境地区的贸易额“急剧增长。”^② 输出额由一八五〇年的二十一万一千五百一十六卢布增至一八五四年的六十五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卢布，四年间增长了二倍多。其中棉织品、金属制品和呢绒分别增长一倍、二倍、四倍以上。^③ 这反映了中国西北地区作为俄国工业品市场的重要性不断增大。沙俄对中国西北贸易的发展，不仅给俄国资产阶级带来巨额利润，而且给沙皇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据不完全统计，仅一八五五年，由伊、塔输入俄国的茶叶，就为俄国国库提供了十万卢布的关税收入。^④

四、塔城人民的抗俄斗争

沙俄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武力入侵和经济掠夺，激起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愤怒与反抗。一八五五年焚毁塔城俄国商站的斗争，就是突出的例证。这一斗争是沙俄图谋侵占中国雅尔噶图金矿引起的。

雅尔噶图位于塔城西南，东距莫多巴尔鲁克卡伦七八十里，属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辖境。当地回、汉居民早

① 《清文宗实录》，第42卷，第15—16页。

②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270页。

③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第436—437页。

④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323—324页。

就在这里采挖金沙。一八五三年夏，清政府决定设立官厂，鼓励民人前往开发，“以助饷项”。^①沙俄侵略者听说雅尔噶图产金，顿起贪心，派人前往矿山阻拦中国金夫开采，^②同时由西西伯利亚总督照会伊犁将军进行威胁，胡说该矿是俄国所属，中国应将金夫“即速撤回，勿令复入，不然日后不和之事，起与不起，我们不保。”^③伊犁当局一面申明雅尔噶图属于中国，一面对沙俄妥协退让，借口“金苗不旺”，将金矿停撤，^④并于一八五四年先后四次出动军队，“收揽”矿工返回塔城。但是，挖金工人为谋取生计，仍有不少继续留矿，散而复聚者亦复不少。沙俄见塔城矿工不屈，恼羞成怒，决定诉诸武力。一八五五年春，大批俄军由阿亚古斯侵入雅尔噶图，强行驱赶中国工人，一手制造了伤害矿工多人的流血惨案。^⑤塔城人民怒不可遏，纷纷要求地方政府维护矿山主权，为死难同胞伸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派员与俄国驻塔城领事塔塔里诺夫交涉，塔塔里诺夫蛮不讲理，恫吓说：“卡伦以外，是我们哈萨克的地方，你们将民人逐回，不然亦难保事之有

① 咸丰朝《始末》，第11卷，第23页；第13卷，第2页。

② 《民人徐天尧等控告萨碧屯侵吞国课私通番夷呈》（咸丰五年十月二十日，1855年11月29日递到）。

③ 咸丰朝《始末》，第11卷，第24页。

④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617页；咸丰朝《始末》，第13卷，第2页。

⑤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英秀等奏俄罗斯夷商与民人衅情由并白请严议折》（咸丰五年七月二十三日）；《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617页。

部队，并将其中一部开抵离塔城仅二十五俄里的有利阵地。^①

八月十七日，瓦里哈诺夫由科帕尔抵伊犁。沙俄外交部训令他与札哈罗夫密切合作，“从速恢复业已中断的贸易关系”，并伺机“谈判俄中边界问题”。^②在交涉中，瓦里哈诺夫“意存狡执，一味索赔”，^③甚至说俄国的失物，“应按十倍赔偿。”^④清朝地方官严正驳复，指出，雅尔噶图“本系我国地方”，中国金夫在彼采金，俄国无权干涉；此案由该国“驱逐挖金民人、伤毙人命”所致，俄方应首负其责，不应反向中国索赔。但瓦里哈诺夫坚执原议，宣称“此次前来，特为办理赔还一事，其余将来另办。”并威胁说：“若不议赔，”“即行回国”。^⑤由于俄方蛮横无理，谈判毫无结果。十月下旬，瓦里哈诺夫离伊犁返回鄂木斯克。

此后，沙俄继续利用“塔案”向清政府任意敲诈勒索。一八五七年三月，沙俄外交部曾指示出使中国的普提雅廷，为诱使清政府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谈判中可“不必要求赔偿这些损失”。^⑥与此同时，沙俄继续在中国西部边境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六月间，俄军三十余人携带

① 《瓦里哈诺夫全集》，第2卷，第561页。

② 马古兰：《瓦里哈诺夫的生平与事业》，载《瓦里哈诺夫全集》，第1卷，第55页。

③ 《清文宗实录》，第211卷，第20页。

④ 咸丰朝《始末》，第14卷，第6页。

⑤ 同上书，第5—12页。

⑥ 阿·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2页。

军械，窜犯伊犁奇沁卡外爱达尔库木地方。^①接着，俄国驻伊犁领事札哈罗夫向伊犁将军提出商货“由伊犁河内载船行运”的无理要求，企图攫取伊犁河自由航行权。^②八月末，俄方又将驻伊犁领事和商人等全部撤回，并封锁边境，“彼此断绝通行”，^③蓄意制造紧张局势，逼清政府就范。

一八五八年四月，俄方再次提出，如果清政府同意以黑龙江为界，作为“报答”，商站损失“计银已及二十万两，亦可不要。”^④同年五月，在璦琿谈判中俄方又以中方“未秉公处理”塔城事件相要挟，迫奕山屈服。^⑤中俄《璦琿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沙俄又以减少赔偿三分之一为饵，逼诱清政府从速完成条约的批准、互换。^⑥另一方面，

① 咸丰朝《始末》，第16卷，第2页。

② 咸丰朝《始末》，第16卷，第31—33页。按：早在一八四二年二月，沙俄西西伯利亚当局就已擅自授予俄国巨商库兹涅佐夫等在巴尔喀什湖和伊犁河航行十五年的特许权。为此，加斯弗尔德向尼古拉一世奏称：此举不仅可以“迅速发展”俄国与伊犁及其邻近地区的贸易，而且“可以用来最迅速地向军队运送各种军需物资。”沙俄陆军大臣多尔哥鲁科夫表示“完全同意”（列基耶夫等编：《十八——十九世纪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文件与资料集），第400页）。这是“俄国政府力图利用商人的商务活动为俄罗斯帝国吞并新的领土服务”的又一“事例”。见罗日科娃：《俄国同中亚的经济联系》，第222页。

③ 咸丰朝《始末》，第17卷，第10页；第23卷，第28页。

④ 同上书，第21卷，第5—6页。

⑤ 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传记资料）》，1891年莫斯科出版，第511页。

⑥ 阿·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7页。

沙俄外交部决定派遣驻伊犁领事札哈罗夫来华就“塔案”重开谈判。五月二十一日，外交部通知札哈罗夫，“为彻底解决抢劫塔城商站事件”，一支军队已奉派到达中国西北边境。^①七月二十六日，札哈罗夫由鄂木斯克到达塔城。卫队四百余人护送至塔城外中国卡伦，内四十人伴随入城。^②在谈判中，札哈罗夫态度蛮横，以发动战争相威胁，一再要求仿照英国“在广东索赔烟土”之例办理“塔案”。^③在沙俄的外交讹诈下，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谊、协领哈布齐贤被迫于九月七日在《塔尔巴哈台议定补贴条约》上签字，除答允由中国重修被焚俄国商站外，还以“补贴”俄商名义赔款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二两，以武彝茶五千五百箱（每箱净重五十五斤）折抵，分三年付清。^④条约签订后，札哈罗夫又借口保护俄领、俄商，取得了在伊、塔两处商站驻兵五十名的特权，^⑤开了俄军在中国西北城镇驻扎的恶劣先例。

一八五八年中俄《补贴条约》是紧接中俄《璦琿条约》、《天津条约》之后强迫中国签订的又一屈辱条约。沙

① 阿·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沙皇外交》，载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1卷，第196页。

② 《俄罗斯国阿庚特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咨文》（1858年6月送到。“阿庚特”系俄语“委员、代表”一词的译音。——引者），咸丰朝《始末》，第30卷，第23页。

③ 咸丰朝《始末》，第30卷，第46—48页。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1—115页。

⑤ 咸丰朝《始末》，第31卷，第46—47页。按：在此以前，沙俄已违约密派少量兵丁“守卫”商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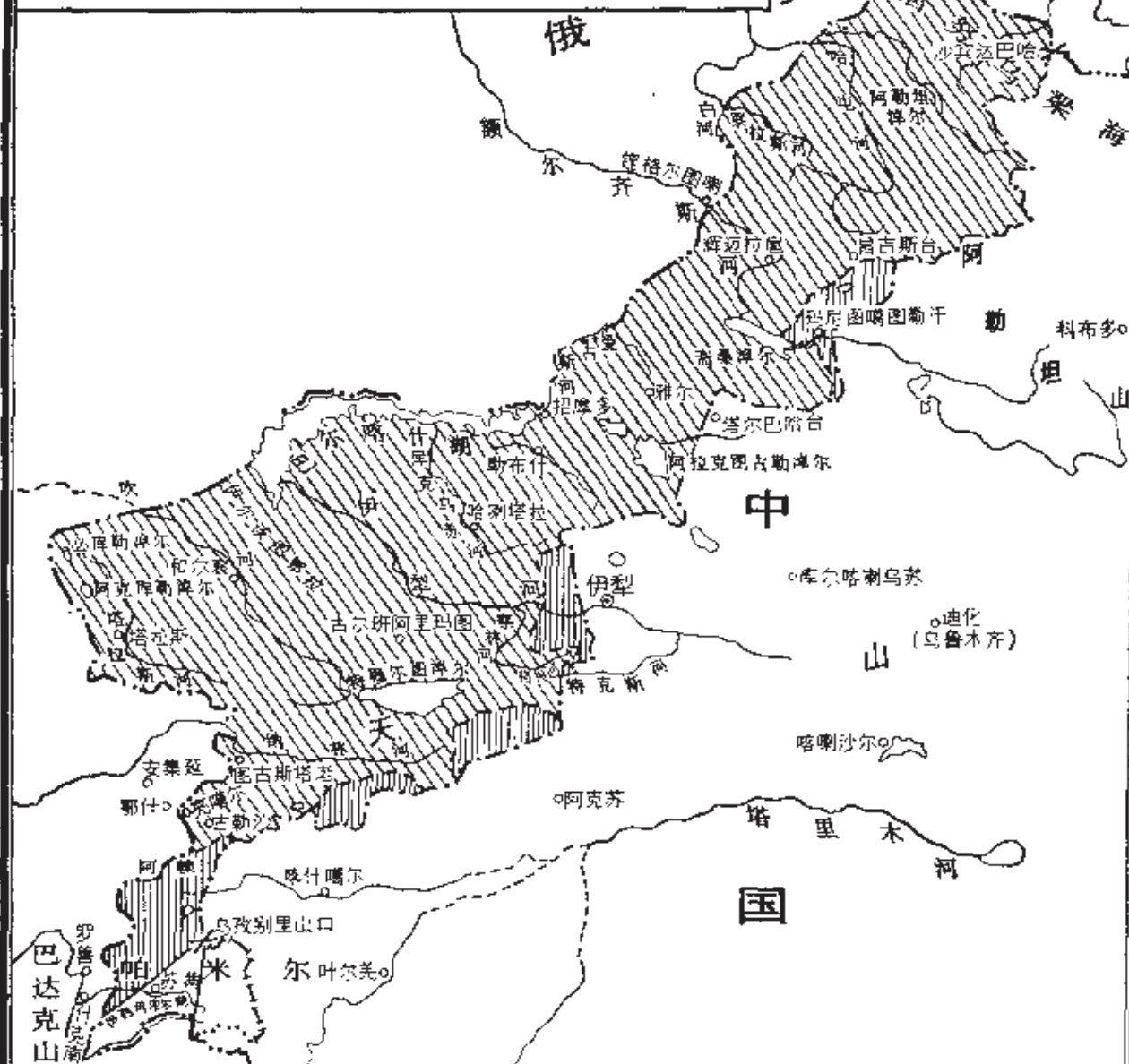
俄侵略者维纽科夫满意地指出：“一八五八年是俄国在远东特别值得庆幸的一年”；在塔城谈判中，由于给札哈罗夫“配备了一支不大的部队，以备不虞，我们最终获得了贴补茶叶四四〇〇〇〇俄磅的胜利”。^①

至此，塔城人民维护矿山主权、反抗沙俄侵略的正义斗争，因沙俄的武装干涉和清政府的出卖而失败。

^①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326页。

沙俄割占中国西部领土示意图

原准噶尔部辖地 俄罗斯



图

例

····· 1860年以前中国西北边界线

--- 十九世纪末的中俄边界

—— 十九世纪末沙俄军事占领线

//// 沙俄通过1860年《北京条约》和1864年《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的中国领土



沙俄通过1881年《伊犁条约》和以后五个勘界议定书割占的中国领土

..... 1895年俄英私分线

第 三 章

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 割占中国西北大片领土

第一节 中俄《北京条约》有关西部 边界条款的掠夺本质

本书第二卷已经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一系列侵略权益，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并为继续扩大领土掠夺埋下了伏笔。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边界的条款，便是其中突出的一项。

中俄《北京条约》分俄、汉两种文本，都是伊格纳切夫一手炮制的。约文第二条规定了在中国西部地区两国共同边界的大致走向：

汉文本：“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

罕边界为界。”^①

俄文本：“迄今未经划定的西部边界，今后应顺山的走向、大河的流向及中国现有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根据恰克图条约于一七二八年（雍正六年）所立最末一个名为沙宾达巴哈的界标起，向西南到斋桑湖，再由此到伊塞克库里湖以南的山，即腾格里山，或吉尔吉斯阿拉套，亦称天山南路（天山南脉），又顺此山到浩罕领地。”^②

这一条款把历来属于中国的山河湖泊和设在境内的卡伦作为划分西界的标志，其本质就是迫使中方承认缔约前沙俄侵占中国西北领土的行径为“合法”，并允许俄国把它的边界线向中国西境纵深地带推进一大步。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充分地表现了沙俄外交的贪婪和蛮横。

首先，沙俄强行规定以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作为分界标志，甚至以腾格里山（即天山南脉）为界山。这是对中国领土的明目张胆的宰割。

斋桑湖是中国的内湖，距其以西以北的中国边界各有四五百里。连俄国侵略者巴布科夫也承认，“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前，斋桑湖始终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无疑属于中国”。^③ 特穆尔图淖尔也是中国内湖，距边界更远。

① 丁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50页。

② 俄国外交部编：《俄中条约集（1689—1881）》，1889年彼得堡出版，第161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9、469页。

腾格里山，是我国布鲁特等民族游牧的场所。除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俄国个别“探险家”曾窜到这里外，在这一巨大的山脉中从来没有俄国人的足迹。约文规定以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腾格里山为分界标志，就是把斋桑湖以北以西，特穆尔图淖尔至腾格里山，以及特穆尔图淖尔以西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入俄国版图。

该约俄文本还规定以“中国现有卡伦路线”为分界标志。这也是适应俄国侵略的需要。

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卡伦，分常驻、移设、添撤三种。常驻卡伦是常年设置不移的卡伦，移设卡伦是按季节不同而移换设置地点的卡伦，添撤卡伦是根据需要随时设置或撤除的卡伦。这三种卡伦，都是“中国的现有卡伦”。它们绝大多数距国境线很远，与边界线毫不相干。^①

中国清朝政府在北部边境大量设置卡伦是在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当时，根据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两国政府勘定了北部边界。清政府从恰克图起，沿边向左右两个方向设立了四十余处卡伦。这些卡伦的职能是捍卫边疆，管理界务，卡伦之间自然形成一条卡伦线。即使如此，这一卡伦线也不能与当地的国境线混同。因为作为国界标志的不是卡伦而是边界鄂博，卡伦与鄂博的位置并不一致。

^① 松筠：《新疆识略》，第11卷，第2、8页；钱恂：《中俄界约斟注》，界约四，第1页。

新疆地区的卡伦，是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之后设置的。与北部边境地区卡伦不同，其主要职能是“讥察行旅，管理游牧”，^① 拘捕逃犯，维护地方秩序，保证交通安全，因此大都设在交通要道、山口、河谷，以及水草丰茂、游牧发达的地方，远离边界，少者数百里，多者千余里。卡伦与国境线之间的广大地区，居住着中国的少数民族。例如，由科布多参赞大臣统辖的十六个卡伦（从沙宾达巴哈以西的齐格尔素台卡伦起到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均设在唐努山以南，卡伦之外是中国乌梁海族聚居的唐努乌梁海、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地区，在这些地区之外才是俄国的土地。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属十三座夏季安设的卡伦（塔尔巴哈台东路卡伦），均在斋桑湖以西，卡伦之外直到楚克里克河流域是中国哈萨克族的游牧地。至于塔尔巴哈台西路卡伦，均在图古勒淖尔（阿拉湖）以东，该湖以西直到爱古斯河一带也是中国哈萨克族的游牧地。伊犁将军所辖的卡伦，以惠远、宁远城为中心，分布在伊犁河南北两岸、阿拉套山、图尔根河、察林河、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一带，卡伦之外，直到巴尔喀什湖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是中国哈萨克、布鲁特等族的游牧地。沙俄侵略者把卡伦硬指为国界标志，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侵吞卡伦以外大片中国领土的野心。

应当指出，按照清朝制度，各卡官兵必须循指定路线

^① 邹代钧：《中俄界记》，下编，第22页。

巡查相邻地区。卡伦与卡伦之间的巡查道路，叫做“开齐”。遍布新疆南北的各种卡伦，大都以重要城镇为中心，通过纵横交错的许许多多开齐连接在一起，并且与驿站、军台等互相配合，组成一个网状体系。此外，并没有一条连结各个卡伦的所谓卡伦线。沙俄侵略者自己也承认：中国西部的卡伦“不是布置在一条线上。”^①然而他们同时又一口咬定说，不仅存在一条“卡伦线”，而且它就是中国西部的“边界线”。这不是明明白白的讹诈吗？

至于汉文本规定以“中国常驻卡伦”作为分界标志，更是别有用心，荒谬绝伦。

在中国西北地区，常驻卡伦与移设、添撤卡伦的分布，大都根据需要，因地制宜，何者在外，何者居内，并无固定格局。伊犁、塔尔巴哈台和科布多地区，情况各殊。但一般而言，常驻卡伦大都设在靠近重要城镇的腹心地带，比移设、添撤卡伦离国境线更为遥远。例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属的巴克图常驻卡伦，离塔城只有十五公里，而玛尼图噶图勒干常驻卡伦在斋桑湖以东喀喇额尔齐斯河和哈雅尔巴斯河的汇合处，更靠近内地。伊犁地区的常驻卡伦以惠远城为中心分布在伊犁河两岸，有的就设在惠远城近郊或惠宁城附近，如固尔班扎海卡伦离惠远城三十五公里，大桥卡伦离惠远城五十五公里，而固勒札渡口卡伦仅距惠宁城十五公里，即使最西的崆郭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7页。

罗鄂伦卡伦和春济卡伦，距惠远城也不过几百里。^①按中国常驻卡伦划界，等于把俄国的国界推向中国新疆腹心地带，直逼伊犁、塔城城垣。这较之按“中国现有卡伦路线”划界，将使中国蒙受更大的损失。

此外，俄文本和俄方据此“译出”的汉文本内容歧异，互相抵触，概念含混，不能指实，为沙俄任意解释约文、敲诈勒索大开方便之门。

第一、关于边界基本走向的规定，互相矛盾。

例如，从沙宾达巴哈开始的一段，汉文本规定边界线“往西直至”斋桑湖，俄文本则规定为“向西南到斋桑湖”。一向正西，一向西南，一个直至，一个斜行，必然划出两条不一致的边界线来！又如，俄文本规定边界顺“中国现有卡伦路线而行”，而汉文本则作“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两种标志，两种划法，决定着几千里边界的不同走向和大片土地的不同归属。再如，汉文本规定以特穆尔图淖尔为界湖，而俄文本并没有明定该湖为界湖，却把腾格里山作为界山。特穆尔图淖尔南距腾格里山几百里，中隔捷尔斯克依阿拉套山（帖列盖岛岭、铁列盖岛山），沙俄侵略者即使有挟泰山以超北海的本领，也无法解决两种文本中的这一矛盾。

第二、两种文本共同规定的划界原则，含混不清。

约文规定“顺山的走向、大河的流向”确定边界走向。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第10卷，《北徼卡伦考》。

但是，从沙宾达巴哈到浩罕的方向，基本上是从北到南，稍微偏西，而这一线的大山例如萨彦岭、塔尔巴哈台山、腾格里山等山脉，基本上都是东西走向；大河如额尔齐斯河、伊犁河、楚河、塔拉斯河等的流向，大体上也与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的方向相反。因此，约文规定的原则，在实际上是无法遵循的。更荒唐的是，条约甚至没有规定究竟沿什么山脉和河流进行划界。内容如此含混不清的约文，在国际条约中是极其罕见的。

两种文本还共同规定：斋桑湖是边界线必经之地，浩罕是其终点。

斋桑湖东西长一百余公里，浩罕的东部边界长达数百公里，而约文竟没有明确规定中俄边界经过该湖的哪一点，到浩罕边界的什么地方，这就使沙俄得以随意解释条约，逼清政府接受对俄方最有利的“边界线”。

第三、两种文本的约文本身也各自存在着许多荒谬和含混之处。

汉文本规定边界从沙宾达巴哈起“往西直至”斋桑湖，似乎说得非常清楚明确。但从地理位置上看，沙宾达巴哈在北纬 52 度和 53 度之间，而斋桑湖横跨北纬 48 度线，两者相差四度左右。显然，边界线从沙宾达巴哈“向西”是无法“直至”斋桑湖的。

汉文本又规定边界线顺“中国常驻卡伦等处”而行，并没有指明是哪些常驻卡伦。科布多、塔城，特别是伊犁地区的常驻卡伦，分布在十分广阔的土地上，连结任何两

个常驻卡伦都能划出一条线来，究竟以哪一条为准？

汉文本还规定边界线顺特穆尔图淖尔而行，并没有规定顺该湖的北岸、南岸，还是该湖的什么地方而行。特穆尔图淖尔长约一百八十公里，最宽处五十余公里，总面积达六千二百平方公里，是当时我国最大的高山湖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高山湖泊之一。对于这样大的湖泊，约文竟没有明定它归属双方的范围，在“勘界”时自然便于沙俄上下其手。

同样，俄文本也是含糊不清，谬误层出。例如，约文规定边界线从沙宾达巴哈“向西南到斋桑湖”，但中经什么地方？到斋桑湖的哪一点？都没有明确规定。

尤其荒谬的是，俄文本竟把不同的山脉硬“捏”到一起。约文规定边界线从斋桑湖“到伊塞克湖（特穆尔图淖尔）以南的山，即腾格里山，或吉尔吉斯阿拉套，亦称天山南路（天山南脉），又顺此山到浩罕领地”。但是，在伊塞克湖南边的是捷尔斯克依阿拉套，越过该山向南，才是腾格里山，即天山南脉。^①而吉尔吉斯阿拉套位于伊塞克湖以西，和腾格里山相距很远。这两条山脉虽然都是天山山脉的支脉，但它们各自都有所指，不容混淆。约文把两条山脉作为一条，统称为腾格里山，显然是制造混乱。

① 参看俄国土地规划及农业管理总署移民局编：《俄国亚洲部份地图集》第35图；帝俄《百科全书》，第29卷，1895年彼得堡出版，第95页。

以上分析表明，中俄《北京条约》关于西部边界的条款不但对中国是不平等的，而且约文含糊不清，自相矛盾，根本不可能执行。按照公认的国际法，这样的条约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而不应成为在中国西部勘定两国边界的根据。那种认为中国西部地区中俄边界的走向已由这一条约完全确定，剩下的工作只是据约勘界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然而，在“强权即公理”的年代，侵略者的意志就是法律。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中的种种含混不清和矛盾之处，恰恰给沙俄提供了更多可乘之隙；在后来的“勘分西界”谈判中，沙俄代表正是利用该款文字含混和自相矛盾，极力对约文作有利于俄方的解释，并摘取两种文本中对他们最有用的文字，作为勘界的依据，从而达到了进一步侵占中国大片土地的预定目的。沙俄军官布克斯盖夫登在《1860年的北京条约》一书中供认：“根据第二条，我们得以将边界任意向中国的西部推进，并可以占据通向小布哈拉（指中国南疆。——引者）诸城的关隘”，^①一语道破了沙俄炮制的这一边界条款的恶毒性质。

第二节 塔城会谈前夕沙皇政府的侵略部署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沙皇政府立即着手利用该

^① 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的北京条约》，1902年旅顺出版，第235页。

约巩固和扩大侵略利益。根据条约第三条的规定，一八六一年六月，沙俄逼迫清政府订立《勘分东界约记》，完成了对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兼并；七月，俄国公使巴留捷克与清朝总理衙门商定，两国“勘界”大臣于次年五月十一日在塔城开始会谈。从此，沙俄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侵略，进入了一个以“勘界”为名、大块割占领土为特点的新阶段。

一、密谋策划，制定新的割地方案

一八六一年二月，亚历山大二世任命富有侵略经验的杜加美尔中将^①为西西伯利亚总督，兼西伯利亚独立军团司令，授权他主持拟制勘分中俄西界草案，物色分界委员，并直接指导他们同中方代表进行谈判。

四月初，杜加美尔抵鄂木斯克，五月亲临科帕尔和维尔内“视察”后，随即建议彼得堡将原定一八六一年在楚河一线对浩罕的军事进攻暂缓进行，以便集中力量巩固“外伊犁地区”。七月十一日，沙皇政府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了上述地区的局势，基本同意杜加美尔的观点，认为当务之急是“改善与加强我们在已占领地区的地位”，巩固以维尔内为中心的“外伊犁地区”。亚历山大二世

^① 杜加美尔，在俄国以善于玩弄外交阴谋和军事征服两手、侵略弱小邻国见称，一八二八——一八三三年参加过俄国对土耳其、波兰的军事远征。此后曾任驻德黑兰公使，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任俄国驻多瑙河各公国总督。回国后长期任帝国枢密大臣。

立即批准了这一决定。^①同时，沙皇政府根据杜加美尔的推荐，任命在西伯利亚独立军团司令部担任要职的巴布科夫上校^②为分界委员，负责筹划同中方“勘界”事宜。

巴布科夫是沙皇政府的忠实走卒。在前任西西伯利亚总督加斯弗尔德任内，就已受命研究有关中国西部地区的档案材料，编绘了《外伊犁边区地形图》。他还利用《北京条约》的含混规定，拟制了“国界草案”，公然沿中国阿尔泰山山脉分水线和阿拉套岭勾划了一条“未来的国界线”，把当时仍处于中国政府有效管辖范围内的大片地区，纳入俄国版图。杜加美尔一到鄂木斯克，巴布科夫马上呈上这份草案，请他审阅。

巴布科夫承认，俄方对预定的分界地区的地理知识十分贫乏，“所有的地形材料都是很有限的，大部分是根据询问得来的材料”，“超不出推测的范围”；^③他所设计

① 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第120—121页；贾姆格尔契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221—224页。

② 巴布科夫，旧译巴普考、博普考、博补考，沙俄总参谋部军官。一八五七年奉调到西西伯利亚任师参谋长。因能深入沙俄窃据的中国领土进行调查，受到陆军大臣苏霍扎涅特的嘉奖。巴布科夫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科布多界约》等割地条约，步步高升，历任军区副参谋长、军区参谋长等职，最后获步兵上将衔。一八八二年沙皇政府撤销西西伯利亚总督府，改设草原地区总督府后，他曾多次署理草原地区总督。他在西西伯利亚的活动，和沙俄宰割中国西部的历史密不可分。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84—85、231页。

的“草案”，很难作为与中方进行交涉的依据。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沙俄西西伯利亚当局决定一面继续组织“考察团”，在俄军的掩护下，前往斋桑湖等地测绘，一面向正以领事身分在伊犁、塔城从事情报活动的札哈罗夫和斯卡奇科夫求助。^①这时，杜加美尔获悉勘界谈判将于来年开始，中方委员已经到达塔城，于是赶忙派巴布科夫前往塔城，会商一八六二年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趁机与斯卡奇科夫会晤。

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巴布科夫偕同帮办安德列耶夫到达塔城。二十六日，中方委员明谊等在塔城接到总理衙门通知，双方已在北京商定，两国委员于明年五月十一日在塔城会勘西界，随即将此事照会巴布科夫。问题既已解决，巴布科夫已无继续滞留塔城的理由。但是，他不愿轻易放弃敲诈勒索的机会。他本无俄方的勘界全权证书，这时却以“俄国派来办理此事之人”自居，要求与明谊等立即“将界址议定”，“不必拖到来年”，^②并声称俄

① 札哈罗夫，一八四〇—一八五〇年随俄国东正教第十二届传教士团在北京学习满语。一八五一年起任俄国驻伊犁领事，一八五八年升任总领事。他利用窃取的中文资料，编写了《中国西部疆域记述》一书，并在沙俄总参谋部军官的协助下绘制了一份中国西部疆域图，上面标明了中国常驻卡伦的位置，成为俄方制定“国界草案”的重要依据。

斯卡奇科夫，一八五〇年以“学生”名义，随俄国东正教第十三届传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一八五九年出任俄国驻塔城领事。他善于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中国情报。

② 同治朝《始末》，第2卷，第38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01—102页。

方将于今冬明春在沙宾达巴哈一带筹建界牌，要求中方下令各处守卡官兵，届时“听其在境内运料鸠工”，“勿得拦阻”。明谊等察觉俄方“外托和好，内肆侵贪，觊觎多端，窥伺已久，意在急遽商定，易行其诈”；^①所提要求又违反双方协议，予以拒绝。

在塔城期间，巴布科夫住在俄国领事馆，从斯卡奇科夫那里获得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边疆地理以及中方委员的个人情况等“宝贵资料”。^②九月下旬回鄂木斯克后，他立即重新编制了关于划分中俄西界的“计划”，设计了“边界”走向，深受杜加美尔赞许。这份计划妄指阿尔泰山、阿拉套岭和天山的分水岭为分界标志；除斋桑湖仍被视为界湖外，计划超越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辽阔的中国土地，连同伊塞克湖、阿拉湖在内，一概划归俄有。札哈罗夫不仅完全赞同这份计划所提出的“国界线的一般走向”，甚至还主张“设法使中国人同意变更伊犁地区和斋桑湖一带的部分走向”，^③即对中俄《北京条约》作更有利于俄国的修改。这一切，充分反映了沙俄的贪得无厌。

一八六一年底，巴布科夫奉命赴彼得堡，向陆军部和外交部呈交经杜加美尔审定的“划界草案”，“以便最后审

① 同治朝《始末》，第2卷，第40页；第3卷，第2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02—103页。

③ 同上书，第129—130页。

查和批准国界线。”^① 随身还带了关于中国国界的大批材料、《外伊犁边区地形图》，以及在边境地区进行地形测量的请示报告。新任陆军大臣米留金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伊格纳切夫对他的报告表示赞许。接着，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召见了这个来自侵华前线的军官，在审阅《外伊犁边区地形图》时，指指点点，对中国伊塞克湖盆地和周围地区馋涎欲滴。为了表彰巴布科夫的“功勋”，沙皇特意赐予刻有自己名字的宝石戒指一枚。

在沙皇政府中，主管对华事务的机构是外交部亚洲司。一八六一年八月出任该司司长的伊格纳切夫，是沙俄侵华活动的重要策划者和实际主持者，一向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当时，他秉承沙皇的旨意，负责审查和修改“划界草案”，决定利用《北京条约》汉文本关于常驻卡伦的规定，扩大对清政府的勒索，并把前引札哈罗夫的意见写进他为外交部起草的“训令”里。

一八六二年一月，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特别会议，研究新的侵华步骤。陆军、外交、财政各部首脑，伊格纳切夫，以及外交部顾问科瓦列夫斯基出席了会议。会议任命巴布科夫为俄国同中国勘分西界的全权委员，总参谋部大尉、测量学家戈鲁别夫为第二委员，^②讨论并通过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29页。

② 后来根据巴布科夫的申请，沙皇政府增派札哈罗夫为俄国勘界委员，戈鲁别夫改任第三委员。

了亚洲司拟就的给俄国委员的训令草案。三月，沙皇正式予以批准。

由沙俄外交大臣签发的这份训令，是沙俄图谋通过外交诈骗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的行动纲领。

训令强调，应使中方代表“确信”，“作为交涉依据的只是条约”，要“无条件地遵守北京条约的规定”进行划界。^①这就是说，不管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是何等荒谬，俄、汉两种文本是怎样矛盾，也不管沙俄怎样力图歪曲约文和掠夺更多的中国领土，都必须始终打着信守成约的幌子，以便借口履行条约，强迫中方接受沙俄的敲诈勒索。

训令歪曲中俄《北京条约》关于划界标志的规定，责成俄国委员在谈判中必须把“中国常驻卡伦线”作为划界的根本依据，指出“新的国界要沿着迄今没有肯定下来的，但似乎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假定国界的现有中国常驻卡伦线行走。”^②

总之，按沙俄外交部训令，“常驻卡伦线”就是“国界线”！以“常驻卡伦线”为界是俄方“既定而不可更改的条件”。^③但是，正如前节所述，《北京条约》俄文本只有“中国现有卡伦线”而无“常驻”字样，汉文本虽有“及常驻卡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1、208页。

②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1975年莫斯科出版，第141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1页。

伦”之说，但并无“线”字。“训令”所谓的“中国常驻卡伦线”，不仅在事实上，就是在约文内，也属子虚乌有。沙皇政府明知乎此，为了达到侵略目的，竟不惜采用诈骗手段。巴布科夫供认，尽管两种文本互相矛盾，但“由于中国委员完全不懂俄文，这种情况在当前的谈判中并没有什么特别不便之处。”“根据上述考虑，我们决定尽力坚持沿中国常驻卡伦线划分国界，警告中国委员，正是应当在这种名称之下来理解《北京条约》第二条所叙述的卡伦线”。^①

应当指出，当时沙俄虽然侵占了中国巴尔喀什湖东南大片土地，但仍未能占领斋桑湖、伊克塞湖及其周围地区，更谈不到把它的军事占领扩展到中国常驻卡伦附近。沙皇政府坚持以所谓“常驻卡伦线”划界，意味着把俄国的“假定国界”向中国伊犁、塔城方向推进数百里以至千余里，从而把又一片幅员广大的中国土地划归俄有。

同时，训令公然违反条约两种文本都把中国内湖斋桑湖定为界湖的规定，责成巴布科夫等力争俄国独占该湖。训令强调：“斋桑湖问题对于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该湖盛产鱼类，周围富有牧草，且有水路交通之便，利于贸易，所以“保持对这个湖泊的专有是我们的愿望！”^②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8—199页。

② 同上书，第191页。

在这个问题上，连俄方委员也承认，既要实施训令的要求，“把斋桑湖全部掌握在俄国权力之下”，又要象条约明定的那样，使国界“直至斋桑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两个相反的要求”。为了实现沙皇政府的愿望，又不致使这种违约行为做得过于露骨，巴布科夫等绞尽脑汁，拟出了这样一段“国界”走向：从大阿尔泰山向西南，在斋桑湖以北哈留图河转向该湖东北端，然后绕过喀喇额尔齐斯河的三角洲，沿该河右岸东行到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再从这里陡转向南，向塔尔巴哈台山行进。^①俄方设计的这段“国界”走向是条曲线，先南后东转而往西，这不但违背汉文本“往西直至”斋桑湖的规定，也与俄文本“往西南到斋桑湖”之说背道而驰。据此，不仅整个斋桑湖，而且原属中国的科尔沁（库尔楚木）盆地以及喀喇额尔齐斯河口附近，全被囊括归俄。口口声声要“一丝不苟地按《北京条约》办事”的沙俄，其对《北京条约》的真实态度就是如此！

关于中国伊犁西南地区的划界问题，训令也肆无忌惮地背弃条约汉文本关于“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的明文规定。沙俄外交部认为：中国内湖特穆尔图淖尔周围以及该湖东边的格根河流域和特克斯河上游，水草丰盛，土地肥美，是沟通新疆南北的战略要地；善塔斯山口、招哈山口和察林河水系，又是联结维尔内和喀什噶尔、和田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03—204页。

等城的孔道，在经济上、军事上至为重要。“因此，必须认定这一整片地方是属于俄国所有。”根据上述意图，俄国委员拟定了这一地区的“边界线”：从伊犁河向南，经过察林河东面的春济卡伦，再往东把察林河全部水系（包括最东边的格根河流域）和特克斯河上游划入俄国的领域。^①

最后，训令规定，俄国委员应按照上述各项要求，拟就“国界草案”，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提交中国委员，并“要求作出断然的答复”：要么全盘予以接受，要么负谈判破裂的全部责任。训令强调，这是俄方委员“必须掌握的行动方法”。^②这意味着要求俄方代表在谈判中毋需考虑中方提出的任何意见和方案，而宁可采用最后通牒方式，迫使中方代表在俄方炮制的“国界草案”上画押签字！

上述训令的全部内容充分表明，沙俄决心超越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强迫中国割让更多的领土。当时，俄国驻塔城领事斯卡奇科夫直认不讳地写道：俄国的目的是“要把《北京条约》规定的界线以外的地方划归自己”，迫使清政府“接受一条与《北京条约》不相符合的国界线”。^③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沙皇政府决定授予巴布科夫便宜行事的权力。伊格纳切夫在把“训令”交给他时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92—194页。

② 同上书，第196页。

③ 同上书，第186页。

嘱咐：在执行时，“授予你完全的行动自由、极广泛的主动权”；哥尔查科夫在接见时也授意：“你要把这些指示以及在给你的训令中所表明的各项加以发挥，”上述文件“丝毫也不约束你的行动自由”！^①

就这样，沙皇的特别会议一结束，巴布科夫便肩负新的侵华使命，离彼得堡赶回鄂木斯克。

二、抢占据点，以武力侵逼支持外交勒索

与密谋炮制“国界草案”同时，沙俄为了配合即将举行的“划界”谈判，正在酝酿对中国西部边境地区采取新的以“武装占领国界”为目标的军事行动。

如前所述，沙俄恣意歪曲《北京条约》，硬把所谓常驻卡伦线作为“假定国界”。而当时沙俄在中国西部地区的非法侵占线（实际控制线）距中国常驻卡伦尚远；常驻卡伦外的许多地方，仍在清政府的管辖之下；中国边防部队对边境地区的巡查，仍在定期进行。即使在沙俄侵占区，当地哈萨克、布鲁特人也没有完全“归顺”俄国，抗俄斗争不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沙俄一方面决定在占领区继续诱逼当地中国少数民族“自愿加入”俄国国籍，用武力迫使他们“服从俄国政权”，^②以巩固殖民统治；另一方面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40—141页。

② 同上书，第172页。

准备出兵拦阻中国巡边部队，抢占直至中国常驻卡伦附近的山隘、要津，以扩大侵占范围，在塔城谈判前造成既成事实。正如巴布科夫所供认：只有在谈判开始之前“及时用军队占领沿边地带最重要的据点”，才能保证实现外交部“训令”规定的目标。^①这是问题的关键。

还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初，沙俄“阿拉套州”长官兼大玉兹哈萨克监护官科尔帕科夫斯基上校就借口“保护”俄国占领区的布库人，建议杜加美尔总督在伊塞克湖南岸卡腊科尔河和济尔噶朗河之间建立据点，确立俄国在伊塞克湖盆地的“统治”，并把该地建成俄军供应基地。杜加美尔立即表示赞同，强调“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永久占有伊塞克湖”对俄国是“必需的”。^②一八六二年春，科尔帕科夫斯基得悉清朝官员在特克斯河和哈尔齐拉河一带巡查、征税，立即派遣勃留门塔利上尉率部侵入伊塞克湖以东哈尔齐拉河，揭开了全面拦阻中国巡边队伍、“武装占领国界”的序幕。

这时，业已返回鄂木斯克的巴布科夫，正在着手实施沙皇政府的掠夺计划。他清楚地知道，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乾隆帝便已确定了巡查西界的制度。此后，由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等地派出的部队，定期沿指定路线到西界巡逻，历年不辍。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巡边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 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65—166页。

② 贾姆格尔契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225—226页。

路线虽因沙俄、浩罕窃踞了若干地区而有所变动，但每年的巡查，一直在常驻卡伦以外很远的地方进行。^①但是，巴布科夫与所有的沙俄侵略者一样，把中国的巡边部队当作俄国侵华路上的重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不仅不以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侵略行动为非，反而诬指中国官兵在境内巡边是什么“越界侵犯俄国领土”，并叫嚷“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坚决办法，”“制止”清政府在自己的国土上行使主权，“不让中国人越过此线（按指“常驻卡伦线”。——引者）”。^②为此，他立即取道谢尔基奥波里，赶到科帕尔，和科尔帕科夫斯基研究军事部署，并前往侵华前哨库克苏，与约期前来的驻伊犁领事札哈罗夫会晤。经过密商，巴布科夫拟订了继续出兵拦阻中国巡边部队、侵袭格根河流域和斋桑湖地区的计划，并很快获得了军团司令部长官的批准。

于是，在科尔帕科夫斯基、巴布科夫的指挥下，盘踞在科克彼克特、科帕尔、维尔内等处的沙俄武装部队，针对中国巡边队伍行进的方向，分途出动：四月中旬，由大尉巴拉诺夫率领的哥萨克军，在乌尔扎尔附近，拦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博勒果素带领的队伍，挡住了他们从塔城经阿拉湖前往勒布什的去路。五月间，从科帕尔等处派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62—164页。

② 同上书，第171—172页。

出的哥萨克军，“车运枪炮，排列刀枪”，进驻哈喇塔拉河上游呢玛图附近，设立哨所，迫使伊犁索伦营总管富珠尔泰等率领的官兵在前往勒布什巡查途中退回伊犁原处。五月底六月初，普罗琴科大尉为增援勃留门塔利，从维尔内带领大队俄军，“驮运车炮马炮，执持器械”，侵入伊塞克湖以东土布河地方，扑围伊犁协领哈布齐贤为首的查边队伍的营地，并蛮横宣称：“奉我国吩咐来此专拦你们，不准过去；如定要过去，咱们就打仗。”哈布齐贤等在俄军的炮口下，被迫撤回。沙俄外交部对于俄军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竟表示“完全赞许”。^①

这时，中俄塔城谈判的会期已经逼近。俄方一面命驻塔城领事通知中方，俄国委员将如期到塔城，一面却令俄军按照预订计划，加紧向中国常驻卡伦推进，抢占重要据点，以造成有利的谈判地位。

在伊塞克湖以东地区，尾随中国巡边队伍的俄军普罗琴科所部，悍然越过察林河，于六月中旬进占格根河，并扬言：“绝对不容许中国人再回到格根河和特克斯河上游地方。”同时，为了控制从维尔内前往伊犁的通道，沙俄从科帕尔向库克苏哨所增派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炮兵排，然后分兵一部，由库克苏东侵博罗胡吉尔河上源倭根塔什山口，占据离惠远城仅一百余公里的有利阵

^① 同治朝《始末》，第8卷，第3—5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66—171页。

地。^①

在斋桑湖周围地区，巴布科夫从科克彼克特调派半个步兵连支援已经侵入喀喇额尔齐斯河下游的哥萨克部队，企图占领斋桑湖东岸一带直至预定的“国界线”，即从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往南至塔尔巴哈台山脉。

在塔城西面，七月初，巴布科夫亲自率领一个步兵连、半个哥萨克连和一个哥萨克炮兵排，在护送俄国委员的名义下，由乌尔扎尔东进，侵占距塔城约十五公里的巴克图卡外小水地方，直逼塔城城垣。

与“武装占领国界”同时，沙俄总参谋部军事地形测绘团人员在俄军掩护下，对“假定国界”进行了测量。一八六二年春，由尼凡季耶夫上尉带领的测量队开始测量塔城以北阿拉套山北部支脉一带。另一支以斯特列利尼科夫少尉为首的测量队，开始测绘斋桑湖南岸，并计划把测量范围扩大到由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往南沿中国卡伦直至塔尔巴哈台山口的广大地区。由于当地哈萨克人的坚决反抗，斯特列利尼科夫一伙被迫中途折回。

入侵俄军不仅沿途滋扰，凌辱中国边民，抢劫牲畜财物，^②而且公然在塔城西南莫多巴尔鲁克等三处卡伦外，以及塔城以北开齐周围哈穆尔山岭起至卓逊山岭一带擅

① 巴布科夫：《1859 - 1875 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 172 - 173 页。

② 同治朝《始末》，第 8 卷，第 5、63、64 页。

立分界标志，^①真是猖狂之极。

至此，俄方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在塔城会议上逼中方委员在俄国的“国界草案”上签字。巴布科夫供认：根据穆拉维约夫逼签《璦琿条约》、割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的经验，俄国采取了“武装占领国界”的措施，把“军队分布在中国常驻卡伦线附近，其目的是为了向中国人表明，在我国部队后方的全部土地，即在他们卡伦线以西的全部土地，我们认为按照《北京条约》都是属于俄国的。”“我国部队分布在国界上的这一事实，明确地向中国人表示，我们有充分的可能随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②

这就是塔城谈判前夕的形势。

第三节 一八六二年塔城谈判

正当沙俄侵略者磨刀霍霍，加紧准备割占中国新疆大片领土的时候，清政府却天真地希望与俄方“秉公”勘定西界。

一八六一年三月，清政府任命马里雅苏台将军明谊为钦差大臣，前往塔城会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办理勘定中俄西界事宜。随后又调任伊犁协领哈布齐贤等

① 同治朝《始末》，第8卷，第3、52—53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173、179页。

为分界委员，前往协助，并命令明谊到任后立即派出委员，分赴各处界址，“详细履勘”，核实舆图，以便谈判时有所依据。^①

六、七月间，明谊、哈布齐贤相继驰抵塔城。通过细核中俄《北京条约》，他们痛感“与该国从我境内、卡内分界”，对中国十分不利，于十二月上奏同治帝，强调条约所指“自沙宾达巴哈末处，至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边界”，“并未指明逐段立界地名，”难免沙俄“任意侵占”；“若特穆尔图淖尔，则在伊犁边内；至于斋桑淖尔，则明明在塔尔巴哈台辉迈拉扈等三处卡伦之内。若自此议分，不特占据我之边界，恐将中华原设之卡伦更被其包入，”^②请求清政府妥筹对策。

面对明谊等提出的尖锐问题，主持外交的恭亲王奕訢一筹莫展，竟认为：“如指明不许其于此（指“我境内、卡内”。——引者）立界，该国又得以条约既定为辞，不免借端饶舌。”^③他一面要求明谊在塔城谈判中“按照地图，妥为剖辩，以免任意侵占，漫无限制，”^④一面又指示“不可徒事纷争，致启边疆之衅”。^⑤这种妥协调摇态度，不能不影响塔城谈判的最后结局。

① 《清文宗实录》，第356卷，第3页。

② 同治朝《始末》，第4卷，第18-19页。

③ 同上书，第19页。

④ 《清穆宗实录》，第29卷，第20-21页；同治朝《始末》，第6卷，第47页。

⑤ 同治朝《始末》，第4卷，第19页。

塔城会谈原拟一八六二年五月开始，后经双方在京议定，展期两个月举行。在此期间，明谊等曾命分界委员哈布齐贤等分南、北、中三路，按《伊犁回部图》和《新疆北路地界全图》，前往履勘旧有界址，以便将所勘绘图贴说，作为谈判的根据。但途中都遭俄军拦阻，被迫折回，这更给塔城谈判的前景投下了阴影。

一八六二年七月十三日，俄方代表巴布科夫、戈鲁别夫等随带哥萨克骑兵三十人，由巴克图卡外到达塔城。会议开始前，明谊为俄方违反定约在中国境内擅立鄂博，派员向巴布科夫提出抗议。巴布科夫故作痴呆说：“我们咋派之人前来你们卡伦之外，原系履勘山势河道里数，以备绘具图说，将来据之会议，并未吩咐令其垒立鄂博”。中方委员当即指出：“现经我们差派委员巴彦图前往各卡伦查明，已垒石鄂博十七处，每座均高五六尺。既系你们查看山势河道，丈量里数，逐处垒此石堆，作何使用”？巴布科夫知难抵赖，只好同意将石堆全行拆毁。^①但是，俄方这种“让步”，不过是一种姿态，其目的在于把中方委员诱上谈判桌，以遂其鲸吞我国西部领土的阴谋。

八月三日，双方在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公署举行首次会议。中方与会的有明谊、明绪和博勒果素，俄方出席的有巴布科夫、戈鲁别夫和斯卡奇科夫。巴布科夫在会上抢先发言，宣称：“《北京条约》应当成为两国在国界谈

^① 同治朝《始末》，第8卷，第53—54页。

判中的主要依据”；按照该约，“国界应该沿常驻卡伦线划分”。^①随后，他拿出一张地图，“内点红色为限，不论中华边疆，止以常驻卡伦为界，所有卡外尽作为应给该国之地。”甚至连条约规定作为分界标志的“山岭、大河之流，”在地图上也未作为划界依据。明谊当即据理反驳，指出条约内并无统以常驻卡伦为界之语，而且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边界，“袤延万里，其中仅有三处地名，系指大数而言，再未详细指定逐段立界之处。”因此，双方应遵照地图，先派员查勘待议之界，然后“秉公商办”。^②接着，中方出示标有中国西疆范围的黄线（“黄限”）的地图，并向俄方具体说明：居住卡外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乌梁海，塔尔巴哈台所属爱古斯、勒布什之哈萨克，伊犁所属特穆尔图淖尔、哈喇塔拉之哈萨克、布鲁特，都是中国的臣民，他们“游牧养生之地”，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能将其地“分隶你国”。但巴布科夫强词夺理，便说“常驻卡伦线”以西的地方，早归俄占；其归属“没有讨论的余地”。^③双方相持不下，商定改日再议。

八月六日，俄方在第二次会议上重弹以“中国常驻卡伦线”为界的旧调，胡说“红限”以西“为条约载明已给（俄国）之地”。明谊坚持按“黄限”划界，指出：“现有我国旧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14—215页。

② 同治朝《始末》，第9卷，第35—36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15页；同治朝《始末》，第9卷，第36页。

址地图，自应照图详议”。巴布科夫勃然变色，厉声说：“若要如此，即可不议，我们不能以你们之图为凭。”斯卡奇科夫也威胁说：“我们只好带来兵队占据卡外之地，不由你们不给。”但是，沙俄的恫吓并未奏效。明谊泰然冷对凶相毕露的沙俄代表，严词回答：“有理不妨缓商，无理不能强占。两国和好多年，秉公会议，谁敢遽云用兵，以后不可再说。”^① 由于俄方代表蛮不讲理，动辄以武力相要挟，谈判毫无进展。

第三次全体会议原定八月九日举行。但是届时俄方忽然通知：沙皇政府已增派札哈罗夫为谈判代表，俟其明日到后再议。十日，札哈罗夫到达塔城，但俄方又借故拖延，直到二十四日才复会。在此期间，俄方委员反复研究了谈判的策略，并决定在下次会议上装作对划界问题“不感兴趣”，以观察中方的反应。因此，会议开始时双方沉默不语达半小时多。^② 在这种情况下，明谊才摆出档籍旧图，说明中国原有疆域范围，并指出俄方撇开中国原有边界，要求“按常驻卡伦划界”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俄方代表不顾中方的正确主张，不顾条约俄文本无“常驻卡伦”字样、汉文本无“卡伦线”的“线”字的重要事实，利用中方委员不懂俄文，竟从汉文本抽出“常驻卡伦”四字，从俄文本抽取一个“线”字，凑在一起，硬要中方以“常驻卡伦线”

① 同治朝《始末》，第9卷，第37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17页。

划界。札哈罗夫甚至叫嚷：如果不以“常驻卡伦线”为界，“即是你们废了条约”。针对俄方的无理指责和要求，明谊驳斥说：“条约系总其大纲，商办始定其界址，”“今我们本着条约与你们商办，谨遵我国谕旨，据图而议，如何反说我们废了条约？”他坚持要俄方看了中方地图再议。札哈罗夫蛮横地表示：我们只知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你们之图，我们不看”。明谊等又引证历史事实，向俄方反复说明常驻卡伦从来不是国界标志，指出：我国卡外勒布什地方，“自乾隆年间立有石碣，现在尚存。且我国伊犁、塔尔巴哈台每年派官兵前往该处查收哈萨克呈交之租马，均在此界会哨，”该地属于中国无疑。札哈罗夫无词以对，竟出言不逊，破口大骂道：“此界系你们伊犁将军私行偷立，何以算得交界？且你们伊犁将军，真乃小人之行，我们不能为凭！”由于俄方“意存构衅”，^①会议再次不欢而散。

经过几次会议，俄方的诡谋暴露无遗。明谊等考虑若全盘答应俄方苛求，中国损失太大；若一点不依俄方主张，又怕“边衅”立起，于是他们拟定了一个折衷方案，主张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四处旧有边界至常驻卡伦之间，“适中定议”，并附呈地图一纸，上面绘红、黄、紫三色线条，“红限”表示俄方要求界线，“黄限”表示中国原有边界，“紫限”居二者之间，请求清政府“酌

^① 同治朝《始末》，第9卷，第39—40页。

核”。明谊等正是指望以“紫限”作为中方让步的限度，与俄方定议完案，“庶该使不能任意贪求，以弥兵隙。”清政府很快采纳了明谊等人的意见。^①

鉴于俄方在会上张口闭口不离“一丝不苟地履行《北京条约》”，“要根据条约确定国界”，明谊等在九月二日的会谈中指出，约文规定自沙宾达巴哈起的边界走向是“往西直至”斋桑湖，而俄方委员“偏执己见，欲自沙宾达巴哈往南又转往东”，显然与约文相背。^②这时，札哈罗夫十分狼狈，只好提议“两国复派委员，会同画图，再行定议”。明谊等以条约内有“先勘后议”之说，立即表示同意。但札哈罗夫出尔反尔，又说：“若果如此办理，诚恐十年二十年不能定议。”明谊回答：“原约有不限时日之语，缓办何妨。”札哈罗夫理屈词穷，又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进行纠缠，^③使谈判陷入僵持局面，散会时甚至连下次会期也未商定。

札哈罗夫等见中方委员不肯就范，十分不满。会后，他们再次研究对策，决定继续摆出对谈判划界“满不在乎”的姿态，等中方先来约请俄方开会；如果中方不提出复会并接受俄方要求，就正式宣布停止谈判，解散会议，并“把不能举行谈判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委员。”^④

在沙俄委员的压力下，中方为了打破僵局，于九月十

① 同治朝《始末》，第9卷，第42页。

② 同上书，第17卷，第46页。

③ 同上书，第9卷，第42—43页。

④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23页。

七日被迫表示让步，提议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由“辉迈拉胡(扈)等处卡伦，往南至雅尔裕勒(乌尔扎尔)，再往西南直至伊犁连界之勒布什地方止”划分国界，答应把这一线以西原属中国之地割给俄国。^①这也就是明谊等呈请北京审核的三色线图上标明的“紫限”。^②但是，札哈罗夫等坚持以“常驻卡伦线”为界，蛮横地声称：“在常驻卡伦线外，已经再没有你们(中国)的土地”，对中方的方案竟不予置理。^③

九月二十日，俄方将《俄中划分西北边界议单》，^④即巴布科夫等按照俄国外交部训令拟订的“国界草案”交给中方，威胁说：谈判只能在中方同意接受俄方“议单”的条件下继续；国界必须照俄方的方案加以划定，“不能有别的划分方法”；“若不照此办理，即可毋庸再议”，^⑤并限十日内答复。至此，中俄塔城会谈濒于破裂。

明谊等细阅来文，“大意总要以常驻卡伦分界，毫无凭公商酌之语”，决定“逐层以理驳诘”。因事关大局，为慎重计，先于九月二十三日通知俄方，待请示后答复。^⑥不久，即将复文与俄国“议单”录呈清政府，并复照西西伯

① 同治朝《始末》，第10卷，第10—11页。

② 同上书，第11卷，第3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24页。

④ 《议单》全文载同治朝《始末》，第18卷，第52—54页。

⑤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26页；同治朝《始末》，第10卷，第12页。

⑥ 同治朝《始末》，第10卷，第12页。

利亚总督，申述中方对《北京条约》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俄方提案的态度，驳斥俄方委员对《北京条约》的种种曲解。十二月十日，清朝总理衙门根据明谊等人的意见，照会俄国公使巴留捷克，正式拒绝了俄方无理要求。复照指出：俄方坚欲“统以现在中国常驻卡伦为界”，是对《北京条约》的严重歪曲。“条约仅载有及卡伦等处字样，并无以卡伦为界之语”。如果统以常驻卡伦为界，则订约时应写明“西疆概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一语可定，何必多言？！^①关于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地区的分界问题，照会指出，约文载明：“自沙宾达巴哈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既不是向西南斜行，更不是趋向东方；俄方草案“把国界转向东方，沿喀喇额尔齐斯河而行”，显然“与条约不合”。^②照会还质问：俄国军队越界进入中国境内私垒鄂博，而且札哈罗夫等在谈判中“动云带兵占据，并口出不逊”，“如此恃强背理，为守条约乎？抑废条约乎？”照会强调，即使按《北京条约》的规定划界分地，已“与俄国大有裨益，而于中国亏损甚多”，现在俄方又“欲强占于条约之外”，中国当然不能答应。最后，照会表示，中国仍当“谨守条约，和平商办”，希望俄方也“照约办理，勿再另生枝节。”^③

① 同治朝《始末》，第11卷，第4—5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68—269页。

③ 同治朝《始末》，第11卷，第4—6页。

十月初，俄方限定的日期已满，没有收到中方答复，十分恼怒，便单方宣布中止谈判，择期回国。当中方表示希望他们稍留数日，以待复文时，札哈罗夫又叫嚷：“你们不能以常驻卡伦为界，我们不能等候。”他们还拒绝协商复会的日期、地点，声称：“将来议与不议，尚难豫定”。^①十月十二日，札哈罗夫等悻悻启程，一八六二年塔城谈判于是被迫中断。

第四节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

一、沙俄加紧武装挑衅，以“打”逼“谈”

一八六二年塔城谈判中断后，明谊曾多次建议清政府“行文俄国，约期分界”，争取早日恢复谈判，通过协商解决；同时要求“妥筹防守”之方，“以备俄人逞兵侵界”。清政府采纳了上述意见，并谕令明谊在对俄交涉中“仍当斟酌事势，刚柔互用，勿使遽行决裂”。^②

遵照清政府的指示，明谊等在一八六二年冬和一八六三年春，接连多次发出照会，呼吁俄方早日复会，按照条约商办结案。但是，俄方无视清政府的建议，一口拒绝无条件恢复谈判。

当时正值陕、甘两省爆发回民起义，新疆局势不稳。

① 同治朝《始末》，第10卷，第53页。

② 同上书，第14卷，第30—31页。

沙俄认定这是“从七河地区扩张新领地”的大好时机，^①决定对中国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指示杜加美尔准备出兵，“尽可能实际上占据符合俄国意图的全部国界线”；至于谈判，只有在中国政府保证“按照俄国代表提出的方案”“解决全部国界问题”时，方可恢复。^②

根据沙皇政府的指令，西西伯利亚当局于一八六三年三月下旬在北起阿尔泰山、南抵天山山脉的中国西部广大地区，作了全面的军事部署。接着，俄军分头向中国境内纵深地带推进，直指塔尔巴哈台、斋桑湖、伊犁等地区的战略要点。四、五十年代小股俄军的暗占蚕食，到这时已演成明火执仗的大规模武装掠夺。

在塔城地区，四月中旬，由步、骑、炮兵组成的沙俄“塔城部队”，侵入北起哈巴尔苏山口、中经巴克图卡伦以西、南至胡苏图卡伦一线，“意欲先占地方，潜立石垒”。清政府官员前往诘问，指出“此系我们地方，不能任令你们久住，”要求俄军迅速撤回。但沙俄哥萨克大尉巴拉诺夫竟声称“你们常驻卡伦之外就是我们地方，”拒不撤走。^③随后，俄军又窜到塔城东北乌里雅素图卡外驻扎，无理拦阻中国官兵越哈穆尔山岭前往斋桑湖巡查，拆毁官员所居毡房，逼令中国官兵移至卡伦以内。^④

①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99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53页。

③ 同治朝《始末》，第15卷，第49—51、54页。

④ 同上书，第17卷，第3—4页。

在科布多地区，俄军继强占塔城所属辉迈拉扈和札哈苏淖尔两卡伦一带地方之后，于五月上旬窜到昌吉斯台卡外，声称要在中国布赫塔尔玛河以北吹河（楚雅河）、哈喇布勒扈克及罕山等处，“搭房住牧”。^①五月中旬，又越过霍呢迈拉扈、胡兰阿吉尔干两卡之间道路，肆意拘禁、殴打守卡官兵，毁损毡房，抢劫军械、马匹、银物，并扬言自昌吉斯台卡伦以西、阿尔泰山后，都是沙皇的领地，以后不准中国人行走住牧。侵略者所到之处，还强迫哈萨克头人“出给手印字具”，声明“归附”俄国。^②对于不肯屈服的哈萨克部族，则用武力把他们赶出世代游牧的地方。

斋桑湖地区是俄军攻取的重点目标。四月间，沙俄在湖西科克彼克特河左岸，集结了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骑兵连和一个炮兵排，组成“斋桑部队”。在塔城、科布多地区活动的俄军策应“斋桑部队”，实际上构成它的左右两翼。六月间，尼凡季耶夫上尉率领骑兵连侵入科布多所属科尔沁盆地后不久，又奉命沿斋桑湖北岸东侵，在该湖东端渡喀喇额尔齐斯河继续向东行进。与此密切配合，八月中旬巴布科夫由鄂木斯克赶到科克彼克特，亲自率步兵、骑兵各一连，携带大炮两门，沿斋桑湖南岸向东推进。这两支侵略军在喀喇额尔齐斯河畔会合后，于八

① 同治朝《始末》，第16卷，第1页。

② 同上书，第21—22页。

月二十八日到玛尼图噶图勒干卡外，强行驻扎。^①巴布科夫供认，俄国出动“斋桑部队”，陈兵玛尼图噶图勒干，其“目的就是要占领邻接斋桑湖的地方，一劳永逸地使中国人了解，斋桑湖也好，全部周围地方也好，从今以后都无例外地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之内。”^②

在伊塞克湖附近地区，四月上旬，科尔帕科夫斯基按照同年三月沙俄特别委员会关于武装“侦察”楚河流域和“经纳林河前往喀什噶尔的道路”的决定，^③开始在维尔内组织执行此项侵略任务的特别部队。五月间，集结于卡斯帖克的俄军分途出发，一路由列尔赫中校率领，向西侵入塔拉斯河右岸阿乌利耶-阿塔（今苏联江布尔），一路由普罗琴科大尉率领，取名“喀什噶尔部队”，矛头直指伊塞克湖南岸、天山中部地区。同月，杜加美尔再次呈请沙皇政府准予在伊塞克湖畔建立堡垒。^④六月中旬，“喀什噶尔部队”经伊塞克湖西岸，侵入纳林河一带。当地布鲁特族萨尔巴噶什部对入侵者恨之入骨，自动聚集起来，于七月一日在松库里（即森格尔池）围歼俄军少尉朱巴列夫所部，激战三昼夜，毙伤敌人多名。^⑤普罗琴科赶到解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45—246页。

② 同上书，第268页。

③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第157—159页。

④ 贾姆格尔奥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252—258、263页。

⑤ 同治朝《始末》，第19卷，第43页；贾姆格尔奥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259页。

围后，按预订计划，继续“探索经天山中部直达喀什噶尔的道路”。这时，科尔帕科夫斯基获悉入侵伊犁地区的俄军受到清兵顽强阻击，决定结束对楚河流域的“侦察”；“喀什噶尔部队”也奉命改变行进方向，前往增援业已侵入伊塞克湖以东格根河的俄军。

俄军对伊犁地区的窜犯，始于五月中旬。当时，俄国勘界委员戈鲁别夫大尉率领由步、骑、炮兵组成的“伊犁部队”，分三路侵入格根河下游、伊犁河畔爱达尔库木和博罗胡吉尔河上源一带，进逼鄂尔果珠勒卡伦、奇沁卡伦和博罗胡吉尔卡伦，形成了从西南、正西、西北三面威胁伊犁的态势。六月初，俄军一部进抵伊犁西北博罗胡吉尔卡外，扬言奉沙皇谕旨，要“用炮攻取”索伦营沙岗以外地方，然后“再取喀什噶尔”，并“派匡苏勒官带兵一千名，同往塔尔巴哈台，入塔勒奇沟进伊犁城。”^①当地中国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营兵丁，面对沙俄入侵者的战争挑衅，无不切齿痛恨，“人情汹汹，勇气十倍”，“皆欲剿灭”来犯敌人。在边疆军民的爱国热情激励下，伊犁将军常清决定派兵“前赴西南、正西、西北各处卡伦内防堵”。^②六月十二日，俄军越博罗胡吉尔卡伦，炮击中国守卫部队，制造了打死打伤清兵的流血事件。清兵忍无可忍，用弓箭、抬炮奋起自卫，将敌人击退。六月底、七月初，俄军又两次猛扑博罗胡吉尔卡内清兵营地，守军被迫

① 同治朝《始末》，第18卷，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17卷，第24—25页。

还击，俄军败走。

沙俄侵略者在伊犁西北攻不动，便把攻击矛头转向伊犁西南的鄂尔果珠勒卡伦。七月九日、十一日，集结于格根河的大队俄军，在叶连斯基少校指挥下，进犯该卡清军营地。清兵在哈萨克部军民的协助下奋力抵御，俘获俄军数名。^①此后，俄军得到普罗琴科大尉的“喀什噶尔部队”的增援，于八月间多次侵袭鄂尔果珠勒等地。沙俄侵略者尽管拥有大量新式武器，其势汹汹，但由于伊犁守军的顽强抗击，不得不从前沿阵地后退。

历时两个多月的博罗胡吉尔和鄂尔果珠勒防卫战，有力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负责前线指挥的戈鲁别夫大尉丧魂落魄，一病不起。俄国驻伊犁领事馆秘书柯洛托夫金少尉对中国人民的抗俄热忱“心怀畏惧”，于七月三日深夜带着哥萨克卫兵“私行潜走出境”。^②连巴布科夫也不得不哀叹：这是“极可悲的事件”。^③

对于沙俄上述一系列侵略活动，清朝总理衙门和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从一八六三年六月起曾向俄方多次抗议，要求撤走入侵军队，拆除非法建立的房屋与鄂博。俄国驻华代办格凌喀在复照中竟颠倒是非，硬说俄军是“前往按约分界后应归本国界内之地”，反诬中国部

① 同治朝《始末》，第19卷，第28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清穆宗实录》，第75卷，第31—32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77页。

队在本国境内循例巡查是进入俄国界内“滋事”。^①针对俄方这种无耻谰言,清政府在八月七日的复照中驳斥说:“边疆未分之先,中国人前往旧界,不为背理;俄国兵突来占据,实为背理。若谓各该地方系分界之处,亦应俟分界后互相守卡,方为各守各界。乃突然派兵前来,便非各守各界本意。况现在条约,尚未讲明,更何由知该处应归俄国界内耶?!”^②这番义正辞严的话,把沙俄的侵略面目揭露无遗。

但是,在俄军猖狂进攻面前,清政府畏惧战争的心理与日俱增。六月中旬,俄军进犯巴克图卡外的消息传到北京,不安的气氛立即笼罩清廷,上谕认为,勘分西界之事“早结一日,即早免一日葛藤。若再稽滞迁延,恐将来又另生枝节。”^③据此,六月下旬,清政府催请俄方从速派员来塔城重开谈判,“以期早为定议”;^④同时命令明谊“迅赴塔城,先期以待”。^⑤然而,俄方坚持侵略立场,在复照中坚持中方必须接受俄国的“国界草案”,谈判才能恢复。^⑥显然,沙俄故意拖延谈判,是为了加紧武装入侵,强迫清政府接受俄方的全部条件。

① 同治朝《始末》,第17卷,第36—37、45页。

② 同上书,第47—48页。

③ 同上书,第15卷,第52页。

④ 同上书,第17卷,第36页。

⑤ 同上书,第16卷,第3页。

⑥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57页;同治朝《始末》,第17卷,第37页。

当时，清政府虽然对沙俄的凶恶本性有所认识，但盲目相信刚由国外传入中国的“国际公法”的片言只语，竟认为“外国最尊重条约，理屈者词必穷”，谅俄国政府“亦难一味狡狴，竟置和约于不顾”。^①为此，特将申述中方主张的上年十二月二十日照会（俄方尚未作答）重新抄送俄国，并说明：“欲永息争竞，必亟勘定疆界，欲勘定疆界，必先讲明条约，盖条约一经讲明，则勘分自易完结，”^②似乎“讲明条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殊不知沙俄“尊重”的仅仅是他们掠夺中国领土的强盗要求，而不是什么“公法”和条约。事实正是这样。八月三日，格凌喀在复照中根本不顾《北京条约》汉文本关于国界线“自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等规定，宣称俄文本才是“和约之原文”，而俄文本“载明‘由沙宾达巴哈往西南至斋桑淖尔湖’”，所以俄方的划界草案，“实属与条约之正义相符”。他还断言，在俄文本译汉时，“本应写‘西南’字样，误写作‘西直’字样，明系翻译官之错”。^③

必须指出，沙俄既然把俄文本当作“条约的正本”，那么，它便没有任何理由坚持“统以常驻卡伦为界”的荒谬主张，因为俄文本上并无“常驻”字样。可是，在同一照会中，格凌喀只字不提两种文本上的这一矛盾，却死死抓住汉文本上的“常驻卡伦”数字不放。事实证明，沙俄侵略

① 《清穆宗实录》，第71卷，第16页。

② 同治朝《始末》，第17卷，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42-44页。

者根本不尊重《北京条约》的任何一种文本。为了向中国敲诈勒索，他们忽而以汉文本为依据，不敢提俄文本上相应的内容，忽而宣称俄文本是原本，汉文本载明的规定不能算数。真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针对沙俄的无理取闹，清朝总理衙门再次复照驳斥，指出：“原定和约系贵国所译，并非中国所译。当时因已载明‘往西直至’字样，故尔允从；若早谓系‘西南’字样，中国必不定约。”“且条约互换，已经三年有余，前项汉文，不闻贵国有翻译错误之语”！现在，格凌喀突然声称条约汉文本“有翻译错误”，只能说明俄方“有心背约”！^①

正当双方就“约文正义”在北京进行激烈争辩的时候，沙俄对中国西部地区的进攻，急剧升级。八月底，俄军炮击伊犁博罗胡吉尔卡伦、制造流血事件的战报飞达北京。恭亲王奕訢在沙俄的战争讹诈面前十分惊慌，认为“西北一带边疆，道路绵远，防不胜防”，若再不答应俄方要求，“致被深入，恐所失愈多，转寰愈难”，主张“准照该分界使臣议单办理”勘界。^②九月七日，同治帝按慈禧旨意，批准按奕訢的意见办理。随后，奕訢会晤俄国代办格凌喀，表示准备接受俄方上年提出的“分界议单”，并提出俄方应以撤退入侵军队为交换条件。格凌喀诡称将“请求本国政府从国界上撤退部队，”但不肯作出书面保证。巴布科夫承认：“我国代办给予中国人这种诺言的用

① 同治朝《始末》，第17卷，第45—46页。

② 同上书，第18卷，第51—52页。

意是：这种诺言对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约束力，他并没有向中国人保证履行它。”^① 格凌喀就这样配合俄军的行动，从奕诉手里骗取了照俄国方案分界的照会。

九月九日，格凌喀接获清朝总理衙门关于约请俄国分界大臣照俄国“分界议单，勘定边界，妥速会商办结”的照会，^② 急忙将这一情况连同清政府照会全文报告西西伯利亚总督，以便通知俄方委员。这时，因俄军侵犯伊犁受挫，巴布科夫正带领部队从喀喇额尔齐斯河撤回科克彼克特途中，忽然接到杜加美尔关于中方已经同意俄方划界草案，请“急速前往塔城”的通知与命令，喜出望外。他写道：“在经受了使人如此疲惫和忐忑不安的等待以后，得到这个可喜的消息，我所感到的满意心情是难以描述的。”^③ 于是，巴布科夫约同正在乌尔扎尔的札哈罗夫，于十月九日匆匆赶到塔城，并预先照会中方说：在当前的会议上，关于如何划分国界的问题，已经用不着继续讨论；当前应当做的只是签署、交换“国界条约”；“不管事情能否办完”，他们在十月二十七日前一定要离开塔城。^④ 十月四日明谊接得这份语气逼人的照会，见内有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66—267页。

② 同治朝《始末》，第18卷，第61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67页。

④ 同上书，第271页。

“贵将军显有允准我们（前开单内）所指边界之意”字样，感到迷惑不解，只好一面约札哈罗夫等“讲解条约，公平定议”，一面将米照原文录呈总理衙门“酌办”。^①

十月十六日，明谊等前往俄国驻塔城领事馆，与札哈罗夫、巴布科夫会晤。俄方拿出他们单方拟就的分界地图，要求“照图定议”。^②明谊表示不能同意。于是札哈罗夫咄咄逼人地质问：清政府对俄国的划界草案已“一概允许”，答应从速会办完结，明谊何以“规避执行自己政府的命令”？^③明谊等感到事出意外，只得声明待接到清政府有关训令后，再“遵照换约”。^④札哈罗夫等以索求不遂，于十月二十五日宣布停止谈判，启程回国。

十一月三日，明谊接得上谕，确知总理衙门已答应按俄国上年议单定约，觉得问题严重，一面回奏朝廷，指出俄方议单指定的分界之处（“红限”），其中多有碍于我国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索伦人等生计，建议奕訢再与格凌喀商议，或将分界线从“红限”退让一二百里，以便安置此项人众，或仿照《璦琿条约》第一条，地归俄有后，仍准中国人在该处照常住牧；^⑤一面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照会

① 同治朝《始末》，第24卷，第8—9页。

② 同上书，第9页。

③ 同上书，第10—11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73页。

④ 同治朝《始末》，第24卷，第15页。

⑤ 同上书，第3、12—14页。

西西伯利亚总督，“约明年派员前来商办换约”。^①这就是说，他希望清政府继续交涉，暂缓订约，以便尽可能挽回一些主权。但是，明谊的这番苦心已无法改变对俄交涉的被动局面。一八六四年初，清政府接连颁发谕旨，责令明谊等遵照前旨，“将分界事宜，径行断结，不得再行咨商各国事务衙门，以致往返稽延，俾该国借口，另生枝节。”^②同时，杜加美尔来照，借口明谊等给俄方照会中有“商办”字样，指责中方“打算继续就如何划界问题进行争论”，拒绝派员前来。^③至此，明谊除了在俄方“议单”上签字画押外，实际上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二、《勘分西北界约记》的签订及其基本内容

一八六四年上半年，明谊多次通知杜加美尔派使臣前来塔城，“按照议单，妥商定议”。但杜加美尔断然拒绝继续谈判，蛮横要求中方对俄方“议单”内“所指界址，全行应允，毫无更改”，并保证“会议时并无争论”，“照单内指出界址，立记绘图，互相画押”，然后设置界牌。^④明谊复照说明，“因议单有与条约不符之处，”所以需要按照条约“会同公商”；总理衙门所准者，“系指议单与条约相符

① 同治朝《始末》，第22卷，第32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80页；同治朝《始末》，第24卷，第3页。

④ 同治朝《始末》，第24卷，第2页。

之处，非不符之处亦概允许也”。^①例如，《北京条约》内“并无载有分人一事”，“议单”划去中国乌梁海、哈萨克、布鲁特等族人民的牧场田地，有碍他们的生计，双方应就此事进行协商，作出适当安排。对此，杜加美尔竟无理宣称，“议单”所指俄国界址以内的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哈萨克、布鲁特等族，“均为该国所属之人”，^②并威胁说，若明谊再不接受俄方要求，他立即将俄国分界大臣“撤回停办”，^③甚至声称俄方可以不待勘界定约，即派兵前往俄国所指界址“常川住守”，中国政府无权干涉等等，^④气焰极为嚣张。

与杜加美尔的外交恫吓相呼应，俄军五百余人于五月一日侵入塔城以西巴克图卡外头道河地方，在哈穆尔山脚强行驻扎，^⑤五月十三日，俄军六十余人，侵入科布多所属霍呢迈拉扈卡伦西南。接着，沙俄侵略者又在阿勒坦淖尔乌梁海地区加紧侵略活动，向两旗总管递文，宣称阿勒坦淖尔及哈屯河一带地方已归俄有，“如有人言系中国游牧，”定将“拿送俄城”。七月十一日，沙俄官兵又侵入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库克乌苏河地方，绑架前往巡

① 同治朝《始末》，第27卷，第33—34页。

② 同上书，第32页。

③ 同上书，第26卷，第11—12页；第27卷，第33页。参看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83—284页。

④ 同治朝《始末》，第27卷，第33页。

⑤ 同上书，第26卷，第13页。

查哈屯河的中国官兵十多名。^①

这时，库车、喀喇沙尔、乌鲁木齐等地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相继爆发，烽火遍及天山南北，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孤立无援。沙俄趁机派兵五百余名，强占伊犁西北的夏博罗胡吉尔卡伦；七月十五日，又增兵六百余名，直入山口，至冬博罗胡吉尔卡伦扎营，旋于八月初进逼图尔根河西，强占卡内地方，并扬言：“此都是俄国之地，与中国何干”！^②

在俄军节节进逼、伊犁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伊犁参赞大臣明绪于八月十一日行文西西伯利亚总督：“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并要求俄方“速将伊犁兵队撤出卡外，静候议分界址。”^③ 俄方见逼签条约的时机已完全成熟，立即同意派员前来塔城，而对撤军一事，则置之不理。

一八六四年九月初，札哈罗夫、巴布科夫离鄂木斯克前来。同时，俄军六百余人，奉命携带炮械，率先窜入塔城巴克图卡伦以西小水地方驻扎，“显有逞兵挟制之意”。十四日，札哈罗夫一行三十余人到达塔城，随后交给中方分界地图一份，威胁说：“若照此画定限道定界，将分入俄国地面旧住人丁均为俄国所属，如谓可行，即派员来圈

① 同治朝《始末》，第27卷，第1—2页。库克乌苏河系哈屯河上游。

② 同上书，第28卷，第2—3、5—6页。

③ 同上书，第3页。

(俄国贸易圈,札哈罗夫等驻地),在另有绘就图内添写清字地名,以便互换;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止好派兵强占。”^①

九月二十一日,中俄双方在参赞署正式会晤。俄方坚持必须“照单换约”,“人随地归”,其他一概不能考虑。他们不但“动辄以用兵为词,肆意强横”,而且“询问”中国西部“变乱情事”,意欲乘间欺凌。^② 明谊等慑于时势,只得接受俄方要求。

二十三日,中方派分界委员前往俄国领事馆,在俄方绘制的分界图上依照俄文注写满文地名,并与俄方商拟勘界议定书的具体条款。这时,俄方交出约文草案,并增加两项新的无理要求:一、塔尔巴哈台所属巴克图卡外小水地方中国的民庄五处,^③ 必须在立界前向内挪移;二、从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互换之日起,所有从卡外迁入卡内的中国哈萨克、布鲁特等族人民,应于立界时拨回原处。中方委员表示“断难照办”。经过数天激烈争辩,最后达成协议:小水地方民庄于立界后十年内陆续内

① 同治朝《始末》,第29卷,第20—21页。

② 同上书,第22—23页。

③ 小水地方,东距塔城约三十余里,是中国居民长期开垦的农业区,当时已成为塔城的谷仓。最初,西西伯利亚总督在拟定划界草案时认为,在这里划定国界线,“一定会造成将来引起各种冲突的口实,应当注意到尽可能使这段国界向西挪得更远些。”(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13页)一八六二年塔城谈判中,札哈罗夫等还保证不侵占这片土地。可是,才隔两年,同一个俄国代表在订约时竟将它强行割去。

迁；由卡外迁入卡内者，以此次换约之日为准，人随地归。^①

十月七日，明谊、锡霖、博勒果素在俄方压力下，终于与札哈罗夫、巴布科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同时在俄方一手绘制的分界地图上签字画押。至此，时断时续、历时三年之久的塔城“勘界”谈判遂告结束。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共十条，^②主要内容有：一、划分边界。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边界”为止的共同边界，将新界以西原属中国的大片土地划归俄国。二、人随地归。边境地区人民，“向在何处住牧者，仍应留于何处住牧”；划界后，“地面分在何国，其人丁即随地归为何国管辖。”三、建立界牌。换约后满二百四十天，两国立界大臣会同，按照议定界址，分段建立界牌鄂博，并拟定国界记文，互换为凭。四、挪移卡伦、民庄。立界后，位于新界俄国一侧的原有中国卡伦，应于一个月内存往中国一侧；巴克图卡外民庄五处，限十年内存迁。

应当指出，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加给中国的边界线，名义上是依据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实际上却超越该约的规定，在许多地方向中国一侧推移，从而使中国蒙受了更多的领土损失：

① 同治朝《始末》，第29卷，第23—24页。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15—218页。

第一,改变了边界走向。《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自沙宾达巴哈至斋桑湖的边界走向,应为“往西直至”(汉文本)或“向西南到”(俄文本),而《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一条规定,自沙宾达巴哈起,先向西,后往南,顺萨彦岭至唐努山西端,转往西南,顺赛留格木岭至奎屯山,然后西行,顺阿尔泰山至斋桑湖北面的察奇勒莫斯山,再转往东南,沿斋桑湖北岸和喀喇额尔齐斯河岸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其间,边界线多处摆向东边中国一侧。这样,沙俄就多占了《北京条约》规定的边界走向与《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的边界线之间的大片中国土地,向属中国的斋桑湖也全被俄国吞并。

又,根据《北京条约》第二条,边界线自斋桑湖起,“往西南”至特穆尔图淖尔,再往南至浩罕边界为止。《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二、第三条却规定,边界从斋桑湖以东约七十公里的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先往东南至赛哩山,后往西,顺塔尔巴哈台岭至哈穆尔(哈巴尔苏)山口,转往西南沿巴克图、玛尼图、巴尔鲁克等卡伦至阿勒坦特布什岭东端,再由此岭往西,至匡果勒鄂博山,即转向南行,沿奎塔斯山顶至图尔根河源,顺此河依博罗胡吉尔、霍尔果斯等处卡伦至伊犁河之齐钦(奇沁)卡伦,过河往西南至春济卡伦,转往东南至特穆尔里克河源,而后转东,由特穆尔里克山顶至格根河源,再往西南,由喀喇套山、达喇图河至特克斯河,过河顺那林哈勒哈河到天山。自此往西南,由特穆尔图淖尔南边顺天山之顶,行至葱岭,接浩罕

界。显然，这段边界线先往东南，后往西往南，不符合《北京条约》俄、汉两种文本的有关规定，使中国多丧失了斋桑湖东南、阿拉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以东以南的大片领土。

第二，越过了俄方自己提出的“分界标志”。《北京条约》汉文本规定中俄两国在西部“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在一八六二——一八六四年的谈判中，俄方又一再声称，常驻卡伦是分界的主要标志。然而，《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的边界线，不但将中国西北大量移设和添撤卡伦，而且把一系列常驻卡伦包入俄境。《勘分西北界约记》第四条划入俄境的许多卡伦，如乌里雅苏台所属科布多地区的乌克克卡伦、沁达盖图卡伦、乌尔鲁卡伦、昌吉斯台卡伦，塔尔巴哈台所属的阿鲁沁达兰卡伦，伊犁地区的匡果罗鄂伦卡伦、惠番卡伦、春济卡伦、特克斯色沁卡伦、敦达哈布哈克卡伦、伊克哈布哈克卡伦和察察卡伦，都是公认的中国常驻卡伦。连俄方签字代表巴布科夫也承认：由于“从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起，国界沿萨乌尔山（即赛哩山）而行，”因而“位于这个山岭以西至塔尔巴哈台山的中国常驻卡伦线，被并入俄国领域之内。”^①塔城地段如此，其他地段也是如此。清政府早在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前就已指出：“俄国议单所指，弯入内向，将常驻卡伦包去多处，实与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87—288页。

(北京)条约相背。”^①可见，沙皇政府是不讲任何国际信义的。为了掠夺的需要，它可以把自己提出的誓言（要“一丝不苟地执行《北京条约》”）和划界原则（“以中国常驻卡伦划界”）完全抛弃。此外，《北京条约》规定以中国内湖特穆尔图淖尔作为界湖，这已使中国蒙受了极大损失，但《勘分西北界约记》却更进一步，竟将边界线划在特穆尔图淖尔以东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从而把整个特穆尔图淖尔圈入俄国的版图。

再如《北京条约》俄文本规定，边界线南抵吉尔吉斯阿拉套。苏联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史地图，都把“俄罗斯帝国一八六〇年的边界”标在特穆尔图淖尔东南顺捷尔斯克依阿拉套往西接楚河上游。^②可见，按照俄国人的原意，这个“阿拉套”，实际上是指距特穆尔图淖尔南岸不远的捷尔斯克依山脉（铁列盖岛山）。可是，《勘分西北界约记》却把界线推到纳林河以南，把属于中国喀什噶尔的纳林河流域强行割去。

以上分析表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是沙俄继《北京条约》之后强加给清政府的又一掠夺性条约。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俄方首席代表札哈罗夫毫不隐讳地

① 《清穆宗实录》，第103卷，第10页。

② 涅奇金娜主编：《苏联通史》，第2卷，1949年莫斯科出版，附图；《十九世纪的中亚》；巴齐列维奇等编：《苏联历史地图集》，第2册，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13图；《十九世纪的哈萨克斯坦和中亚》；越特金等编：《吉尔吉斯史》，第1卷，第366—367页附图。

承认：“这是一个有利的议定书。据此，大片领土从中国转归了俄国。”^①巴布科夫也供认，由于签订这一条约，“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东部原属中国的幅员广大的土地划入了我国领域之内。”“除了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的一部分外，并入俄国领土的还有科尔沁和斋桑湖边区，格根河流域和纳林河（锡尔河上游）盆地……”。^②

就这样，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部北起阿穆哈山脉，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东迫塔城、伊犁，总面积共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三、《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三个子约

根据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六条的规定，从一八六五年五月起，双方勘界大臣应在指定地点会齐，按照议定界址，分途建立界牌。由于新疆维吾尔等族反清运动的爆发，伊犁、塔尔巴哈台及其西境哈萨克游牧区陷入混乱，双方无法派员前往，西南一路的勘界已不可能。但在反清武装斗争尚未波及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北路边境地区，清政府仍积极准备依约立界。为此，一八六五年六月，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麟兴专程前往科布多，与俄

① 《关于札哈罗夫的回忆》，载《关于中国、东西伯利亚和朝鲜文集》，1885年彼得堡出版，第13篇。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88、471页。

人约期划界，并派员去索果克卡伦等候。八月，俄方派人到索果克通知说：俄国因“出师西进”（指侵略浩罕。——引者），本年“不克会立界牌鄂博”。^①麟兴等只得折回，勘界立牌工作于是被迫推延。

然而，沙俄进军中亚，并不意味着它搁置了掠夺中国西境的计划。相反，就在攻打浩罕期间，它利用中国西北各省局势不稳，一面拖延立界，一面不断派遣武装部队驱赶中国守卡官兵，强占沿边土地。到一八六八年夏，科布多所属乌克克、昌吉斯台、那林、辉迈拉扈等八卡，均被俄国占领。^②

清政府为沙俄“乘乱一味占据边疆”所苦，^③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由科布多参赞大臣奎昌照会俄国塞米巴拉金斯克省省长巴布科夫，提出抗议，同时要求俄方从速派员前来，依照条约，会同勘界。^④一八六八年三月，巴布科夫向正在俄境的署伊犁将军荣全表示，愿意照约会勘边界。^⑤随后，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朝总理衙门，“以俄国附近新疆有贼处所，不能悉照塔城条约，处处立牌”，建议“于安静地方，先行建设”。^⑥五月间，清廷颁发谕旨，命麟

① 同治朝《始末》，第59卷，第4页；第35卷，第8页。

② 同上书，第62卷，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58卷，第20页。

④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377页。

⑤ 同上书，第360、377页。

⑥ 同治朝《始末》，第60卷，第38—39页。

兴、荣全、奎昌等从速“会同俄国边界官员，查明（同治）三年所分界址，将应建界牌鄂博，概行建立。”^①同年十二月，双方在北京达成协议，决定于次年五月二十二日在乌克克会齐后，“从北部处于中国叛乱分子活动范围外的地方开始”设置界牌。同时，俄方为便于操纵勘界，在协商中又以“保障安全”为名，强要中方同意两国大臣在勘界时，“必有（俄国）兵队跟随保护”。^②

一八六九年六月上旬，俄方勘界全权大臣巴布科夫、帮办穆罗姆佐夫（旧译穆鲁木策傅）中校和翻译官、伊犁领事巴甫林诺夫（旧译庞龄），带领由步兵和哥萨克各一个连组成的“特别卫队”，到达乌克克卡伦。^③十三日，荣全、奎昌与巴布科夫等正式会晤，按俄方提议决定：双方在赛留格木岭设置第一个界牌之后，分为两组：一组北上，由奎昌会同穆罗姆佐夫设置科布多地区北段界牌，然后由荣全接替奎昌，会同穆罗姆佐夫继续往北树立乌里雅苏台地区界牌，直至沙宾达巴哈界牌为止。另一组西南

① 同治朝《始末》，第58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61卷，第39页；第62卷，第28页；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379页。巴布科夫承认：根据一七二七年中俄举行边界谈判期间俄方在国境线附近布尔河畔调集军队的成功经验，沙俄这次选定中国的乌克克卡伦为设置界牌的起点，向那里派遣军队，也是为了使勘界活动导致有利于俄国的“良好结局”。见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382—383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383页；同治朝《始末》，第66卷，第3页。

行,由巴布科夫会同从北路返回的奎昌,勘定直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卡伦为止的科布多地区南段边界。从玛尼图噶图勒干往南沿塔尔巴哈台山脉到哈巴尔苏山口,即布伦托海沿边地区^①的划界,则待中方划界大臣文硕(后改为奎昌)到达国境后,与巴布科夫会办。^②

六月十九日,划界工作开始,双方在巴布科夫选定的乌克克卡伦以东乌兰达巴哈设置了第一个界牌。接着,奎昌同穆罗姆佐夫一起沿赛留格木岭往东往北设置界牌。途中,穆罗姆佐夫“中怀诡谲,意图多占”。奎昌害怕“决裂”,对俄方采取迁就态度,草草设立了察干布尔噶苏、布果素克达巴哈等五处界牌,于七月六日结束了科境北段的划界。^③

七月十三日,奎昌按双方预定计划返抵乌克克,准备由此往西沿阿尔泰山勘分科境南段边界。殊不知巴布科夫乘奎昌尚在北段勘界之时,已遍查了上述边境地区的地形和交通状况,预定了设置界牌的地点,并在布赫塔尔玛盆地通往斋桑湖和喀喇额尔齐斯河的各个山口单方设置了几个界牌。十七日,奎昌赶到昌吉斯台会见巴布科

① 一八六六年塔尔巴哈台为反清武装力量占据后,清政府另设布伦托海(在塔城东北)办事大臣管辖其所属之地,故有“今日之布伦托海即前日之塔尔巴哈台,异名而不异地”之说(《清穆宗实录》,第253卷,第3页)。一八六九年裁撤。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406—407页;同治朝《始末》,第66卷,第3—4页。

③ 同治朝《始末》,第66卷,第16—17页。

夫时，已面临既成事实。^①但是，他不仅未向俄方表示异议，反而借托年迈体衰，山路难行，同意巴布科夫带领科布多官员继续前往，一切“归他指挥”。巴布科夫于是得意洋洋，俨然以“全部边界事宜的全权支配者”自居，为所欲为，于八月十日在玛尼图噶图勒干完成了划界工作。总计，自布果素克岭起至玛尼图噶图勒干，共建立牌博二十处。八月十三日，双方签署由俄国一手包办的《科布多界约》。通过此约，沙俄终于割占了原属中国的斋桑湖以北地区。^②光绪年间，科布多参赞大臣清安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痛心指出：《勘分西北界约记》和《科布多界约》“已将科地分让至十分之六，其分让之处本属沃壤，尽被俄人割去”，致使当地哈萨克等族“无所栖止”，均拥挤于哈巴河等处就牧。^③后果严重，由此可见。

奎昌南返后，先期到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属交界处等候接办的荣全，立即与穆罗姆佐夫议设乌里雅苏台地段中俄界牌。这时，穆罗姆佐夫又要求中方必须按水源划界，说“此地虽系赛留格木，而水源尚不在此，必须再行找寻，方可建立牌博。”荣全指出：“原图既有红线，原约又有条款，应当顺此山岭，方为平允。”穆罗姆佐夫竟蛮横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411—412页。

② 同上书，第412—416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9卷，第2页。参看《新疆图志》，第55卷，交涉志三，第10页。

地宣称：“红线、条约可不必遵。”经过反复辩论，最后照俄方意见在博果苏克（柏郭苏克）坝设置了第一座牌博。^①但是，七月八日北行至珠鲁淖尔（又称朱甫鲁库里湖）议立第三个界牌时，穆罗姆佐夫又以道途险阻、“万难飞越”为由，不愿照分界红线（即顺唐努山南向西至唐努鄂拉达巴哈末处转往北行，顺萨彦山向东至沙宾达巴哈）立界，而要求“止就珠鲁淖尔迤北数十里、唐努山之察布齐（察布产）坝上建立鄂博，由此直向西北，绕至沙宾达巴哈。”荣全明知按此议立界，“不惟与原图大不相符，且将唐努乌梁海游牧包去大半”，但由于畏难苟安，并未据理力争。在给清政府的报告中，他甚至提议“倘红线所定曲折之处，实不能行，向内绕道，只于蒙古等生计尚无妨碍，亦可稍让隙地，令彼得益而止”，要求准予“从权办理”。^②随后，荣全不待清廷批准，于七月末在俄方的压力下匆匆结束全部八个界牌的设置，九月四日在昌吉斯台互换了《乌里雅苏台界约》，唐努乌梁海西北部阿穆哈河一带牧地，遂归俄有。

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地段勘界活动结束后，满怀喜悦的巴布科夫准备在布伦托海地段如法炮制。这时，负责布伦托海勘界事务的奎昌，因塔城辖境尚未完全收复，不愿前往。巴布科夫获悉后，竟无视国际勘界惯例，报经

① 同治朝《始末》，第66卷，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15—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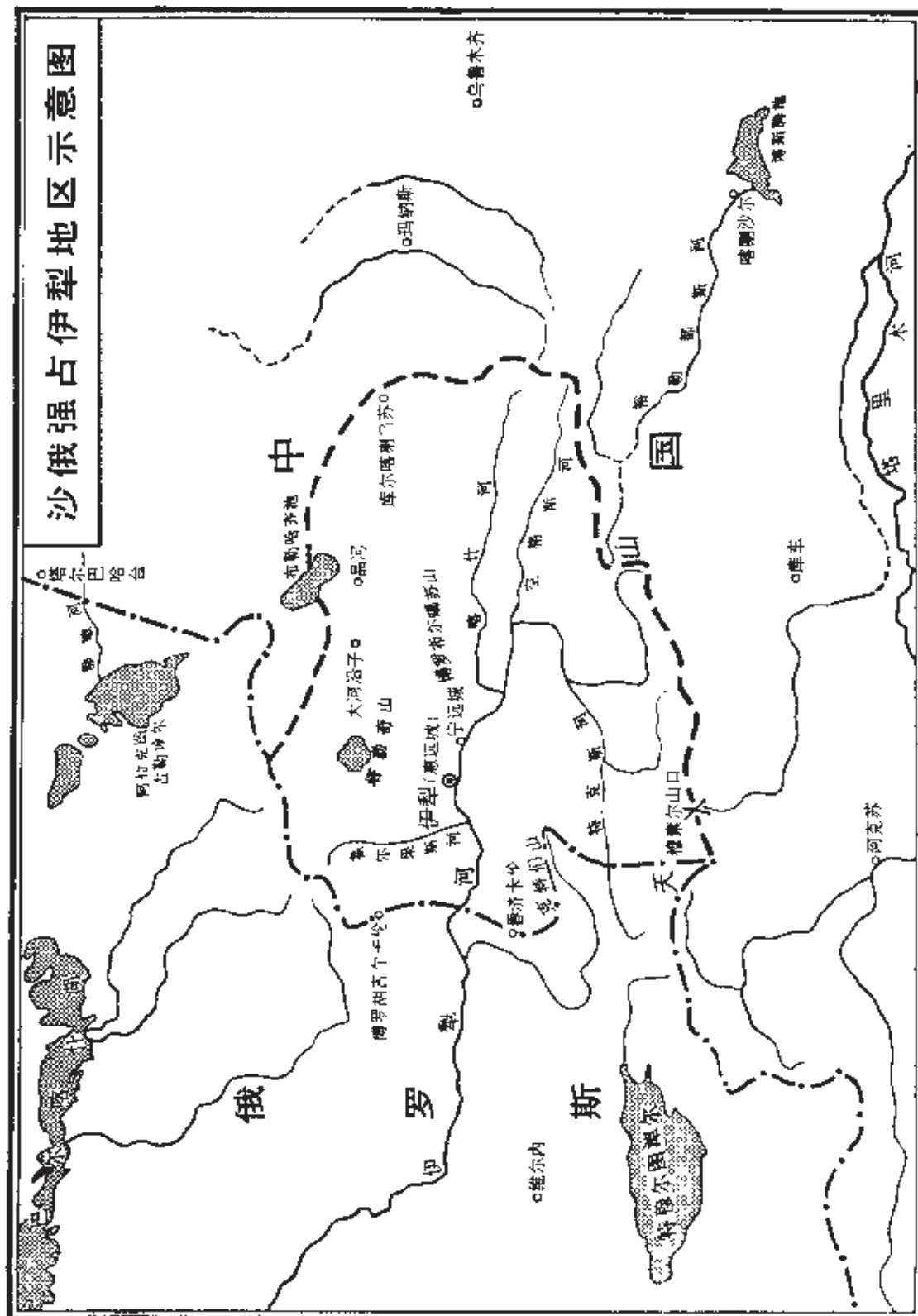
沙皇政府批准，背着中方于九月间伙同穆罗姆佐夫从玛尼图噶图勒干向南至赛哩鄂拉，复顺塔尔巴哈台山岭西行至哈巴尔苏地方，逐段自行设置了九个界牌；其中察汗鄂博界牌的设置，违背一八六四年塔城界约，越入中国国境一百多里。与此同时，俄国驻华公使照会清朝总理衙门，无理宣称：“布伦托海地界，虽无中国大臣会办，（俄国）亦可自行建立。”清政府复照反对，指出“以贵国独勘之界，作为中国共勘之界”，“于会办原议不符”，要求待明岁春融，再行定期会办。^①但俄方一意孤行，置若罔闻；到一八七〇年二月，竟向中方声明立界已经“完竣”。^②清政府仍命奎昌于同年七月间前往玛尼图噶图勒干，会同穆罗姆佐夫“查勘”。奎昌面对既成事实，只得在俄方牌博左侧，另立中方界牌，并于八月十二日签署了《塔尔巴哈台界约》，将斋桑湖以东以南的土地割归俄国。

至此，在沙俄一手把持下，北起沙宾达巴哈南至哈巴尔苏出口的中俄边界，均已勘定。通过勘界，沙俄获得了巨大的领土利益。但是，侵略成性的沙俄，并不以此为满足。它力图扩大对中国的领土掠夺。《塔尔巴哈台界约》刚签署，它就悍然揭开了武装侵占伊犁的帷幕，并准备撕毁成约，逼迫清政府“勘改”已定边界。

① 同治朝《始末》，第69卷，第13—14页。

② 同上书，第71卷，第16—17页。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示意图



第四章

沙俄武力逼签中俄《改订条约》

第一节 沙俄觊觎南疆和强占伊犁

一、向中亚的殖民进军和对南疆的侵逼

就在武力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的同一年，沙俄从浩罕开刀，发动了征服中亚各汗国的殖民战争。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是由几方面的因素促成的。

这时，俄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动。一八六一年三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标志着农奴制的俄国开始被资本主义俄国所代替。从此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新企业不断出现，纺织等产业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逐年增加。暴发的俄国资产阶级迫切地要求扩大商品市场。但是，大量的农奴制残余的存在和广大人民的贫困，限制了群众的购买力，束缚了国内市场。在欧洲市场上，俄国也无力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竞争，只能充当供应农产品的角色；唯有在经济落后的东方，特别是包括中国西部地区在内的中亚细亚，它的工业产品才能

找到新的销路。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就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中亚，力图凭借刺刀来独占这一广大的商品市场。

俄国资产阶级还处心积虑地要把中亚变成他们独占的原料基地，首先是棉花基地。当时俄国主要的工业部门是纺织业，其原料一向依靠从美国进口的棉花。一八五七至一八六〇年间，俄国共进口美棉二百一十二万普特。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输入俄国的美棉急剧减少，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五年仅进口一百一十一万普特，远远不敷需要。中亚细亚是著名的棉花产地，同时与俄国接壤，运费低廉，因此沙皇政府愈加急切地图谋吞并中亚，为俄国工厂主攫夺这一重要的富源。

除经济原因以外，俄、英争霸也是促使沙俄立即在中亚动手的一个因素。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便企图从两个方面——印度和波斯湾向中亚渗透。与此同时，沙俄则力图独吞中亚，进而威胁英国在东方的主要殖民地印度。克里米亚战争后，沙俄在近东的出路被英、法堵塞，更力图向中亚扩张。一八六三年初波兰爆发反抗沙俄暴政的大规模起义，英国趁机联合法国，要求给予波兰独立，使沙俄在西方受到巨大压力。这一形势也对沙俄在中亚的行动有一定影响。正如陆军大臣米留金所说，沙皇政府决意立即在中亚大举进攻，以便“把英国人的力量从欧洲引开，并给他们的贸易利益造成尽可能巨大的损害。”^①

^① 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第147页。

一八六三年三月，沙皇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先对锡尔河堡垒线和西伯利亚堡垒线之间的地带进行周密侦察。不久，陆军部和外交部就“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出动军队占领上述两线之间的缺口。米留金并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规定由奥伦堡部队占领苏札克，西西伯利亚部队占领阿乌利耶-阿塔，沿喀拉套山脉建立新“边界线”，然后继续南进，将“边界线”推移到阿雷斯河，把奇姆肯特圈入沙俄的版图。一八六三年末，这一方案经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成为俄国进军中亚的行动纲领，并指定由奥伦堡总督和西西伯利亚总督负责执行。

一八六四年，沙俄殖民军按照原定计划向中亚腹地推进。六月，契尔尼亚耶夫上校率领俄军二千五百人从维尔内向西南方进攻，迅速侵占阿乌利耶-阿塔。另一支俄军一千二百人由维寥夫金上校率领，从彼罗夫斯克(阿克麦吉特)沿锡尔河东进，攻占土尔克斯坦城。随后，沙俄殖民军在契尔尼亚耶夫指挥下继续南进，于十月三日攻占奇姆肯特。

中亚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动辩护，并预防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对此提出抗议，沙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先发制人，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向各国发出《通告》，大谈俄国在中亚的“文明使命”和俄军行动的“防御性质”，并振振有词地说，俄国在中亚所做的事情，与“美国在美洲、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荷

兰在其殖民地、英国在印度”所干的完全一样，^①言外之意是，谁也没有理由反对俄国的行动。这个满纸殖民主义恶臭的《通告》，向全世界宣布了沙俄彻底征服中亚的决心，并且相当有效地封住了其他西方殖民国家的嘴巴。

一八六五年六月，沙俄军队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向中亚细亚最大的城市塔什干发起猛攻。浩罕军民英勇抵抗，激战三昼夜，六月二十九日塔什干终于陷落。第二年，沙皇政府宣布将该城并入俄国。一八六七年，沙俄在中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成立七河省，在夺自浩罕的土地上成立锡尔河省，归新设的土尔克斯坦总督管辖，并成立相应的军区。一八六八年二月，沙俄强迫浩罕订约，把浩罕实际变成俄国的附庸。接着，俄军继续向布哈拉汗国进军，迅速占领撒马尔罕，并迫订投降条约，使布哈拉沦为俄国的附属国。从此，沙俄征服全部中亚细亚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浩罕位于费尔干盆地和塔什干绿洲，与南疆接壤。沙俄向浩罕大举进攻的目的不仅为了吞并中亚各汗国，同时还图谋经浩罕进一步侵略中国南疆。早在十九世纪初期，俄国人已盘算要打通由浩罕进入南疆的道路。稍后，奥伦堡总督彼罗夫斯基更露骨地主张：俄国必须征服浩罕，因为“它位于从俄国进入中国土尔克斯坦（指新疆南部。——引者）的道路上。中国土尔克斯坦和中国蒙

①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亚细亚的往来文书》，1873年 中亚细亚第2号，第70—72页。

占地区，有希望使我们的货物获得比布哈拉以南的各地区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①当时，欧洲盛传新疆南部人口稠密，并出产棉花和各种贵金属，这些消息使俄国资产阶级馋涎欲滴。十九世纪中叶前后，俄国工商业促进会和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不断要求开辟经浩罕到南疆的商路，渴望独占这一广袤的市场。同时，新疆南部接近克什米尔和印度，沙俄一旦控制南疆，便可以直接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由于这些原因，在攻占塔什干以后，一些沙俄军官已在私下推测，俄军不久即将进一步征服喀什噶尔。^②这种议论决不是空穴来风。

这时，新疆少数民族的反清起事日趋扩大。一八六四年八月，布鲁特头目思的克和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攻占喀什噶尔回城疏附，建立起割据政权。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竟丧心病狂地向外国乞援，要求浩罕派大和卓博罗尼都的后裔、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前来喀什噶尔，用作欺骗群众的工具。浩罕统治者认为这是伸张势力的大好机会，立即派部将阿占柏带领一支浩罕部队，护送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阿占柏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侵略分子，一八六五年一月进入喀什噶尔后，他把布素鲁克扶上“汗”位，自己牢牢掌握了实权，并先后攻占英吉沙尔、疏勒（喀什噶尔汉城）、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等地，到

①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5—1895）》，第33页。

② 弗雷希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东土尔克斯坦的竞争》，载英国《皇家中亚杂志》，第26卷第3部分，1939年7月出版，第476页。

一八六七年夏，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南疆。接着，他便将傀儡布素鲁克撵走，自己登上汗位，称“毕条勒特”汗（意即“幸运者”），宣告成立“哲德沙尔国”（七城之国）。

南疆局势的急剧变化引起俄、英两个殖民大国的密切注意。它们都企图趁机在新疆攫取广泛的侵略利益，并为此目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哲德沙尔”伪政权成立之初，沙俄就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要求阿古柏给予贸易特权。阿古柏一心想做“哲德沙尔”的“独立君主”，希望沙皇政府承认“哲德沙尔”。但是，沙皇政府认为“哲德沙尔”成立不久，能否长期存在还是未知数，不愿过早地采取这一外交步骤，以免招致清政府的反对，影响沙俄已从中国获得的侵略权益。同时，沙俄担心在南疆出现一个新的伊斯兰教的“独立国”，可能对中亚各地人民产生某种号召力，不利于它在中亚的扩张和建立殖民统治，也不利于实现它吞并中国南疆的计划。因此沙皇政府既要通过阿古柏在南疆捞取好处，又拒绝承认“哲德沙尔”。这样，在沙俄和阿古柏之间，自始就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互相猜疑和紧张关系。

一八六七年，沙俄要求阿古柏同意“建筑一座横跨纳林河的桥梁和一条通过天山进入喀什噶尔的军用公路。”^①企图把喀什噶尔置于俄国的控制之下。阿古柏不甘心听凭俄国摆布，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沙俄于是更

^① 包罗杰：《阿古柏传》，1878年伦敦出版，第178页。

进一步，在纳林河畔距喀什噶尔仅四天行程的地方建筑了纳林堡，作为进攻喀什噶尔的“预备措施”，并“公开宣称它的意图就是要惩罚阿古柏对它的轻蔑态度。”^①阿古柏面临沙俄的军事威胁，急忙封锁南疆的西部边界，并在图鲁噶尔特山口附近修筑恰哈玛克堡，和纳林堡的俄军相对峙；双方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只是由于浩罕和布哈拉爆发了抗俄起义，沙俄殖民者忙于实行镇压，才把进攻喀什噶尔的计划暂时搁置起来。

接着，沙俄便改用“和平”手段向南疆渗透。一八六七年九月，在纳林河上游进行侦察活动的俄国军官波尔托拉茨基上校致函阿古柏，要求建立商务关系。阿古柏希望借此缓和同俄国的矛盾，表示同意俄国在喀什噶尔建立商栈和派驻商务代表。^②一八六八年三月，俄商赫鲁道夫率商队来到喀什噶尔，售出了货物，并会见了阿古柏。随后，阿古柏派他的侄子萨迪·米尔扎随赫鲁道夫赴俄，表示“愿与俄国达成完全谅解”。^③上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趁机大肆勒索，建议与阿古柏订立一项内容与沙俄强迫浩罕签订的奴役性条约完全相同的条约。^④由于沙俄要价太高，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同年十月，考夫曼派

① 包罗杰：《阿古柏传》，第181页。

② 波波夫：《征服中亚史片断》，载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集刊》，1940年第9辑，第234页。

③ 包罗杰：《阿古柏传》，第184页。

④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31页。

副官赖因塔尔大尉回访喀什噶尔，再次向阿古柏索取种种特权。赖因塔尔受到了彬彬有礼的接待，但是阿古柏并没有满足他提出的要求。这样，尽管沙俄和阿古柏之间开始建立非正式的接触，但紧张关系依然存在。

不久，考夫曼又生一计，竟怂恿浩罕的呼达雅尔汗去“征服喀什噶尔”。考夫曼的如意算盘是：第一，俄国不出一兵一卒，即可达到“惩罚”阿古柏的目的；第二，除掉阿古柏以后，就让对俄国比较顺从的呼达雅尔汗暂时统治喀什噶尔，而沙俄则趁机抄浩罕后路，并吞浩罕的全部领土。^①呼达雅尔汗知道考夫曼诡计多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答应在俄、阿之间进行斡旋，劝告阿古柏对俄国让步。因此，沙俄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又没有得逞。

在沙俄千方百计地企图控制中国南疆的同时，英国也展开积极的活动，力图操纵阿古柏，从而把南疆纳入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是与沙俄盛气凌人、蛮横霸道的作风相反，英国对阿古柏采取了十分圆滑的拉拢手段，而阿古柏也有意向英国靠拢，以对抗来自沙俄的巨大军事压力。

早在“哲德沙尔”伪政权建立以前，印度的英国商人和英印殖民当局已在盘算夺取南疆市场。从一八六三年起，不少英国探险家曾潜赴南疆侦察，搜集了大量情报。一八六七年，英印政府在拉达克的列城派驻商务专员，以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30页。

促进对南疆的贸易关系。一八六八年初，英印旁遮普省副省长接待了阿古柏派来的友好“使者”。同年秋，英印政府派遣茶叶种植园主兼富商沙敖赴喀什噶尔进行“非正式”访问，并赠给阿古柏一批英制来复枪。阿古柏多次接见沙敖，亲如手足。^①这次访问，标志着英国和阿古柏互相勾结的开端。

一八六九年，迈约出任印度总督，公然把南疆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年六月，英印政府向伦敦提出一份备忘录，强调指出：俄国在南疆“并非无所作为”，印度势将受到俄国的威胁；为了防止英、俄之间发生冲突，最好在两国之间有一些“独立国家”；俄国应维持希瓦等国的“独立”，而英国则可保证给阿富汗和叶尔羌周围地区以“独立地位”。^②这一文件清楚地说明，英印政府实际上企图把中国南疆变成一个在英国控制下的“缓冲国”。

一八七〇年，阿古柏派萨迪·米尔扎访问印度，并请求英印政府派官员回访。迈约趁机指派弗赛斯率领使团前往“哲德沙尔”，企图加紧同阿古柏勾结，同时又做贼心虚地极力表白，说弗赛斯一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使团，而且决无政治目的”。^③此事引起了沙俄的很大猜

① 详见沙敖：《鞑靼高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1871年伦敦出版，第十二、十五章。

②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39页。

③ 同上书，第42—43页。弗赛斯到达南疆后，正值阿古柏远赴乌鲁木齐，因此并未见到阿古柏，随即匆匆返回印度，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疑和嫉妒。半官方的《土尔克斯坦信使报》神经紧张地叫嚷：“既然阿古柏是我们的近邻，……似乎应该由俄国而不是由英国来垄断六城地区的市场。”^①一些有地位的俄国商人联名上书考夫曼，强烈要求在南疆攫取各种特权，包括在喀什噶尔片面设立领事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沙俄图谋控制我国新疆南部的急切心情，同时也反映出它与阿古柏的尖锐矛盾及俄、英之间的激烈争夺。这时，阿古柏的势力日益膨胀，沙俄怀疑他有进一步进攻伊犁的意图；这一地区是沙俄从中亚侵入我国新疆北部的大门，战略上和商业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俄国侵略者早就把它视为禁脔，并狂妄地称之为“俄国的开伯尔”山口。^②为了预防阿古柏在伊犁“建立‘亲英的统治’”，^③沙俄决定抢先动手，于一八七一年出动大批军队，悍然侵占了整个伊犁地区。

二、强占伊犁地区及其殖民统治

由伊犁河上游及其三大支流特克斯河、巩乃斯河（空格斯河）和喀什河（喀什河）流域构成的伊犁地区，是中国西部边疆的一块宝地。这里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雨水充足，物产丰饶，农牧林矿诸业兴旺，集市贸易也很发达。在

①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44页。

② 开伯尔山口在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历史上曾是从印度次大陆通往中亚的要道。

③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44页。

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坐落有惠远、绥定、广仁、惠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勒奇九城，其中惠远最大，是伊犁将军的驻扎地、新疆的军政中心。这里民族众多，有哈萨克、维吾尔、回、汉、布鲁特、厄鲁特、锡伯等族。他们长期以来就劳动、生活在祖国的这一锦绣边疆。

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并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后，侵略野心并未稍减。新疆少数民族起事所引起的动荡为沙皇政府提供了可乘之机。除了不断觊觎南疆以外，沙俄还计划从斋桑和七河地区出兵，“对东干地区的两个主要中心——伊犁和乌鲁木齐实行军事占领”。^①其中，伊犁是首当其冲。沙俄扩张主义分子库罗巴特金后来直言不讳地写道：“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因为这样不但极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②

一八六六年三月上旬起事者攻陷惠远城后，沙俄阴谋出兵“助剿”，一面派波尔托拉茨基上校带人到特克斯河谷和穆素尔山口进行侦察，一面照会清政府称，俄国准备派兵协助清军“收复”惠远，但没有得到答复。

一八六九年十月，窃据博罗胡古尔的部分俄军，包括骑兵一百〇四名、步兵六十七名，携带大炮两门，竟然窜到霍尔果斯附近的马札尔，劫去当地居民绵羊五千只。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525页。

② 库罗巴特金：《俄日战争的总结》，1909年柏林出版，第76页。

类似的劫掠挑衅事件，在此前后曾多次发生。

一八六九年秋阿古柏攻占库尔勒后，开始向北推进。沙俄担心他即将进攻伊犁，于一八七〇年八月命令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派兵强占了沟通天山南北的咽喉要地穆索尔山口，并修筑通向伊犁的道路。随即在伊犁西部天山和阿拉套山之间长达二百多公里的边界上集结两支部队，为侵占伊犁预作准备。大约同时，考夫曼向彼得堡送去一份报告，力陈必须占领伊犁的种种“理由”，请求允许他采取行动。^①

一八七〇年底，沙俄借口解决“边境劫掠”问题，派遣总参谋部大尉考尔巴斯（旧译柯勒巴）男爵前往伊犁刺探情况。

采取了以上准备步骤后，一八七一年初，沙皇政府连续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侵占伊犁问题。二月二十二日，特别会议作出了强占伊犁的决定。当时阿古柏已经攻占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沙皇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动手，不仅是为了防止阿古柏攻打伊犁，而且它估计清政府已经永远无法规复新疆，这正是趁火打劫的天赐良机。

占领伊犁的决定一经作出，考夫曼就着手寻找出兵的借口。一八七一年四月，阿拉木图附近一个哈萨克部落的首领塔札别克，因不堪沙俄的残暴统治，率众逃往伊犁地区。这件事成了沙俄强占伊犁的口实。

^① 斯凯勒：《土尔克斯坦》，第2卷，第186页。

一八七一年五月八日，沙俄七河省省长、驻军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少将突然向伊犁割据政权首脑阿布尔·奥格兰（旧译挨婆鲁屋拉）发出最后通牒，限一周内即五月十五日以前交出“逃犯”塔札别克等，否则就要派俄军入伊犁追捕。五月十四日，彼得堡特别会议重申了出兵占领伊犁的决定。十五日，考夫曼借口安定边境秩序，下达了进军令。一次预谋的武装入侵就此开始。

入侵的俄军分两路向伊犁进犯：五月十五日，由巴里茨基少校率领的俄军从博罗胡吉尔出动，扑向马札尔。这支侵略军共有一个步兵连，九十名哥萨克和两门大炮。当地居民破坏水渠，断敌水源，使俄军寸步难行。五月十九日，俄军一度侵占马札尔，但立足未稳，便遭到猛烈反击。二十一日，他们焚掠了马札尔后，被迫退往中国废城霍尔果斯，途中再次受到伊犁居民“从四面八方的持续而顽强的围攻。”^①二十二日，当地居民又对盘踞在霍尔果斯的敌人发动进攻。二十四日俄军撤到阿克肯特。伊犁居民利用森林和各种有利地形，不断进攻，使俄军“得不到喘息机会”。^②几天以后，沙俄侵略军被迫撤回博罗胡吉尔。

另一路由春济进犯克特们地区的俄军，同样受到当地居民的沉重打击。五月二十日，这支侵略军由叶连斯基中校率领，企图经克特们河谷攻占克特们山口。当地居民早已严阵以待。敌人一进入克特们河谷，就遭到猛烈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29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攻击。他们继续强攻山口，双方从上午十时激战到下午三时，俄军死伤十余人，被迫从克特们山口退却。此后，在五月二十六日和六月十二日，伊犁居民又两次围攻盘踞在克特们村等地的俄军。六月十二日的一次，抗俄武装从凌晨三时起同敌人一直作战到晨八时，一度收复了克特们村，打死打伤敌军三十八人。

俄军在入侵最初阶段的失利，迫使他们不得不增加兵力。六月二十日，科尔帕科夫斯基亲自来博罗胡吉尔指挥。与此同时，伊犁抗俄武装秣马厉兵，筑堡挖壕，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

六月二十四日，俄军近两千人，配备大炮十门，从博罗胡吉尔出发，进犯伊犁地区。^①他们采取迂回战术，突破左右两翼防线，包围伊犁抗俄队伍。经过激烈的战斗，抗俄武装因伤亡太大，被迫突围。六月二十八日，俄军侵占阿林都村，随即扑向清水河子。当地各族居民四千人对侵略者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抵抗。三十日，“该城全体男性居民都参加了要塞保卫战”，^②连儿童和老人也投入战斗，用枪炮、长矛甚至砖石迎击来犯之敌，终因力量悬殊，清水河子当天陷于敌手。七月一日，绥定沦陷。三日，俄军攻占巴彦岱（惠宁）。四日，占领宁远城（今伊宁市），伊犁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归于失败。

在强占伊犁的过程中，从博罗胡吉尔到宁远城仅有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39—40页。

② 同上书，第47页。

一百公里，但是沙俄侵略军攻占这个地段却用了五十天的时间（五月十五日至七月四日）。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参加武装抗俄斗争的，有维吾尔、布鲁特、回、汉、哈萨克、蒙古族、锡伯和索伦人。他们团结一致，为守土保国谱写了光辉篇章。

沙俄侵略军强占伊犁后，贪心未餍，继续扩大占领区。塔勒奇山和博罗布尔噶苏山（婆罗科努山）以北的大河沿子、晶河（精河）一带，乃至西湖（库尔喀喇乌苏）等地，也被他们派兵占领。上述地区加上伊犁河谷，面积共约七万平方公里。

沙俄侵略军还妄图吞并整个天山北路。一八七二年五月，西西伯利亚军区的俄军三个连队，携带大炮，在哈尔杰耶夫带领下“直入塔境，在三工河湾、额尔米斯河（额敏河）、老河口等处驻扎，”^① 声称“塔城系伊犁兼辖，也是俄国暂管地方。”^② 但是，塔城地区的哈萨克居民奋起击退了这股入侵者。

一八七二年十月，俄军一股伪装商帮，窜到玛纳斯西八十里的石河子地方，图谋偷袭乌鲁木齐。这一阴谋被及时识破。十一月六日，中国地方武装严惩了这伙来犯者，打死打伤五十多人，余众仓惶逃走。^③

① 同治朝《始末》，第86卷，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38—39页。

③ 同上书，第89卷，第23页；《新疆图志》，第116卷，兵事志二，第20页。

沙俄强占伊犁以后，对当地人民实行了赤裸裸的军事殖民统治。这一殖民体制，和沙皇政府在新征服的中亚地区所推行的几乎毫无区别。

在行政上，俄国废除了原伊犁割据政权的统治机器，将阿布尔·奥格兰连同其全部财产（包括六千匹马）送往维尔内。根据彼得堡的命令，伊犁地区划归七河省管辖，由七河省省长兼驻军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直接统治，下设伊犁事务办公室，专司当地行政事务。整个伊犁地区被分为四个管区。其中伊犁河右岸三个，即固尔札、博罗布尔噶苏、绥定，左岸一个，即海努克。^①首脑都由七河省省长指派俄国军官充任。

沙俄占领军还在宁远城东金顶寺强行建立殖民中心，大兴土木，“将大城（惠远）西北三城庐舍隳为平地”，取各城木料“营造市廛几二十里”，^②其中包括兵营、官邸、店铺和教堂，并任命俄国军官担任市长。形形色色的沙俄官员、军人、商人、移民和教士麇集城中，俨然成了殖民者的天堂。

在俄军占领下，伊犁变成了一座军警林立、阴森恐怖的大监狱。仅惠远一城，就驻扎俄军上千人。碉堡、卡哨，遍及城乡。伊犁十几万居民，被置于俄军的刺刀统治之下。

① 一八七四年，将伊犁河右岸的三个管区改为两个，一八七六年，又将整个伊犁河右岸合并为一个管区。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卷，第4页。

为了防备伊犁人民反抗，科尔帕科夫斯基下令将城内两个火药厂全部拆毁，并将分散在人民手中的刀剑戈矛搜缴殆尽，甚至有些农具也被当作武器加以没收。殖民当局还采取各种措施，“监视居民中的不可靠分子”。凡聚众“闹事”者，则“以武力镇压之”。^①沙俄还把精壮回民三、四千人，强行集中在清水河子、绥定、塔勒奇等处，供其驱使，并将家属作为人质押往俄国，以防止他们造反。^②

沙俄殖民者对伊犁地区的掠夺是骇人听闻的。他们除将原伊犁割据政权的一切公产当作“战利品”霸占外，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掠夺手段：

捐税。俄国殖民者“以治属地之法”，对中国居民“按灶科赋”，“违则重罚”。所谓“按灶科赋”，就是按户征税。他们对维吾尔人按户“摊派银两”；^③对索伦、锡伯、蒙、汉等族“勒索银两甚紧”，“刻下万分窘苦”；^④对布鲁特、哈萨克等族也“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⑤根据沙俄官方统计资料，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七年，沙俄在伊犁通过征收户税共勒索了五十

① 潘图索夫：《1871—1877年有关伊犁地区的资料》，1881年喀山出版，第3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6卷，第8页。

③ 《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二，第4页；同治朝《始末》，第89卷，第22页。

④ 同治朝《始末》，第89卷，第22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卷，第29页。

三万六千七百四十五卢布六十戈比。^①殖民当局还向商店、商栈、油房、磨坊等征收营业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六年间，共勒索七万七千二百三十九卢布五十九戈比。^②从一八七四年起，对当地人民又开始勒索为修建俄军兵营等用的“地方金”，一八七四——一八七七年共收“地方金”六万三千三百六十五卢布八十戈比。^③此外，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更是花样翻新，不胜枚举。人民脂膏，被榨取殆尽。左宗棠指出：“俄人挟伊犁为重者，贪每岁横征数十万(两)之利。”^④包罗杰也指出，当时的伊犁地区，是俄国在中亚“财政收入最多的部分之一。”^⑤

徭役。大量征用民伕，是沙俄残酷压榨伊犁居民的又一种形式。殖民当局修筑军用道路、碉堡、军事台站及其它军事设施，都要强征伊犁丁壮无偿服役。还有许多人被强迫自带钱粮到俄国境内服徭役，终年不得回家。其中一些人饥寒交迫，折磨致死。

商业剥削。在被占领的伊犁，俄国人垄断了商业，中国的“官商市肆，均为所占”。^⑥从俄国运来的大量低劣工业品，独占了伊犁地区的市场，本地商业备受排挤，朝

① 潘图索夫：《1871—1877年有关伊犁地区的资料》，第36—37、145页。

② 同上书，第38—39页。

③ 同上书，第37、145页。

④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2卷，第85页。

⑤ 包罗杰：《阿古柏传》，第279页。

⑥ 《新疆图志》，第57卷，交涉志五，第2页。

不保夕。俄国当局利用这一垄断地位，哄抬俄国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当地农牧产品价格，致使居民被迫向俄国高利贷者举债。

鸦片贸易。沙俄殖民当局还在伊犁鼓励种植鸦片。种植地区主要是从绥定沿伊犁河谷上行到喀什河口一带。种植面积在一八七四年已达七千六百五十英亩。这些鸦片，俄国人“禁止输入费尔干纳”，除在当地销售外，主要输往中国内地牟取暴利。据一八八〇年《土尔克斯坦报》记载：仅在一八七四年从伊犁输往中国其他地方的鸦片即值三万三千二百三十五英镑。^①英人兰斯德尔当时目睹，在伊犁“人们公开吸食鸦片”，到处出售烟土烟具。^②沙俄殖民者在中国土地上种烟贩烟，危害之烈，于此可见。

伊犁地区人民不愿做沙俄的殖民地奴隶，同占领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八七一年六月三十日，俄军开进清水河子时，当地一个回族之家的八口男女，不愿受沙俄奴役，焚毁住宅并服毒自尽。

同年七月四日，科尔帕科夫斯基逼令伊犁各族人民“归顺”俄国，遭到严厉拒绝。“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上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③后来俄国占领者假发

① 转引自兰斯德尔：《俄属中亚细亚》，第1卷，第257页注。

② 同上书，第261页。

③ 同治朝《始末》，第84卷，第11页。

慈悲，对居民“散发口粮，劝令归顺”，结果仍是“兵民不从，亦不领粮，唯盼大兵早到，共图收复”。^①

为了对抗沙俄的经济掠夺，当地人民故意漏报户口册籍，拒交税款。潘图索夫承认：伊犁“当地管事人隐瞒了相当多的纳税单位”。^②

反抗沙俄统治的另一种方式是逃离敌占区，投奔祖国。文献记载，在沙俄占领期间，有大量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布鲁特人、蒙古人逃往塔城、布伦托海、裕勒都斯，喀喇沙尔等地。一八七九年一月，“土尔扈特众先后自伊犁归喀喇沙尔者七千余人，”左宗棠下令“发给赈粮，仍令于珠（裕）尔（勒）都斯游牧”。同年四月，又有“哈萨克、布鲁特部众千余人，以俄赋敛重，自伊犁投入喀喇沙尔土尔扈特故地游牧”。^③ 逃脱敌人牢笼的伊犁各族人民，纷纷向清政府控诉俄国殖民者的黑暗统治，要求迅速出兵，驱逐俄寇，光复失地。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斗争意志增强了清政府收复新疆和交涉归还伊犁的决心。

三、俄英争夺南疆的加紧

沙俄侵占伊犁地区不仅使它在新疆北部取得绝对的优势，而且在军事上控制了沟通天山南北的道路，加强了它在南疆同英国角逐的力量。俄、英两国争夺这一地区

① 同治朝《始末》，第89卷，第22页。

② 潘图索夫：《1871—1877年有关伊犁地区的资料》，第9页注。

③ 《左文襄公全集》，年谱，第9卷，第15、18页。

的斗争从此日趋激化。

沙俄侵略者凭借在中亚和伊犁的庞大兵力，力图逼迫阿古柏就范。从一八七一年冬季开始，俄军积极准备进攻喀什噶尔，在维尔内集中了军需物资，并且为此目的修筑了军用公路。一八七二年四月，考夫曼拟就了准备和阿古柏缔结的“条约”约文。五月，他派遣总参谋部大尉、入侵伊犁的俄军先遣队头子考尔巴斯男爵来到英吉沙尔，要求阿古柏签字。六月，阿古柏慑于军事压力，与俄国订立“自由通商条款”五条，^①其中规定：俄国有权在南疆各地自由通商；在各市镇设立货栈，派驻商业代理人（商队头目）；俄国商品运入南疆只纳百分之二·五的进口税，并可过境运往其他地方。通过这一“条约”，沙俄在南疆掠取了大量侵略权益。与此同时，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首领”。

上述“条约”签订后，沙俄同阿古柏的关系一时有所改善。不久，阿古柏派遣他的外甥赛义德·阿古柏·汗（哈古·妥拉）携带阿古柏的亲笔信访问塔什干和彼得堡，受到“象接待王侯那样的待遇”。^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接见他，并邀请他参观了阅兵式。

事情对俄国说来似乎一切顺利。然而，英国人并没有打瞌睡，他们再一次向阿古柏伸出了“友谊之手”。阿古柏对俄国本不信任，“条约”签订不久，他就决定进一步

① 罗林逊：《英俄在东方》，1875年伦敦出版，附录九，第402页。

② 包罗杰：《阿古柏传》，第196页。

加强联英方针,企图依靠英国的保护来避免沙俄的控制。一八七三年阿古柏派赛义德·阿古柏·汗前往印度,和英印总督诺思布鲁克举行密谈。^①随后,他又在诺思布鲁克的怂恿和协助下访问了土耳其,共商联英拒俄大计,并与土耳其苏丹达成协议,阿古柏承认土耳其对“哲德沙尔”有宗主权;土耳其苏丹则封阿古柏为艾米尔。在这一勾结的基础上,土耳其运给阿古柏大量武器,派遣军官赴南疆训练军队,苏丹派札曼伯克作阿古柏的政治顾问;^②阿古柏则在南疆悬挂土耳其国旗,发行铸有苏丹头像和名字的硬币,^③奉土耳其为上国。

一八七三年秋,赛义德·阿古柏·汗一行从土耳其经苏伊士运河再次来到印度。在此,他同英印当局“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讨论,商讨有关把喀什噶尔和我国(英国)之间的一切事情置于友好基础之上的措施。”^④与此同时,以蒯赛斯为首的英印政府使团再一次动身前往南疆,准备进一步加强对阿古柏的控制。这个庞大的使团沿途受到阿古柏伪政权的“热烈欢迎”,他们经赛图拉、桑

① 一八七三年三月十四日诺思布鲁克致阿尔盖尔的密函。转引自弗雷希特林:《1863—1881年英俄在东土尔克斯坦的竞争》,载英国《皇家中亚杂志》,第26卷第3部分,1939年7月出版,第479页。

②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亚细亚事务的往来文书续编:1879年》,1880年中亚细亚第1号,第21页。

③ 包尔汉:《论阿古柏政权》,载《历史研究》杂志,1958年第3期;蒯赛斯:《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1875年加尔各答出版,第11页。

④ 包罗杰:《阿古柏传》,第220页。

株、哈尔哈里克、叶尔羌、英吉沙尔，于同年十二月四日到达喀什噶尔。^①十二月十一日，阿古柏接见弗赛斯一行。弗赛斯向阿古柏递交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亲笔信，并代表英国政府赠送他一批武器。阿古柏受宠若惊，对弗赛斯说：“你们的女王是一个伟大的君主。她的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慈善的政府。我渴望她的友谊，因为这种友谊永远是拥有它的人的利益源泉。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阳光里，象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茁壮成长。我特别希望获得英国人的友谊，这对我是不可缺少的”。^②奴才对主子摇尾乞怜的丑态，溢于言表。

一八七四年二月，阿古柏的代表和弗赛斯签订了“通商条约”。英国除获得沙俄在南疆享有的各种侵略特权外，并取得派遣外交代表常驻阿古柏宫廷、设立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商务代理人和在南疆各地购买、出售或租用土地的权利。^③这个条约虽然是一个商约，但英国订约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英印总督诺思布鲁克直截了当地指出，该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使英国得到了“在必要时进行外交干涉的根据”。^④显然，弗赛斯的这次“旨在抵消考尔巴斯男爵条约的不利后果”^⑤的南疆之行，圆满地完成了使命。

① 弗赛斯：《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第3—9页。

② 同1书，第11页。

③ 罗林逊：《英俄在东方》，附录十，第403—406页。

④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45页。

⑤ 包罗杰：《阿古柏传》，第221页。

在英国控制阿古柏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沙俄则发现阿古柏“并未严格履行”一八七二年同它签订的条约。^①一八七三年沙俄索莫夫商队到达喀什噶尔后，被阿古柏限制在商栈内，不许外出。从这一事件中，足以看出阿古柏对沙俄的冷淡态度。

一八七五年，沙俄又派遣赖因塔尔中校第二次访问喀什噶尔，企图逼迫阿古柏同意俄国在南疆设立领事。阿古柏对赖因塔尔表面上以礼相待，但坚称一八七二年“条约”中只许俄国设立“商队头目”，不同意俄国派驻领事。^②因此，赖因塔尔此行除了“搜集一些关于阿古柏兵力的情报”外，^③一无所获。在此情况下，沙皇政府准备对“桀骜不驯”的阿古柏采取行动。考夫曼任命斯科别列夫上校为统帅，在“哲德沙尔”边境集结了大量军队；粮食及军需品也已运到纳林。^④恰在此时，浩罕爆发反对沙俄殖民者及其走狗呼达雅尔汗的起义，沙俄的入侵计划只得停止执行。

这时的阿古柏正处于权力的顶点。他占领了罗布泊及其以西的整个南疆和北疆的一部分；一八七四年后，英、土源源不断地向他提供军事援助，除直接运来大量军火外，还给他提供成套的修理厂设备，并派人到南疆传授

①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1879年彼得堡出版，第50页。

② 斯凯勒：《土尔克斯坦》，第2卷，第324页；包罗杰：《阿古柏传》，第203—204页。

③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第161页。

④ 包罗杰：《阿古柏传》，第206—208页。

铸炮和制造弹药的技术。^①这一切，使他觉得背有靠山，有恃无恐。

然而，阿古柏伪“哲德沙尔”国最终逃不脱覆灭的命运。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外来侵略势力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对，^②而且因为出兵新疆的正确意见在清政府内部占了优势。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对待阿古柏的问题上有两派主张。一派以李鸿章为代表，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竭力主张放弃新疆，“准其自为部落”。^③另一派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力主出兵平定阿古柏，然后向沙俄交涉收回伊犁。两派经过激烈争论，清政府最后采纳了左宗棠出兵新疆、平定阿古柏的正确主张。

一八七五年五月，左宗棠被授命为钦差大臣，主持新疆军务。他坐镇兰州，制定西征战略，有步骤地改组军队，筹办军费，为大举进军作准备。六月，以索思诺夫斯基为首的俄国“学术贸易考察队”到达兰州，企图刺探中国西部回民举事的情况及清政府的军事部署，估计该地区“未来的政治命运”，以便沙皇政府据以“决定对中国西部和喀什噶尔的行动方式”。^④索思诺夫斯基调查后

①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1956年莫斯科出版，第215页；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第171—176、198页；包尔汉：《论阿古柏政权》，载《历史研究》杂志，1958年第3期。

②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第43—47、178—179、194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第19页。

④ 索思诺夫斯基：《1874—1875年在中国的考察》，第1卷，第1册，1883年莫斯科出版，第6、559页。

得出结论：“由于交战双方力量悬殊过大”，阿古柏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① 他会见了左宗棠，表示愿意从斋桑地区向中国运售军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利用清军消灭英国走狗阿古柏，予英国在南疆的势力以致命打击；另一方面指望以此为契机，重新“建立这个国家（中国）和西西伯利亚的直接贸易联系”，从而获得“对我们（沙俄）有利的政治后果”。^② 左宗棠明知沙俄此举是专谋私利，然而为了使沙俄的利己政策转而为我所用，也同意从俄国购买一部分军粮。于是，双方就此事达成了协议。

一八七六年三月，左宗棠将指挥中心移至肃州，随即开始平定阿古柏的胜利进军。他采取了“先北后南”的方针，于同年夏秋连克古城、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与阿古柏勾结的陕回反动头目白彦虎自乌鲁木齐逃奔南疆，天山北路底定。这时阿古柏军前沿在达坂城，与清军隔岭对峙。时届冬季，大雪封山，左宗棠决定屯兵北路，待来年春融，予阿古柏以致命一击。

沙皇政府严密注意着事态的发展。在清军进兵北疆、荡平天山以北的阿古柏势力之际，沙俄急忙派出以普尔热瓦尔斯基和彼甫佐夫为首的两个“考察队”到新疆南北大肆活动，刺探情报。^③ 一八七六年十一月，沙俄又派遣

① 索思诺夫斯基：《1874—1875年在中国的考察》，第1卷，第1册，第545页。

② 同上书，第554页。

③ 参看本卷第六章第二节。

库罗巴特金使团到南疆和阿古柏谈判，企图从这个半死人身上掠夺赃物。

库罗巴特金后来直言不讳地供认，他这次出使的目的是同阿古柏谈判划分“哲德沙尔”和费尔干省之间的边界，搜集喀什噶尔的各种情报，尤其是商务和军事情报。^① 他的使团自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六日抵达喀什噶尔城后，东行经巴楚、阿克苏、拜城、库车，沿途刺探情况，进行路线测量。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使团到达当时阿古柏的驻地库尔勒。

这时，阿古柏外有清军压境，内有民怨沸腾，又不可能指望英国出兵援助，正急于向沙俄求援。在一月二十三日接见库罗巴特金时以及其他场合，他一再表示他的“唯一希望是保持和土尔克斯坦总督的友谊”，“只有依靠俄国人才能够得到好处”。^② 库罗巴特金看出“阿古柏愈是内外交困，他就愈益倾向于尊重俄国臣民的利益”，^③ 因此，决定在这次谈判中采取高压手段，强迫阿古柏“服从土尔克斯坦总督的意志”，“把具有极重要的军事意义的若干哨所让给我们，而我方则不给任何补偿。”^④ 他信口开河，说什么塔什库尔干“是沿罕边境的前沿哨所”，^⑤ 并在谈判中提出以苏约克山口、乌鲁克恰提、玛里他巴尔一

①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第2页。

② 同上书，第8页。

③ 同上书，第50页。

④ 同上书，第13页。

⑤ 同上书，第9页。

线划界。阿古柏恳求放宽条件，但库罗巴特金坚持侵略立场，不容分说。在沙俄的巨大压力下，阿古柏被迫于二月十一日同意按俄方“规定”的上述“边界线”划界。^①二月十八日，库罗巴特金一行完成使命后，动身回国。

除了同阿古柏“划界”之外，库罗巴特金通过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的南疆之行，还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全面侦察，搜集了南疆的政治、经济、军事、山川地理、风俗民情等方面的详细情报，绘制了从鄂什到库尔勒全长一千三百多俄里的路线图。归途中，库罗巴特金又分出苏纳尔古洛夫一队人从阿克苏经乌什返回伊塞克湖，探测俄军准备入侵的道路。库罗巴特金进一步证实了索思诺夫斯基一年多以前的结论：阿古柏政权必将崩溃。他认为，如俄国趁机出兵，阿古柏军将如“浩罕、布哈拉和希瓦的军队一样，能够轻而易举地被击溃”，^②“如直接攻取英吉沙尔要塞，喀什噶尔城可望不战而降。”^③

但是，库罗巴特金的如意算盘已经来不及实现了。使团离去不久，清军开始向南疆发动进攻。在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和配合下，西征义师纵横驰骋，势如破竹，连克达坂城、七克台、辟展、吐鲁番、托克逊。五月，阿古柏暴死于库尔勒，敌人营垒大乱，内讧纷起，溃不成军。

①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第12页。按：因“哲德沙尔”的迅速覆灭，这项据盗协议未能付诸实施。

②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第208页。

③ 同上书，第252页。

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进行垂死挣扎，再一次派人向俄、英求救。沙皇政府见“哲德沙尔”死期已近，急忙于一八七七年七月命令费尔干省省长阿布拉莫夫出动步骑炮兵近千人，强占乌鲁克恰提以西的伊尔克什坦地区，以便在清军到来之前造成既成事实。^①

英国原来不相信清政府能规复新疆。及至清军进军北疆，连克重镇，英驻华公使威妥玛见大势不妙，连忙于一八七六年秋出面“调停”，请允许阿古柏保南八城自王，名义上“作为清朝属国，祇隶版图，不必朝贡”，并以沙俄蓄谋侵占南疆威吓清政府。总理衙门识破英国诡计，告以此事“应由左宗棠酌办”，严词拒绝。^②一八七七年初，英国又怂恿赴英求援的赛义德·阿古柏·汗与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接触，并再次表示英国愿从中“调停”。清政府依然不为所动。阿古柏丧命后，七月七日，英外交大臣德尔比正式照会郭嵩焘，表示英国愿出面调停，建议以下列条件为基础，求得问题的“体面的最后解决”：一、中国在“哲德沙尔”有宗主权；二、中国与“哲德沙尔”明确划界。^③清政府指示左宗棠“体察情形，斟酌核办。”左宗棠上奏清政府说：“帕夏（指阿古柏）侵占回部十余年，英人荫庇之亦十余年”，“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竟公然向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424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第6卷，第28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0卷，第34页。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17/825，1877年7月7日英国外交部备忘录。转引自徐中约：《伊犁危机》，1965年牛津出版，第42页。

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①随即命令所部继续进攻。从九月中旬起，西征健儿长驱直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十二月，清军克喀什噶尔，伯克胡里及白彦虎率残部数千人逃入俄境。至此，平定阿古柏的义战大获全胜。

在阿古柏盘踞南疆时期，俄、英两国勾心斗角，不择手段，争欲变中国南疆为自己的殖民地。随着左宗棠西征大军的胜利进军，它们的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平定阿古柏以后，新疆大部分土地都已收复，唯有伊犁地区仍在沙俄军队的非法占领之下。于是，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就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

第二节 关于交还伊犁的最初交涉和《里瓦吉亚条约》

沙俄出兵占据伊犁，是暴力兼并中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为了维护领土完整，清政府一贯坚持向俄方交涉归还伊犁的方针。沙俄口头声明“代收代守”，实际上却蓄谋永久霸占，拒不交还，致使交涉长期得不到结果。

一八七一年俄军强占伊犁后，沙俄公使弗兰加里照会清政府称：“七河省巡抚廓（指科尔帕科夫斯基），现在

^① 魏光燾：《勘定新疆记》，第3卷，第9、10页。

派兵前赴伊犁，已于五月十七日克服伊犁城池，请定如何办法。”^①明明是强占中国土地，弗兰加里却美其名曰“克服”，把沙俄的侵略罪责开脱干净。至于“请定如何办法”云云，更是对清政府的愚弄。

其实，沙俄的主意早就定了，办法早就有了。还在递交此信一个月前，伊犁的沙俄占领军当局就遵照沙皇旨意，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不是为了恢复满人的政权，而仅仅是为了确保我们边境的安宁和秩序”；^②也就是说，要继续在伊犁盘踞下去。科尔帕科夫斯基甚至在侵占伊犁的当天就公然宣称，沙俄决定“永远”占领这片中国领土。^③

清政府接到上述俄方来函后，误以为俄国有交还伊犁之意，于一八七一年九月一日令署理伊犁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速赴伊犁同俄方商谈交收事宜。荣全立即带领卫队百余人自乌里雅苏台前往伊犁，并派章京多仁泰先行，以便同俄方联系。同年十一月，多仁泰到达阿拉木图。科尔帕科夫斯基根本不谈归还伊犁问题。“章京再三与言，该俄官似答非答。章京要赴伊犁，该俄官拦阻不允。”他还气势汹汹地质问多仁泰：“我们取了伊犁，你们将军为何带兵前来？”最后，他交给多仁泰一封

① 同治朝《始末》，第82卷，第6页。

②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53页。

③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1913年彼得堡出版，第86、188页；林乐知口译、蔡锡龄笔述：《西国近事汇编》，1878年（光绪四年戊寅），第3卷，第61页。

信,要求荣全来俄境会面。^①

与此同时,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获悉荣全前来商谈交还伊犁问题,即令科尔帕科夫斯基准备进行谈判,并指示他:“一、向(伊犁)将军说明伊犁地区的现状和我们为中国守护该地所做的努力。二、向他声明,在中国军队开到以前,伊犁地区不能交还中国当局。三、向中国代表了解,清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伊犁地区,主要是何时和怎样能够实现这一点。四、不向中国政府要钱抵补军事开支,而力求为自己取得最广泛的自由贸易条件。五、在随后的有关特别指示到来以前,暂不涉及同中国划分对我们更加有利的边界问题。”^②

沙俄侵略者根本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收复新疆,因而故意刁难,以此作为归还伊犁的先决条件。俄军占领伊犁期间到过该地的英国人兰斯德尔写道:“一些俄国官员对我说,他们认为那一天(按:指清军收复新疆)永远不会到来。”^③这就是沙俄侵略者的真实思想。他们不仅企图永久霸占伊犁地区,而且还准备通过谈判从中国攫取更多的通商特权;至于要自己的代表在这次谈判中暂且回避划界问题,那正是为了日后强占和割去更多的中国领土。

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日,荣全一行抵达塔城。考夫

① 同治朝《始末》,第84卷,第39页。

②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2卷,第56页。

③ 兰斯德尔:《俄属中亚细亚》,第1卷,第627页。

曼命令科尔帕科夫斯基致函荣全，声称俄方将会谈地点定为谢尔基奥波里(阿亚古斯)。三月二十七日，荣全赶到该地，久等不见科尔帕科夫斯基的踪影。随后接到俄方通知，声称沙皇已改派博戈斯拉夫斯基(旧译博呼策勒傅斯奇)上校为谈判代表。直到五月十五日，博戈斯拉夫斯基才姗姗来迟，十八日双方开始谈判。会上，博戈斯拉夫斯基追问中国何时可以平定新疆之乱，并进而威胁说：“你们乌鲁木齐、玛纳斯来多少兵？现在兵到何处？这些乱的地方，你们几天取回来？与我立下字据！”^①“中原要是兵力不足，俄国可以帮助。各处地方，中原若不取，俄国能取。”^②他还大肆敲诈，要求将塔城东南的额敏河流域割让俄国，允许俄国人到蒙古地方和新疆各处经商，在乌鲁木齐、哈密、乌里雅苏台、阿克苏、叶儿羌、喀什噶尔等处设立领事馆，赔偿沙俄官商前几年在伊犁、塔城、乌里雅苏台起事中所受的“损失”。荣全要求商谈交收伊犁问题，博戈斯拉夫斯基断然拒绝，声称：“伊犁的事，我一句也不能说，等着我请示我们国君，才能论说。”^③又说：“当中国军队自己还不能够保卫伊犁防止阿古柏侵犯的时候，归还该地是不可能的。”^④沙俄代表的这种态度，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于是荣全只得返回。

① 同治朝《始末》，第86卷，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37—38页。

③ 同上书，第38页。

④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第213页。

荣全赴俄谈判毫无成效，清政府便同沙俄驻华公使直接交涉。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奕訢亲赴俄国公使馆照会弗兰加里，要求他“斟酌情理，切实函复博（呼策勒傅斯奇）大臣，俾荣（全）将军早到伊犁，接收城池。”同时告诉他，“俟交代清楚后，倘有应商各件，如买卖等事，不妨彼此从长商议。”^①这就是说，只要沙俄归还伊犁，其他问题均可通融商办。七月十三日，弗兰加里悍然拒绝中国的要求，致函总理衙门说：“若遽将伊犁交还，倘三、五月或一年内仍行滋事，重烦本国动兵，有何益处？博大臣既面见简派之将军，而所议尽行辞却，惟索即交伊犁，而交还后于管辖安抚之实据，毫无把握。博大臣为之诧异。本大臣亦以博大臣之言为有理”。^②他还穷凶极恶地趁机向清政府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声称：若要交还伊犁，必须“修改”《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划定的中俄西段边界。^③七月十六日，奕訢再次到俄国公使馆要求归还伊犁。弗兰加里不但拒绝讨论，而且扬言要继续扩大占领区，“收复喀什噶尔、玛纳斯等处”。^④随后他又向清政府伪善地声明：“俄国并无久占之意，祇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⑤九月初，博戈斯拉夫斯基突

① 同治朝《始末》，第87卷，第13页。

② 同上书，第17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④ 同上书，第9页。

⑤ 《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二，第4页。

然经恰克图来到北京，与奕訢会见。他说来说去，总是不肯交还伊犁，并说：“荣将军兵力太单，如接收伊犁，恐不能守”。^① 似乎俄国霸占伊犁，拒不交还，倒是为中国着想！

一八七三年初，俄国新公使布策到北京上任。他的态度更加嚣张，竟要求总理衙门通知荣全，“本国伊犁官决不让中国官干预其事”，并企图扩大俄军的占领范围，宣称“塔（塔尔巴哈台）、库（库尔喀喇乌苏）两城大路迤南及极西地方，均归本国以兵力办理。”^② 这种蔑视中国主权的表示，清清楚楚地暴露了沙俄永久霸占伊犁和进而鲸吞全疆的野心。

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初步交涉充分表明，中国一日不消灭阿古柏入侵势力和规复新疆，沙俄就一日不会从伊犁撤走，任何外交谈判都无济于事。因此，出兵消灭阿古柏就成了收复伊犁的关键。

如前所述，从一八七六年春到一八七七年冬，以左宗棠为统帅的西征大军彻底摧毁了阿古柏的罪恶统治，收复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只有伊犁地区仍在沙俄的军事占领之下。于是，解决这个问题再次提上了清政府的日程。

俄军侵占伊犁不久，沙俄公使弗兰加里曾向清政府再三保证，将来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之后，俄

① 同治朝《始末》，第88卷，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93卷，第34—35页。

国立即交还伊犁。一八七五年六月，受沙皇政府派遣来中国的军官索思诺夫斯基又在兰州对左宗棠重申，“伊犁暂驻俄兵，原是防回侵害。只俟中国打开乌鲁木齐、玛纳斯，即便交还。”^①阿古柏匪帮覆灭后，清政府即要求沙俄履行诺言，归还伊犁。但布策多方推诿，坚持“中国须将通商交涉各案先行办结，方可会议交还。”^②清政府反复交涉，毫无结果。后来，按照布策的意见，决定改由左宗棠与俄国中亚殖民当局就地交涉归还伊犁和引渡逃入俄境的叛匪。一八七八年二月，左宗棠和刘锦棠行文考夫曼和科尔帕科夫斯基，要求根据条约规定将叛国投俄的匪徒白彦虎等解回，沙俄在回文中竟硬说这些人是“难民”，不但拒不引渡，反而要求清政府偿付他们逃俄后的生活费用。^③同年六月，伊犁将军金顺派殷华廷等前赴阿拉木图，向俄方再次要求归还伊犁和引渡逃匪，但科尔帕科夫斯基狡辩说：“逃人穷蹙来依，我图(土)尔齐(克)斯坦总督不忍置之死地，非敢故违条约。至交还伊犁一节，事体重大，难以擅专，俟咨商总督高福曼(考夫曼)，再行定议”。^④考夫曼则声称：“有驻京公使在，不敢专也”，“此事应由中国大臣与我驻京使臣议办”。^⑤关于伊犁问题，沙俄就是这样由驻华公使推给七河省省长，由省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47卷，第1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卷，第31页。

③ 《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第308卷，第14页。

④ 《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二，第7页。

⑤ 同上书，第5卷，国界志一，第41、45页。

长推给土尔克斯坦总督，最后又由土尔克斯坦总督推给公使，拒不接受中国的要求。

沙俄侵略者还硬说新疆秩序尚未恢复，所以伊犁不能归还中国。其实，他们清楚地知道，随着阿古柏伪政权的覆灭，清政府已经在除伊犁地区以外的整个新疆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北路迪化(乌鲁木齐)等处，自克复以来，招徕开垦，户口日增。南八城地方富庶，见办开渠、丈量地、铸钱、征厘诸事，具有端绪。”^①沙俄口口声声表示关心新疆秩序的重建，实际上却唯恐天下不乱，疯狂地进行颠覆活动。一八七八——一八七九年，逃匿俄境的白彦虎残部及阿古柏余党，在沙俄的纵容、指使下，少则数百人，多则几千人，先后四次侵扰喀什噶尔地区。清军迅速歼灭了这些匪徒，并从他们身上缴获沙俄当局签发的路票。被俘的匪徒亲口供认，他们是俄官派遣到新疆来发动暴乱的。^②因此，如果说新疆秩序尚未恢复，那也是沙俄一手造成的。

清政府为了交收伊犁问题，三番五次同沙俄公使及土尔克斯坦总督交涉，始终不得要领，于是决定派崇厚直接赴俄京谈判。

崇厚是一个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一八六〇年经奕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3卷，第39页。

② 据《新疆图志》记载，“逆目阿里达什初出犯边，系由俄官处告假潜出，其阿布都勒哈玛与爱克木汗条勒由俄纠众内犯时，俄官姜达即囑以此行务取喀什噶尔城池，否则不准再入俄境，故该贼首在乌鲁克恰提卡外声言奉俄国号令攻取喀、英各城。”见该书第99卷，奏议志九，第4页。

祈推荐，任三口通商大臣。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崇厚奉命赴法国“谢罪”，回国后擢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一八七六年任盛京将军。他长于逢迎外国侵略者，“外国人普遍地喜欢他”，认为他具有“令人愉快的品格”，^①因此博得了洞悉洋务的“声誉”。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清廷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颁发谕旨说：“现在新疆底定，伊犁为俄兵驻守，未据交还，首逆白彦虎等，逃往俄疆，尚未交出，该国修约事宜，亦久未议定。崇厚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特派前往（俄京）驻扎，相机办理”。^②

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崇厚和头等参赞邵友濂等人从上海乘船启程。随行人员共约三十名，其中有两名俄国人，一名是同文馆的教习哈根（夏下），另一名是俄国驻华使馆的译员波日奥（璞志），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使团抵达彼得堡。

沙皇政府对崇厚百般笼络，并特别提高接待规格。一八七九年一月二十日，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召见使团。崇厚“从旅馆被接入一驾六匹马拉的皇家马车，他的随员也被接入一驾四匹马拉的皇家马车，并由宫廷典礼官伴随”。^③ 接见后，沙皇又设盛宴款待。崇厚陶醉在这种“奉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4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3卷，第28页。

③ 英国外交部档案，17/826/40，洛夫特斯致索尔兹伯里电，1879年1月28日发自圣彼得堡。转引自徐中约：《伊犁危机》，第52页。

承性的接待”中，^①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掉入了沙俄精心设计的陷阱。

一八七九年三月，沙皇政府召开关于伊犁问题的特别会议，由陆军大臣米留金主持，到会的有财政大臣格里格、格尔斯、外交部首席顾问热梅尼、布策和总参谋长盖登等人。为了维持沙皇政府的“体面”，会议决定不拒绝履行俄国“多次重申的诺言——交还伊犁。但在得到中国人的积极让步以前，伊犁不能交还”。这些让步包括给俄国更多的贸易特权，赔偿“损失”，“修改”天山以北的俄中边界，等等。^②会议还重申一八七六年四月的一项决定，要求中国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穆索尔山口等地。因此，沙皇政府所谓的“交还伊犁”仅仅是一种敲诈勒索手段。同时，它准备“交还”的并不是整个伊犁，而只是伊犁地区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崇厚同格尔斯就交收伊犁问题开始谈判。俄方提出的要求“大致分通商、分界、补卹俄民为三大端。复将商务界务各分为三条。商务一条（原文如此。——引者）曰中国西边省分准其贸易，曰天山南北各路妥协贸易章程，曰西边省分及蒙古地方设领事官。界务之三条曰伊犁西南界，曰塔尔巴哈台界，均应稍加更改，曰天山迤

^① 英国外交部档案，17/826/628，埃杰顿致索尔兹伯里密电，1879年10月2日发自维也纳。转引自徐中约：《伊犁危机》，第52页。

^② 《米留金日记（1878—1880）》，第3卷，1950年莫斯科出版，第124页。

南两国应将未定边界划清。至补卹俄民银两，应再详议”。^① 谈判进行不久，格尔斯陪同沙皇去克里米亚游憩，谈判代表改由热梅尼、亚洲司副司长麦尔尼科夫和从北京赶回的布策担任。在持续半年多的数十次谈判中，沙俄代表不断使用欺骗和讹诈手段，向崇厚进逼。昏庸的崇厚对俄方步步退让，在开议之初就擅自“允其通商，允还代收代守兵费。”他把虎狼当作朋友，“每遇交涉之事，惟以诚意相孚”，甚至向清政府担保沙俄“无图利之心”。^② 清政府多次训令崇厚，告以事关重大，“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③ 关于割地问题，清政府明确指出：沙俄“将同治三年经明谊议定之界，欲于西境、南境各画去地数百里，并伊犁通南八城之路隔断，致伊犁一隅，三面皆为俄境，弹丸孤注，势难居守，此万不可许之事”；同时强调：“通商一事，办理亦不能漫无限制”。^④ 但崇厚对清政府的指示竟充耳不闻，对沙俄提出的各项要求“不审察利害轻重，贸然许之”。^⑤ 正如邵友濂当时所说：“他们要什么，（崇厚）就答应什么”。“我愈退，彼愈进，不餍其欲不止”。^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5卷，第31—32页。

② 同上书，第16、31、32页。

③ 同上书，第36页。

④ 同上书，第16卷，第3、2页。

⑤ 《新疆图志》，第54卷，交涉志二，第9页。

⑥ 镇江市博物馆：《邵友濂使俄文稿和家书中的沙俄侵华史料》，载《文物》杂志，1976年第10期。

这样，一八七九年十月二日，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吉亚，崇厚未经清政府同意，就擅自同格尔斯、布策签订了《里瓦吉亚条约》（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和《璦琿专条》、《兵费及邮款专条》以及《陆路通商章程》。十一日，崇厚匆匆离俄回国，行前还特别照会沙皇政府，奴颜婢膝地感谢沙皇和俄国外交部的“体谅”、“信任”和“好意”。^①

《里瓦吉亚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割地——条约规定：沙俄将伊犁九城一带交还中国；中国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特克斯河流域及沟通天山南北的穆索尔山口；在喀什噶尔地区，两国边界由苏约克山顶往南经伊尔克什坦卡东面的克则勒苏河（齐吉勒苏河）再往南至玛里他巴尔山；在塔城地区，两国边界由奎崕山顺哈巴、布尔崇二河中间山岭分流之处过喀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内堪迭尔雷克河源。

（二）通商——俄商得在中国蒙古地方和新疆全境免税进行贸易；得在张家口、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地建造铺房行栈；增辟中俄陆路通商新线，西路由嘉峪关经汉中、西安至汉口，北路由科布多经归化（呼和浩特）、张家口、通州至天津；俄国人得在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吉林省扶余县），并可沿途从事贸易（《璦琿专条》）；俄商在中国贩运茶叶减税。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58页。

(三) 赔款——中国赔偿沙俄“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和“补卹”俄民共五百万银卢布(约合二百八十万两白银),换约后一年内偿清。

(四) 设领——俄国除依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外,并得在嘉峪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添设领事。

此外,《里瓦吉亚条约》还规定:“交收伊犁后,俄国人在伊犁地方置有产业者,应准照旧章管业。”已入俄籍之伊犁居民,“将来至中国地方贸易、游历等事,凡有两国条约许与俄民利益之处,亦准一体均沾。”

沙俄逼签《里瓦吉亚条约》的消息传来,举国大哗,连素来主张对外妥协的奕訢也认为此约丧权太多,不能接受。他在一八七九年十月八日和十二月十日两次上奏说:《里瓦吉亚条约》强行规定“噶(霍)尔果斯河西及伊犁山南之帖(特)克斯河均归俄属,并塔城界址亦拟酌改。是照同治三年议定之界,又于西境南境各划去地段不少,似此则伊犁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收还伊犁与不收同,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其余运货、设官、免税、设栈各条,扩充既广,流弊易滋,且亦有碍华商生计,”“若允照办,轆轳甚多。”^①一贯力主收复伊犁全境的左宗棠愤慨地说:“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伊犁西南之地划归俄国,“自此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6卷,第27页;第17卷,第26页。

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度内，固不能一朝居耳，虽得必失。”^①他坚决地指出：“观其交还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属俄，其诡谋岂仅在此数百里土地哉？界务之必不可许者，此也。”谈到通商、设领条款，左宗棠认为，沙俄“欲藉通商，使其深入腹地，纵横自恣，我无以禁制耳”，而乌里雅苏台“等处广设领事，欲因商务蔓延地方，断不可许”。^②伊犁将军金顺也力陈《里瓦吉亚条约》必不可允。司经局洗马张之洞上奏说：“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③他竭力反对批准崇约，认为“不改此议，不可为国”。^④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的要求，得到各个阶层的支持。

在全国舆论的影响下，一八八〇年一月二日，清政府宣布将崇厚交部严加议处，十六日下令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二月十九日，清政府照会俄国，严正声明：崇厚在俄国“所议条约章程、专条各款……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⑤三月三日，崇厚被定为斩监候，待秋后处决。

清朝政府拒绝接受《里瓦吉亚条约》和惩办崇厚——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5卷，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37页。

③ 《张文襄公奏稿》，第2卷，第3页。

④ 同上书，第2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9卷，第3页。

事，对于兴冲冲地期待实现“已得之权利”的沙俄来说，不啻是冷水浇头。这只狂怒的熊开始咆哮起来，竭力要保护它已经到手的猎获物。在清政府决定将崇厚“交部严加议处”的第三天，即一八八〇年一月四日，沙俄代办凯阳德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责问惩处崇厚“是何用意”，并以此事“与两国交涉事件大有关系”进行恫吓。奕訢答称，此事系中国内政，与俄国无涉。凯阳德立即暴跳如雷，说：“既是中国内政，俄国使臣在此无事可办，只可就走”，言毕拂袖而去。一月六日，奕訢亲赴俄国公使馆解释，凯阳德的嚣张气焰有增无已，公然威胁清政府说：“俄国并非无力量，至条约准与不准，在俄国总是一样。”^①崇厚被定斩监候罪后，凯阳德又进而以下旗返国、断绝外交关系相威胁。与此同时，沙俄亚洲司副司长麦尔尼科夫在彼得堡挑拨邵友濂说：“崇宫保如此和平办事，未曾到京，便得处分，从此贵国充当公使者孰不危惧？想大人亦觉为难。”^②布策也威胁邵友濂说：“贵国若将崇宫保治以死罪，则关系邦交大局与各国公使脸面，明言之无益，姑看贵国办理如何！”^③三月初，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出马，给布策授勋，作为对清政府惩治崇厚的对应措施。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8卷，第10、11页。

② 镇江市博物馆：《邵友濂使俄文稿和家书中的沙俄侵华史料》，载《文物》杂志，1976年第10期。

③ 同上。

在实行外交恫吓的同时，沙俄还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一八八〇年三月，考夫曼受命做好向中国开战的一切准备，随即在漫长的中俄边境上加强兵力部署，从塔什干等地将大批正规部队和预备队调往伊犁一带，并把各种战备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到伊犁和与其毗邻的维尔内、卡腊科尔及阿赖岭诸山口。在伊犁地区很快集中了一万二千多名沙俄步兵和五十门火炮，比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七年盘踞伊犁俄军总数多六、七倍。^① 驻扎伊犁的沙俄侵略军在塔勒奇山构筑了堡垒，开辟了通往晶河和石河（即乌鲁木齐方向）的军用道路，以便随时向东推进。为了补充兵力以迅速占领中国收复了的北疆地区，同年四月七日，考夫曼致函西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要求他准备从斋桑湖方面派兵协同作战。沙俄很快就在这一地带的边境线上部署了一支由一万二千八百名步兵和六千二百五十名骑兵、配备有六十二门火炮的进攻部队，^② 这支侵略军的进攻目标是布伦托海和古城（奇台）。同时，沙俄还拟定了经由鄂什和伊尔克什坦进攻喀什噶尔的作战路线，为此在毗邻南疆的费尔干省集结了另外一支部队（由五千人和三十门火炮组成）。^③ 考夫曼为了利用阿古柏的

① 在伊犁地区，一八七六年驻有沙俄正规军一六二七人和哥萨克一〇二人，一八七七年驻有正规军二〇二八人和哥萨克四十二人。（潘图索夫：《1871—1877年间有关伊犁地区的资料》，第108—109、160—161页。）

② 瓦尔坚堡：《俄国在亚洲的进展》，1900年塔什干出版，第90页。

③ 格·恩·格：《伊犁问题史上的一页》，载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亚洲通报》杂志，1911年哈尔滨出版，第7期，第32页。

残余势力作为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帮凶，还亲自接见了阿古柏的儿子伯克胡里，煽动他说：中俄“倘以伊犁之议 两国构兵，为汝复国正在此时。汝先告谕喀什噶尔人民，令其驱逐华人，诸城可传檄而定也。”^① 为了同样的侵略目的，在中俄东段边界，沙俄补充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兵力，特别增援了海参崴一带的俄军，并计划增筑炮台于黑龙江西岸，^② 准备在对华宣战后立即占领珲春、宁古塔和三姓，直指沈阳。^③ 七月十日，沙俄国务会议主席康士坦丁亲王亲自主持了有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头目参加的会议，策划以海军袭击中国的海岸和港口。于是在远东海面上，不久就出现了数十艘沙俄军舰，其中包括：四艘装甲舰，三艘快速巡洋舰，三艘海防舰，六艘炮艇，四艘运输船和相当数量的驱逐舰。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列索夫斯基上将。^④ 沙俄扬言要封锁渤海、黄海，直接威胁北京。

这样，由于沙俄炫耀武力，不断对中国实行战争威胁，致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① 林乐知口译、蔡锡龄笔述：《西国近事汇编》，1880年（光绪六年庚辰），第1卷，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7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516—517页。

④ 克尤涅尔：《远东国家现代史》，第3卷，第1分册，191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第101页。

第三节 中俄《改订条约》的签订

沙俄的战争讹诈把中国逼到了墙角。面对沙俄的巨大军事压力,清政府不得不加强战备,命令左宗棠赴西北统筹战守,同时调直隶兵到东北充实边防。天空一时阴云密布,国际舆论纷传中俄战争不可避免。然而,战争终究没有打起来;当时的形势决定了双方只能重开谈判,议改前约。

沙俄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不择手段地(包括战争手段)迫使清政府批准《里瓦吉亚条约》,是它的本能。但在当时,它的处境是既虚弱又孤立,无力发动一场新的侵华战争。在国外,经过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的俄土战争,俄国迫使土耳其签订《圣斯蒂芬诺条约》,它向巴尔干扩张的政策似乎已大功垂成。但是,由于英、德、奥等国或明或暗的反对和柏林会议的召开,《圣斯蒂芬诺条约》事实上成为废纸,并使沙俄在欧洲舞台上陷于极孤立的地位。它忙于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一时难以向中国挑起衅端。同时,英国的魔影在中国同样威胁到沙俄,沙皇政府深恐一旦发动侵华战争,将再次遭到英国的干涉。在国内,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革命潮流澎湃,政局动荡,谋刺沙皇的事件频频发生。加以俄土战争的巨大消耗,①

① 单是由于进行这一场战争,沙俄就借债约一亿五千万卢布。见戈洛瓦乔夫:《俄国在远东》,1904年彼得堡出版,第193页。

财殚力竭，年荒饷缺，交通困难，运兵不便，发动侵华战争更是力不从心。因此，虽有狂热的扩张主义者库罗巴特金之流从事战争煽动，从米留金、格尔斯、格里格到沙皇本人，始终下不了对中国作战的决心。沙俄统治集团经过反复考虑，日益倾向于重开谈判，借助外交手段来保持已经攫取到手的侵略利益。

当时的西方列强，除德国以外，^①都希望中俄不致因伊犁问题演成武装冲突。

英、俄在中国的长期争夺，决定了英国不希望俄国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清政府拒绝批准《里瓦吉亚条约》，是符合英国利益的。英国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曾一度想支持清政府抗拒沙俄，并作出了同意英国军官在清军中服务的决定。但是，当它进一步考虑中俄战争对英国可能产生的影响时，它终于决定改变方针，防止战争的爆发。原因在于：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对华贸易占中国整个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五。^②战端一开，势必严重影响此项贸易。而且英国公使威妥玛估计，一旦发生战争，俄军必将占领北京，清王朝可能覆灭，这

① 当时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在和法国公使宝海的谈话中毫不掩饰地表示，德国希望趁中俄发生战争的机会，在中国占领一些海军基地，并恬不知耻地说：“混水必能摸鱼”。见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1933年纽约出版，第191页。

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17/857/8。转引自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11页注⑤。

样，对英国在华利益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① 因此，它一面暗中支持清政府修改《里瓦吉亚条约》以箝制沙俄，一面压迫清政府不要“走极端”，并通过对俄让步求得争执的和平解决。当时威妥玛、总税务司赫德及应邀来华的戈登的活动，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法国也不愿中俄之间发生战争，因为：俄国如果发动对华战争，就会把兵力从欧洲调往远东，从而放松对法国宿敌德国的牵制。

正是在上述条件下，中俄两国上空的战云终于散开。重开谈判的主张占了上风。清政府本来就力求避免对俄作战，在西方列强特别是英国的影响下，迅速确定了重开谈判、改订前约的方针。一八八〇年二月十九日，清政府举行王大臣会议，认为：“就刻下情形而论，似以遣使前往较为得体，且在我既属情理兼尽，在彼或可以借此转圜”，并决定派遣“熟悉洋务大臣一员，亲赍国书，前往俄国，将此事窒碍原委，详细剖辩”。^② 同日，清廷颁发上谕，正式任命大理寺少卿、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以期妥协而重邦交，”^③ 同时照会俄方“派员与该大臣和衷商办。”^④ 一八八〇年四月一日，总理衙门详细审议了崇厚所订条约、通商章程、瑗

① 徐中约：《伊犁危机》，第113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9卷，第2页。

③ 《光绪朝东华录》，第1册，总第856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9卷，第3页。

珲专条和兵费及恤款专条，逐条签注应准应驳的理由，并提出《中俄约章总论七条》作为给曾纪泽的训令，强调指出：“曾纪泽此次办法，自以全收伊犁为是。否则，仅议条约，酌予通融，倘能就绪，尚是中策。若俄国不能全交伊犁，且执与崇厚所议约章专条，妄事争辩，或于崇厚所议外，横生枝节，不得就我范围，则惟有随时随事，请旨遵行，宽其时日，缓以图之”。^①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就是希望在对俄酌量让步的基础上改订崇约，挽回一部分主权。

曾纪泽赴俄前多次向清政府陈述了自己对重开中俄谈判的具体意见。他认为，这次赴俄交涉，“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为稍轻。……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②在他看来，“此事纵办得顺遂，大约界务稍有更改，则兵费不能不加。商务系俄人所最重者，必不能全行驳改。若能劝其归于另案办理，即属万幸。然此案若不兼议商务，则兵费又不能不加。纪泽虽尚未赴彼都，然以愚意揣之，断无驳改全约，而不加兵费之理”。^③五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密电指示曾纪泽：“到俄先告以（《里瓦吉亚条约》）难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9卷，第50页。

② 《曾惠敏公奏疏》，第2卷，第6—7页。

③ 《曾惠敏公文集》，第3卷，第18页。

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惟勿先露，旧约通商分界，俟后商办，亦可告知。”^①曾纪泽复电主张在通商上酌予让步，争取归还伊犁全境。^②经过往复讨论，基本上确定了力争收回伊犁、酌允通商、增加偿款的方针。

一八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曾纪泽带领随员前赴俄国，同月三十日抵达彼得堡。还在曾纪泽动身之前，清政府听从英、法等国的意见，于六月二十六日决定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曾纪泽本人对英、法（主要是英国）的意见更加重视，在他的使团中既有英国人马格里，又有法国人日意格，并通过他们同英、法驻俄大使德佛楞和商西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外，美国新任驻俄公使科士达，也是曾纪泽在俄谈判期间的一名顾问。

八月四日，曾纪泽往见沙俄外交副大臣兼亚洲司长格尔斯，商谈递交国书事，格尔斯“面冷词横”，开口就说崇厚所定条约“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议，”^③并责难中国政府惩办崇厚，反诬“中国添兵设防，似欲启衅。”^④清政府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创造谈判条件，即于八月十二日宣布将崇厚“加恩即行开释”。八月二十三日，双方举行了首次正式谈判。在其后半年中，两国代表分别在沙俄外

① 《曾纪泽公奏疏》，第2卷，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1页。

③ 《金鉴等集》，第1卷，第2页。

④ 同上书，第4页。

交部和中国使馆，先后会谈了五十多次。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除曾纪泽外，还有参赞邵友濂、刘麒祥、翻译庆常等，俄方代表有格尔斯、热梅尼、麦尔尼科夫、布策以及翻译孟第等。

在八月二十三日首次会谈中，曾纪泽明确提出了酌改《里瓦吉亚条约》的六条基本意见：（一）交还伊犁全境；（二）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交界仍照旧址；（三）中国允许“嘉峪关通商，尼布楚、科布多开两条道路行走”；（四）领事只添设嘉峪关一处；（五）哈密、古城、巴里坤等处贸易，俄国可择一处留货，照张家口办理；（六）新疆贸易不能处处免税。格尔斯对此很不满意，说：“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①八月二十五日，米留金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不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另派布策到北京直接谈判，借以就近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这次会议还确定以下三点“原则”：（一）中国若同意增加赔款并调整另外地区的国界，俄国可以不坚持保留特克斯河流域；（二）修约须无损于俄国的“尊严”；（三）坚决要求中国人尽快了结一切争端。^②上述决定随即经沙皇批准。八月二十八日，格尔斯向曾纪泽发出照会，强硬要求偿还俄国“代守”伊犁的兵费并给补恤银两，由中国拨地安置愿入俄籍的伊犁居民和改订两国边界，并正式声明俄国即将派布策到

① 《金绍筹笔》，第1卷，第7页；《曾惠敏公文集》，第4卷，第6页。

② 《米留金日记（1878—1880）》，第3卷，第267页。

北京去商办崇约。热梅尼当时在致格尔斯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沙俄此举是为了给“中国政府一个教训，是对它拒绝批准在这里缔结的条约的惩罚。”^①沙俄就这样单方面中断了彼得堡的谈判。不久，格尔斯随沙皇去克里米亚，布策则前往马赛，准备动身来华“谈判”。

清政府获悉布策即将来华后，认为“事机已迫”，“深恐大局不可收拾”，^②立即指示曾纪泽说：在交涉中“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③如能继续在俄谈判，即使作更大的退让，也可应允。^④九月十八日，曾纪泽到沙俄外交部会见热梅尼，要求召回布策，并说，愿俄国“放心，推诚相信，同我商议，虽不能全照前议，但有可让之处，我必酌量相让”。^⑤热梅尼得到曾纪泽的保证后，立即写信给格尔斯说：“这次会谈给我的印象是：侯爵和他的政府确实有和解的愿望”。^⑥米留金也看出了“中国问题有了新的转机。从公开和秘密获得的所有情报看来，清政府真是被我们的作战准备和外交家们的建议吓坏了，非常愿意在彼得堡结束谈判，并赋予曾（纪泽）公使

①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104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2卷，第26、27页。

③ 《曾惠敏公奏疏》，第2卷，第28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2卷，第26页。

⑤ 《金绍箴笔》，第1卷，第9—10页。

⑥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05页。

以最广泛的权力，只求不把谈判移到北京”。^①

沙皇政府见讹诈已经奏效，留在彼得堡谈判同样可以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并可就近“任意操纵谈判，要拖就拖，要快就快，要中断就中断。在这里谈判，还可以避免决裂后布策撤离北京所引起的种种困难”，^② 因此决定召回布策，但限定在彼得堡的谈判期为一个月。

一八八〇年十月二日，中俄彼得堡谈判复会。布策不断指责“中国举动失当”，缠问曾纪泽有无缔约全权，此外并不讨论具体问题，只是静观中方的动向。曾纪泽急于打破僵局，决定从八月二十三日的立场后退一步，提出：在俄国交还特克斯河流域的条件下，清政府可不再坚持收回伊犁全境，“允将伊犁西边之地于修约之时酌让若干归与鄂（俄）国，以便安置迁民”；在塔尔巴哈台与喀什噶尔的边界问题上也松了口，表示“中国俱允派员前往勘定”。此外，曾纪泽还允许：中国同意嘉峪关通商并设领；天山南北贸易暂不纳税；茶税分别酌减；增开科布多、尼布楚两条商路；赦免伊犁居民；偿还“代守”兵费并给补恤银两。^③

但是，曾纪泽的让步并没有使沙俄的胃口得到满足。远在黑海之滨的格尔斯，竟胡说中方的新方案与八月二十三日所开六条没有什么不同。布策也操同一腔调说，

① 《米留金日记（1878—1880）》，第3卷，第273页。

②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05页。

③ 《金貂筹笔》，第1卷，第17—18页。

中国此举并无相让之处。十月四日，热梅尼写信给格尔斯说：“基本问题是交还特克斯河流域和穆索尔山口，这是中国方面特别重视的问题，也是争端的主要原因。在我们这方面，军事当局已经承认这个流域和这个山口并不象去年人们所说的具有那么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我们交还这些地方没有任何损失。”^①

为了利用归还特克斯河流域进行勒索，沙俄军政头目在内部讨论中提出了许多方案。考夫曼原来主张交还整个伊犁地区面向中国勒索一亿卢布的赔款，后又主张割占伊犁地区的北部作为交还特克斯河流域的代价。格尔斯提出在中国东北地区物色一片面积相等的土地作为补偿。沙俄海军部也主张以地易地，要求割占中国乌苏里江流域一块土地。布策主张在乌苏里江一带修改边界，扩展俄国在华商业利益和在崇约规定数目之外再加一笔偿款。他们的具体主张尽管不尽相同，但目的都在于从中国索取最大限度的“补偿”。

从这一狡谋出发，布策在十月上旬的谈判中一再向曾纪泽提出“原约(崇约)难以更动”，必须照旧批准，“如其中有中国请商改者，不妨另立续增之条，并载明中国以何项补偿本国”。^②又说“本国将帖(特)克斯川让与中国，中国须以相抵地方补偿本国”，逼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

①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11页。

② 《全韬筹笔》，第1卷，第29页。

方何处可让？”^①热梅尼也坚持要中国增加赔款、割让相抵之地，否则就不交还特克斯河流域。这些要求超过了崇约，自然为曾纪泽所拒绝。于是，布策再一次演出他的拿手好戏，怒冲冲地对曾纪泽说：“贵爵不能任此事，惟有到北京商办”，^②改由驻华代办凯阳德同总理衙门交涉。热梅尼表示：俟一个月的期限届满，沙皇将命令列索夫斯基到北京会同凯阳德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他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谈判“若再迟延，不如打仗”。^③与此同时，沙俄不断在中俄边境调兵遣将，进行挑衅，加紧武力逼降活动。曾纪泽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按照总署先前的指示，于十月二十日向俄方声明中国愿“将前约全行废弃，伊犁地方暂时仍不索取。”^④热梅尼要求曾纪泽具结，保证中国将伊犁永交俄国管辖。曾纪泽断然予以拒绝。为了使谈判不致彻底破裂，曾纪泽同时表示：伊犁虽云缓索，通商问题仍可从容会商。

曾纪泽上述声明将了沙俄一军，因为这样一来，沙皇政府利用交还伊犁进行敲诈的计划势将落空。基于这种考虑，它决定稍稍减轻对曾纪泽的压力，以便继续通过谈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十一月一日，俄方通知曾纪泽，沙皇同意将谈判时间

① 《金韬筹笔》，第1卷，第31、36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40页。

④ 同上书，第41页。

延长两个月。曾纪泽见俄方态度有所缓和，趁机要求它明确提出自己的方案。十一月八日，热梅尼把俄方自谈判以来首次提出的改约方案交给曾纪泽，内容是：崇约照旧批准；另立专条分列两国商改的条款，其中包括俄国允将特克斯河流域退还中国；塔、喀两处分界照崇约办理；嘉峪关和松花江航行两事应予商办；俄国因伊犁问题所耗兵费中国必须“偿还”。^① 曾纪泽接到备忘录后，一面立即电告北京，一面向接连到沙俄外交部找热梅尼、布策商谈。十一月三十日，遵照总理衙门电示，曾纪泽照复沙俄外交部，除重申先前表明意见外，还具体提到了下列几点：中国准许在嘉峪关一处设置领事官；开放嘉峪关通商；松花江行船贸易问题暂缓商办；偿款二百五十万卢布。^②

十二月三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格尔斯和米留金回到彼得堡。十二月八日，曾纪泽往见格尔斯。格尔斯声称：“我赴黑海三月有余。鄂（俄）国所让者已是无处可让”。^③ 过了三天，格尔斯又对曾纪泽说：“今本国已答应交还帖（特）克斯川，在中国已属十分光彩”，并指责他在谈判中“丝毫不肯相让，全不为鄂（俄）国留地步，殊非和平商议之道”。^④ 这就是说，尽管中方已在设领、通商、偿款等方面作了重大让步，但沙俄仍不满足。

① 《金轺筹笔》，第2卷，第15—18页。

② 同上书，第39—42页。

③ 同上书，第34页。

④ 同上书，第36页。

十二月十二日，格尔斯、热梅尼、布策、米留金和新任财政大臣阿巴扎开会研究伊犁问题，决定向中方最后摊牌，以迫使曾纪泽就范。十四日，布策带翻译孟第来到中国使馆，非常傲慢地通知曾纪泽说：“我今先来晤谈一次，然后格大人再与贵爵面商一切，以后即无话矣”。^①此后半个月，是中俄谈判的决定性阶段。俄方不再坚持批准《里瓦吉亚条约》，但向中方提出一系列恶毒的要求。在界务问题上，沙俄坚持割占中国伊犁西境；它虽答应退还包括穆素尔山口在内的特克斯河流域，却又提出将该流域西南隅三村落划归俄国；^②并以哈萨克人往来越界分管不清为口实，要求修改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早已划定的塔尔巴哈台边界；此外，还要重新勘定喀什噶尔边界。曾纪泽指出，热梅尼、布策原先曾明确答应将整个特克斯河流域归还中国，此事他本人早已报告清政府，因此特克斯河流域西边三村落不能割给俄国。但格尔斯诡称这不过是“请将帖克斯川西边界址稍加改定，非欲多占地方”。布策也强词夺理说，特克斯河流域“虽边界稍有改动，不能不算全还”。在俄方的无理坚持下，曾纪泽最后作了让步，表示：“我想帖克斯川西边分界可照明将军旧界为根。鄂（俄）国有不便处，可稍加酌改”。^③关于改定

① 《金貂筹笔》，第2卷，第39页。

② 这三个村落距穆素尔山口很近，长约一百里，宽约四十多里，面积为一千多平方公里。见《金貂筹笔》，奏折，第3页。

③ 《金貂筹笔》，第3卷，第12页。

塔尔巴哈台边界问题，曾纪泽也放弃了坚持一八六四年条约的立场，对格尔斯说：“假使两国分界大臣亲履其地，奏明本国云：有某处某处必须照崇钦差所定界限勘分乃妥，彼时亦无可说，”^① 屈从了布策所提在一八六四年条约和《里瓦吉亚条约》所规定的边界线之间酌定新界的办法。谈到喀什噶尔，曾纪泽表示：这段边界已由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划定。沙俄代表竟胡说“喀什噶尔地方当初两国并未定界”，^② 硬要按他们所谓的“现在两国所管界址”定界，实际上也就是要按照崇约划界，蓄意割占中国喀什噶尔地区大片土地。双方争执不下，没有结果。格尔斯和热梅尼别有用心地提出此事“暂缓商议”、“日后再说”，^③ 布策又声称中俄两国在这一带可以各自管理。曾纪泽担心如不明确勘定这段边界，将给沙俄日后入侵喀什噶尔以可乘之机，只得接受俄方的划界要求。

商务方面，俄方代表也提出了许多侵略要求，有些甚至超过了崇约。例如，十二月十四日布策借口通州无坚固房屋存货，要求准许俄商自盖或租赁房屋，同时还要求准许俄商在天津——通州间的运河中使用小火轮运货。曾纪泽坚持原约之外不得增添，予以拒绝。俄方提出开辟经西安、汉中到汉口的商路的无理要求，曾纪泽也没有接受，但同意俄国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立领事；准许俄商

① 《金钅招筹笔》，第3卷，第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5页。

在嘉峪关贸易；俄商在新疆南北两路贸易暂免纳税，在蒙古贸易照旧免税；添开科布多、尼布楚商路以及准许俄商在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正如耶拉维奇所指出，“里瓦吉亚条约中广泛的通商特权大部分保持未动。”^①

勒索赔款是沙俄非常关注的又一个重要问题。一八七七——一八七八年俄土战争后，沙俄的财政十分拮据。到一八八一年初，财政赤字达到五千万卢布。^②沙皇政府为了扩大财源，力图从中国勒索巨额赔款。如上所述，早在十月间，俄方即向曾纪泽提出赔款的要求。十一月，俄方再次要求中国赔偿“兵费”。曾纪泽驳称，两国并未开战，何以向中国勒索兵费。热梅尼蛮横地说：“如谓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③曾纪泽解释说，中国只是不同意用兵费的名义出钱。热梅尼见掠夺“偿款”有了希望，便顺水推舟，答称：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名目，“名目可以不拘定，但款项定要出”。^④当天他写信给格尔斯说：“我认为最好是不拘采取何种形式，尽量从他们手里多索取几百万”。对此，格尔斯表示同意，复信说：“关于我们向曾（纪泽）要求的赔款的性质，我和您的想法一样，没有必要与中国人争执，只要能够在问题的实质上达成协议即可。”^⑤十一月十七日，曾纪泽

①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38页。

② 《米留金日记（1878—1880）》，第3卷，第287页。

③ 《曾惠敏公奏疏》，第2卷，第33页。

④ 《金貂筹笔》，第2卷，第21页。

⑤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第134、156页。

正式表示：“若稍加伊犁守费，我可应允；若言兵费，断不能允。”热梅尼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无论兵费不兵费，总算是鄂（俄）国要钱。”^①关于偿款的数目问题，十一月二十四日，热梅尼向曾纪泽表示：“只要中国补偿鄂（俄）国所费款项，作为代守伊犁之费，亦无不可。现因耽搁一年之久，已耗代守伊犁之费四百万卢布。”^②曾纪泽认为数目过大，只同意增加二百五十万卢布。十二月十五日，格尔斯要求中国除原约所定数目外再加五百万，总共偿付一千万卢布。曾纪泽援引热梅尼增加四百万卢布的要求进行驳斥，最后偿款确定为增加四百万卢布。

谈到松花江航行问题，曾纪泽坚持要废除崇厚所定《璦琿专条》。沙俄代表纠缠不已，力主保持原议。曾纪泽根据总理衙门的指示，坚持要废除《璦琿专条》关于俄国行船至伯都讷的规定。布策威胁说：“我可以实告贵爵，承平无事之时，本国兵船绝不入中国松花江，如有兵端，何江不入？！”^③直到十二月十五日，为了从其他方面榨取更多的权益，格尔斯和布策才勉强同意废除专条，但仍坚持俄国有权在松花江行船贸易。

在上述初步协议的基础上，十二月二十三日，布策来中国使馆，手持《里瓦吉亚条约》法文原稿，逐条列举了俄方的修改意见，然后宣称：俄国外交部将把他刚才所说的

① 《金貂筹笔》，第2卷，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30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27页。

整理成备忘录提交中国，这是俄国的最后意见，不能再改动了，并要曾纪泽报告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格尔斯交给曾纪泽两份照会和一份备忘录。第一份照会强硬声明：“此次允改各条，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且将沙俄外交部许商改之事“全行收回”。^①第二份照会提出交收伊犁办法三条。备忘录历叙俄国允改之事，涉及七点：（一）交还伊犁；（二）喀什噶尔界务；（三）塔尔巴哈台界务；（四）嘉峪关通商；（五）松花江行船问题；（六）添设领事；（七）天山南北两路贸易。第二天，曾纪泽到沙俄外交部，对俄方片面规定的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界线”和俄国在吐鲁番添设领事提出异议，格尔斯不容分说，粗暴地打断他的话说：“贵爵将本国之意电报贵国，约可定，则须如此定之；中国再不满意，则鄂（俄）国另有办法，不能与贵爵再举一条二条朝夕辩论矣。本日本部公事甚忙，迟数日布大人即办法文约章，请贵爵细看可也”。^②这样，俄方提出的备忘录就成了改约的基础。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曾纪泽被迫在沙俄拟定的中俄《改订条约》（又称《圣彼得堡条约》）上签字画押，同时还签订了关于赔款交纳办法的《专条》、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和附件《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界卡伦单》。

中俄《改订条约》有法、汉、俄三种文本，全约共二十条，主要内容如下：

① 《曾惠敏公奏疏》，第2卷，第29页。

② 《金韬筹笔》，第3卷，第27页。

（一） 割地

在伊犁地区，条约规定两国边界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口，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札特村附近，该线以西原属中国的“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根据这一条款，沙俄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塔尔巴哈台地区，条约规定“勘改”斋桑湖以东的中俄旧界（即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勘定的边界），“自奎峒山过伊尔特什河（喀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划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

在喀什噶尔地区，条约无视《勘分西北界约记》，规定两国应派员照俄方所谓的“现管之界”勘定边界，安设界牌，从而为割占更多的中国领土埋下伏笔。

（二） 赔款

中国以偿付俄国“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国商民的名义赔款九百万银卢布（约合五百零九万两白银），限两年内偿清。

（三） 通商

条约重申俄国在蒙古地区贸易免税并规定俄商在新疆南北两路贸易“暂不纳税”。往后的历史证明，所谓“暂不纳税”，其实就是长期免税。^①此外，条约还准许俄商前

^① 详见本卷第五章第一节。

往肃州(即嘉峪关)贸易;俄商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可照旧经张家口、通州前赴天津运往别地和内地市场销售;俄国人有权在设领事馆的城市及张家口建造铺房、行栈。与中俄《改订条约》同时签订的中俄《改订陆路通商章程附件: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界卡伦单》中,还规定俄商来华贸易可经蒙古和新疆边境地区三十五处地方出入。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德所说:“俄国通过圣彼得堡条约实际上保持了它在里瓦吉亚获得的全部商业特权。”^①

(四) 片面设领及领事裁判权

俄国除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外,得在肃州、吐鲁番两处增设领事。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俟商务兴旺后陆续添设领事。俄国领事有权与中国地方官“公同查办”两国人民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切事端。

(五) 华民迁居俄国问题

条约规定,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中国政府“不得对他们的迁出和携出动产予以任何阻拦。”还在该约签定以前,沙俄就裹胁成千上万中国居民迁入俄境;上述条款为它进一步大批劫持中国居民提供了条约“根据”。伊犁将军金顺当时正确地指出:俄国伊犁殖民当局“名为保护愿迁入俄籍之人,其实日事逼胁。所迁之民,多非情愿。比以限期日近,俄人在固勒札驱追

^①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79页。

益急。其不愿迁徙者，鞭撻重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①据不完全统计，在《改订条约》签订后的短期内，“迁入”俄境的中国维吾尔、回、哈萨克族居民共达七万名左右。^②由于过半数的居民被迫迁走，清政府接收后的伊犁地区只剩六万七千八百余人。^③原先地富人稠的宁远城一带只剩三千余户，而且“半系老弱贫瘠之民。”^④《伊犁地区军事—统计记述》一书的作者费奥多罗夫中校承认：“一八八二——一八八三年间，几乎全部塔兰奇农民迁入了俄境，”致使伊犁地区的“农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⑤

此外，条约还规定俄国人占领伊犁期间霸占的地产在清政府接收伊犁以后，产权仍归俄国人所有；清政府不得究治在俄军强占伊犁期间资俄通俄分子。

关于松花江行船贸易问题，本约援引并歪曲中俄《璦琿条约》，规定俄国在松花江有航行权和贸易权，具体办法另行商定。

同《里瓦吉亚条约》相比，中俄《改订条约》部分条款对中国的损害减少了一些，主要是交还了特克斯河流域二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但是沙俄政府向清政府增索了四百万银卢布作为代价。不仅如此，这一条约还保留了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第15页。

②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165页。

③ 曾同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50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第15页。

⑤ 费奥多罗夫：《伊犁地区军事—统计记述》，第2卷，1903年塔什干出版，第2页。

崇约的其他许多不平等规定。从根本上说,它和《里瓦吉亚条约》一样,都是沙俄武力逼签的、破坏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不平等条约。正如中俄《改订条约》订立前夕曾纪泽对格尔斯和布策所说:“崇大人所订之约所许贵国好处极多,本爵来此商改,贵国祇允商改几条,其余留与鄂国之好处,中国不免吃亏者尚难枚举。”^① 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说,中俄《改订条约》和《里瓦吉亚条约》“几乎完全一样”。^② 英国学者克劳斯评论中俄《改订条约》时说:“俄国在退出伊犁大部分地方时感到欣慰的是:它知道自己能够在任何时候重新占有它所放弃的土地。为了使这一点更易于做到,它规定这一地区的西部永远属俄国所有。它的利益由于坚持在伊犁拥有田地的俄国人继续保持产权,以及从中国索取到九百万银卢布赔款(这笔钱远比人们估计他们付出的占领费用为多),而获得进一步的保障。在该约的次要条款当中,有几条扩大了俄国领事的权力和俄商的权利。因此,虽然俄国名义上放弃了对一部分中国领土的要求,但不能说它在这项交易中吃了亏。”^③ 苏联前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辞典》中也说:中俄《改订条约》“确认了从前的条约和协定中规定的俄国及其臣民在中国西部和蒙古的一切权利和特权……同时,相当地扩大了俄国贸易和企业家在中国关

① 《金貂筹笔》,第3卷,第29页。

② 拉铁摩尔:《亚洲的枢纽》,第39页。

③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1558—1899)》,第178页。

外地区的活动范围；俄国有权在肃州和吐鲁番城，以及‘视贸易发展情况并与中国政府协商后’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和古城设立领事馆；开放肃州城供俄国免税贸易（至定出关税率为止），这就给了俄国将其政治经济影响扩充到中国西北内地的很好机会。……可见，按照一八八一年彼得堡条约，俄国尽管在解决自己的领土要求方面部分地未能奏效，却从中国得到了一系列的其他让步，这些让步促进了俄国在新疆的优势地位的确立。”^① 以上这些对中俄《改订条约》的不平等性质的论述，是符合事实的。

中俄《改订条约》订立后，沙俄占领军仍继续盘踞伊犁不走，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才撤回俄境。^②

第四节 中俄《改订条约》的五个子约

根据中俄《改订条约》第七、八、九条关于勘界以及安设界牌的规定，沙俄在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间，又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中俄《伊犁界约》是《改订条约》第七条和第九条的派

^① 维辛斯基主编：《外交辞典》，第2卷，1950年莫斯科出版，第379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第15页。

生物。《改订条约》第七条规定：“伊犁西边地方应归俄国管属，……中国伊犁地方与俄国地方交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札特村东边，自此处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所定旧界”。第九条规定：“两国交界地方及从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处，应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一八八二年八月，哈密帮办大臣长顺和俄国七河省省长弗里德少将根据该约，在伊犁西南那林哈勒噶会晤，着手勘定伊犁地区的两国边界。在勘界过程中，弗里德歪曲和违背《改订条约》的有关规定，力图把边界线进一步推向中国一侧。长顺虽曾一再据理力争，但是在俄方的压力下，最后还是被迫屈从了俄方的一些无理要求。

十月二十八日，双方签订了中俄《伊犁界约》，规定自那林哈勒噶山口起至伊犁东北喀尔达坂止，共设界牌三十三处，其走向是：那林哈勒噶山口、特克斯河、苏木拜河、沙尔套山、廓里札特村东的特奇勒干小山、霍尔果斯河、顺阿拉奎山至喀尔达坂。同一八六四年塔城界约第三条相比，沙俄将这一带的国界由奎塔斯山、博罗胡吉尔河、春济卡伦一线向东推进到了霍尔果斯河、廓里札特村东一线。而在伊犁西南自廓里札特村东到那林哈勒噶山口一段，俄方更无视刚刚签订的《改订条约》第七条的明确规定，通过勘界又占去了达喇图河与苏木拜河之间的中国领土。沙俄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视成约为废纸，不

断扩大侵吞中国领土，中俄《伊犁界约》是又一个生动的例子。

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也是由中俄《改订条约》第七条和第九条派生而来的。按照《改订条约》第七条和第九条的规定，自廓里札特村东边往南，两国边界应“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即顺“天山之顶”勘定，安设界牌。一八八二年八月，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扎布会同俄国代表费尔干省副省长梅金斯基（旧译咩登斯开）少将，开始勘分中国喀什噶尔地区和俄国七河省的边界。在勘界过程中，俄方代表背弃成约，不以“天山之顶”，即天山正干为界，却把自那林哈勒噶到别迭里的边界定在天山正干之南的支脉上。十二月七日双方签订了中俄《喀什噶尔界约》。沙俄通过这一界约侵占了位于天山正干南边的扎纳尔特河源地区的中国领土。清政府感到失地太多，曾希望同俄国“详细辩论”，“重加履勘更正，以符定约”。^①然而木已成舟，沙俄岂肯吐出入口之食？

中俄《科塔界约》是关于斋桑湖以东地区的界约。这一带的边界线，不仅一八六四年条约已有明确规定，而且根据一八六九年的《科布多界约》和一八七〇年的《塔尔巴哈台界约》早就设置了界牌。一八八一年，沙俄借口这段边界“有不妥之处”，在《改订条约》第八条中，强迫中国方面接受沙俄的领土要求，规定“由两国特派大臣会同勘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1卷，第9页。

改”，“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即喀喇额尔齐斯河）至萨乌尔岭画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

一八八三年七月，清政府派遣伊犁参赞大臣升泰、科布多帮办大臣额尔庆额，会同沙俄代表、鄂木斯克军区参谋长巴布科夫中将和参谋彼甫佐夫上校，开始“勘改”斋桑湖以东地区的边界。谈判伊始，俄方代表就违反《改订条约》关于在旧界和从奎峒山到萨乌尔岭的直线之间划界的明文规定，蓄谋侵占中国的哈巴河地区，妄图迫使清政府代表同意以上述“直线”为界。升泰等据《改订条约》予以驳斥，坚持在旧界与上述“直线”中间分界。俄方面对成约，无词以对。沙俄侵占哈巴河地区的阴谋未遂，接着又提出以毕里则克河为界。该河在哈巴河西边不远，因此，这个方案仍然是违约多占的方案。升泰等继续据约驳诘，俄方代表顽固坚持侵略立场，争辩十多天，才商定以阿拉克别克河为界。

一八八三年八月十二日，双方签订中俄《科塔界约》，规定了自赛哩乌兰岭（萨乌尔岭）到阿克哈巴河源的边界线。此线以东以南属中国，以西以北属俄国。通过这次勘界，在科布多地区，沙俄割占了阿拉克别克河以西和一八六四年旧界之间的中国领土；在塔城地区，割占了阿拉克别克河口以南经迈哈布奇盖至木斯岛山一线以西和一八六四年旧界以东的中国领土。条约签订后，双方随即安设了界牌，并于一八八三年九月四日和十三日，先后签

订了中俄《科布多新界牌博记》和《塔尔巴哈台北段牌博记》。

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是关于塔城地区哈巴尔苏（哈巴尔素达巴罕）到喀尔达坂（喀拉达坂）的界务条约。关于这段边界线，一八六四年条约第二条早有明确规定，但尚未树立界牌。中俄《改订条约》第九条要求两国派员安设界牌。因此，这段边界只是按约立牌的问题。

一八八三年九月，伊犁参赞大臣升泰和沙俄七河省省长弗里德在塔城开始会谈。弗里德撇开设立界牌问题，要求勘改边界，企图违约多占。升泰等坚持依约安设界牌，驳斥说：这段边界“原有图线条约可循，非若别处尚须斟酌议分可比，因定议后地方旋即变乱，尚未安设牌博，致有今日之举，当时业已从宽割让，何得再于图约外犹有希冀！”^① 弗里德纠缠不已，“冀遂要求之谋”。^② 升泰坚称，“非图约所指，断不敢擅行议分。”^③ 随后，弗里德见违约多占的图谋没有得逞，又节外生枝，借口有俄属哈萨克人在巴尔鲁克山住牧，“一经定界，遽难迁移”，竟然要求将巴尔鲁克山地区“借让给俄”，表示如满足这一条件，“其余悉允照旧约分办”。^④ 升泰等担心如若不从，沙俄可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6卷，第13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14页。

能煽动巴尔鲁克山俄属哈萨克人滋事，被迫让步。

一八八三年十月三日，双方签订了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第一条规定，自哈巴尔苏至喀尔达坂设立牌博二十一处。第四条规定，巴尔鲁克山“仍属大清国地方”，但从换约之日起十年之内，巴尔鲁克山的俄属哈萨克人照旧在该地游牧，中国不得将居民迁往该地，也不得在该地设卡。为了使上述条款更加具体化，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与沙俄驻塔城领事巴勒喀什（巴尔喀申）签订了中俄《会订塔城哈萨克归附条约》，规定北起额敏河，南至玛里山附近，西起国界，东至托里、雅玛图大路以西不到四十里处，从一八八三年十月三日算起借给俄国十年，“由俄国官员承管防守”，中国不得与闻。这样，巴尔鲁克山等地竟成了沙俄占据的国中之国。

巴尔鲁克是准噶尔语，意为“树木丛密”。^① 这个地区位于塔城、库尔喀喇乌苏和鼎河之间，俄国租占该地，犹如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心脏插入一把尖刀。尤其是塔城本身从此处于俄国的三面包围之中，形同孤岛，“失地利，扰行旅，断后路，危远疆，为害甚大”。^② 因此，新疆地方官员迭次奏请索回这一地区。但当借期将满时，俄方又提出再借十年的无理要求，只因清政府据约力争，坚不展

① 徐松：《西域水道记》，第5卷，第10页；许景沔：《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上，第14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90卷，第3—4页。

限，双方才于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二日订立中俄《收回巴尔鲁克山文约》，规定俄国自巴尔鲁克山地区撤出。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是勘分别迭里山口至乌孜别里山口的中俄边界和确定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两国边界走向的条约。一八八三年夏秋，清政府代表沙克都林扎布会同俄方代表梅金斯基，就上述地段边界的勘定和设立界牌问题进行了谈判。一八八四年六月三日，双方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通过这个界约，沙俄强行割占了中国喀什噶尔北部和帕米尔地区的大片土地。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的边界，共分为三段：一、自别迭里山口到苏约克山口，二、自苏约克山口到乌孜别里山口，三、乌孜别里山口以南，分述如下：

一、自别迭里山口到苏约克山口

关于这段边界的走向，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第三条早有明确的规定，并为《改订条约》第七条所重申，即顺“天山之顶”为界。按照这个规定，中俄边界当从别迭里山口循阿特巴什山而行。《新疆图志》指出：“夫既曰天山之顶，必指自天山至葱岭之正干而言，断非天山西南之支阜，”因此，“凡正干以南流入中(国)界之水皆应属之中国”。^①又说：“别叠(迭)里山口迤西，曰阿特巴什山，山南之水皆南流入阿克苏(阿克赛)河，山北之水皆北

^① 《新疆图志》，第55卷，交涉志三，第26页。

流入纳林河，所谓天山之正干也”。^①《中俄界记》称：“阿特巴什山北之水，均入纳林河；山南之水，均入阿克赛河，此天山之正干与葱岭相接者，同治三年明谊所议即以此为界”。^②可是，谈判时俄方代表无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规定，不以天山正干阿特巴什山划界，强指正干西南天山支脉为界，迫使中方接受它单方面规定的边界线，从而将喀什噶尔北面阿克赛河一带的中国领土划入了俄国版图。^③

二、自苏约克山口到乌孜别里山口

从苏约克山口到葱岭，即所谓“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的边界，按《改订条约》第九条的规定，应“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勘定这段边界时，沙俄代表拿出他们单方面绘制的“边界图”，强要中方同意，结果，又把当时明明由中国“现管”的大片领土违约划入了俄国版图。例如，从苏约克山口至玛里他巴尔山一段，俄方将中国现管的一些地区据为己有。虽经中方代表据约“力为指辩”，但梅金斯基拒绝讨论，甚至以中止勘界相要挟，^④清政府

① 《新疆图志》，第5卷，国界志一，第8页。

② 邹代钧：《中俄界记》，下，第4章，第40页。

③ 参看钱恂：《中俄界约勘注》，界约五，第3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7卷，第7页；《新疆图志》，第7卷，国界志三，第41—45页。

代表终于被迫接受俄方要求。又如，从玛里他巴尔山至乌孜别里山口一段，沙俄公然背离一八八一年条约“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的规定，把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全部圈入俄国版图。还须指出，这段边界在一八八三年并未实地履勘。据沙克都林扎布勘界日记，当时双方勘界只到了屯木伦、伊尔克什坦一带。^①喀什噶尔道李宗宾也说，“自伊尔克什他木至乌仔(孜)别里山豁为止一段，彼此扞格，均未亲历详细会勘，一切界址，悉由俄人指定。”^②

三、乌孜别里山口以南一段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条称，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显然，这个规定是违反中俄《改订条约》的“现管”原则的。当时，乌孜别里山口的南面和西南，都属中国现管地区。因此，这样规定边界走向，其本身就是对中国帕米尔地区的侵略行为。所谓中国界线“一直往南”，即从乌孜别里山口朝萨雷库里湖延伸；所谓俄国界线“转向西南”，是从乌孜别里山口转向雅什库里湖西端。这样，除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及大帕米尔的小部分留在“一直往南”一线以东的中国境内外，位于“一直往南”和“转向西南”两线之间原属中国的萨雷兹、阿尔楚尔两帕

① 沙克都林扎布：《南疆勘界日记图说》（光绪九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即一八八三年九月十六日日记）。

② 《新疆图志》，第8卷，国界志四，第13页。

米尔的一部分及大帕米尔的大部分所构成的三角地带竟成了待议地区，为日后沙俄进一步侵占这个地区埋下了祸根。

综上所述，通过中俄《改订条约》及后来的几个勘界议定书，沙俄共割占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加上在此以前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在短短二十多年间共侵占中国西部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 五 章

沙俄扩大对新疆的侵略 和违约霸占中国帕米尔地区

第一节 《改订条约》缔结后沙俄在 新疆侵略势力的膨胀

一八八一年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后，沙俄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侵略。它竭力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对新疆实行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军事压迫，直至违约侵占中国的帕米尔地区。

按《改订条约》第十条规定，俄国得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及吐鲁番设立领事官。其中前三地设领，中俄旧约已有规定。一八五一年，俄国已在伊犁、塔城一度设立领事馆，后因维吾尔等族举事，不久撤回。《改订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援引该约，迫不及待地在新疆伊犁、塔城、喀什噶尔恢复和新设了领事馆。关于在吐鲁番设领问题，俄国发现领事馆设在该地作用不大，要求改为乌鲁木齐。清政府据约力争，但因俄方不断施加压力，最后只得屈服。一八九六年，俄国终于在乌鲁木齐设立了总领事

馆。^①

上述四处俄国领事馆，除领事、副领事、翻译官等等之外，还派驻卫队数十名至百名不等。俄国领事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条款，肆无忌惮地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曾任沙俄驻伊犁、塔城和乌鲁木齐领事的博戈雅夫连斯基供称，“无论在行政方面还是司法方面，俄国臣民均受驻中国的俄国领事管辖。因此，中国当局不能审判和惩治任何一个俄国臣民，……如果他触犯了中国的或俄国的法律，每遇这种情况，关于他的罪责问题，应由俄国领事审理或在必要时由领事和中国当局共同审理，而不是由中国当局单独审理。此外，中国当局如要作出有关俄国臣民的命令，必须取得俄国领事的同意，否则此决定对俄国臣民不发生效力”。^②这种权利往往被滥用至骇人听闻的地步，变成对俄国臣民所犯罪行的公开包庇。例如，一八八三年，俄属中亚人“时出抢劫（中国）驻卡兵”，清政府照会俄官查禁，他们竟“置若罔闻”，对“拿获到案”者，则“索回不办”。^③又如，一八八八年，俄国人殴毙中国官民三人，伊犁将军色楞额向沙俄驻伊犁领事吴司本提出交涉，吴司本“狡推不认”，反诬“中国兵丁欲杀俄人，抢掠俄货”，甚至调马队前来伊犁恫吓。^④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①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116-117页。

② 同上书，第332—333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32卷，第2页。

④ 同上书，第78卷，第20—21页。

俄国领事还在新疆各主要城市设立商董（阿克沙哈勒），有时也称“乡约”。在设有领事的四城，商董直接听命于领事，随时向领事报告商情，“同时执行搜集领事所需要的各种情报的间谍职责”。^①未设领城市的商董，其职责与设领城市的商董基本相似，不同的是他们较设领地的商董享有更大的独立行动权，并有权同清朝地方政府直接交涉。^②不言而喻，通过商董的设立，沙皇政府事实上在新疆各地布满了变相的“小领事”，这是完全违反条约规定的，是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破坏。

在领事和商董的多方庇护下，俄商利用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和在设领各处“准俄民建造铺房、行栈”的特权，“视新疆为无税口岸，奔走偕来，如水赴壑。”^③那些在沙俄征服浩罕前已迁居新疆的浩罕人，沙俄领事也一律指为俄国臣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在沙俄领事的包庇下为非作歹，成了沙俄向新疆渗透的又一支别动队。他们经常凑聚于“贸易圈”中，例如在伊犁，俄商及“安集延人”居然霸占了一个城区。后来，一些俄籍人又擅自在城外领事馆附近租地建房，“形成了一个新的俄国区”。^④在塔城，一八八二年恢复设领以后，俄国“贸易圈”竟扩展到长一俄里，宽半俄里。一八九八年建立的乌鲁木齐俄国

①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367页。

② 同上书，第368页。

③ 《新疆图志》，第55卷，交涉志三，第30页。

④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335页。

“贸易圈”占有一整条街。^①中国行政当局在这些地方“根本不能行使权力”，“它们犹如俄国的一角，那里住的是俄籍人，行的纯粹是俄国法律，适用的是俄国秩序，”^②俨然是国中之国。就连博戈雅夫连斯基也不得不承认，《中俄改订条约》以后，在新疆“所有比较重要的城市，尤其是在有俄国领事的地方，形成了一些相当大的俄籍人的移民区”。^③

上述事实表明，一八八一年中俄签订《改订条约》以后，沙俄采取种种手法，将侵略触角伸到新疆各地，布下了一个以领事馆、“贸易圈”为据点，以领事、商董为指挥，以俄商及“安集延人”为队伍的庞大的侵略网。尤其是为首的俄国领事，恃强逞横，无法无天，简直成了沙皇派驻新疆的总督。试以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后升为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为例，以见一般。

彼得罗夫斯基是沙俄驻喀什噶尔第一任领事，一八八二年十一月抵喀什噶尔就任。他从沙皇政府得到“自由行动的全权”，^④直接对陆军部和外交部负责。在担任领事的二十年中，作为俄国资本的一个忠实走狗，他成功地使俄国商业在南疆居于垄断地位。然而，他的兴趣并不限于此。他公然宣称，他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在新疆“作

①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336—340页。

② 同上书，第334页。

③ 同上书，第316—317页。

④ 科博德：《在亚洲的极深处》，1900年伦敦出版，第253—254页。

为统治力量继续存在下去”，他已和驻玛尔格兰的俄军司令商定，随时准备派兵“占领和征服这个庞大的中国省份。”^①

为了实现吞并新疆的野心，彼得罗夫斯基进行了大量间谍活动。这类活动分两个方面：一、搜集南疆和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二、搜集英国在上述地区活动的情报，以遏制英国势力的发展。他买通了喀什噶尔道的一个幕僚，得以及时获知英国特务荣赫鹏同喀什噶尔道秘密谈判的细节。他还企图重金收买英印政府的信使，以窃取英印政府和英国驻喀什噶尔代表马继业的信件。^②他的活动经常使他的对手马继业惴惴不安，无计可施。

彼得罗夫斯基凭借俄国在南疆的优势，气焰薰天，不可一世，对清朝地方当局颐指气使。他公然声称：喀什噶尔道本人完全处于他的“掌握之中”，“百依百顺”。科博德在描述沙俄在南疆的势力时写道：“彼得罗夫斯基先生要求道台作某些让步，这位道台可能马上就表示同意，因为他知道对方是谁，不愿自讨没趣；……万一该官员本人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只须给北京发个电报，俄国公使立即会给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要它马上指示道台全部照彼得罗夫斯基所要求的一切去办。”^③ 埃塞

① 科博德：《在亚洲的极深处》，第 69、307 页。

② 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973 年伦敦出版，第 46 页。

③ 科博德：《在亚洲的极深处》，第 255 页。

尔顿写道：彼得罗夫斯基“专横跋扈”，“成了喀什噶尔的实际统治者”。^① 斯克林、奈丁格尔也说，当时，“人们在各个市场和中亚商路沿线都纷纷谈论，喀什噶尔最重要的人物不是道台，而是……俄国领事彼得罗夫斯基。”^②

彼得罗夫斯基的所作所为，反映了八十和九十年代沙俄在新疆政治势力的恶性膨胀。

沙俄在经济上对新疆的侵略、控制和掠夺，较之政治上的侵略，毫无逊色。一八八一年的中俄《改订条约》，使新疆门户洞开，给俄国资本在新疆扩大商品市场和掠夺原料开了绿灯。沙皇政府决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条约，加紧发展中国西部地区的中俄贸易，并为此赶修中亚铁路，以缩短商品运输时间，降低运输费用，增强竞争能力。从前，莫斯科的工业品运到新疆要经过秋明到塞米巴拉金斯克，然后用大车或驼马运往新疆，运费高昂；一八八八年中亚铁路修抵撒马尔罕后，输往喀什噶尔的莫斯科工业品运费大大降低。此外，沙皇政府还实行出口补贴制度，对输往中国西部的棉织品，以补偿棉花进口税的形式给以补贴；对火柴、食糖等商品，则以补偿消费税的形式给予补贴。^③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以及俄商享有的免税贸易的特权，俄国对新疆的贸易飞快增长：一八五〇年，新疆中俄贸易总值为七十四万二千卢布，

① 埃塞尔顿：《在亚洲的心脏》，1925年伦敦出版，第111页。

② 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23页。

③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38页。

一八九三年跃增为五百八十二万八千六百卢布，^① 约为一八五〇年的八倍。

更值得指出的是新疆中俄贸易中商品结构的根本变化。一八八一年条约以后，俄国工业品，尤其是棉织品、金属及金属制品对新疆的输出成倍增长。其中，棉织品的输出占居首位。^② 一八五三年，俄国运入新疆的棉织品总值为二十八万八千六百卢布，一八九三年为二百零三万七千四百七十六卢布，增加了六倍，约占俄国对该省出口总值二百零三万六千卢布的三分之二，^③ 占俄国棉布输出总值的百分之七。^④ 从前，来新疆贸易的俄商主要贩卖从尼什哥罗德等地的集市购买的俄国土特产品；到二十世纪初，大量商品已改从莫斯科等工业中心直接购买，^⑤ 其中主要是工业品。与此同时，新疆对俄国的出口“主要是牲畜及畜产品”，^⑥ 其中包括羊毛、各式畜毛、生皮、肉类、脂肪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商开始从新疆输入棉花。博戈雅夫连斯基直言不讳地供称：“从中国西部（向俄国）出口棉花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首先，这增强了当地居民的购买力，……从而可以增加我国商品的

①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1957年莫斯科出版，第121页。

②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48、251页。

③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121—123页。

④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第279页。

⑤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42页。

⑥ 同上书，第257页。

销路；其次，棉花是我们所亟需的。我国工厂用棉，部分是中亚供给的，更多的是美国的。……这种情况使我们处于依赖美国的地位，一旦它完全停止售给我们，或大幅度地提价，那就难以得到棉花了。因此，我们除了发展中亚的棉花生产外，应尽力关心从中国土尔克斯坦增加棉花输入，这将使我们减少对美国人的依赖，这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① 这位俄国领事的现身说法，表明了沙皇政府把新疆变成俄国的经济领土的企图。同时，通过上面揭示的数字不难看出，这一企图正以飞快的速度成功地实现着。

沙俄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给中国商民带来了灾难。早在中俄《改订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新疆督办刘锦棠就奏明清政府，由于俄商享有特权，形成了“华商完厘次数多而成本重”，俄商免税而“成本轻”，妨碍华商生计的现象，而且俄商往往将在中国购买的上货“复运进口”，重利盘剥。他建议今后将俄商购买的土货加盖“回国”二字的戳记，不许在中国境内行销；已出卡的中国土货，“亦不得由陆路复运进卡”，任其行销。^② 一八八三年，刘锦棠鉴于“安集延商人”在新疆到处活动，漫无限制，又建议总理衙门照会俄国公使转饬驻新疆领事，“此后安集延商人货物南路准在喀什噶尔一处销售，北路准在伊犁一处销售，毋须发给路票分赴各城，以保商务而消隐患。”^③ 对于这些

①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257--258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27卷，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32卷，第4页。

维护主权的主张，清政府没有采纳。

一八八七年，新疆地方当局为挽回不利局面，增设乌鲁木齐及新疆南北两路税局，并奏请总理衙门根据中俄《改订条约》第十二条“俟将来商务兴旺，由两国议定税则，即将免税之例废弃”的规定，照会俄国公使：因俄商来华日多，要求按约议定税则。但沙俄岂肯放弃既得利益，“饰词延宕”，终无结果。博戈雅夫连斯基在二十世纪初写道：“中国行政当局屡次企图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限制俄国臣民免税贸易的权利，……但是我国驻中国西部地区的领事们和驻北京的公使提出了坚决抗议，立即制止了这个企图。因此，目前我国商人在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几乎毫无限制地进行着免税贸易。”^①

沙俄的贸易特权造成了俄国商品在新疆的垄断地位。斯拉德科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一八九三年俄国对新疆的出口，已“占俄国对华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四点三。俄国货逐渐排挤了其他外国货，形成独占之势。”^②“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新疆几乎只同俄国一国贸易。新疆对俄国的输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原料，我国对新疆的输出则几乎全是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因此，就贸易的性质而论，新疆已变成沙皇俄国的工业原料供应者和工业品的消费者。”^③

① 博戈雅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第333页。

②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第279页。

③ 同上书，第123页。

第二节 沙俄窥伺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开始

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西部地区的总计划中，吞并帕米尔高原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和该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及俄、英两国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分不开的。

俄、英在中亚的角逐，为时已久。英国作为一个海上殖民强国，在其舰队所及的地方虽然常居优势，但是在中亚却敌不过沙俄的侵略势头。尤其在一八五七年印度起义爆发后，英国元气大伤，多年不能在中亚有所动作。相反，沙俄却趁着这一有利时机，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中亚迅速推进，日益逼近英属印度北部边界，“造成将来入侵的严重威胁”。^① 英帝国素来是靠它的强大海军“保卫”印度的，自恃为金城汤池，万无一失；现在发现有人企图从背后破门而入，不禁为它的这块最大的殖民地的“安全”感到担心。一八六八年，英帝国谋士亨利·罗林逊发表一份备忘录，指出俄国自里海经希瓦、阿姆河、帕米尔“进军印度”的危险，^② 引起了广泛注意。以此为滥觞，英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50页，注一。

② 罗林逊：《英俄在东方》，第5章，《关于中亚问题的备忘录》，第271—300页。

国政界纷纷谈论“保卫印度”的必要，英、俄争夺帕米尔的活动随之开始。

帕米尔位于中国南疆的西部，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在此汇聚，形成一个举世无双的高原山区。境内层峦迭嶂，势极奇险，素称“世界屋脊”。从这里有两条道路可通印度：一条经阿克苏河谷、阿克塔什、明铁盖山口、喀喇昆仑山口、西藏西北部、克什米尔和坎巨提（乾竺特）；一条经兴都库什山的山口。俄国占领了帕米尔，势将直捣英属印度的下腹部。英国为了避免这一危险，并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力求北进，这就是俄英在西藏、南疆包括帕米尔在内的地区进行争夺的根本原因。一八七六年沙俄吞并浩罕，势力达到帕米尔的北沿。自此，俄、英争夺帕米尔的斗争日益突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俄、英两国开始了“考察”帕米尔的竞赛，随后俄国提出它的“属国”布哈拉对帕米尔西部享有“权利”，并要求“继承”浩罕在帕米尔东部的“遗产”；英国则推出一个阿富汗替它打头阵，你推我攘，剑拔弩张，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在平定阿古柏以后，着手加强帕米尔地区的防务。于是，在这个高寒荒僻的地区，结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的纽结，出现了所谓“帕米尔问题”。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完全是俄、英两国争夺势力范围的产物。沙皇俄国在这一争夺中采取攻势，分得的赃物最多。

沙俄首次窥伺中国帕米尔地区是在一八七一年。这年，以费得钦科为首的一伙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偷越阿赖岭潜入阿赖谷地侦察，竟以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的名字擅自将外阿赖岭的最高峰命名为“考夫曼峰”。^①

沙俄的野心受到英国的密切注视。经过一个时期的争夺和勾结，两国达成了一项在帕米尔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一八七二年十月十七日，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提出英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巴达克山及附属于它的瓦罕地区，自萨雷库里湖（伍德湖^②）至科克察河、奥克苏斯河汇流处，是这个阿富汗省份的北部边界，整个属于阿富汗艾米尔”。一八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正式接受格兰维尔的意见。这就是所谓“格兰维尔-哥尔查科夫协议”。^③这个协议完全背着中国，悍然将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萨雷库里湖及其以西一线指为俄英势力范围的界限，是不折不扣的分赃协议。

一八七六年，沙俄镇压了浩罕人民反抗沙俄及其走狗浩罕汗的起义后，宣布废除浩罕汗国。同年组成以征

① 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1956年莫斯科出版，第87—90页。

② 英国人伍德一八二八年“游历”中到过帕米尔，自称是萨雷库里湖的“发现者”，英国人遂名此湖为“伍德湖”，后又以英国女王的名字改称“维多利亚湖”。

③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亚细亚的往来文书》，1873年，第一件，第五件。

服中亚的刽子手斯科别列夫为首的“阿赖远征军”，悍然越过阿赖岭侵入阿赖谷地，在那里插上俄国国旗。随后，斯科别列夫命令部下维特根斯坦公爵、科斯坚科等率小分队偷越外阿赖岭，闯入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大喀喇库里湖、乌孜别里山口，窥探号称“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山。其中一股甚至向南窜到阿克拜塔尔山口一带。这是沙俄入侵中国帕米尔地区的第一个重大行动。

一八七七年，沙俄派出以斯维尔佐夫为首的“帕米尔考察队”对外阿赖岭及其以南的大喀喇库里湖一带进行侦察。第二年，这一伙人又向南经阿克拜塔尔山口抵郎库里，窥探慕士塔格山和贡格尔山，然后转向西南，侦察萨雷兹帕米尔和阿尔楚尔帕米尔，直抵雅什库里湖。^①

一八七八年，以穆什基托夫为首的另一支沙俄“考察队”越阿赖岭进入穆克苏河谷；再越外阿赖岭，到大喀喇库里湖进行了侦察。^②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沙俄在帕米尔的侵略活动进一步加紧。沙俄军官、“科学考察家”科斯坚科在一八八〇年出版的《土尔克斯坦》一书中叫嚣：“位于费尔干纳省极南部与（达科特）山口之间的广大地区”，即包括中国帕米尔地区在内的帕米尔全境，“迟早将纳入俄国的版图，从而该领土势必同印度河的分水岭（兴都库什山）直接毗

① 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129页。

连。”^①为了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一八八三年，沙皇政府派出由总参谋部大尉普佳塔率领，有“地形学家”宾杰尔斯基、“地质学家”伊凡诺夫参加的大型“考察队”，侵入帕米尔各地进行全面侦察。这支“考察队”于同年五月从塔什干出发，经鄂什越阿赖岭窜到和什库珠克帕米尔大喀喇库里湖，然后分赴郎库里、塔克敦巴什帕米尔、^②小帕米尔、大帕米尔、瓦罕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雅什库里湖和什克南的贡特河流域等地。行经郎库里时，普佳塔的马队曾“被中国军队扣留”。^③但是这个“考察队”不顾中国的阻拦，仍然继续前进，并以“考察队”成员宾杰尔斯基的名字将大、小帕米尔之间的一个山口擅自命名为“宾杰尔斯基山口”。普佳塔和他以前的历次“考察队”在帕米尔的活动，为沙俄逼签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④对中国帕米尔地区提出领土要求搜集了大量情报资料。

① 参看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220页；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12页。

② 窜扰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的一股俄国人，先后到达至今仍在新疆境内的布伦库里湖、小喀喇库里湖、塔合曼、塔什库尔干等地。

③ 伊凡诺夫：《帕米尔旅行记》，第2—3页；《1883年普佳塔上尉考察纪要》，载《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第10卷，1884年彼得堡出版，第8、51页。

④ 参看本卷第四章第三节。

第三节 沙俄武力侵占萨雷阔勒岭 以西中国帕米尔地区

一、八十年代后半期、九十年代初帕米尔的形势

一八八四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然而，沙俄连这个对中国不平等的规定也并不想遵守。几十年来它每次强加给中国一个不平等条约，都不过是为破坏这个条约、以更加不平等的条款套在中国头上作准备。一八八四年以后沙俄在帕米尔地区的所作所为，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俄、英争夺帕米尔及其邻近地区的斗争不仅未见减弱，反而愈演愈烈。这也是促使沙俄扩大对中国帕米尔地区侵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八八四年二月俄国占领麦尔夫绿洲后，与阿富汗军队在库什卡河发生冲突，几乎导致俄、英之间的战争。在帕米尔西部，又因罗善、什克南（舒格南）等地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沙皇俄国并不满足于一八七三年俄、英瓜分帕米尔的协议，继续宣称俄国的边界在兴都库什山，并企图占领中国的帕米尔地区，经坎巨提威胁印度。对此，英国采取了针锋相对的行动，于一八八六年派出以洛卡特上校为首的军事地形“考察队”穿越坎巨提，遍查了兴都库什山通向

帕米尔的各山隘，并深入到瓦罕、喷赤河一带活动。同年，英国“探险家”荣赫鹏窜到南疆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侦查。第二年，英印当局又派遣杜兰德上校巡查兴都库什山各山口。与此同时，沙俄“考察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兄弟也到叶尔羌河上游一带刺探情况。同年，沙俄特务军官格罗姆切夫斯基（康穆才甫）被派往帕米尔、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后藏和坎巨提等地从事不可告人的勾当。一八八八年，此人再次奉命侦察帕米尔，然后潜入坎巨提，以提供军事“援助”为诱饵，极力劝说坎巨提统治者萨弗达尔-阿里汗“归顺俄国”。次年，他又带领武装卫队，经喀尔提锦、达尔瓦斯窜到什克南边境，然后侵入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小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叶尔羌河上源、和田、西藏及坎巨提等处活动。一八九〇年，格罗姆切夫斯基再一次到达叶尔羌，企图经普鲁越喀喇昆仑山到达西藏西北部。英国政府密切注视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动向，于一八八八年派荣赫鹏进行跟踪。第二年，荣赫鹏“考察”了巴罗基尔山口以东各山口和叶尔羌河上游一带，并潜入坎巨提，重金贿赂萨弗达尔-阿里汗，诱迫他同英印政府签订臣属条约。一八九〇年，荣赫鹏受命前往叶尔羌与清政府地方官员会谈阻止沙俄侵占帕米尔问题。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侦悉后，立即将此事报告沙俄外交部。在此情况下，沙皇政府决定抢先动手，大举入侵中国的帕米尔地区。

清朝新疆地方当局见帕米尔形势危急，为防止沙俄

入侵，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一八八八年，向六尔阿乌增派了驻防军。一八八九年，护理新疆巡抚魏光燾命令张鸿畴“巡查内外卡伦”。^①张鸿畴遵命巡查了大帕米尔和阿尔楚尔帕米尔，向西直抵雅什库里湖，在湖的北面建苏满卡。魏光燾还下令在阿克苏河支流伊斯提克河畔建伊斯里克（伊斯提克）卡。与此同时，又授权张鸿畴在萨雷阔勒岭以东的布伦库里、布伦口、塔什库尔干等重要据点设立卡房，选派当地居民守卫萨雷阔勒岭各重要关隘，以加强第二线防务。为了保证军事运输和物资供应，张鸿畴还动员当地居民整修了从布伦口到六尔阿乌的驿站。以上种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疆人民和地方政府反抗沙俄侵略的积极性，但从有效地抵抗沙俄侵略来说，这些措施是远远不够的。

二、武力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 的中国帕米尔地区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沙皇政府认为吞并帕米尔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沙俄已经完成了对哈萨克、中亚三汗国和土库曼的征服，巩固了它在中亚的统治，为侵占帕米尔准备了基地。至于英国，沙皇政府认为，虽然一些年来它在帕米尔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并唆使阿富汗军队侵抵阿尔楚尔帕米尔一带，但是它的主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7卷，第3页。

要力量是在海上，无法在帕米尔与俄国争锋。在上述条件下，沙皇政府决定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地区攫为己有。

一八九一年春，经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外交大臣格尔斯密谋策划，沙皇政府宣布上尔克斯坦总督符列夫斯基“巡视”阿赖前线，借以表明俄国决心“保卫游牧于帕米尔的俄国臣民吉尔吉斯人的利益”。^①六月十八日，沙俄驻喀什噶尔领事彼得罗夫斯基将此事通知喀什噶尔道向邦倬。向邦倬复照说，帕米尔是中国领土，“贵国总督只能到交界之地”。彼得罗夫斯基口头“保证”只“巡阅”已被俄国侵占的和什库珠克帕米尔，不到中国现在管辖下的帕米尔。向邦倬再次发出照会要求作出书面保证。彼得罗夫斯基“竟不收受，并不认面谈之语。”^②俄方这样出尔反尔，说明所谓“巡边”是假，实则别有诡谋。

同年七月下旬，沙俄总参谋部上校、上尔克斯坦第二边防营营长约诺夫率领马、步、炮兵百余人，以“猎取勃罗羊”为名闯入帕米尔地区。参加这支侵略军的还有总参谋部大尉斯克爾斯基、“军事地形学家”宾杰尔斯基等。随后，符列夫斯基本人也率领卫队前往阿赖。

沙俄侵略军入帕后，先后窜犯阿克拜塔尔山口、郎库

① 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第391页。

② 《新疆图志》，第8卷，国界志四，第2—3页。

里、阿克塔什、阿尔楚尔帕米尔、伊斯里克、阿克素睦尔瓦、巴什拱伯孜等处。他们沿途垒石为记，上面刻下俄军经过的日期。^①侵入阿克塔什一带的俄军，公然在毕依比达坂竖立木杆、张贴布告，宣布中国当地居民从此已是“俄国百姓”，^②甚至将清政府派驻帕米尔的一些地方官“撤职”，换上一些俄国的走狗。^③约诺夫还带两名军官和几十名哥萨克向南窜到兴都库什山，侦察了倭海及蕊（瓦赫基尔）、科拉布胡尔特等山口，然后越兴都库什山进入阿富汗的雅新河流域，归途中穿过达科特冰川，经巴罗基尔山口重入瓦罕，抵布才拱伯孜。

与此同时，英国间谍荣赫鹏和戴维森也潜入帕米尔侦察俄国人的活动。戴维森尾随俄军一段距离后到达阿尔楚尔帕米尔；荣赫鹏则率领十八名廓尔喀卫队经大喀喇库里湖跟踪约诺夫直到布才拱伯孜。约诺夫自雅新河返回后，在布才拱伯孜与荣赫鹏相遇。他板起面孔对荣赫鹏说，俄国已经“合并”了帕米尔，^④并出示一张俄国在帕米尔的“管辖”范围的地图。他还宣布，奉沙皇政府的命令，由于荣赫鹏没有沙皇政府签发的入帕通行证，决定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4页。

② 《新疆图志》，第8卷，国界志四，第3页；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1962年杜尚别出版，第1编，第282—283页。

③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编，第283页。

④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225页。

将他“驱逐出境”，并逼使荣赫鹏保证今后不再来帕米尔，限令他马上经由倭海及蕊山口到塔什库尔干去。^①

约诺夫驱逐荣赫鹏后，又窜到阿尔楚尔帕米尔。在苏满塔什，俄军悍然劫去乾隆年间中国政府竖立的纪功碑，抢走中国巡逻队的旗帜，命令张鸿畴把边防军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撤走。^②他还强制集合阿尔楚尔帕米尔的布鲁特居民，向他们宣布沙皇已经兼并了从萨雷阔勒到喷赤河的整个帕米尔地区，从此他们已归俄国管理。约诺夫还在这里逮捕了戴维森，没收他的全部情报资料，然后驱逐到喀什噶尔。^③

约诺夫一伙在中国横冲直撞数十天后，于同年九月中旬返回玛尔格兰。这次入侵，进一步探明了中国帕米尔地区政治、军事、山川地理等情况，“对(沙俄)有关帕米尔的现有资料作了相当大的补充”，^④为一八九二年武力吞并中国的帕米尔地区作了准备。此前不久，符列夫斯基也于九月初从阿赖回到玛尔格兰。

沙俄对帕米尔的侵略引起清政府的强烈抗议。一八九一年九月，新疆巡抚魏光燾照会土尔克斯坦总督，责其“称兵越界”；同时责成喀什噶尔道向俄国领事“执理辩

① 捷连甫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0—401页。

② 同上书，第402页；斯克林、余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34—35页；寇松：《帕米尔和奥克苏斯河源》，1898年伦敦出版，第35页。

③ 斯克林、余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35页。

④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编，第282页。

论，促令照复”，并派人“前往查看”。^①同月，总理衙门指示驻俄公使许景澄就“俄兵无故越境侵占”一事向沙俄交涉，要求“速将越界兵队撤回”。十月，许又往晤沙俄外交副大臣基斯敬（希什金），要求立即撤出越境军队，拔除在毕依比达坂张贴布告的木杆，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基斯敬诡称俄军仅仅是“游猎”帕米尔，且已返回塔什干，并辩解道，俄军越界是由于“该处地方分界不甚清楚”。他还假惺惺地说：“俄国地方如此广大，并不愿再得他国之地。……俄国但愿自保疆土，与中国和好，决无他意。”^②在这里，基斯敬把扩张成性的沙俄说成是“不愿再得他国之地”，把强占中国领土说成是“自保疆土”，把赤裸裸的暴力说成是“与中国和好”，这是十足的伪善，无耻的狡辩。在此前后，土尔克斯坦总督向沙俄总参谋部提出一份报告，力主取消一八八四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第三款，沿萨雷阔勒“自然边界”“和中国重新划界”。后者完全同意这个报告的主张，并向俄国陆军部呈送一份报告，列举了俄国“需要帕米尔”的种种理由，要求沿兴都库什山划界。^③这就表明，基斯敬娓娓动听的言词和“保证”，不过是为了麻痹清政府、掩盖沙俄准备大举入侵的烟幕。

① 光绪十七年八月十二日（1891年9月1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陕甘总督杨昌濬的电报。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6卷，函牍二，第20—21页。

③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5页。

中国新疆地方当局没有相信俄国“决无他意”的保证，在俄军返回费尔干纳后，立即派遣边防军开赴郎库里、六尔阿乌（木尔加布）及阿尔楚尔帕米尔等地。^①十月二十三日，张鸿畴带马勇三十骑由喀什噶尔赴苏满。魏光燾还派遣海英、李源钢查勘帕界。海英等遍查了塔克敦巴什、伊斯里克、阿克素睦尔瓦、雅尔特拱拜、图斯库尔、苏满、六尔阿乌、黑孜吉牙克各卡，作了详细报告，绘制了地图。一八九一年十月，张鸿畴带兵由喀什噶尔赴苏满，“在立碑旧址筑立墙壁，为将来清界之据”。一八九二年一月，海英重立被俄军盗走的乾隆纪功碑于苏满。^②同年，新疆地方当局又命令在阿克塔什兴建卡房，防备沙俄再次入侵。

英国不甘心沙俄在帕米尔日益得手，先后于一八九一年九月和十二月两次照会沙俄外交部，抗议俄方驱逐荣赫鹏和戴维森，^③指出俄国所谓苏满等地属彼，并无证据。同时，英印政府派杜兰德上校带兵占领坎巨提，^④在那里筑台置炮、修路屯粮，并怂恿阿富汗在帕米尔扩大地盘，以封锁沙俄继续南进的道路。

就在英国占领坎巨提以后不久，符列夫斯基写信给

① 当时清政府驻郎库里的兵力为六十名，往苏满增派的兵力为七十五人。参看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7—408页。

② 《新疆图志》，第8卷，国界志四，第8—9页。

③ 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第394页。

④ 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37—44页。

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表示“决不能让英国人进入帕米尔”，并要求：（一）派格罗姆切夫斯基中校率奥伦堡第六哥萨克团第六混成连开赴布才拱伯孜及阿克塔什；（二）从上尔克斯坦第三边防旅抽调五百六十人，配备山炮六门开赴帕米尔；（三）将奥伦堡第六哥萨克团开赴阿赖岭作后援，等等。万诺夫斯基表示完全同意。^①

一八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沙皇亲自主持召开专门会议，参加者有外交大臣、陆军大臣、总参谋长及被召回彼得堡的约诺夫等。这次会议决定武装占领中国帕米尔，同时和清政府及英国政府谈判帕米尔问题。由于时值隆冬，出兵不便，决定先派少量先遣队入帕；春天再增调骑兵到萨雷库里；夏季一到，再派出大队人马全面占领帕米尔。

一八九二年二月十五日，以勃尔热齐茨基为首的数十人的先遣队，窜入帕米尔刺探军情，规定每周一次将所获情报送往玛尔格兰。

为了配合军事入侵，沙皇政府对清政府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二月二十三日，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照会许景澄，对中国派兵赴苏满的正当行动横加指摘，胡说什么此地“不属中国”，“应俟公商定界”。^②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也向总理衙门无理要求撤退苏满防军。沙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致函喀什噶尔道，胡说阿尔楚尔帕米尔已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5-406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6卷，第13页。

通过一八八一年中俄《改订条约》割给俄国，中国无权向苏满派兵，等等。^①在沙俄的压力下，总理衙门大臣们忧心忡忡，认为“若遽行出兵，恐启衅端”，^②驻俄公使许景澄也害怕“若坚持不退，彼必又派兵入帕。”因此，清政府一面照会俄国“允其止兵勿进”，^③一面下令将派出员弁撤回。新疆巡抚陶模复电抗争，最后仍不得不“撤添派之队，驻旧设之兵。”^④

清政府的怯懦态度使沙俄更加得寸进尺。此后，沙俄政府竟然责难中国，说什么“七八年来中国逐渐拓上，帕地亦有属俄之处，未经勘界，中国亦不应驻兵”，无理地要求中国尽撤各卡，“否则俄国亦将进兵据地”。^⑤在沙俄的武力威胁下，总理衙门再一次被迫让步，于五月四日电令陶模尽撤帕米尔驻军，“勿怀他疑”。^⑥两天后，先已侵入帕米尔的勃尔热齐茨基先遣队开到郎库里。张鸿畴适在该地，他向勃尔热齐茨基提出警告，限令俄军于三天内撤离郎库里，否则中国就要用武力把他们赶走。^⑦这时，陶模为总署的命令所迫，指示驻帕米尔的边防军全部撤

① 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3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6卷，第13页。

③ 同上。

④ 《新疆图志》，第8卷，国界志四，第10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6卷，第2页；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56页。

⑥ 《新疆图志》，第8卷，国界志四，第11页。

⑦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8页。

退到萨雷阔勒岭以东，退守布伦库里一带，张鸿畴才不得不撤退。

一八九二年春，沙皇政府先后两次开会部署对帕米尔的入侵。万诺夫斯基在会上强调俄国必须“在帕米尔占领巩固的阵地，占领布才拱伯孜和阿克塔什，从而以兴都库什山作为俄国的边界”；^①为了保卫“费尔干纳的安全”，必须武装占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全部帕米尔，使中俄边界“从乌孜别里山口起沿萨雷阔勒伸向慕士塔格。”^②

与此同时，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发布了出兵占领中国帕米尔的谕旨。约诺夫上校再次被任命为“帕米尔支队”的指挥官。行前，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就此次入侵的具体任务发出指令：在邻接六尔阿乌、郎库里和库达拉的地区，应尽力设法“清除中国的卡伦和阿富汗的流动侦察班”；“一定要坚持让中国人离开郎库里附近”；密切监视从六尔阿乌到兴都库什山的帕米尔南部地区，不让英国人在那里站住脚，^③等等。

一八九二年六月十四日，约诺夫带领一个步兵营、三个哥萨克骑兵连和一个炮兵排共一千五百余人从玛尔格兰出发，向中国帕米尔地区大举入侵。这支侵略军从鄂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08页；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第398页。

②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编，第289页。

③ 同上书，第290页。

什和达拉乌特库尔干分两路入帕，在博尔达巴会合后南行，于七月中旬经阿克拜塔尔山口窜入郎库里，和早已窜入该地的勃尔热齐茨基“先遣队”会合。随后，俄军在阿克苏河和木尔加布河的汇合处扎营，不久又分为两路：一路由约诺夫率领进犯阿尔楚尔帕米尔；另一路由斯克爾斯基大尉率领去阿克塔什“清除”已在那里修筑卡房的中国边防军，再开赴布才拱伯孜。两支军队约定在雅什库里湖会合。

约诺夫带领土尔克斯坦边防第三连、奥伦堡第二哥萨克骑兵连、一个炮兵排和工兵小队侵入阿尔楚尔帕米尔，“到雅什库里湖东岸，在中国苏满塔什对面扎营。”^①由斯克爾斯基率领的另一支侵略军，于七月十五日自六尔阿乌开拔，沿阿克苏河南犯。他们一路上逮捕中国边防兵，逼迫当地布鲁特村长提供清军驻防阿克塔什的情况，并于七月二十四日窜抵阿克塔什，以优势兵力迫使中国驻军撤离卡房，^②随后又将这座卡房彻底破坏。同年十月行抵阿克塔什的英国人邓莫尔写道：阿克塔什卡房已被俄军“夷为废墟，没有一个完整的石块了。”^③斯克爾斯基一伙在阿克塔什逞凶后继续前行，他们翻越克孜勒拉巴特山口抵萨雷库里湖，再越哈尔果什山口到达雅什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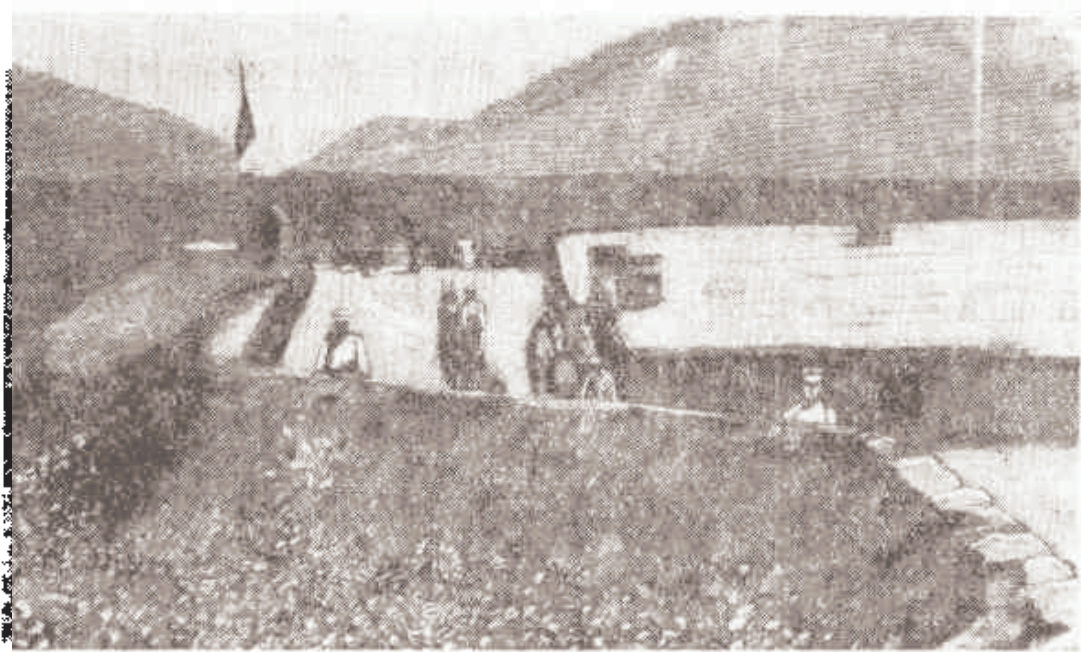
① 塔格耶夫：《在侵入云贵的地方》，1904年莫斯科出版，第82—86页；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59页。

② 寇松：《帕米尔和奥克苏斯河源》，第46页。

③ 邓莫尔：《帕米尔》，第2卷，1893年出版，第108—109页。

里湖。

沙俄侵略军在雅什库里会合后,开始返回六尔阿乌。行经察提尔塔什时,又分出一连人,仍由斯克爾斯基指挥,向南经大小帕米尔抵布才拱伯孜,侦察了瓦罕帕米尔和兴都库什山的科拉布胡尔特山口,再经阿克塔什返回;大队人马则直接折回六尔阿乌。约诺夫根据土尔克斯坦总督的命令,公然在木尔加布河和阿克拜塔尔河交汇处的沙展坟附近修筑了一个“帕米尔哨所”(后改称“木尔加布哨所”)。这个哨所“高出河面约三十英尺,周围有一道五英尺高的墙,一道七英尺深的沟和一道斜堤,四周约长五百码”。^① 负责修建该哨所的俄国军事工程师谢列勃列



沙俄强建的帕米尔哨所

(来自塔格耶夫:《在普尔盖的地方》)

① 邓莫尔:《帕米尔》,第2卷,第177页。

尼科夫称，选择这个地点构筑哨所，完全是“出于地理和战略上的考虑”，因为该地“位于帕米尔的中央和各条道路的枢纽处”。^①十月初约诺夫率领大部人马返回玛尔格兰后，在这个哨所留下二百多名占领军，安设了大炮，由总参谋部大尉库兹涅佐夫任哨所指挥官。一八九四年哨所最终建成后，在这里驻扎了一整营俄军。^②此后，沙俄就长期赖在中国帕米尔地区不走。除了这个据点外，沙俄还在郎库里湖东岸六、七俄里处修筑一个哨所，驻扎四十名占领军。^③这个哨所“隐藏在一个不大的盆地里”，“四百步以外都不容易发现它。”修建它的目的在于“封锁从喀什噶尔到帕米尔哨所的通道”，^④即阻止中国边防军到萨雷阔勒岭以西自己的土地上来。其后不久，沙俄又将这个哨所移往“更适合于此目的”的阿克塔什。^⑤

沙俄武力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地区后，当地居民纷纷逃亡到萨雷阔勒岭以东寻求祖国的保护。后来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的马继业当时从吉尔吉特前往喀什噶尔，途中仅在明铁盖和塔什库尔干之间就碰到从阿克塔什逃来的布鲁特难民约一百二十

① 塔格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34页。

② 斯文·赫定：《亚洲游记》，第1卷，1893年伦敦出版，第188—192页。

③ 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65页。

④ 塔格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第140页。

⑤ 科博德：《在亚洲的极深处》，第260—261页。

户。^①一八九五年费尔干纳省俄军参谋部给土尔克斯坦军区司令官的一份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尽管采取了坚决措施”，“仍然不能阻止”帕米尔的牧民迁到“中国土尔克斯坦（即南疆）地区去。”^②上述事实充分反映了中国帕米尔居民对沙俄殖民统治的憎恨。

沙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是公然违反一八八四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肆意践踏中国领土的抢劫行为，它必然要引起中俄两国之间的一系列交涉。

第四节 中俄帕米尔划界交涉

沙皇俄国违约武力霸占中国帕米尔地区后，它的下一步打算，就是逼迫清政府进行“划界谈判”，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从而使非法的占领“合法化”；清政府为了使沙俄撤出它违约侵占的中国帕米尔地区，也要求与俄国举行谈判。中俄一八九二——一八九四年的帕米尔划界交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九日，沙皇政府电示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清政府提议举行帕米尔划界谈判，并口头宣布：“应以沿萨雷阔勒分水岭划分边界线作为划界的主要原

① 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65页。

②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方哈拉和帕米尔》，第1编，第331页。

则”。^①十一月十五日，喀西尼来到总理衙门，正式表示“奉外部命议分帕界”，并“出示地图”，要求“自乌仔（孜）别里转东而南”，沿萨雷阔勒山梁划分中俄边界，即以沙俄军事占领线为界。^②俄方这种一开始就漫天要价、强迫中国接受它非法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既成事实的做法，受到清政府的严正驳斥。十一月十八日，清驻俄公使许景澄奉命往晤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格毕尼斯（喀普尼斯特），后者强词夺理，声称喀约“过于宽混，难以作准”，坚持“以萨雷阔勒地方分界”。许景澄反驳说：“两国所定之界约，如果不能作据，则更有何据定断何为中国何为俄国之地？”^③声明在帕米尔只能根据喀约规定的走向划界。次日，许景澄正式照会沙俄外交部，再次阐述清政府对帕米尔划界的基本立场，即“将此界约（指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为底子，然后将中间余地商量勘分”，并指出：“按历来书史以验，各帕地实属中国，所以欲凭喀城界约商办者，因系两国商定之条，并可见中国格外相让，以敦和好之谊也”。^④清政府主张在乌孜别里山口“一直往南”和“转向西南”两线之间的三角形地带“商量勘分”帕米尔边界，是完全符合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但是沙俄连这个不平等的条

①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171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2卷，奏疏二，第5—6页；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171页。

③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函牍三，第25页。

④ 同上书，第4卷，公牍，第14页。

约也不愿遵守，坚决拒绝依约在上述三角形地区划界，甚至根本无视喀约关于“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定，强要清政府按照俄国的军事占领线——萨雷阔勒岭划界。十一月二十二日，沙俄外交部再次指示喀西尼“尽力向中国大臣们说清，一八八四年议定书第三条关于自乌孜别里山口起边界走向的语句，由于含混不清，不能作为谈判的充分根据，划界的唯一可靠的根据是自然地理，即按照分水岭（指萨雷阔勒岭）”。^①这个荒谬主张遭到拒绝。十二月十日，许景澄往晤格毕尼斯，提出按照“中国界线一直往南”的规定，俄国应将盘踞郎库里一带的军队撤出：“因此地在乌孜别里往南之东，应属中国界，故请退兵。”格毕尼斯蛮不讲理地说：“要知该地属中国与否，尚无确凭”，拒绝了中方的合理要求。他再次宣扬喀约“不明白”的谬论，并公然企图把喀约关于边界走向的明确规定抛在一边，声称如果“按地势将山岭分水之处分之，不拘东西南北之说，则尽善矣。”许景澄坚不同意。沙俄见事不成，于是以中止会谈相威胁。格毕尼斯对许景澄宣布：“现在已电复喀使（即喀西尼），暂且停议，俄国定见总是如此，……不分亦好，无庸多论”。三天后，又向许景澄宣布，沙俄以萨雷阔勒岭划界的方案“无可改移”，划界事“应在北京细商”，拒绝和许景澄谈判。^②

鉴于沙俄坚持侵略立场，清政府认识到“非先增缮边

①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171页。

② 《许文肃公遗稿》，第7卷，函牍三，第25—31页。

备即不足以决界议”，^① 于是在萨雷阔勒岭一带重新布防，防备俄军进一步东侵，同时正告俄国公使喀西尼：由于俄方得寸进尺地占领中国领土，“新疆将士蓄愤已深，若议久无成，难免不生事故”。^② 沙俄见施加压力未能奏效，表示同意继续谈判，对许景澄说：“帕事愿速了”，要求中方指出萨雷阔勒岭以西“何地应画入华界，俄可和商。”^③ 其实沙俄根本没有放弃以萨雷阔勒岭为界的野心，只不过是借此摸清政府的底。

四月十六日，清政府派驻法参赞庆常赴奥地利萨尔茨堡，与正在该地休养的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会谈。在四月十六、十七两天的会谈中，庆常提出“保和好，守喀约，止派兵”三原则，坚持按喀约划界。格尔斯软硬兼施，坚持要清政府放弃按喀约划界的立场。庆常据理力争，将格尔斯的种种谬论逐条驳斥，致使俄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格尔斯的诡辩之一曰：“帕事重在他国，不重在中国”，“其地势为印度、浩罕往来捷径”，沙俄占帕是为了防备英国有所“举动”。庆常义正词严地驳斥说：“俄国与他国相争，与中国无涉，吾华但欲固守帕米尔应归华属地界，不侵邻境，亦不容他国侵我之地，此最光明磊落。”你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2卷，奏疏二，第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7卷，第4页。

③ 《许文肃公遗稿》，第10卷，电报，第6—7页；《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9卷，第5页。

要相争，“尽可自行布置，不必阑入华属帕米尔界内，则中俄自然相安。”

格尔斯的诡辩之二曰：“帕米尔在中国实为无用之地”，中国不必“如此郑重”。庆常坚定地回答说：“帕米尔地方诚为荒瘠之区，但中国既有管辖之权，又有成约，则无论肥瘠，不能舍弃。”

格尔斯的诡辩之三曰：“帕米尔向归浩罕”，沙俄吞并浩罕后，帕米尔也应与浩罕“俱归”。庆常驳斥说：“帕米尔归浩罕管属说，未之前闻，而其属华则确有证据。一则从前官兵迭入帕境，平定巨寇，勒石纪功，至今犹存；一则帕地向有中国卡，见于贵国公牍；一则帕地之民向受华官约束，应中国差徭。……此皆中国实在证据。况有成约，尤为坚固。”格尔斯狡辩说：“至帕米尔属浩罕一节，俄国亦有证据”，但他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庆常步步紧逼，说：“曾忆崇官保（即崇厚）在俄定约之时，（俄国）声明贵国边界至玛里他巴尔山而止，乃二、三年之后，竟由玛里他巴尔山拓至乌仔（孜）别里，亦属可观，然亦未提帕米尔一字。假如帕地果属浩罕，当时岂有不知之理。”格尔斯狼狈不堪，连忙扭转话题，不敢再持帕米尔原属浩罕之论。

由于庆常坚持按喀约划界，沙俄提不出反驳的理由，便借口“意见不合”，要求“从缓商议”，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①

① 以上见《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函牍四，第4—8页。

清政府为了解决帕米尔争端，调庆常赴俄专主议界事务。九月六——二十六日，庆常多次赴沙皇村与格尔斯会谈。格尔斯仍坚持要中国割让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庆常断然拒绝，说：“萨雷阔勒为界之说，早经总署驳回，似可不必再提。”^① 双方相持到十二月初，格尔斯提出具体的划界方案，内容是：“自乌孜别里向南数俄里，顺东南山梁折东，沿郎库（里）湖北岸，又东南顺山坳转至派格士别山梁，其南仍划萨山为界。”^② 照这个方案，似乎沙俄有所收敛。它不是建议从乌孜别里“往南”了吗？但往南数俄里即转向东，再后仍以萨雷阔勒岭为界。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政府拒绝。十二月十六日，庆常正式要求俄方另拟办法。格尔斯立即撕下愿意“和商”的面纱，诬指中国“全无和商之意”，并威胁说，“与其同中国作无谓之周旋，不若与英国商定一切”。^③ 沙俄之所以在这时如此强硬，原因正在于它勾结英国瓜分帕米尔的秘密谈判，已在十二月初原则上做成了交易。^④ 在往后的谈判中，沙皇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咄咄逼人。双方反复争辩，延至次年四月，谈判仍无结果。

综观一年多中俄帕米尔界务交涉，沙俄完全无视条约的明文规定，只相信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强要中国

① 《许文肅公遺稿》，第8卷，函牘四，第15—16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9卷，第6页。

③ 《许文肅公遺稿》，第8卷，函牘四，第24—25页。

④ 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78页。

接受以萨雷阔勒岭为界，侵略气焰极为嚣张。这样的谈判根本不是谈判，而是把中国当作俎上肉，在“和平”的谈判桌上向中国提出割让大片领土的要求，逼迫清政府无条件投降，实在是欺人太甚！四月十一日，格尔斯对庆常说：“现在两国意见不合，一时难以定局”，俄国陆军部准备对中国用兵，“本大臣欲杜衅端，想一调停之法，与中国言明：于未商定之前，如中国兵不进，俄亦允飭边将仍驻原处，不准前进，彼此一律办理，以便和商，而免生事。”^①庆常要求将此建议正式照会中国，等候答复。

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二日，沙俄外交部照会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说：“由于俄国和中国间关于帕米尔问题的意见分歧并很难立刻达成一个谅解，帝国政府认为，维持过去已形成的和目前存在的状况乃是目前避免误会或可能纠纷的最好办法。双方保持各自的位置，并将命令主管机关不得超越上述位置。目前事实上所形成的状况在未得到最终解决之前似可继续维持，……如果发生分歧或举行新的谈判，谈判将在北京举行。”由于当时日本侵略朝鲜，中日甲午战争即将爆发，清政府无力西顾，只得对沙俄退让。四月十七日，许景澄复照俄方，表示同意“在中国和俄国间的帕米尔问题未得到最终解决以前，双方分别给予两国主管机关命令以便使其保持并不超越各自的位置。”

^① 《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函牍四，第33页。

应当指出，清政府在同一文件中作了如下两点重要保留：

“一，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上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一八八四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

二，采取上述措施也并不表明终止目前的谈判。”

四月十八日，许景澄又照会沙俄外交大臣格尔斯说，中方“已经命令中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目前它们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中国和俄国关于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过了五天（即四月二十三日），格尔斯复照许景澄，声明沙皇政府“已经命令俄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它们目前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俄国和中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为止。”

上面是中俄有关帕米尔问题的四个换文。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俄双方通过交换这些文件，商定了暂时保持双方军队各自的位置，直到帕米尔问题最终解决为止。这些文件根本就不是划界的文件。对于帕米尔地区中俄边界的划分，清政府曾明确声明中国保留“以一八八四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格尔斯四月二十三日也对庆常说过，上述四个换文，只是“两不进兵”之议，今后帕米尔边界尚须“徐俟界议定局”。^①可见，连沙皇政府也并不认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9卷，第12页。

为一八九四年的四个换文是划界的文件。

第五节 俄英瓜分帕米尔

俄、英两个殖民帝国在帕米尔有着对立的利益，它们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互相争夺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勾结起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换取暂时的妥协。

沙俄声称帕米尔“地属中俄，但愿两国勘分，非英所宜预”，^①始终反对清政府和英国举行有关帕米尔问题的谈判，更反对中、英、俄三国一起协商；与此同时，它却背着清政府和英国秘密磋商，进行瓜分帕米尔的活动。沙俄外交正是玩弄分别与中、英谈判的两面手法，一方面拿中俄谈判压英国；另一方面又端出俄、英瓜分的既成事实强迫清政府接受，纵横捭阖，以遂其吞并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贪欲。

英国为了和沙俄争夺势力范围并利用帕米尔作印度的“屏障”，曾表示“支持”中国维护帕米尔地区的主权。一八九一年秋，英国外交部送给清政府秘密照会和地图各一件，建议划分中国、阿富汗边界，意欲使中国确保帕境，“支格其间，可隔阂俄兵之南下”。^②荣赫鹏也主张，为了阻止沙俄这个“冰川”向印度南移，“英国政府应尽可能帮

① 《新疆图志》，第56卷，交涉志四，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助中国人保住帕米尔”，^①使中国的西部边界同阿富汗领土“接触”，使帕米尔成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②一八九二年七月，英国得知沙俄大举入侵帕米尔后，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曾两次向沙俄提出抗议。但沙俄根本不予理睬，继续为所欲为。沙俄对中国萨雷阔勒岭以西帕米尔地区的侵占，宣布了英国企图的破产。在此条件下，原来就是为自己打算、非真为中国打算的英帝国，便转而谋求与沙俄瓜分帕米尔地区。

一八九二年八月，英国向沙俄提议，从萨雷库里湖向东划一条直线到萨雷阔勒山脊，直线以南属英国“保护”，直线以北属俄国“保护”。同年十二月和次年二月，英国又两次照会沙俄，阐明瓜分帕米尔及其邻近地区的主张。英国企图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给沙俄在这个地区的扩张划一个极限，阻止其继续南进威胁印度；沙俄这时已是赃物到手，希望取得国际“承认”。于是，双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利益上的共同点，背着中国大搞其肮脏交易。

一八九三年一月，沙皇政府向英国表示，如果俄、英两国首先在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则俄国愿意考虑俄、英在帕米尔的“划界”问题。三月，沙俄连续两次召开策划瓜分帕米尔的特别会议，进一步讨论英国的建议。会议重申尊重一八七三年俄、英瓜分帕米尔的协议，坚持

① 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第37页。

② 荣赫鹏：《一个大陆的中心》，1896年伦敦出版，序言。

以喷赤河作为划分两国势力范围的界限：阿富汗人应从罗善、什克南撤至喷赤河左岸；作为交换条件，俄国“属国”布哈拉应从它占领的喷赤河左岸退出。会议还决定，俄国同意在兴都库什山以北给英国留下一小块地方，不过不以一八七三年俄、英协议的以帕米尔河为界，而是以瓦罕河为界。^①这两次会议的主要结论，成为后来俄、英瓜分帕米尔协议的基础。

三月底，沙俄外交部将上述瓜分帕米尔的方案照会英国。四月二十四日，英国外交大臣罗斯伯里照会沙俄驻英大使斯塔尔，坚持在萨雷库里湖以西“保持现状”，即仍按一八七三年协议以帕米尔河为界；在该湖以东，则向东划一条“直线”为界。五月十九日，斯塔尔将沙皇政府的复照送交英国政府，仍然坚持沙俄三月份提出的方案，交涉陷于僵局。^②此后，由于俄国军方的意见占了上风，沙皇政府的态度更趋强硬，在七月十九日给英国政府的照会中，沙皇政府进一步提出，在帕米尔东部，从萨雷库里湖东端向东南方划一条线直到倭海及蕊山口，将布才拱伯孜圈入俄国境内。英国认为这条线将使俄国威胁到兴都库什山各山口，予以拒绝；^③同时派遣英印政府外交秘书莫蒂默·杜兰德前往喀布尔劝说阿富汗艾米尔阿布

①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263—264页。

② 同上书，第265—266页。

③ 同上书，第272页。

德-拉赫曼撤出罗善、什克南，以换取俄国对英国方案的同意。可是，阿布德-拉赫曼坚决不同意从罗善、什克南撤退。这时，沙皇政府误认为杜兰德去喀布尔，是为了劝说艾米尔拒绝退出罗善、什克南。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遂派军队进入罗善，对阿富汗施加压力。这件事恰恰帮助了杜兰德：艾米尔被“说服”了。^①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沙皇政府照会英国外交部称，它原则上同意自萨雷库里湖向东划一条线，但坚持：（一）英军不得进入兴都库什山以北、萨雷库里湖以东那条线以南的地区，不得在该处筑堡；（二）该地区应并入瓦罕，归阿富汗管辖，阿富汗也不得在该地筑堡。^② 英国于一八九四年二月初接受沙俄的上述要求，但又提出：（一）俄国确认坎巨提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二）英国有权派军队到兴都库什山以北进行巡逻；（三）英国有权派兵到该地区恢复秩序。沙俄反对英国的上述要求，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借口坎巨提紧靠兴都库什山并与帕米尔接壤，坚决反对将这一地区划入英国势力范围。他还反对英国军队进入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声称：“我们已经一再向英国宣布，英军越过兴都库什山是对俄国的敌对行动，我们现在必须重申：以任何借口越过兴都库什山都是不能容许的。”^③ 这说明，俄、英两国在进行勾结的同时，仍然进行

①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第275—276页。

② 同上书，第276—278页。

③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13页。

着激烈的争夺。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一日，俄、英两国趁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之机，达成瓜分帕米尔的最后协议，主要内容是：①

一、“英、俄两国在维多利亚湖（萨雷库里湖）以东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应该是：从该湖东端的一点起，顺着在该湖稍南的山梁到宾杰尔斯基山口，再到乌尔他别尔山口。”

“从这里起，分界线仍顺维多利亚湖所在的纬度以南的同一山岭而行，然后继续向东”到萨雷阔勒岭；

二、这条分界线将由俄、英、阿富汗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的纯技术性的联合委员会来具体划定；②

三、英国政府保证不在分界线以北伸展势力，俄国政府保证不在分界线以南伸展势力；

四、英国政府保证上述英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土地应构成阿富汗领土的一部分，不把它并入英国，不在这一地

① 《大不列颠政府及俄国政府关于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协议》。见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附录七，第334—335页。

② 阿富汗代表是徒有其名的。他只能列席会议和签字，不能发言。当时正在帕米尔旅行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曾同联合划界委员会的人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记载表明，阿富汗人在划界委员会中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他写道，那个阿富汗代表，“我几乎把他忘记了”。（《亚洲游记》，第2卷，第690页。）捷连节夫也供称：“俄国和阿富汗划界，但划界的签字仅由英俄两国认可，阿富汗人却象一个年幼的孤儿站在一旁，这也许是荒谬的”。（《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20页。）

区设立兵卡或炮台。

一八九五年六月,沙皇任命费尔干纳省省长帕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少将为参加“划界”联合委员会的俄方委员。英国派驻彼得堡武官杰勒德少将为英方委员。七月二十日,双方在萨雷库里湖会聚。二十七日,在湖的东端立了第一个界标,其后又在宾杰尔斯基山口及其以东的乌尔他别尔山口、米赫曼-朱雷河口等地立了界标。九月八日,在萨雷阔勒山脊立了最后一个界标(十二号界标),结束了帕米尔的“标界”。^①一八九六年一月,尼古拉二世正式批准了这个“新国界”。^②但是,这次“标界”以后,沙俄继续抱着向南扩张的野心。继格尔斯任俄国外交大臣的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就提出要“矫正”这次“勘界”：“一旦有机会,就把整个阿属土尔克斯坦(即瓦罕等地)从阿富汗手中拿过来”。^③

俄、英瓜分帕米尔,是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政策的表现。在瓜分过程中,清政府曾通过它的外交代表对此事提出抗议,严正指出:“英俄不顾中国允认与否,遽行定界,迹近强占”,^④并分别指示驻俄公使许景澄、驻英公使薛福成向俄、英两国郑重声明日后“必重申前说”。^⑤但沙俄

①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20—422页。

② 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第404页。

③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第3卷,第423页。

④ 《新疆图志》,第9卷,国界志五,第20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13卷,第16页。

根本无视中国的主权，继续非法占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中国帕米尔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阿富汗的边界，通过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签订的《中国阿富汗边界条约》已经划定。至于中苏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边界问题，则尚待解决。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仍然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并主张在解决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这里所说的“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当然包括帕米尔地区的中苏边界问题。解决这段边界问题的条约根据，只能是一八八四年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军事占领线就是军事占领线，不是“永久国界”；互不进军的换文就是互不进军的换文，不是“划界换文”。在这个问题上篡改历史、制造混乱的任何企图，都将是徒劳的。

第 六 章

沙俄对中国西部和 北部的“地理考察”

不断向东方实行殖民扩张，武力掠夺亚洲邻国的领土，是沙俄一贯奉行的国策；而进行“地理考察”，则是武装占领的前奏曲。凡是沙俄预定要霸占的地方，往往先有形形色色的“学者”、“旅行家”前往刺探情报，察看地形，进行测绘。他们是俄国将军的侦察员，是武装入侵的先遣队。

近代意义上的俄国“地理考察”，或称“科学考察”，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产儿。它的雏形出现于十九世纪初。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开始由小规模的分散活动逐步发展为大规模的、采用近代科学技术的、有计划有领导的活动。一八四五年十月帝俄地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这个新阶段的开始。“学会”是十九世纪俄国“地理考察”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它和沙皇政府两位一体；长期担任它的主席的是皇室成员康士坦丁亲王；它的许多会员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它的活动同沙俄陆军部、外交部、财政部乃至沙皇本人有密切关系。“学会”打

着科学旗号，执行对外扩张的职能，而沙皇政府则在后台指挥操纵，并为它的活动提供武装保护和物质保证。曾经两次潜入中国刺探情报的沙俄“学者”列格尔承认：帝俄地理学会类似沙皇政府“在地理考察和地理发现方面的一个部”。^①这是符合事实的。

中国是沙俄“地理考察”的重点。整个十九世纪，尤其是帝俄地理学会成立以后，沙俄派出的大量“考察队”，多数是派到中国西部、北部和中亚地区的。这个“学会”的副主席谢苗诺夫供称：“俄国地理学会自从它存在的第一个十年末起，就把考察亚洲中部当作它面临的首要任务。……在最近三十年内，俄国地理学会的考察路线网布满了亚洲中部的所有山区，不仅布满了早已熟知的阿尔泰—萨彦岭……和天山之间的地区，而且布满了天山和欧洲人几乎无法接近的西藏的北缘——昆仑山之间的地方。”^②另一个旧俄学者泽列宁也写道：“这个学会（帝俄地理学会——引者）自其诞生之初迄今，一贯朝着亚洲活动，主要是朝着靠近大陆心脏、绵延成千上万俄里、同俄国交界的地区活动。俄国在亚洲的殖民政策和对这些地区的科学考察携手并进，而且俄国对被合并地区的考察，多半是或多或少地先于领土占领和边界的移动

① 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1899年彼得堡出版，第53页。

② 谢苗诺夫：《波塔宁〈中国唐古特·西藏地区和蒙古中部〉一书序言》，1950年莫斯科出版，第4—5页。

的。”^①一语道破了沙俄“地理考察”的侵略实质。

十九世纪沙俄对中国西部和北部地区的“考察”，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一八七〇年以前，“考察”范围主要是在中国西北沿边一带，为逐步侵吞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服务；一八七〇年以后，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一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开始，“考察”范围迅速扩大到天山南北、内外蒙古、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部和西藏的北部及东部地区。这时正值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②沙俄是这一斗争的积极参加者。“考察”范围的扩大，清楚地反映了沙俄领土扩张野心的急剧膨胀。

第一节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沙俄 对中国西北边疆的“考察”

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已有一些俄国学者、探险家按照官方意图，从额尔齐斯河南下，擅自侦察中国巴尔喀什湖附近地区，积累了一些情报资料。但是，直到三十年代末，沙俄对该湖只进行了局部测绘，

① 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55页。

②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尚无总体的认识，^①更不必说该湖以东以南了。进入四十年代后，随着沙俄侵华步伐的加紧，俄国人对这一地区的非法“考察”，出现了新的局面。

早在一八四〇年夏，俄国“科学家”卡列林和基利洛夫等人，由额尔齐斯河支流那林河畔的那林堡，潜入塔尔巴哈台山区侦察。次年，在哥萨克部队护送下，卡列林又山阿亚古斯窜入巴尔喀什湖以东勒布什河和阿克苏河上游巴斯坎河一带，并进入准噶尔阿拉套山区，窥测了出入伊犁北部地区的通道。^②

一八四〇年秋，东方学家、采矿工程师科瓦列夫斯基少校在商队掩护下，从阿亚古斯向东，越过哈巴尔苏山口向南，经阿拉湖东岸，先后潜入伊犁、塔城。途中，他广泛搜集了关于伊犁、塔城的商品需求和贸易情况，准噶尔盆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以及伊犁、塔城一带的矿藏及其开采情况。他报告：伊犁可能成为“亚洲最大的市场之一”，发源于塔尔巴哈台山区的许多河流谷地中有丰富的金矿砂，并别有用心地强调说，这些金矿砂至今“尚未引起中国政府的注意”。^③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英译本，附录，第177页。

^② 谢苗诺夫、波塔宁：《亚洲自然地理学》，第4卷，第61—63、188—189页；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1集（1715—1856），1955年塔什干出版，第51页；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78页。

^③ 瓦利斯卡娅：《科瓦列夫斯基旅行记》，1956年莫斯科出版，第128—132页。

差不多与此同时,俄国学者施伦克等人,以采集植物标本为名,于一八四〇年六、七月间从阿亚古斯秘密前往巴尔喀什湖、萨司克湖、阿拉湖和准噶尔阿拉套山“考察”,并经乌尔扎尔河潜入塔城。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年间,他又秘密侦察了巴尔喀什湖西南岸、楚河上游和塔尔巴哈台山区、勒布什河、哈喇塔拉河、伊犁河,直至伊塞克湖北岸。^①

在此期间(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由西伯利亚军事地形测绘团上校西利维尔格利姆负责,对北起额尔齐斯河、南至楚河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广大地区,进行了武装侦察,并着手绘制该地区的地图。^②

一八四七年沙俄占领科帕尔不久,又派遣西伯利亚军事地形测绘团军官、地形测绘员尼凡季耶夫越伊犁河前往阿拉套地区,编绘了伊塞克湖附近地区图,上面标示了经过该湖湖畔前往喀什噶尔、乌什的道路。这是俄国人“认识同天山、浩罕毗邻的地区的开始”,“在此以前,我们(俄国)对该湖的图形几乎一无所知。”^③同年,

① 兰斯德尔:《俄属中亚细亚》,第1卷,第288—289页;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1集,第49—50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28页。

③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167、140页;兰斯德尔:《俄属中亚细亚》,第1卷,第294页。**按:**一八五〇年初,俄国地理学会会员哈内科夫根据尼凡季耶夫的地图资料,着手编制伊塞克湖及其周围地区图,一八五五年发表。而清政府早于乾隆年间即派人正确地测绘了该湖及其邻近地区,比沙俄约早一个世纪。参看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第150页。

西伯利亚军事地形测绘团根据连年来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秘密进行的地形测量，和天文学家费奥多罗夫对该地区一些侵略据点所作的天文测定，制成了有关该地区比例尺为每英寸五十俄里的详图。^① 在以后的中俄边界谈判中，这类地图为俄方制定掠夺性的方案提供了方便。

进入五十年代后，沙俄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考察”活动进一步加紧。俄国的“科学考察”还为沙俄掠夺资源、扩大经济侵略开辟道路。

一八五一年八月，尼凡季耶夫由地形测绘员布拉托夫等陪同，在七十六名哥萨克护送下，乘船“考察”了注入巴尔喀什湖东岸的阿亚古斯河、阿克苏河和哈喇塔拉河。次年，又到达该湖东南岸和伊犁河三角洲，调查了水文，研究了鱼场情况和通航条件。^②

同年，采矿工程师弗兰加里奉命参与以科瓦列夫斯基为首的“考察队”，前往“哈萨克草原南部”搜集地质构造和矿藏等情报，研究建立采矿工业的可能性。六月间，弗兰加里按计划由阿亚古斯经勒布辛斯克哨所、科帕尔，到达哈喇塔拉河和库克乌苏河一带活动。他回国后曾发

①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30页。

②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英译本，附录，第182—185页；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1集，第71—72页；别尔格：《西伯利亚和中亚各湖泊游记》，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214页。

表“考察”报告，引起了俄国“学术界”的广泛注意。^①同年七月，科瓦列夫斯基前往伊犁，同清政府进行缔结商约的谈判，接着在八月间潜赴紧靠伊塞克湖的外伊犁阿拉套山区侦察。回科帕尔后，他立即向外交部亚洲司提出了开辟巴尔喀什湖以东诸河流的水上交通、改善通往外伊犁的陆路运输的建议，企图向伊、塔、喀什噶尔等地渗透。^②

同年，沙俄为了开辟由阿亚古斯通往塔城的商道，派总参谋部大尉古特科夫斯基率部测绘了阿亚古斯、科克彼克特至塔城的线路，并于次年向沿线地区迁入武装哥萨克，在东距塔城不远处建立了乌尔扎尔哨所和哥萨克军屯。^③

一八五四年侵占维尔内后，沙俄把“考察”的重点转向天山山脉北部支脉和楚河上游。一批批俄国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测绘人员取道维尔内，前往日的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八五六——一八五七年谢苗诺夫的天山之行。

谢苗诺夫出身于俄国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一八四

① 格沃兹杰茨基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地理考察》，1964年莫斯科出版，第90页。

② 瓦利斯卡娅：《科瓦列夫斯基旅行记》，第68—69页。按：后来，科瓦列夫斯基在出任俄国地理学会副主席（一八五六——一八六二）、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一八五六——一八六一）期间，积极支持俄国“学者”前往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考察”，对沙俄的对外扩张“起了巨大作用”。见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第77页。

③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28—229页。

八年彼得堡大学毕业。一八四九年被选为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一八五〇——一八五六年任该会自然地理部秘书。在学生时期，他根据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的地质构造，推测那里可能蕴藏着大量的“对俄国特别重要”的煤矿，^①就立志前往欧洲旅行家从未涉足、只见于中国文献的天山考察，为沙皇作出“有益的贡献”。^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一八五三——一八五四年间他去柏林大学攻读“亚洲自然地理学”，并开始学习中国语文。谢苗诺夫的志趣符合沙皇政府对外扩张的需要，受到官方的赏识和培植，很快被纳入了沙俄侵华的轨道。

一八五六年四月，谢苗诺夫借口为了翻译、补充德国地理学家里特尔的《亚洲自然地理学》，要求俄国地理学会批准他前往“阿尔泰、哈萨克草原等地”。他虽未公开提出“考察”中国天山山脉，但地理学会明白谢苗诺夫“有一个更广泛的计划”，立即批准了他的要求，并拨给他“考察”费用。^③

一八五六年六月中旬，谢苗诺夫由彼得堡到达鄂木斯克，请求西西伯利亚总督协助，表示不仅要去维尔内，

① 切尔尼亚夫斯基：《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及其地理著作》，1955年莫斯科出版，第27页。

② 谢苗诺夫：《回忆录》，第1卷，第239页。转引自陀斯妥耶夫斯基编：《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生平》（文集），1928年列宁格勒出版，第32页。

③ 陀斯妥耶夫斯基编：《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生平》（文集），第45页。

“而且可能去研究边区的地质构造、它的动植物，乃至相邻的山区的居民”，^①即前往当时尚未被沙俄侵占的中国天山地方。这时加斯弗尔德已“最终决定占领整个外伊犁阿拉套山脉的北麓”，正需要地理学会给予支持，所以对谢苗诺夫的来到表示十分欢迎，答应在“考察”过程中尽可能提供武装保护。同时派遣若干地形测绘员随行，并同意让谢苗诺夫参考有关的各种地图。^②

在加斯弗尔德的赞助下，谢苗诺夫取道塞米巴拉金斯克，经阿亚古斯、勒布什和科帕尔等地，于九月十二日到达维尔内。在这里他根据刚刚侵扰伊塞克湖畔归来的霍缅托夫斯基上校的介绍，清楚地知道游牧于伊塞克湖以东的布鲁特族布库部“臣属中国”，^③但仍然执意去伊塞克湖东部。九月十四日，谢苗诺夫一行三十余人（内有十余名武装哥萨克）离维尔内沿外伊犁阿拉套山东行，于九月下旬到土布河和伊塞克湖东岸进行侦察，然后返回。十月三日，谢苗诺夫又率领九十名哥萨克出发，沿外伊犁阿拉套山北坡经卡斯帖克山口到达楚河上游、伊塞克湖西岸，查明了新近与俄军作战的萨尔巴噶什部就在湖西不远处。他利用萨尔巴噶什部个别头人害怕俄军大规模

① 陀斯妥耶夫斯基编：《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生平》（文集），第46页。

②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50—52页。

③ 同上书，第94页。

入侵的心理，^① 前往一个头入的驻地进行煽动，一面伪装“友好”，诡称俄国人愿与布鲁特人“建立善邻关系”，一面大肆恫吓说：如果布鲁特人敢于反对俄国入，必将遭到报复。^② 尽管如此，谢苗诺夫由于兵力单薄，加以时届深秋，不敢前去天山深处，遂决定取道维尔内返回鄂木斯克，以待明年。

十月下旬，谢苗诺夫穿着哥萨克服装，冒充护送俄国邮车的入员混过博罗胡吉尔卡伦，进入伊犁城刺探情报。他在该城逗留的七天期间，曾与俄国领事札哈罗夫密谈，观看了札哈罗夫秘密绘制的准噶尔——天山地区图。^③

十一月，谢苗诺夫向俄国地理学会书面报告了他的天山之行，并申请增拨款项供来年重赴天山之用。地理学会表示赞同。

回到鄂木斯克后，谢苗诺夫向加斯弗尔德详细汇报了他的“考察”成果，鼓吹：外伊犁地区是俄国理想的殖民区，应使它“成为俄国在亚洲的一颗明珠”。他强调，在鄂木斯克很难治理广大的哈萨克游牧区，只有在该地区内部特别是它的前沿阵地科帕尔、勒布什、乌尔扎尔和塔尔巴哈台山麓加强兵力，才能奏效；通过不断向该地区移

①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112页；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49页。

②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117页。

③ 陀斯妥耶夫斯基编：《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生平》（文集），第163页；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120—122页。

民,便“可以在这里为支持俄国在中亚的势力和统治建立起一个最强大的坚不可摧的堡垒”,进而把俄国的国境线继续向前推进,使维尔内同锡尔河上的彼罗夫斯克堡连成一线。因此,巩固地占领外伊犁地区“对于俄国的巨大功绩,决不亚于占领黑龙江沿岸地区。”^①接着他向加斯弗尔德提出了继续“考察”伊塞克湖及其附近山区的计划,要求增派卫兵,以“确保其安全”。加斯弗尔德非常赞赏他的侵略主张,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

一八五七年五月初,谢苗诺夫离鄂木斯克南下,开始了第二次天山之行。五月下旬到达维尔内后,他立即向新任“大玉兹哈萨克监护官”佩列梅什利斯基面陈一切,要求派军队护送他东去“考察”,直至“伊塞克湖盆地同喀什噶尔联结的山口”^②。佩列梅什利斯基欣然表示同意。

这时,布鲁特族萨尔巴噶什部与布库部的矛盾重新激化。谢苗诺夫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唆使大玉兹哈萨克苏勒坦铁色克率部随俄军一起开赴布库人的游牧地,企图假手哈萨克压布库部“臣服”俄国。六月中旬,谢苗诺夫一行五十八人离维尔内东行,十九日到达善塔斯山口附近布库部头人布拉巴依驻地。同时到达的有铁色克率领的大批人马。^③谢苗诺夫将铁色克所部留驻善塔斯一带,

①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128—129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同上书,第142—143页。

自己带哥萨克侵入招哈山口，登上汗腾格里山，最后于七月中旬潜入特克斯河上游谷地，窥测了伊犁通往喀什噶尔的通道穆索尔山口。在此期间，谢苗诺夫亲自了解到布库部“当时仍然向中国政府纳税”，继续“保持着同中国的联系”，^①但是仍一意孤行，以提供“武装保护”为名，逼诱布拉巴依“臣服”沙俄并派人潜往喀什噶尔替他搜集情报，企图继续南侵。^②七月下旬，谢苗诺夫突然获悉铁色克所部发生变乱，形势逆转，被迫“改变自己的全部计划”^③，匆匆赶回维尔内；对天山的“考察”，就此结束。

十一月初，谢苗诺夫在鄂木斯克向加斯弗尔德汇报，再次提出必须立即使布库人、萨尔巴噶什人“臣服”俄国，把俄国国界向南推进，沿楚河——锡尔河“划分新的边界。”^④同时，他还建议“发展”对华边境贸易，并强调“西西伯利亚当局当前应特别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建立同喀什噶尔的直接联系”，因为那里物产丰富，位置重要，比伊犁更为优越，说不定今天还是明天，这块地方就可能“独立”；如俄国漠不关心，它很可能屈从于强大的英国的影响之下。又说“访问”伊塞克湖的布库人，“考察”天山、外伊犁阿拉套山的山区通道，“是为接近喀什噶尔迈出的

①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209页。

② 贾姆格尔契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第171页。

③ 陀斯妥耶夫斯基编：《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生平》(文集)，第51页；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210页。

④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第249页。

第一步”，下一步应当是侦察喀什噶尔本身，占据从伊塞克湖经招哈山口到南疆的通道，设置居民点。^①谢苗诺夫的这些意见，极受加斯弗尔德重视，并为沙皇政府所采纳。

事实表明，谢苗诺夫作为第一个亲赴中部天山“考察”的俄国人，对欧洲地理学界历来关于天山山脉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和冰川作用等方面的认识，不无新的补充和修正。但是，这些自然地理学方面的“发现”，丝毫掩盖不了谢苗诺夫践踏中国主权、非法“考察”天山的侵略性质。

此后，谢苗诺夫以俄国地理学会负责人的资格，多次组织俄国地理学者侵入中国天山南北地区进行特务活动。他本人也步步高升，历任地理学会自然地理部副主席、主席和地理学会副主席。沙俄还曾以他的名字（从一九〇六年起自称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命名了十一个地方。^②这一切，突出地说明了谢苗诺夫的天山之行在沙俄侵华史上的作用。

谢苗诺夫的天山“考察”掀起了沙俄对中国西部进行“地理考察”的狂热。

一八五九年，以维纽科夫为首的一伙人从维尔内出发，到伊塞克湖和楚河流域进行了地形测量。他们还详

① 《俄国地理学会会员谢苗诺夫的札记》，载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569—570页。

② 切尔尼亚夫斯基：《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及其地理著作》，第74页。

细调查了这一地区的交通、商业、农业、畜牧业和民族的情况。^①

同年四至六月，俄国总参谋部大尉戈鲁别夫等人再次潜赴伊塞克湖“考察”。他们从维尔内向东渡车里克河抵特克斯河上游；越善塔斯山经土布河口到伊塞克湖岸，然后沿北岸经库尔墨图等地返回维尔内。八月间，他们经博罗胡吉尔卡伦潜入伊犁，十月抵塔城。在这次“考察”中，戈鲁别夫等人详细侦察了哈萨克大玉兹、土尔扈特部、布鲁特布库部和萨尔巴噶什部，搜集了大量情报。^②

一八六〇年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规定由两国“秉公查勘”西界，沙皇政府为了给这次勘界谈判作准备，向清政府提出掠夺性的要求，更加紧了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

一八六二年春，以尼凡季耶夫上尉和斯特列利尼科夫少尉为首的两个测量队，分别对塔城以北阿拉套山北部支脉和斋桑湖南岸一带进行了非法测量。^③

同年，戈鲁别夫窜到阿拉湖东岸和中国胡苏图卡伦等地活动，先后测定了“巴尔喀什湖和塔尔巴哈台山、准

① 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2集（1856—1869），1956年塔什干出版，第39—40页。

② 戈鲁别夫：《伊塞克湖考察结果概述》，载《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1861年第31卷，第366—370页；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2集，第36—37页。

③ 参看本卷第三章第二节。

噶尔阿拉套和天山之间”若干地点的方位，并测量了伊犁、塔城的地形，^①为俄方在塔城谈判桌上向中国勒索领土提供了重要资料。

一八六二——一八六四年，“地理学家”波塔宁和沙俄勘界委员会秘书长司徒卢威窜到阿尔泰山与塔尔巴哈台山之间的南部平原活动，对斋桑湖以北地区进行测量，绘制了地形图。这是波塔宁多次到中国西部和北部“考察”的第一次。

一八六三年六月，由兹里亚霍夫上校带领的“河道考察队”，乘汽船溯额尔齐斯河驶入斋桑湖，于八月间窜入喀喇额尔齐斯河，沿途绘制了航道图。^②

一八六四年，以谢维尔佐夫为首的“考察队”到天山山脉西部、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活动，绘制了地形图，并调查了东布鲁特的状况。^③

同年，俄国采矿工程师塔塔里诺夫从阿亚古斯出发，“考察”了塔尔巴哈台山北坡，然后又从卡腊科尔出发“考察”南坡，并潜入塔城活动。此行除搜集了丰富的地理、地质资料外，还找到金砂、绿宝石、铜、煤、石墨等矿床。^④

综上所述，截至一八六四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① 谢苗诺夫：《俄国地理学会半世纪来的活动史》，1896年彼得堡出版，第271页。转引自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2集，第36—38页。

②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第249页。

③ 谢维尔佐夫：《土尔克斯坦地区旅行记》，第77—101页。

④ 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2集，第56页。

为止,沙俄对中国西部的“考察”,主要集中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伊犁、塔城以西和斋桑湖周围地区。这个地区恰恰是当时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重点。这一事实充分揭示了所谓地理考察同沙俄对华领土扩张的密切联系。

一八六四年是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部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沙俄对中亚诸汗国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与此同时,陕甘回民起事蔓延到天山南北。一八六五年初,浩罕野心家阿古柏乘机侵入南疆。在此情况下,沙俄决定利用在中亚新取得的有利阵地和中国西北的动荡局势混水摸鱼,进一步向新疆伸展侵略势力,从而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考察”活动。

一八六七年七、八月间,地理学会配合沙皇政府准备进攻喀什噶尔、迫使阿古柏就范的军事计划,派遣总参谋部上校波尔托拉茨基、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奥斯登-萨根等人从维尔内出发,经楚河、伊塞克湖西端、松库里湖(森格尔池)到纳林河流域,并先后侦察了穆索尔山口、恰提尔库里湖、图噜噶尔特山口、苏约克山口、阿特巴什河等地。此行测量了纳林河南面的地形,^①首次“从伊犁平原到达了喀什噶尔或小布哈拉草原”,^②见到了“喀什噶尔耕作过的田野”。^③

同年秋,谢维尔佐夫率“考察队”沿外伊犁阿拉套山

① 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2集,第68页。

②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69页。

③ 同上书,第371页。

东行到察林河；越善塔斯山口到伊塞克湖东端；再越巴尔琿岭、素玉克山口抵纳林河上游；顺纳林河而下，转入阿特巴什河谷地，直抵阿克赛河地区而返。此行对天山广大地区进行了地形测量，细查了天山构造，并到处描画山隘要地，搜集了许多重要情报。^①

一八六九年，俄国“学者”拉德洛夫一行从科帕尔出发，先后到博罗胡吉尔卡伦、伊塞克湖北岸和东岸卡腊科尔一带活动。此行“搜集了有关锡伯族、索伦族及其宗教、社会关系的情报，以及伊犁河流域的形势和起事过程的情报”，^②对锡伯、索伦、布鲁特萨尔巴噶什等部的语言和风俗也进行了调查。^③

一八七〇年，俄国总参谋部军官考尔巴斯等人到伊塞克湖东岸和纳林河上游一带活动，详细侦察了喀克善山、阿特巴什山，“考察”了天山中段的许多山口，其中包括穆索尔山口；^④此外，还对天山作了三万平方俄里的地

① 谢维尔佐夫：《土尔克斯坦地区旅行记》，第123—230页；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74—75页；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2集，第47页；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47页。

② 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2集，第91页。

③ 同上。

④ 考尔巴斯：《一八七〇年秋穆索尔（山口）之行》，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8卷，1872年，第17—22页；谢苗诺夫主编：《关西的俄罗斯》，第10卷，第373页；穆什基托夫：《土尔克斯坦》，第1卷，第1编，1886年彼得堡出版，第208页；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2集，第92—93页。

形测量。^① 考尔巴斯继波尔托拉茨基之后对穆索尔山口进行侦察，显然和俄国一八七一年出兵强占伊犁有直接关系。

第二节 沙俄在中国西部和北部 “考察”活动的继续加强

一八七一年沙俄出兵强占伊犁，是沙皇政府利用中国西北的混乱局势疯狂扩大领土掠夺的严重步骤。几乎与此同时，普尔热瓦尔斯基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了他的“第一次中央亚细亚考察”。以此为起点，在以后的三十年中，俄国“考察队”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中国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这一现象反映了沙俄日益增长的侵华野心。下面，我们将叙述这一时期俄国人在中国进行“地理考察”的概况，其中，将着重叙述具有代表性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活动。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八三九——一八八八)是帝俄总参谋部军官，一八五五年参加俄军服役，后毕业于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一八六七——一八六九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考察”，以苏城支队参谋长的身份参与镇压青岛淘金工人和苏城一带中国居民的抗俄斗争。^② 从一八七〇年起，普尔热瓦尔斯基受总参谋部和

^①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72页。

^②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1890年彼得堡出版，第75—76页。

地理学会的派遣，先后到中国西部进行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为此，他成了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宠儿，名噪一时，被誉为俄国“地理考察”的泰斗，当选为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帝俄地理学会名誉会员。

“军人科学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一生做着征服中国的黄粱美梦。他猖獗地狂吠道：在中国，“你只要囊中有钱，一手拿枪，一手执鞭，你就能到处通行无阻。我们从经验得知，欧洲人到此地来必须使用这三件东西。为了传播文明，欧洲人应该带着这三件东西到这里来，……只要有一千名俄国兵，就足以征服从贝加尔湖到喜马拉雅山的整个亚洲”。“在这里，仍然可以重建柯尔蒂斯那样的丰功伟绩。”^①他还向沙皇政府献策说，俄国为“姑息”中国已经浪费了两个世纪，应当立即挑起中国人对俄国作战，一举“使中央亚细亚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的民族脱离中华帝国”。^②这些热昏的梦呓，证明他是最凶恶的殖民主义分子，是地地道道的俄国“柯尔蒂斯”。

一八七〇——一八七三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中国进行“第一次中央亚细亚考察”。“考察”计划是在陆军部、总参谋部、地理学会和沙俄驻华公使弗兰加里（倭良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八七三年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报告。载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161页。按：赫尔南多·柯尔蒂斯（一四八五——一五四七）是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强盗。

② 雷菲尔德：《拉萨之梦》，1976年伦敦出版，第111页。

嘎哩)的积极支持下制定的。弗兰加里建议,“考察”的重点应放在“黄河上游、鄂尔多斯、青海以及其他毗连藏北的一些地方”。他野心毕露地说:“我们不能把这些考察工作让与他人,也不能让别人在亚洲的这个地区超过我们”。^①地理学会考虑到沙皇政府急欲了解中国西部回民举事的情况和清政府的军事部署,建议将“旅行路线”选经“叛乱的中心”,注意“搜集关于回民起事的准确情报”。^②最后,确定以鄂尔多斯、甘肃、青海为这次“考察”的主要目标。^③一八七〇年八月一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计划。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带着助手佩利佐夫和武装人员从恰克图出发,经库伦、张家口,于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四日到达北京,下榻俄国使馆,受到弗兰加里的殷勤款待和多方面的支持。^④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准备,一八七一年三月,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从北京启程,出古北口,先到多伦诺尔、达里湖一带刺探情况;再折向西南,于五月初重抵张家口;往西,顺阴山山脉到包头;渡黄河到鄂尔多斯,再西行数百里到磴口,入阿拉善旗。在这里,他以五倍到十八倍的高

①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92页。

② 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161页。

③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94页。

④ 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和唐古特人地区》,1946年莫斯科出版,第42页。

价“出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货物，赚了一大笔钱”；^①然后到贺兰山窥伺。十月底，“考察队”动身返回张家口过冬。

一八七二年三月，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再次从张家口出发，于六月重抵阿拉善；再南赴甘肃，越长城，渡庄浪河，直抵大通河畔。七月中旬到十月初，他们在这一带调查喇嘛教的情况，并到大通河南岸的达坂山和北面的天梯山等处活动。

同年十月底，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从甘肃到达青海湖畔，沿北岸绕到西岸，经布哈河到达都兰寺。普尔热瓦尔斯基冒充前往拉萨会见“东方大活佛”达赖喇嘛的“西方大活佛”，到处以占卜治病为名进行间谍活动；^②然后进入柴达木盆地，经和西左后旗，越布尔汗布达山西南行，一直窜到长江上游木鲁乌苏河及其支流那木七台乌兰木伦河一带，企图越唐古拉山潜入西藏，因经费将罄，驮畜不支，只得从原路返回，^③于一八七三年十月一日抵恰克图。

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伙人的活动，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沿途居民拒绝向他们出售粮食、牲畜；拒绝他们留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住在帐篷里，靠打猎

①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128页。

② 同上书，第162—163页。

③ 别尔格：《伟大的俄国旅行家》，195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第245页。

过活”。^①加以当地居民“不是拒绝指路，就是指相反方向”，他们“几乎在每一个路口都要迷失方向，浪费时间，白白走几十俄里冤枉路。”^②为了应付面临的“中国人的一致仇恨”，^③普尔热瓦尔斯基公然对居民实行武力威胁，在张家口等地不止一次地公开举行“击退进攻”的打靶演习。他狂妄地写道：“威胁——这是我们……最好的通行证”，“我可以用脑袋担保，只要有十五名身挎速发枪的好兵，我就能穿越整个中央亚细亚。”^④

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前后历时三年，行程约一万二千公里。在整个过程中，“考察队”对沿途的山川地理、天文气象、动物植物、风俗民情和政治、经济、军事状况进行了无孔不入的调查。行经甘肃时，普尔热瓦尔斯基“多次访问了有驻军的城市”，“趁机细查了中国军队的状况”，^⑤包括兵力、装备、战法、士气等，并作了记录。^⑥回到俄国后，他迫不及待地向总参谋部递交了两份题为《关于中国的现状》和《关于回民起事的情报》的报告。^⑦他踌躇满志地写道：这次“旅行”的“成就”“超过

①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119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③ 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266页。

④ 同上书，第275-276页。

⑤ 同上书，第319页。

⑥ 同上书，第311-326页。

⑦ 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和唐古特人地区》，第42页；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401页。

了最初过蒙古边境时的预想”。^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返回彼得堡后，立刻身价百倍，成了轰动一时的“英雄”。各式各样的庆功会、报告会、授奖会接踵而来，应接不暇；他成了陆军大臣米留金的座上客；总参谋部把他由大尉提升为中校；地理学会授予他康士坦丁勋章。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对他分外垂青，亲自参观他从中国盗窃来的标本展览。这一切，体现了沙俄统治集团对一个忠实鹰犬的破格恩赏。

当普尔热瓦尔斯基正在中国活动的时候，沙皇政府从刚占领的伊犁派出以舍别列夫上校为首的另一支“考察队”向南溯穆索尔河、登穆索尔冰川，于一八七一年十月越过穆索尔山口。这是越过该山口的第一支俄国“考察队”。^②

一八七二年，沙俄又派马图索夫斯基等人从斋桑向南渡额敏河潜入玛纳斯，然后沿驿道渗入塔城附近的沙拉和洛苏刺探情报。^③

一八七五年，以穆什基托夫为首的“考察队”，对伊塞克湖南岸的铁列克山脉和察林河、格根河、伊犁河谷及天山中段进行了“考察”，并搜集了大量矿藏资料。^④

①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175页；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399页。

②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73页。

③ 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54页。

④ 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3集（1869—1880），1962年塔什干出版，第95—96页；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126页。

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中国进行了“第二次中央亚细亚考察”。这次“考察”的目的地是拉萨，预定在途中着重侦察罗布泊和天山东部地区，并计划会见阿古柏。外交大臣格尔斯研究了“考察”计划，指示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了解这些地区的政治情势，了解当地的人口、需求以及该地能为俄国人的商业进取精神开放的前景。”^①还说：“西藏作为喇嘛教的中心，对俄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又完全没有关于这个地区的准确资料，因此，外交部不能不特别赞许普尔热瓦尔斯基先生深入拉萨的决心。”^②陆军大臣米留金也表示：“陆军部十分愿意尽全力协助实现这一大有裨益的事业，”并指示沙俄中亚殖民当局促其圆满成功。与此同时，俄国驻北京公使布策逼迫清政府发给“考察队”经哈密到西藏的护照。^③这一切，说明沙皇政府对这次侦察的重视是非同寻常的。

一八七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沙皇批准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到中国从事新的“旅行”的上谕下达。五月，普尔热瓦尔斯基带着助手艾克龙等从彼得堡出发，来到俄军占领下的伊犁。八月二十四日，“考察队”沿伊犁河上行。沿途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园艺发达，山河壮丽。普尔热瓦

①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208页。

② 同上。

③ 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413—414、442—443页。

尔斯基感叹道：“伊犁河谷是亚洲的伦巴第。这样好的地方实在不应该交还（中国）。 ”^①再前行，渡特克斯河下游，溯空格斯河谷、昌曼河谷，越纳喇特岭，过裕勒都斯高原，到达阿古柏控制下的海都河盆地。当地居民听说普尔热瓦尔斯基等来到，又风闻随后有大队俄军，纷纷“抛弃家园，逃往喀喇沙尔”。^②这时阿古柏内外交困，正想改善同俄国的关系，特派亲信顾问札曼伯克到库尔勒迎接“考察队”，并陪同它前往罗布泊。“考察队”从库尔勒经浣溪河来到塔里木河下游的若羌，然后向南侦察阿尔金山脉达四十天之久，绘制了长约五百俄里的路线图。^③普尔热瓦尔斯基寻找越此山去西藏的通道未成，于一八七七年初返回罗布泊。

接着，“考察队”对罗布泊进行了全面侦察。普尔热瓦尔斯基“乘小船周游罗布泊，走遍了湖岸的所有村庄，尽可能研究他们的习俗”，并“画了沿岸的地图”。^④一些浸透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思想的旧俄学者据以断言：罗布泊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早在一八七六年发现的”。这种说法的荒诞离奇实在出人想象。众所周知，中国人自古就熟悉罗布泊，这个中国的内湖在《山海经》中称“渤海”，《史记》、《汉书》称“盐泽”或“蒲昌海”，《水经注》称“牢兰（楼

① 译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414页。

②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英译本，第48页。

③ 译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421页。

④ 同上书，第425页。

兰)海”。到了清代,一七六二年的《皇舆西域图志》已将该湖明确记为“罗布淖尔”,即“罗布泊”的意思。就连普尔热瓦尔斯基本人在《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一书中,也不得不引用中国的上述文献记载,承认二千多年以前中国汉代就知道罗布泊。可见,所谓俄国人一八七六年“发现”罗布泊的说法,纯属虚构。

结束对罗布泊的侦察后,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于一八七七年五月七日重抵库尔勒,十一日会见阿古柏,^①然后由原路取道裕勒都斯,于七月十五日返抵伊犁。

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一阶段的“考察”,除侦察了天山、罗布泊和阿尔金山脉外,还搜集了关于南疆政治形势的详细情报。^②他在给总参谋部的报告中,详述了阿古柏众叛亲离和人民生活、军队士气等方面的情况,得出结论说:阿古柏“获胜的机会殊属可疑”,“阿古柏国家即将崩溃”。^③从上述判断出发,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现在“阿古柏对于我们(沙俄)的任何要求都一定会同意”,建议考夫曼派兵占领特克斯河东面的大小裕勒都斯地区,将俄国国界一举推进到达兰岭。^④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英译本,第128页;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429、434页;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235—236页。

② 普尔热瓦尔斯基:《关于东土尔克斯坦现状的报告》。载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附录十二,第570页。

③ 同上书,第575—576页。

④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237页。

在伊犁休整期间，普尔热瓦尔斯基着手制定第二阶段“考察”计划。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会修士大司祭巴拉第、驻华代办凯阳德等人的建议下，^①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取古城（奇台）—哈密—敦煌—祁连山—柴达木盆地—长江上源的路线前往拉萨。

一八七七年九月九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带领卫队六人、助手艾克龙和大量武器装备从伊犁出发。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故意绕道艾比湖向北，然后向东南穿过山地和沙漠，于十一月十六日到达古城。这时，因沙俄违背诺言继续霸占伊犁，中俄关系日趋紧张，沙皇政府电令“考察队”返回；加以普尔热瓦尔斯基等患病，身体不支，于一八七八年初回到斋桑。^②

普尔热瓦尔斯基这次“考察”虽未能实现进入西藏的目标，但是“收获”仍是不小的：（一）查明了当时新疆的政治军事形势；（二）刺探了罗布泊、塔里木河下游、天山东部、准噶尔盆地和欧洲人未曾到过的阿尔金山脉的情况，偷绘了地图；（三）窃取了大量动植物标本。沙皇政府为了表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功劳，下令提升他为陆军上校。

① 一八七七年五月八日凯阳德给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信。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第1卷，第426页；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235、241—242页。

② 摩尔根：《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中亚的旅行和发现》。载《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及每月地理纪录》，1887年第9期；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256—257页。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进行“第二次中央亚细亚考察”的同年，沙皇政府借一支俄国商队将由斋桑经准噶尔盆地前往古城的机会，命令总参谋部军官彼甫佐夫以商队护卫队长的身份，带领一百名哥萨克随同前往，同时责成他“尽可能地搜集商队行经地区、尤其是旅行家从未到过的布伦托海和古城之间地区的详细情报。”^①

一八七六年五月，彼甫佐夫奉命从斋桑出发，到布伦托海，然后溯乌伦古河上行到阿尔泰山，陡转而南，经准噶尔大沙漠直抵古城。随后，彼甫佐夫又潜入天山侦察，窥测了博格多山。在这次“考察”中，彼甫佐夫绘制了长约九百公里的路线图，记述了沿途尤其是准噶尔盆地的自然状况，并刺探了政治、军事情报。^②

同在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波塔宁受地理学会的派遣，率动物学家别廖佐夫斯基、地形测绘员拉法伊洛夫和后来的“蒙古学家”波兹涅耶夫到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察”。“考察队”从斋桑出发，先后行经布伦托海、准噶尔盆地、巴里坤、哈密等地，并对蒙古西北部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进行了重点调查，一直深入到瀚海山区、库苏泊、乌布苏泊一带。他们沿途绘制地图，搜集交通、商业、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报，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

① 彼甫佐夫：《中国和蒙古旅行记》，1951年莫斯科出版，第17页。

② 彼甫佐夫：《喀什噶尔和昆仑山旅行记》，1949年莫斯科出版，第22—23页；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98—100页。

“满载而归”。^①

一八七七年，“植物学家”列格尔潜入天山、特克斯河一带活动，然后越穆索尔山口返回卡腊科尔。^②

一八七八年，因两年前侦察准噶尔盆地有功、担任了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主席的彼甫佐夫，再一次冒充商队成员，潜入中国蒙古地区侦察。八月初，他带领地形测绘员斯科平、丘克林和六名会蒙语的哥萨克从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前往科布多，在那里同一支俄国商队会合后，穿越戈壁经归化城抵张家口。一路上，他们窥测地形，刺探多方面的情报。^③次年春，彼甫佐夫等自张家口北上，抵库伦，折而西，经赛音诺颜部、札萨克图汗部和科布多返回俄国。^④作为此行的结果，彼甫佐夫写了《蒙古和中国内部北方诸省旅行纪要》，并绘制了长达四千公里的路线图。^⑤

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中国进行了“第三次中央亚细亚考察”。

一八七八年九月五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向总参谋部

① 奥勃鲁切夫：《中央亚细亚考察家波塔宁的功勋》。见波塔宁：《蒙古旅行记》，1948年莫斯科出版，第11—12页；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第375页。

② 达布斯：《中国上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66—67页。

③ 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101页。

④ 同上书，第101—102页。

⑤ 马尔戈林：《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彼甫佐夫》。见彼甫佐夫：《喀什噶尔和昆仑山旅行记》，第19—20页；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102页。

和地理学会提出去西藏“考察”的申请，其中写道：“达赖喇嘛的权力并不亚于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力，它遍及整个亚洲中部、东部和南部。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从寒冷的蒙古沙漠和炎热的印度支那各国聚集拉萨，向自己的宗教统治者顶礼膜拜，甚至把他看成是神的化身。……这一神权拥有二亿五千万信徒，一经掌握在有经验、有天才的人手里，毕竟是一股可怕的力量。安抚它，笼络它，如有可能就和它交朋友，——我觉得俄国正可以从中得到可观的利益。”^①“考察”计划得到沙俄陆军部、外交部、财政部和地理学会的一致支持，并很快得到沙皇批准。

一八七九年四月二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率领助手罗博罗夫斯基、艾克龙和武装卫队从斋桑出发，窜入布伦托海一带，再向东南到巴里坤，越天山，经哈密、安西到达敦煌，并窜到千佛洞窥探。^②清朝地方当局禁止他们从敦煌往南经青海去西藏，并拒绝提供向导。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致函沙俄驻北京代办凯阳德，向清政府施加了一系列的压力。大臣们劝阻无效，最后表示：如普尔热瓦尔斯基仍要前往，则中国方面对他的安全“将不负任何责任”^③。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关于预定去西藏考察的报告》。载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附录十四，第580页；卡林采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生平和旅行》，1937年莫斯科出版，第90—91页。

② 别尔格：《伟大的俄国旅行家》，第261—262页。

③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292—295页。

最后,普尔热瓦尔斯基无视中国主权,悍然往南越祁连山诸山脉,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然后越布尔汗布达山、可可西里山,直奔长江上源本鲁乌苏河。一八七九年十一月,“考察队”翻越唐古拉山口,遭到藏民的狙击。普尔热瓦尔斯基下令开枪,打死打伤藏民多人,^①第一次强行闯入西藏境内。

西藏地方当局闻知普尔热瓦尔斯基等正向西藏窜来,事先在那曲(黑河)集中了防军,并动员军民赶修工事,严阵以待。广大藏民纷纷表示:“决不能让他们到这里来,让他们先把我们杀净,再进我们的城(拉萨)吧!”^②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伙不顾藏族人民的反对,继续向前奔突,一直窜到离拉萨一百六十英里的那曲附近。^③西藏地方官员前来责问他们为何入藏寻衅,普尔热瓦尔斯基伪善地回答说:“我们纯粹是为科学目的而来的”。藏官通知他们说:“西藏政府决定不让你们继续前进”。但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不听劝阻,继续赖在那曲附近不走。十二月十二日,拉萨再次勒令俄国人离藏。普尔热瓦尔斯基认识到强行前往拉萨,必将遭西藏军民的顽强反抗,吉少凶多,只好决定折回青海。他悻悻然地写道:西藏人民的“无知和野蛮”给他去拉萨“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斋桑经哈密到黄河上游》,1883年彼得堡出版,第241—242页。

② 同上书,第247—248页。

③ 同上书,第248页。

碍”。^①殖民者眼里的中国人，总是“无知和野蛮”的；然而“文明”的“军人学者”普尔热瓦尔斯基毕竟承认人民的力量“不可逾越”，被迫退却了。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西藏被逐后，从原路经唐古拉山口、柴达木盆地前往西宁，准备去黄河上游。西宁办事大臣通知他说：奉有朝廷命令，要“考察队”尽快经阿拉善、蒙古返回俄国。但普尔热瓦尔斯基置若罔闻，于一八八〇年四月擅自向南沿黄河上游前进，直抵该河支流曲什安河、恰克图河一带；欲到黄河源，因山高路难，不明路径，驮畜不济，只得经贵德、青海湖、贺兰山、阿拉善旗北返，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日回到恰克图。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三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前后为时两年。通过这次“考察”，普尔热瓦尔斯基系统地侦察了藏北地区，探明了去拉萨之路，从而为俄国进窥西藏充当了先导。在此期间，“考察队”还绘制了八千多公里长的路线图，搜集了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民族等方面的大量情报。在这次侦察中，普尔热瓦尔斯基还开始注意培养罗博罗夫斯基等作他的“接班人”，后来逐渐形成所谓“普尔热瓦尔斯基地理考察学派”。他们都是清一色的间谍，是沙皇政府的忠实鹰犬。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西藏返回俄国后，受到上层社会

^① 以上见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斋桑经哈密到黄河上游》，第273—277页；卡林采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生平和旅行》，第105—108页；雷菲尔德：《拉萨之梦》，第139页。

更加热烈的欢迎,成了“最知名的人物”。沙皇接见了,他,^①皇后甚至延请他给皇太子多次讲述“考察”见闻。^②在整个俄国统治集团的支持鼓励下,普尔热瓦尔斯基野心勃勃,决定再到中国作进一步的“考察”。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三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期间,沙俄还向中国派出了下面两支“考察队”:

一八七九年五月,列格尔再次从伊犁赴石河活动;七月“考察”喀什河及额林哈毕尔噶山南坡;九月潜入空格斯河谷,经裕勒都斯到吐鲁番,企图向南到罗布泊,未成;最后经托克逊越天山到乌鲁木齐,再经玛纳斯等地回国。^③

同年,俄国地理学会再一次派遣波塔宁赴蒙古西北部“考察”。这次波塔宁着重窥察了乌布苏泊等大湖、色楞格河流域和唐努乌梁海,最后越萨彦岭返回伊尔库次克。^④

一八八三——一八八五年,普尔热瓦尔斯基到中国进行了“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

这次“考察”的主要任务是调查藏北和黄河源。^⑤ --

①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354页。

② 同上书,第361页。

③ 达布斯:《中国上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67页。

④ 波塔宁:《蒙古旅行记》,第12—13页。

⑤ 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普尔热瓦尔斯基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的公函。载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附录十六,第588—591页。

八八三年四月十七日，沙皇批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计划，并拨给四万多卢布作为活动经费。^①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日，普尔热瓦尔斯基率助手罗博罗夫斯基、科兹洛夫、十六名士兵及翻译、摄影师各一名，从恰克图再次窜入中国境内。“考察队”还携带陆军部发给的大量枪支弹药，并在出发前从事了紧张的射击训练。

这支二十一人队伍到达库伦后，穿过戈壁沙漠，经阿拉善入甘肃，于一八八四年二月下旬抵大通河，转赴西宁。在西宁，普尔热瓦尔斯基蛮横地要求给他派向导前往侦察黄河源，当地官员派了几十名官兵护送。普尔热瓦尔斯基心怀鬼胎，疑心这些人是派来监视他的行动的，在途中将护送官兵强行赶走。^②到达柴达木盆地后，他们又绑架头人，强索向导，勒索骆驼、羊只、马料。往后，这一伙人越过布尔汗布达山，于一八八四年五月底窜到黄河源附近的星宿海东端。普尔热瓦尔斯基得意忘形地写道：我们“在星宿海出口处三俄里以下的黄河右岸扎营：我们亲眼看见了这条伟大的中国河流的秘密发源地，并喝了河水，我们欣喜无穷”。^③其实他只到了黄河源以下

① 一八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普尔热瓦尔斯基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会的公函。载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376—377页。

②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387页。

③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恰克图到黄河源旅行记》，1888年彼得堡出版，第1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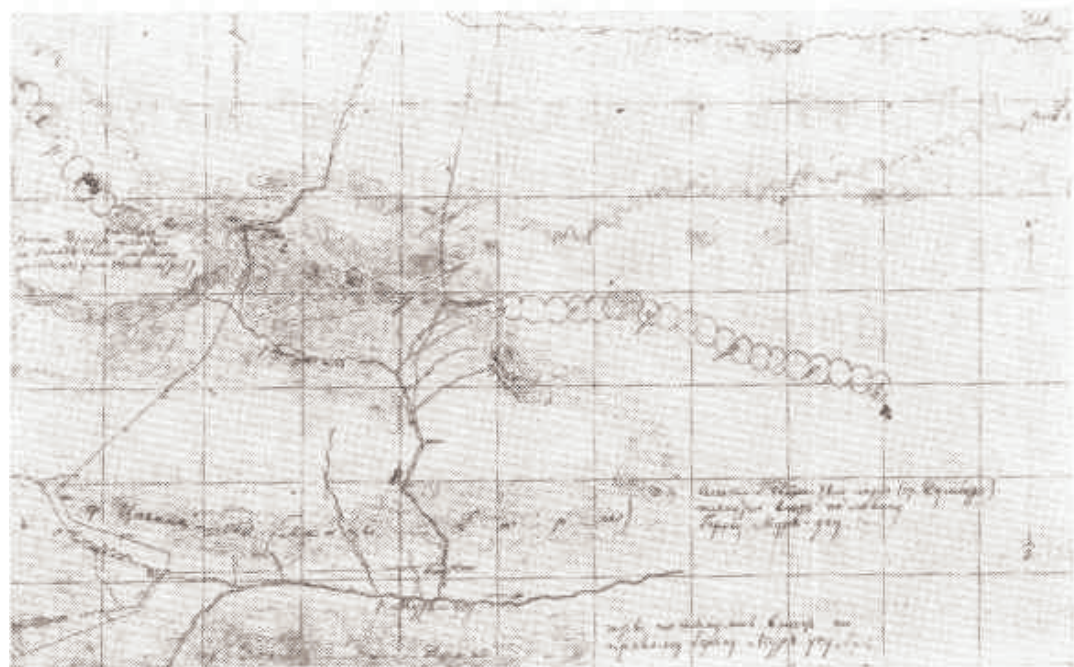
的地方，并没有找到河源。

从星宿海出发，普尔热瓦尔斯基等越巴颜喀拉山，再一次窜到长江上游木鲁乌苏河谷，扎营一周。在此期间，普尔热瓦尔斯基又对当地藏民发动武装进攻。藏民进行反击，终于迫使普尔热瓦尔斯基放弃去西藏的计划，返回星宿海。

重返河源附近后，普尔热瓦尔斯基一伙对星宿海及鄂陵、札陵两湖进行了“考察”，并于一八八四年七到八月绘制了“黄河源地形图”。他按照殖民者的“惯例”，擅自给上述两湖重新“命名”，并恬不知耻地写道：“我根据第一个考察者的权利，将位于东面的湖（鄂陵湖）命名为‘俄罗斯人湖’，将位于西边的湖（札陵湖）命名为‘考察队湖’。让这第一个名称证明第一次深入到黄河源的是俄国人，让这第二个名称铭记着我们在这里的考察。”^①普尔热瓦尔斯基在这里是信口开河。他大概“忘记”了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代代生息、繁殖在黄河之滨。在中国古籍中，关于黄河源的记载汗牛充栋，说明中国人早已熟知黄河源的情况，根本不需要俄国人来“发现”。

普尔热瓦尔斯基不仅不是黄河源的第一个发现者，而且他根本没有到过黄河源，只是到了河源以下约两百里的星宿海东端及其下的两湖地区。他甚至对流入星宿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恰克图到黄河源旅行记》，第198页。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西藏考察路线目测图”

（采自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

海的黄河的两个源头：喀口曲、约古宗列曲的名字也不知道。^① 在他本人绘制的《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央亚细亚旅行目测路线图》中，并没有绘出他经过了黄河源。^② 同样，在沙俄绘制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四次中央亚细亚旅行情况图》中，也只标示他到过星宿海的东端和鄂陵湖、札陵湖的南岸。^③ 这就证明，所谓“普尔热瓦尔斯基第一个考察黄河源”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普尔热瓦尔斯基并未到达黄河源而冒充“第一个考察”了黄河源，原因何在？他自己供称，是为了取得“第一个考察者的权利”。根据这个“权利”，他擅自把中国的传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恰克图到黄河源旅行记》，第155页。

② 同上书，附图一。

③ 同上书，附图三。

统地名换上了俄国的名称,以便在将来某个时候,根据这个“命名”宣布对黄河源地区有占有权。这就是沙俄殖民者的如意算盘。

在窜扰札陵湖、鄂陵湖时,沙俄“考察队”遭到当地藏民的坚决抵抗。普尔热瓦尔斯基两次下令向他们发动武装进攻,共发射子弹一千三百发,打死藏民四十人。^①即使倾黄河之水,也洗不净这伙俄国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腥罪行。

完成对鄂陵、札陵两湖地区的侦察后,普尔热瓦尔斯基等向北越布尔汗布达山入柴达木盆地,往西经格孜库里湖,越阿尔金山脉,于一八八五年二月上旬重抵罗布泊,停留了五十多天。清朝地方当局命令他们立即经库尔勒、伊犁返回俄国,^②普尔热瓦尔斯基拒不服从,反而于四月一日从罗布泊向西南窜到若羌、车尔臣一带活动。此后,“考察队”继续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西行,沿途窥探阿尔金山脉,经民丰到于田。于田地方当局立即下令严禁居民同俄国人来往,并指示将骆驼、马群、羊群和粮食隐藏起来。为了防止俄国人向南进入西藏,还派人进山破坏道路、桥梁。^③普尔热瓦尔斯基不肯罢休,继续从于田转向南行,到普鲁寻找越昆仑山入藏的山口,不成;再后

①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恰克图到黄河源旅行记》,第201—207、491—536页。

② 雷非尔德:《拉萨之梦》,第174页。

③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408页。

经齐尔拉(策勒)、和田、阿克苏,越别迭里山口,于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中旬返回卡腊科尔。

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前后经过两年,行程七千八百公里。这次“考察”侦察了黄河源以下的鄂陵湖、札陵湖附近地区、柴达木盆地和罗布泊,并沿塔克拉马干沙漠南沿系统地窥探了阿尔金山脉和昆仑山脉。返回彼得堡后,普尔热瓦尔斯基立即替沙皇政府绘制一张塔里木河、罗布泊地区的地图,并应邀参加高级军事会议,作了题为《关于对华战争的新设想》的报告。他写信给罗博罗夫斯基说,这个报告在会上“大获全胜”,使到会者获得“强烈的印象”。^①为了表彰普尔热瓦尔斯基的间谍活动,沙皇政府特发给他金质奖章,提升他为陆军少将。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期间,俄国地理学会还派遣波塔宁等到中国进行了第三次“考察”。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他们先后到蒙古、甘肃、青海及四川西北松潘、平武一带活动,绘制了约七千五百公里的路线图,拍摄了成堆的照片,搜集了大量情报。^②

普尔热瓦尔斯基自一八八五年返回俄国后,一直盘算着到中国进行新的侦察。他焦躁不安地写道,他常常

①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426页。

② 波塔宁:《中国唐古特 西藏地区和蒙古中部》,1950年莫斯科出版,第8页。

是“身在欧洲，心在亚洲”。^①他一生做着“拉萨之梦”，但是先后经过四次尝试，均告失败。对此，他是死不甘心的。从一八八八年三月起，他开始准备到中国作“第五次中央亚细亚考察”。经过一番周密策划，普尔热瓦尔斯基决定采取从南疆经青海西部入藏的路线，到拉萨“去见达赖喇嘛”。他忘记了上次在那曲被逐的教训，狂妄地宣称：“我们只须三十个好小伙子就能击溃几千个中国人”，“我用脑袋担保，只须二十到三十名优秀射手，一定能够到达拉萨。”^②

三月二十七日，沙皇批准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考察”计划。与此同时，俄国驻华公使库马尼(库满)逼迫曾纪泽发给了允许普尔热瓦尔斯基前往西藏的护照。^③

十一月一日，先期到达皮什别克准备出发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因喝了染有病菌的楚河水，暴死于卡腊科尔，结束了他充当侵略鹰犬、为沙俄侵华效劳卖命的可耻的一生。为了“铭记”他的“殊勋”，一八八九年三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谕令将他的葬身地卡腊科尔改名普尔热瓦尔斯克，并在该地树立纪念碑。碑顶站着一只脚踏亚洲大地的兀鹰，它象征普尔热瓦尔斯基对中国领土的肆意践踏和沙俄征服中国以至整个亚洲的勃勃野心。

普尔热瓦尔斯基丧命后，沙皇政府改派彼甫佐夫为

①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第436页。

② 同上书，第436—437页。

③ 同上书，第443—446页。

队长,继续进行普尔热瓦尔斯基计划中的“第五次中央亚细亚考察”。但这次“考察”的范围较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原计划已大为缩小,主要是侦察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山区,同时寻找从该地进入西藏的道路,为以后向西藏渗透打下基础。^①

一八八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彼甫佐夫带领改组后的“考察队”从卡腊科尔出发,越别迭里山口潜入中国境内。参加“考察队”的有罗博罗夫斯基、科兹洛夫、采矿工程师博格丹诺维奇,并随带二十多人的卫队和长长的驼马队。这一伙人经阿克苏、喀什噶尔和叶尔羌河谷到叶尔羌城;由此转向东南,经和田、于田、尼雅,沿昆仑山北麓和阿尔金山脉进行详细的侦察和测量,远及阿尔金山南面的牙克库勒库木湖等地,并一度越昆仑山,到达藏北地区的达什库里湖,企图向东南经江达、拉里“直赴巴塘”。为此,他们强迫藏民引路。藏民极为愤恨,故意把他们“引往西宁路上”。彼甫佐夫发觉,“行出数十里外,忽然折回,用枪打毙乌拉(即差役)马牛”,“举枪又欲伤人”,^②气焰极为嚣张。最后,由于藏民力阻,“考察队”无可奈何,只得折回南疆,顺车尔臣河北上,取道罗布泊、喀喇沙尔,于一八九一年一月返回斋桑。

① 彼甫佐夫:《喀什噶尔和昆仑山旅行记》,第25、37—38页;罗博罗夫斯基:《天山东部和南山旅行记》,1949年莫斯科出版,第12页。

② 驻藏大臣升泰奏陈俄人游历藏北现拟赴巴塘折。《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3卷,第2页。

与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侦察方式不同，彼甫佐夫“考察队”经常将人员分为几队到不同地段单独活动。整个“考察”涉及的地域较为集中，侦察更为准确详细。例如，“考察队”在尼雅设立了气象站进行常年观察。他们还系统地调查了地质、地形、道路、水草分布、从南疆通向西藏和拉达克的通道的情况；对南疆的矿藏、采金业、农牧业及商业也进行了详细调查，为沙俄在南疆扩大商品市场和掠夺资源搜集了大量情报。

在彼甫佐夫“考察”南疆的同时，沙俄总参谋部和地理学会还派遣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兄弟到天山东部和祁连山侦察。

一八八九年六月八日，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兄弟带领武装人员六名、翻译二名，先后到准噶尔盆地、博格多山、吐鲁番盆地和觉罗塔格山脉一带活动。一八九〇年春，他们从新疆东入甘肃，系统地“考察”了祁连山，然后前往西宁附近的塔尔寺，转而向南，企图进入四川或西藏，^①途中为清政府所阻，于一八九〇年七月下旬折回塔尔寺。此后他们又窜到甘肃敦煌、嘉峪关、北山等地活动，最后经新疆北部，于一八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返回俄境。^②

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兄弟的这次“考察”，搜集了大

① 《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83卷，第4页。

② 以上见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关于1889-1890年的旅行》。载《帝俄地理学会通报》，第27卷，1891年彼得堡出版，第169-180页；

穆尔札耶夫
穆尔札耶夫

量地理、民族和历史方面的情报，窃取地质和动物标本一万四千件，拍摄照片二百张，^①进行了气象观察，对七千二百俄里的地段进行了地形测量，其中有六千俄里是先前未经测量的地区。^②作为此行的结果，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写了三卷本的《中国西部旅行记》。^③为此，俄国地理学会特发给他奖金和康士坦丁勋章。

同在一八八九年，沙俄总参谋部大尉格罗姆切夫斯基经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由皇太子捐赠经费，先后到塔克敦巴什帕米尔、叶尔羌河谷、喇斯库姆河谷、喀喇喀什河谷、和田、塔勒塔得、喀喇昆仑山口、赛图拉、民丰和西藏西北部等地活动，带回了大量情报。^④

一八九一年，俄籍蒙古族喇嘛巴札-巴克恰·门肯杰尔从恰克图入蒙古，沿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旧道到那曲，然后伪装香客潜入拉萨。此人在拉萨住了一年，并先后到西藏几个喇嘛教圣地刺探情况后，经青海、甘肃到达北京；一八九四年，从海路返回俄国。这是俄国臣民第一次潜入拉萨，带回了首批关于该地的实地侦察情报。^⑤

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沙俄外交部派遣波兹涅耶夫到蒙古“考察”。波兹涅耶夫一伙从恰克图入境后，

① 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89—90页。

② 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关于1889—1890年的旅行》。载《帝俄地理学会通报》，第27卷，第179—180页。

③ 该书第一、二卷出版于1896—1899年，第三卷出版于1907年。

④ 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85—86页。

⑤ 同上书，第104页。

先后到库伦、科布多、张家口、归化、多伦诺尔、巴林旗、乌珠穆沁旗等地活动。此行全程计二万二千俄里，沿途刺探了喀尔喀和内蒙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通商道路等方面的情况。后来波兹涅耶夫根据他的“考察”日记，写了《蒙古及蒙古人》一书。

一八九二——一八九四年，波塔宁到中国北部和西部进行第四次“考察”。同行者有奥勃鲁切夫等。“考察队”入境后分为两路：奥勃鲁切夫着重调查了戈壁、祁连山、天山东段、吐鲁番盆地；波塔宁则向南越秦岭，进入四川西北部，一直窜到打箭炉和今川藏交界的巴塘。一八九四年，“考察队”返回俄国。^①

一八九三——一八九五年，沙皇政府拨给经费，派遣罗博罗夫斯基、科兹洛夫率“考察队”到中国西部活动，先后侦察了天山东部、大小裕勒都斯、吐鲁番盆地、阿尔金山脉；甘肃北山、祁连山；青海湖、柴达木盆地、积石山等地。一八九五年初，罗博罗夫斯基中风瘫痪，“考察队”被迫返回俄国。^②这次“考察”全程都作了地形测绘，除带回大量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外，还带回一批考古文物，其中包括一些维吾尔文和吐鲁番盆地各民族文字的著作。后者引起俄国地理学会的注意。它随即派出以克列门茨为首的“考

① 波塔宁：《蒙古旅行记》，第13页；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118—119页；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103页。

② 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101—103页；《1893—1895年罗博罗夫斯基领导的俄国地理学会中央亚细亚考察文集》，第2册，1899年彼得堡出版，第9页。

察队”，先后窜到天山南北、阿尔泰山和戈壁西部，盗窃了大量珍贵文物，包括古代壁画和各种文字的铭文和手稿。^①

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俄国地理学会派遣科兹洛夫率领“考察队”到西藏活动，计划潜入拉萨。

一八九九年八月一日，“考察队”由塞米巴拉金斯克窜入中国境内。“考察队”有助手二人、蒙文翻译一人、武装卫队十六人，随带骆驼五十四头、马十四匹。他们顺阿尔泰山麓到科布多，经蒙古中部、甘肃、柴达木盆地，企图前往拉萨，未遂；转而向南，一直窜到甘孜、昌都等地活动达九个月之久。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考察队”回到恰克图。

科兹洛夫这次“考察”，全程一万二千八百公里，沿途绘制了地图，搜集植物标本三万件，地质标本一万二千件，拍摄照片四百幅；此外，还广泛刺探了西藏东部各藏族部落的状况。^② 俄国地理学会为了表彰科兹洛夫的“功绩”，特授给他康士坦丁勋章。^③

① 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108页；勃·维·尤索夫：《中央亚细亚考察家弗·伊·罗博罗夫斯基》，见罗博罗夫斯基：《天山东部和南山旅行记》，第18页。

② 科兹洛夫：《蒙古和喀木》，1948年莫斯科出版，第16页；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119—120页；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的发现和探险史》，第111—112页。

③ 穆尔札耶夫：《在遥远的亚洲》，第144—145页。

十九世纪沙俄对中国的“地理考察”，是沙俄对华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就本章不完全的叙述，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俄国派往中国的“考察队”就有四十多个。^①他们的活动遍及中国西部和北部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涉及自然情况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肆意践踏中国主权，蔑视中国法律，刺探情报，测绘地形，寻找矿藏，盗窃标本，横冲直撞，为所欲为。这些侵略行径证明，他们是一伙不折不扣的披着“科学家”外衣的殖民强盗。

① 沙俄派往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考察队”和派往阿古柏处的一些兼有侦察性质的代表团，已见于本卷第四、第五章，不在此数。

附 录 一

中文参考书目

- 司马迁撰:《史记》, 130 卷。
班固撰:《汉书》, 120 卷。
范曄撰:《后汉书》, 120 卷。
陈寿撰:《三国志》, 65 卷。
唐太宗等撰:《晋书》, 130 卷。
崔鸿撰:《十六国春秋》, 100 卷。
魏收撰:《魏书》, 130 卷。
李延寿撰:《北史》, 100 卷。
令狐德棻等撰:《周书》, 50 卷。
魏徵等撰:《隋书》, 85 卷。
刘昫等撰:《旧唐书》, 200 卷。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 225 卷。
欧阳修撰:《五代史记》, 74 卷。
脱脱等撰:《辽史》, 116 卷。
脱脱等撰:《宋史》, 496 卷。
宋濂等撰:《元史》, 210 卷。
张廷玉等撰:《明史》, 332 卷。
柯劭忞等撰:《清史稿》, 534 卷。
玄奘译, 辨机撰:《大唐西域记》, 12 卷。
杜佑撰:《通典》, 200 卷。
王溥撰:《唐会要》, 100 卷。
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 1000 卷。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 291 卷。

王延德撰:《高昌行记》, 1 卷。

不著撰人名氏:《元朝秘史》, 12 卷, 四部丛刊本。

谢再善译:《蒙古秘史》, 1 册, 1957 年中华书局出版。

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 2 卷。

耶律楚材撰:《湛然居士文集》, 14 卷。

乌古孙口述、刘祁笔记:《北使记》, 1 卷。

刘郁撰:《常德西使记》, 1 卷。

迺贤撰:《金台集》, 2 卷。

欧阳玄撰:《圭斋文集》, 16 卷。

赵孟頫撰:《松雪斋文集》, 10 卷。

姚广孝等编:《明实录》, 2926 卷。

申时行等撰:万历时重修本《明会典》, 228 卷。

陈诚撰:《西域行程记》, 1 卷。

陈诚撰:《西域番国记》, 1 卷。

张雨撰:《边政考》, 12 卷。

马齐等编:《清圣祖实录》, 300 卷。

鄂尔泰等编:《清世宗实录》, 159 卷。

庆桂等编:《清高宗实录》, 1500 卷。

曹振鏞等编:《清仁宗实录》, 374 卷。

文庆等编:《清宣宗实录》, 476 卷。

贾桢等编:《清文宗实录》, 356 卷。

宝鋈等编:《清穆宗实录》, 374 卷。

世续等编:《清德宗实录》, 597 卷。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 5 册, 1958 年中华书局出版。

嵇璜等撰:《清朝文献通考》, 300 卷。

嵇璜等撰:《清朝通志》, 126 卷。

和坤等撰:乾隆《大清一统志》, 424 卷。

穆彰阿等撰:嘉庆《大清一统志》, 560 卷。

托津等撰：嘉庆《大清会典》，80卷。
 托津等撰：嘉庆《大清会典事例》，920卷。
 托津等撰：嘉庆《大清会典图》，132卷。
 岳禧等修、海清阿等续修：《理藩院则例》，64卷。
 董浩等撰：《皇清职贡图》，8卷。
 傅恒等撰：《西域图志》，52卷。
 椿园撰：《西域闻见录》，8卷。
 松筠等纂：《西陲总统事略》，12卷。
 松筠等纂：《新疆识略》，12卷。
 松筠撰：《绥服纪略图诗》，1卷。
 祁韵士撰：《新疆要略》，4卷。
 徐松撰：《西域水道记》，5卷。
 徐松撰：《新疆赋》，1卷。
 王树枏等撰：《新疆图志》，116卷。
 褚廷璋撰：《笥心书屋诗钞》，12卷。
 和瑛辑：《三州辑略》，9卷。
 徐崇立编：《西域舆地三种汇刻》，3卷。
 祁韵士辑：《皇朝藩部要略》，18卷。
 张穆撰：《蒙古游牧记》，16卷。
 奕湘、倭哩贺撰：《定边纪略》，2卷。
 富俊撰：《科布多政务总册》，1册。
 恩华撰：《唐努乌梁海图附说略》。
 魏源撰：《圣武记》，14卷。
 何秋涛编撰：《朔方备乘》，81卷。
 沈曾植撰：《蒙古源流笺证》，8卷。
 徐继畲辑：《瀛环志略》，10卷。
 温达等编：《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
 傅恒等编：《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1卷·正编85卷，续编33卷。
 奕訢等编：《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320卷。

魏光燾撰:《戡定新疆记》, 8 卷。

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外交史料》, 10 册。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 道光朝, 80 卷。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 咸丰朝, 80 卷。

宝鋈等编:《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100 卷。

王彦威编:《清季外交史料》, 光绪朝, 218 卷。

左宗棠撰:《左文襄公全集》, 98 卷。

李鸿章撰:《李文忠公全书》, 165 卷。

张之洞撰:《张文襄公奏稿》, 50 卷。

曾纪泽撰:《曾惠敏公文集》, 5 卷。

曾纪泽撰:《曾惠敏公奏疏》, 6 卷。

曾纪泽撰:《金韬筹笔》, 4 卷。

许景澄撰:《许文肃公遗稿》, 12 卷。

杨增新撰:《补过斋文牍》, 44 卷。

沙克都林扎布撰:《南疆勘界日记图说》, 1 卷。

林乐知、蔡锡龄等编译:《西国近事汇编》, 4 卷。

徐松撰:《汉书西域传补注》, 2 卷。

李光廷撰:《汉西域图考》, 7 卷。

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 1 册, 195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垣著:《元西域人华化考》, 8 卷, 1931 年励耘书屋刊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新疆出土文物》, 1 册, 1975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罗振玉编撰:《流沙坠简》, 3 册, 1914 年景石印本。

黄文弼著:《罗布淖尔考古记》, 1 册, 1948 年北平研究院出版。

黄文弼著:《吐鲁番考古记》, 1 册, 1954 年中国科学院出版。

黄文弼著:《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1 册, 1958 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

丁谦撰:《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二集, 78 卷。

- 王国维著:《观堂集林》, 4册, 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 张星娘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6册, 1930年北平出版。
- 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 1册, 1936年上海出版。
-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1册, 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
- 钱恂著:《中俄界约斟注》, 7卷。
- 邹代钧著:《中俄界记》, 2册。
- 许景澄著:《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 2册。
-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 1册, 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 沙畹著, 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 1册, 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 羽田亨著, 郑元芳译:《西域文明史概论》, 1册, 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多桑著,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 中译本, 2册, 196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 王之相、刘泽荣编译:《故宫俄文史料》, 1936年故宫博物院出版。
- 加恩著, 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 198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附 录 二

俄文参考书目

Бабков И. Ф.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моей службе в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 1859—1875г. СПб., 1912. (巴布科夫:《1859—1875年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1912年彼得堡出版。)

Вантыш-Каменский Н.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Казань, 1882. (班蒂什-卡缅斯基:《1619—1792年俄中外交资料汇编》,1882年喀山出版。)

Бартольд В. В.

Сочинения, т.1—2., М., 1963—1964. (《巴托尔德文集》,第1—2卷,1963—1964年莫斯科出版。)

Бокмаханов Е. Б.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азахстана к России. М., 1957. (别克马汉诺夫:《哈萨克斯坦合并于俄国》,1957年莫斯科出版。)

Берг Р. Л.

По озерам Сибири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Л. С. Берга(1898—1906гг.)и П. Г. Игнатова(1898—1902 гг.). М., 1955. (别尔格:《西伯利亚和中亚各湖泊游记》,1955年莫斯科出版。)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Н. В.

Западный Застенный Китай. СПб., 1906. (博戈雅夫连斯

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1906年彼得堡出版。)

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А. Х. Маргулана. Алма-Ата, 1958. (《瓦里哈诺夫选集》, 1958年阿拉木图出版。)

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1—2, Алма-Ата, 1961, 1962. (《瓦里哈诺夫全集》, 第1—2卷, 1961—1962年阿拉木图出版。)

Вальская Б. А.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Егора Петровича Ковалевского. М., 1956. (瓦利斯卡娅:《科瓦列夫斯基旅行记》, 1956年莫斯科出版。)

Вартенбург

Рост России в Азии. Ташкент, 1900. (瓦尔坚堡:《俄国在亚洲的进展》, 1900年塔什干出版。)

Венюков М. 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окраинам русской Азии и записки о них. СПб., 1868. (维纽科夫:《俄属亚洲边区旅行记》, 1868年彼得堡出版。)

Вышинский А. Я.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50. (维辛斯基主编:《外交辞典》, 1950年莫斯科出版。)

Вяткин М. П.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Киргизии. Фрунзе, 1963. (越特金等:《吉尔吉斯史》, 1963年伏龙芝出版。)

Гатаулина Л. М.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07—1636,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59. (加塔乌林娜:《1607—1636年俄蒙关系文件集》, 1959年莫斯科出版。)

Гвоздецкий Н. А. и др.

Русски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авказа 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XIX—начале XX в. М., 1964. (格沃兹杰茨基等:《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俄国在高加索和中亚的地理考察》, 1964 年莫斯科出版。)

Герасимов Б.

В долине Бухтармы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Записки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ого подотдела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ып. 5,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 1911. (格拉西莫夫:《在布赫塔尔玛河谷》, 载《帝俄地理学会西西伯利亚分会塞米巴拉金斯克支会会刊》, 第 5 期, 1911 年塞米巴拉金斯克出版。)

Г. Н. Г.

Страничка из истории Кульджин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Вестник Азии», №7, 1911. (格·恩·格:《伊犁问题史上的一页》, 载俄国东方学家学会《亚洲通报》杂志, 1911 年第 7 期。)

Головачев П.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Пб., 1904. (戈洛瓦乔夫:《俄国在远东》, 1904 年彼得堡出版。)

Голубев П. А.

Алтай,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по вопроса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рного округа. Томск, 1890. (戈鲁别夫:《阿尔泰:关于阿尔泰山区经济和民政发展问题的历史-统计汇编》, 1890 年托木斯克出版。)

Гольман М.И. и Слесарчук Г.И.

Рус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и Монголии в 30—50 годах XVII в.,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Народов Азии», № 76, М., 1965. (戈利曼、斯列沙尔楚克:《关于十七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俄蒙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讯》,第76期,1965年莫斯科出版。)

Гольман М. И. и Слесарчук Г. 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36—1654,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74. (戈利曼、斯列沙尔楚克编:《1636—1654年俄蒙关系文件集》,1974年莫斯科出版。)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А.

Дела и дни Г. Е.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М., 1947. (阿·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的生平事业》,1947年莫斯科出版。)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Г. Е.

Описа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 СПб., т. 1, 1896; т. 2, 1899. (格·叶·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中国西部旅行记》,第1卷,1896年;第2卷,1899年彼得堡出版。)

Джамгерчинов Б.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Киргизии к России. М., 1959. (贾姆格尔契诺夫:《吉尔吉斯合并于俄国》,1959年莫斯科出版。)

Дневник Д. А. Милютина 1878—1880. т. 3. М., 1950. (《米留金日记(1878—1880)》,第3卷,1950年莫斯科出版。)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А. А. (ред.)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 его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Л., 1928. (陀斯妥耶夫斯基编:《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生平》(文集),1928年列宁格勒出版。)

Дубровин Н. Ф.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Пб., 1890. (杜勃罗文:《普尔热瓦尔斯基传略》,1890年彼得堡出版。)

Зеленин А. В.

Всемирные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СПб., 1899. (泽列宁:《普尔热瓦尔斯基旅行记》,1899年彼得堡出版。)

Златкин И. Я.

Исто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1635—1758).М.,1964.(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1964年莫斯科出版。)

Златкин И. Я.

Очерки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М., 1957. (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1957年莫斯科出版。)

Искандаров Б.

Восточная Бухара и Памир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Душанбе, 1962—1963. (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1962—1963年杜尚别出版。)

Каринцев Н. А.

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жизнь 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М.,1937.(卡林采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生平和旅行》,1937年莫斯科出版。)

Киреев Ф. Н. и др.

Казахско-Рус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XIX веках(1771—1867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лма-Ата, 1964. (基列耶夫等:《十八——十九世纪哈萨克与俄国的关系(1771—1867年)》(文件与资料集),1964年阿拉木图出版。)

Козлов П. К.

Монголия и Кам. М., 1948. (科兹洛夫:《蒙古和喀木》,1948年莫斯科出版。)

Корсак А.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历史-统计概览》,1857年喀山出版。)

Кузнецов В. 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Синь-цзяне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М., 1973 г. (库兹涅佐夫:《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政府在新疆的经济政策》,1973年莫斯科出版。)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Записки генерала Куропаткина о 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ой войне. Берлин, 1909. (库罗巴特金:《俄日战争的总结》,1909年柏林出版。)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Кашгария. СПб., 1879. (库罗巴特金:《喀什噶尔》,1879年彼得堡出版。)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Пб., 1913. (库罗巴特金:《俄中问题》,1913年彼得堡出版。)

Кури Б.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XVII- XVIII вв.,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 М., 1927. (库尔茨:《十七至十八世纪俄国与中国的殖民政策》,载苏联《新东方》杂志,1927年第19期。)

Кюннер Н. В.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ч. 3, вып. 1,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0. (克尤涅尔:《远东国家现代史》,第3卷,第1分册,1910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出版。)

Лавров М. В.

Туркестан. География и история края. М., 1914. (拉甫洛

夫：《土尔克斯坦》，1914年莫斯科出版。）

Маслов О. В. (ред.)

Обзор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ий и экспедиций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ч. 1—3, Ташкент, 1955—1956. (马斯洛夫等编：《俄国人到中亚旅行和考察概述》，第1—3集，1955—1956年塔什干出版。)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2, М.-Л., 1937, 1941. (米勒尔：《西伯利亚史》，第1—2卷，1937, 194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Народы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т. 1—2, М., 1962, 1963.

(《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民族志》，第1—2卷，1962, 1963年莫斯科出版。)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 Л.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держа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60—1895. М., 1956. (纳罗奇尼茨基：《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殖民政策（1860—1895）》，1956年莫斯科出版。)

Пантусов Н. Н.

Сведения о Кульджинском районе за 1871—1877 годы. Казань, 1881. (潘图索夫：《1871—1877年有关伊犁地区的资料》，1881年喀山出版。)

Певцов М.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ашгарию и Кун-лун. М., 1949. (彼甫佐夫：《喀什噶尔和昆仑山旅行记》，1949年莫斯科出版。)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войны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в XIX столет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23. (波克罗夫斯基：《十九世纪沙皇俄国的外交和战争》(文集)，1923年莫斯科出版。)

Попов А. Л.

Из истории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т. IX, 1940. (А.波波夫:《征服中亚史片断》,载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历史集刊》,1940年第9辑。)

Потанин Г. Н.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Монголии. М., 1948. (波塔宁:《蒙古旅行记》,1948年莫斯科出版。)

Потанин Г. Н.

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М., 1950. (波塔宁:《中国唐古特-西藏地区和蒙古中部》,1950年莫斯科出版。)

Потапов А. П.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алтайцев. М., 1951. (波塔波夫:《阿尔泰人史纲》,1951年莫斯科出版。)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Из Зайсана через Хами и на верховья Желтой реки. СПб., 1883.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斋桑经哈密到黄河上游》,1883年彼得堡出版。)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Монголия и страна Тангутов. М., 1946. (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和唐古特人地区》,1946年莫斯科出版。)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От Кульджи за Тянь-Шань и на Лоб-нор. М., 1947.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1947年莫斯科出版。)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От Кяхты на истоки Желтой реки. СПб., 1888.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恰克图到黄河源旅行记》,1888年彼得堡出版。)

Прохоров 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М., 1975. (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1975年莫斯科出版。)

Риттер К.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география стран Азии, находящихся в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м сношении с Россией, Восточный или Китайский Туркестан. Вып.1—2, СПб., 1869, 1873. (李特尔:《亚洲国家自然地理学》,第1—2册,1869、1873年彼得堡出版。)

Рожкова М.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а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на Сред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о втор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 и рус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М.-Л., 1949.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194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

Рожкова М. 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России с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ей (40—60-е годы XIX в.). М., 1963. (罗日科娃:《俄国同中亚的经济联系(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1963年莫斯科出版。)

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СПб. (帝俄总参谋部军事学术委员会编:《亚洲地理、地形测绘和统计资料汇编》,彼得堡出版。)

Соверцов Н. А.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му краю. М., 1947. (谢维尔佐夫:《土尔克斯坦地区旅行记》,1947年莫斯科出版。)

Семенов В. П.

Россия. Полн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нашего отечества, т. XVIII, СПб., 1903. (谢苗诺夫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8卷,1903年彼得堡出版。)

Смонов В. П.

Россия. Полн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нашего отечества. т. XIX, СПб., 1913. (谢苗诺夫编:《俄国地理详志》,第19卷,1913年彼得堡出版。)

Смонов П. П.

Живописная Россия. т. X, СПб., М., 1885. (谢苗诺夫主编:《美丽的俄罗斯》,第10卷,1885年彼得堡-莫斯科出版。)

Смо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 П. П.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Тянь-Шань в 1856—1857 гг. М., 1946. (谢苗诺夫:《天山游记(1856—1857年)》,1946年莫斯科出版。)

Смонов П. П. и Потанин Г. Н.

Земледелие Азии Карла Риттера, т. IV, Алтайско-саянская гор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пределах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по новейшим сведениям 1832—1876 года. СПб., 1877. (谢苗诺夫、波塔宁:《李特尔亚洲自然地理学》,第4卷,《俄罗斯帝国境内和中国边境的阿尔泰-萨彦山系(根据1832—1876年的最新材料)》,1877年彼得堡出版。)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К.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 полож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ржав. СПб., 1897. (斯卡列科夫斯基:《俄国的对外政策和各国情况》,1897年彼得堡出版。)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 1957. (斯拉德科夫斯基:《苏中经济关系概要》,1957年莫斯科出版。)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народов Рос-

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1917 г.). М., 1974.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 1974 年莫斯科出版。)

Сосновский Ю. 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Китай 1874—75 гг. том первый, часть I, М., 1883. (索思诺夫斯基:《1874—1875 年在中国的考察》, 第 1 卷, 第 1 册, 1883 年莫斯科出版。)

Тагеев В. Л.

В заоблачной стране. М., 1904. (塔格耶夫:《在耸入云霄的地方》, 1904 年莫斯科出版。)

Татищев С. С.

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I, его жизнь и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изд. второе, СПб., 1911. (塔吉谢夫:《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传》, 1911 年彼得堡第二版。)

Терентьев М. А.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1—3, СПб., 1906. (捷连节夫:《征服中亚史》, 第 1—3 卷, 1906 年彼得堡出版。)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т.1, 1969; т.2, 1972. (齐赫文斯基主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 第 1 卷, 1969 年; 第 2 卷, 1972 年莫斯科出版。)

Трусо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ека). М., 1882. (特鲁塞维奇:《俄中通使与通商关系》, 1882 年莫斯科出版。)

Федоров Д.

Опыт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 ч. 2, Ташкент, 1903. (费奥多罗夫:《伊犁地区军事-统计记

述》，第2卷，1903年塔什干出版。）

Халфин Н. А.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М., 1960. (哈尔芬：《俄国在中亚的政策》，1960年莫斯科出版。)

Халфин Н. А.

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к России (60—90-е годы XIX в.). М., 1965. (哈尔芬：《中亚同俄国的合并》，1965年莫斯科出版。)

Чимитдоржиев Ш. Б.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Монголии и России XVII—XVIII вв., М., 1978. (契米道尔热耶夫：《十七——十八世纪蒙古与俄国的相互关系》，1978年莫斯科出版。)

Чернявский В. И.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 и его труды по географии. М., 1955. (切尔尼亚夫斯基：《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及其地理著作》，1955年莫斯科出版。)

Шукина Н. М.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 1955. (舒金娜：《中央亚细亚地图是怎样绘制的》，1955年莫斯科出版。)

附 录 三

西文参考书目

Abramof, A.

The Lake Nor-zaisan and its Neighbourhood.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XXXV, 1865. (阿布拉莫夫:《斋桑湖及其周围地区》,载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第35卷,1865年伦敦出版。)

Alder, G. J.

British India's Northern Frontier, 1865—1895. London, 1963. (阿尔德:《英属印度的北部边疆(1865—1895)》,1963年伦敦出版。)

Atkinson, T. W.

Oriental and Western Siberia: a narrative of seven years explorations and adventures in Siberia, Mongolia, the Kirghis steppes, Chinese Tartary, and part of Central Asia. London, 1858. (阿特金森:《东部和西部西伯利亚》,1858年伦敦出版。)

Baddeley, J. F.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1919. (巴德雷编:《俄国、蒙古、中国》,1919年伦敦出版。)

Boulger, D. C.

England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 London, 1878.
(包罗杰:《英俄在中亚细亚》,1878年伦敦出版。)

Boulger, D. C.

The life of Jakoob Beg. London, 1878. (包罗杰:《阿古柏传》,1878 年伦敦出版。)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entral Asia. No. 2 (187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Central Asia. (《英国议会
文书》,《关于中亚细亚的往来文书》,1873 年中亚细亚第 2
号。)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entral Asia, No. 1 (1880),
Further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entral
Asia, 1879. (《英国议会文书》,《关于中亚细亚事务的往来
文书续编:1879 年》,1880 年中亚细亚第 1 号。)

Chu Djang

War and Diplomacy over Ili. 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XX, October, 1936. No.
3. (章楚:《关于伊犁问题的战争和外交》,载《中国社会及政
治学报》,第 20 卷第 3 期,1936 年 10 月出版。)

Cobbold, R.

Innermost Asia. London, 1900. (科博德:《在亚洲的极深
处》,1900 年伦敦出版。)

Curzon, G. N. C.

The Pamirs and the Source of the Oxus. London,
1898. (寇松:《帕米尔和奥克苏斯河源》,1898 年伦敦出版。)

Dabbs, J. A.

History of the Discovery and Exploration of Chinese
Turkestan. The Hague, 1963. (达布斯:《中国土尔克斯坦
的发现和探险史》,1963 年海牙出版。)

Etherton, P. T.

In the Heart of Asia. London, 1925. (埃塞尔顿:《在亚
洲的心脏》,1925 年伦敦出版。)

Forsyth, T. D.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Calcutta, 1875. (弗赛斯:《1873 年出使叶尔羌报告》,1875 年加尔各答出版。)

Frechtling, L. E.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Easturn Turkistan, 1863—1881. Royal Central Asian Journal, vol. XXVI. July, 1939, part III. (弗雷希特林:《1863—1881 年英俄在东北土尔克斯坦的竞争》,载英国《皇家中亚杂志》,第 26 卷第 3 部分,1939 年 7 月出版。)

Fuchs, W.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u-T’u. Fu Jen University, Peking, 1946. (福克斯:《朱思本中国蒙古地图和广輿图》,1946 年辅仁大学出版。)

Hedin, S.

Through Asia, 2 vols, London, 1898. (斯文·赫定:《亚洲游记》,两卷本,1898 年伦敦出版。)

von Hellwald, F.

The Russians in Central Asia. Tra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Theodore Wirgman, London, 1874. (冯·黑尔瓦尔德:《俄国人在中亚》,1874 年伦敦出版。)

Immanuel C. Y. Hsu

The Ili Crisis, oxford, 1965. (徐中约:《伊犁危机》,1965 年牛津出版。)

Jelavich, Charles and Barbara.

Russia in the East, 1876—1880. Leiden, 1959. (耶拉维奇:《俄国在东方(1876—1880)》,1959 年莱顿出版。)

Kiernan, E. V. G.

British Diplomay in China, 1880--1885. Cambridge,

1939. (基尔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 1939 年剑桥大学出版。)

Krausse, A. S.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 1558—1899. London, 1900. (克劳斯:《俄国在亚洲(1558—1899)》, 1900 年伦敦出版。)

Lansdell, H.

Chinese Turkistan. London, 1893. (兰斯德尔:《中国土尔克斯坦》, 1893 年伦敦出版。)

Lansdell, H.

Russian Central Asia, including Kuldja, Bokhara, Khiva and Merv. vol. 1—2, London, 1885. (兰斯德尔:《俄属中亚细亚》, 第 1—2 卷, 1885 年伦敦出版。)

Lattimore, O.

Pivot of Asia. Boston, 1950. (拉铁摩尔:《亚洲的枢纽》, 1950 年波士顿出版。)

Lobanov-Rostovsky, A.

Russia and Asia. New York, 1933.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 1933 年纽约出版。)

Mancall, M.

Russia and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曼考尔:《俄国与中国》, 1971 年哈佛大学出版。)

Prejevalsky, N. M.

From Kulja, across the Tien Shan to Lob-Nor. Translated by E. D. Morgan, London, 1879. (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越天山到罗布泊》, 英译本, 1879 年伦敦出版。)

Rawlinson, H.

England and Russia in the East. London, 1875. (罗

林逊:《英俄在东方》,1875年伦敦出版。)

Rayfield, D.

The Dream of Lhasa. London, 1976. (雷菲尔德:《拉萨之梦》,1976年伦敦出版。)

Schuyler, E.

Turkistan. 2 vols, London, 1876. (斯凯勒:《土尔克斯坦》,两卷本,1876年伦敦出版。)

Shaw, R.

Visits to High Tartary, Yarkand, and Kashghar. London, 1871. (沙敖:《鞑靼高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访问记》,1871年伦敦出版。)

Skrine, C. P. and Nightingale, P.

Macartney at Kashgar. London, 1973. (斯科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973年伦敦出版。)

Younghusband, F. E.

The Heart of a Continent: a narrative of travels in Manchuria, across the Gobi Desert, through the Himalayas, the Pamirs, and Chitral, 1884—1894. London, 1896. (荣赫鹏:《一个大陆的中心》,1896年伦敦出版。)

附 录 四

俄汉人名对照表

А	Б
Абаза А. А. 阿巴扎	Бабков И. Ф. 巴布科夫
Абакумов 阿巴库莫夫	Базай-Датха 布才·达特哈
Абдурахман 阿卜杜拉赫曼	Базилевич К. В. 巴齐列维奇
Абиль-Огля 阿布尔·奥格兰 (挨婆鲁屋拉)	Байгачев И. 巴依加切夫
Аблин Сеиткул 阿布林	Балицкий 巴里茨基
Абрамов 阿布拉莫夫	Балкашин Н. Н. 巴勒喀什(巴 尔喀申)
Александр II 亚历山大二世	Баллюзек Л. Ф. 巴留捷克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亚历山大三 世	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亚力山德罗维 奇	Бартольд В. В. 巴托尔德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阿列克 塞·米哈伊洛维奇	Бегер А. 别格尔
Алимбай 阿里姆巴依	Бек Кули-бек 伯克库里
Алим-бек 阿利姆伯克	Бендерский 宾杰尔斯基
Андреев 安德列耶夫	Берг Л. С. 别尔格
Анненков 安年科夫	Берг Р. Л. 别尔格
Асанов 阿桑诺夫	Березовский М. М. 别廖佐夫 斯基
	Блюменталь 勃留门塔利
	Богданович К. И. 博格丹诺 维奇

Богоявленский Н. В. 博戈雅夫连斯基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博戈斯拉夫斯基(博呼策勒傅斯奇)

Бржезицкий 勃尔热齐茨基

Зубенной В. 布别诺依

Буксгевден А. 布克斯盖夫登

Булатов 布拉托夫

Бунаков Е. В. 布纳科夫

Бухгольц И. 布霍列茨

Бютцов Е. К. 布策

В

Вали-хан 瓦里汗

Валиханов Ч. Ч. 瓦里哈诺夫

Вальская Б. А. 瓦利斯卡娅

Ванновский П. С. 万诺夫斯基

Василий Шуйский 瓦西里·

苏伊斯基

Венюков М. И. 维纽科夫

Веревкин Н. А. 维寥夫金

Всёловский Н. И. 维谢洛夫斯基

Вильянов Г. 维利亚诺夫

Витгенштейн 维特根斯坦

Влангали А. Е. 弗兰加里(倭良嘎哩)

Вревский 符列夫斯基

Вронченко Ф. П. 符隆钦科

Вышинский А. Я. 维辛斯基

Вяткин М. П. 越特金

Г

Гагарин М. П. 加加林

Гагарин С. И. 加加林

Галкин 加尔金

Гасфорд Г. Х. 加斯弗尔德

Гвоздецкий Н. А. 格沃兹杰茨基

Гейден Ф. Л. 盖登

Генезер 盖涅杰尔

Гирс Н. К. 格尔斯

Глазенап 格拉泽纳普

Глинка 格凌喀

Годунов И. М. 戈都诺夫

Головин Ф. А. 戈洛文

Головкин Ю. А. 戈洛夫金

Голубев А. Ф. 戈鲁别夫

Голубин П. 戈鲁宾

Горчаков А. М. 哥尔查科夫

Горчаков П. Д. 哥尔查科夫

Грейг С. А. 格里格

Григорьев В. В. 格里戈里耶夫

Громбчевский 格罗姆切夫斯基(康穆才甫)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А. Г. 阿·

格鲁姆-格尔日马伊洛

Грумм-Гржимайло Г. Е. 格·
叶·格鲁姆 格尔日马伊洛
Гуревич Б. П. 古列维奇
Гутковский К. К. 古特科夫斯
基

Д

Джамгерчинов Б. 贾姆格尔契
诺夫
Джангар 张格尔
Добишинский Н. 多比申斯基
Долгоруков В. А. 多尔哥鲁科
夫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А. А. 陀斯妥耶
夫斯基
Дубровин Н. Ф. 杜勃罗文
Дюгамель А. И. 杜加美尔

Е

Екатерина II 叶卡捷琳娜二世
Еленский 叶连斯基

Ж

Жеребятъев 热列比亚季耶夫
Жомини А. Г. 热梅尼

З

Завалишин Д. И. 札瓦利申
Зайцев 札伊采夫

Залоский 札列斯基
Заман-бек 札曼伯克
Захаров И. И. 札哈罗夫
Зелюнин А. В. 泽列宁
Зеленов 杰列诺夫
Зибборштейн 齐别尔斯坦因
Зиновьев 齐诺维也夫
Зряхов 兹里亚霍夫
Зубарев 朱巴列夫

И

Иванов Д. Л. 伊凡诺夫
Игнатьев Н. П. 伊格纳切夫
Измайлов Л. 伊兹玛依洛夫
Ионов М. 约诺夫
Искандаров Б. 伊斯坎达罗夫

К

Кабанов П. И. 卡巴诺夫
Кадыров Ш. 卡迪罗夫
Казнаков Н. Г. 卡兹纳科夫
Канкрин 坎克林
Капнист 格毕尼斯
Капцевич 卡普采维奇
Карбышев 卡尔贝谢夫
Карслин Г. С. 卡列林
Каринцев Н. А. 卡林采夫
Каскинов А. 卡斯基诺夫
Кассини А. Р. 喀西尼

Катенин 卡捷宁
 Каульбарс А. В. 考尔巴斯(柯勒巴)
 Кауфман К. П. 考夫曼(高福曼)
 Киреев Ф. Н. 基列耶夫
 Кирилов И. 基利洛夫
 Клсмонц Д. А. 克列门茨
 Клепиков В. 克列皮科夫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 П. 科瓦列夫斯基
 Козлов П. К. 科兹洛夫
 Колотовкин 柯洛托夫金
 Колпаковский Г. А. 科尔帕科夫斯基
 Константин Н. вел. кн. 康士坦丁亲王
 Корсак А. 柯尔萨克
 Костенко 科斯坚科
 Кояндер А. И. 凯阳德
 Кузнецов В. С. 库兹涅佐夫
 Кульвинский П. 库尔文斯基
 Кумани А. М. 库马尼(库满)
 Куницын И. 库尼增
 Куракин И. С. 库拉金
 Куропаткин А. Н. 库罗巴特金

Л

Ланг Лоренц 郎克

Лерхе 列尔赫
 Лесовский С. С. 列索夫斯基
 Лихарев И. М. 利哈列夫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 А.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
 Лутшев 卢特舍夫
 Любимов Н. И. 柳比莫夫

М

Марголин Я. 马尔戈林
 Маргулан А. 马古兰
 Мартенс Ф. Ф. 马尔坚斯
 Масальский В. И. 马萨利斯基
 Маслов О. В. 马斯洛夫
 Мединский В. 梅金斯基(咩登斯开)
 Мельников А. А. 麦尔尼科夫(梅尼阔甫)
 Милютин Д. А. 米留金
 Михайл Осдорович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
 Мосальский И. В. 穆萨尔斯基
 Мурал-хан 穆拉德·汗
 Мурзасв Э. 穆尔札耶夫
 Муромцов П. 穆罗姆佐夫
 Муртазын 穆尔塔金
 Мушкитов И. В. 穆什基托夫

Н

Нагиль Л. 纳基利
Нарочницкий А. Л. 纳罗奇尼茨基
Несплюев И. И. 涅普留耶夫
Нерпин 涅尔平
Нессольроде К. В. 涅谢尔罗迭
Нечкина М. В. 涅奇金娜
Николай I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I 尼古拉二世
Нифантьев 尼凡季耶夫
Нюхалов 纽哈洛夫

О

Обручев В. А. 维·阿·奥勃鲁切夫
Обручев 奥勃鲁切夫
Остен-Сакснь 奥斯登-萨肯

П

Павало-Швейковский 帕瓦洛-什维伊科夫斯基
Павлинов 巴甫林诺夫(庞龄)
Пантусов Н. Н. 潘图索夫
Певцов М. В. 彼甫佐夫
Перемышльский 佩列梅什利斯基

Перовский В. А. 彼罗夫斯基
Петр I 彼得一世
Петров Т. 彼特罗夫
Петровский Н. Ф. 彼得罗夫斯基
Пилеников 皮连科夫
Пиль И. А. 皮利
Плутов 普鲁托夫
Позднов М. А. 波兹涅耶夫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波克罗夫斯基
Поликарп 佟正笏(波里卡尔普)
Полторацкий В. А. 波尔托拉茨基
Попов А. 阿·波波夫
Потанин Г. Н. 波塔宁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Н. М. 普尔热瓦爾斯基
Прохоров А. 普罗霍罗夫
Проченко 普罗琴科
Путимцов 普蒂姆采夫
Путята 普佳塔
Путятин Е. В. 普提雅廷
Пыльцов М. А. 佩利佐夫

Р

Раузинский Савва Лукич-Владиславич 萨瓦·卢基

奇·拉古津斯基

Радлов Ф. Ф. 拉德洛夫

Рафаилов П. А. 拉法伊洛夫

Регель А. 列格尔

Рейнтал 赖因塔尔

Ремезов М. 明索伊·雷米佐夫

Ремезов С. У. 雷米佐夫

Риттер К. 李特尔

Роборовский В. И. 罗博罗夫斯基

Рожкова М. К. 罗日科娃

Ромодановский И. И. 罗莫丹诺夫斯基

Румянцов Н. П. 鲁缅采夫

С

Савельев И. 萨维利耶夫

Саид Якуб-хан 赛义德·阿古柏·汗(哈吉·妥拉)

Сафдар-Али хан 萨弗达尔-阿里汗

Сворцов Н. А. 斯维尔佐夫

Северцов Н. А. 谢维尔佐夫

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 П. П. 谢苗诺夫

Серебrenиков 谢列勃列尼科夫

Сильвергольм 西利维尔格利

姆

Скальковский К. 斯卡列科夫斯基

Скасси А. И. 斯卡西

Скачков К. А. 斯卡奇科夫

Скорский 斯科尔斯基

Скобелов М. Д. 斯科别列夫

Скопин 斯科平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

Соймонов 索依莫诺夫

Соловцов 索洛夫佐夫

Солотницкая Р. Л. 索洛特尼茨卡娅

Сомов 索莫夫

Сосновский Ю. А. 索思诺夫斯基

Стааль 斯塔尔

Стрельников 斯特列利尼科夫

Струве К. В. 司徒卢威

Сумароков А. 苏马罗科夫

Сунаргулов 苏纳尔古洛夫

Сухожанет Н. О. 苏霍扎涅特

Сычевский Е. П. 瑟切夫斯基

Т

Тагаев Б. А. 塔格耶夫

Тадеев Б. Л. 塔格耶夫

Тазабек 塔札别克

Татаринов А. С. 塔塔里诺夫
Татищев С. С. 塔吉谢夫
Тевколов А. И. 切夫凯列夫
Тезек 铁色克
Терентьев М. А. 捷连节夫
Трусевич Х. 特鲁塞维奇

У

Угримов Л. 乌格里莫夫
Унковский И. 温科夫斯基
Урасов А. 乌拉索夫
Успенский В. М. 吴司本

Ф

Фодченко А. П. 费得钦科
Федоров Д. 费奥多罗夫
Фриде А. 弗里德(福哩德)

Х

Халдоев 哈尔杰耶夫
Халфин Н. А. 哈尔芬
Ханыков Г. 哈内科夫
Хлудов М. 赫鲁道夫
Хоментовский 霍缅托夫斯基
Хорошев 霍罗晓夫
Худояр-хан 呼达雅尔汗

Ц

Циммерман А. Э. 齐麦尔曼

Ч

Чванов Ф. 奇瓦诺夫
Чередов В. 瓦西里·契雷多夫
Чередов И. 伊万·契雷多夫
Черкасов Д. 契尔卡索夫
Чернявский В. И. 切尔尼亚夫斯基
Черняев М. Г. 契尔尼亚耶夫
Чуклин 丘克林

Ш

Шанский 桑斯基
Шепелев 舍别列夫
Шишкин 基斯敬(希什金)
Шпрингер 施普林格尔
Шренк А. И. 施伦克
Шубин 舒宾
Шульц 舒尔茨

Щ

Щеглов И. В. 谢格洛夫

Э

Эклов 艾克龙
Эндем 安敦

Ю

Юсов Б. В. 尤索夫

Я

Ядренцев Н. М. 雅德林采夫

Яковлев 雅科夫列夫

Якуб-бек 阿古柏

Яновский 雅诺夫斯基

附录五

俄汉地名对照表

А

Абакан, р.	阿巴干河	Алжир	阿尔及利亚
Айдарлы-Кум	爱达尔库木	Аличур	阿尔楚尔
Ак-Байтал, р.	阿克拜塔尔河	Алкабек, р.	阿列克别克河
Ак-Каба, р.	阿克哈巴河	Алма-Ата	阿拉木图
Ак-Кент	阿克肯特	Алмата, р.	阿拉木图河
Акколь, оз.	阿克库里湖	Алтай	阿尔泰
Ак-Мечеть	阿克麦吉特	Алтынзмель, г.	阿尔滕埃麦利山
Акмолинск	阿克摩林斯克	Алтышар	阿尔蒂沙尔(六城地区、南疆)
Акса́й, р.	阿克赛河	Аляска	阿拉斯加
Ак-су	阿克苏	Аму-Дарья, р.	阿姆河
Ак-су, р.	阿克苏河	Амур, р.	阿穆尔河(黑龙江)
Ак-Таш	阿克塔什	Ангара, р.	安加拉河
Алай, хр.	阿赖岭	Англия	英国(英吉利)
Ала-Куль, оз.	阿拉湖	Андижан	安集延
Алатау, г. (Алатау, хр.).	阿拉套山脉(喀喇套山)	Аральское море	咸海
Александрия	亚历山大	Арасанский выселок	阿拉善村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хр.	亚历山大山脉	Арысь, р.	阿雷斯河
Алеутские о-ва	阿留申群岛	Атбаш, г.	阿特巴什山
		Аулие-Ата	阿乌利耶-阿塔(江)

布尔)

Афганистан 阿富汗

Аягуз 阿亚古斯(爱古斯)

Аягуз, р. 阿亚古斯(爱古斯)
河

Б

Бадахшан 巴达克山

Базай-и-Гумбез 布才拱伯孜

Баик 丕伊克

Байкал, оз. 贝加尔湖

Бактах 巴克图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Балхаш, оз. 巴尔喀什湖

Барабинская степь 巴拉巴草原

Барлык 巴尔鲁克

Барлыкские, г. 巴尔鲁克山

Баскан, р. 巴斯坎河

Баты 巴特

Башкауз, р. 巴什库斯河

Баян-Аул 巴彦乌拉

Бодель, пер. 别迭里山口

Беджин-тау, г. 别珍岛山

Биень, р. 比延河

Бийликоль, оз. 必利库里湖

Бийск 比斯克

Бир-баши, г. 毕尔巴什山

Бия, р. 阿勒坦河(比亚河)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近东

Большая Алмата, р. 大阿拉木图河

Большой Алтайский хр. 大阿尔泰山

Бордаба 博尔达巴

Борохуцзирский (Борохуджирский) пикет 博罗胡吉尔卡伦

Бугаз 布加兹

Бугаз, р. 布加兹河

Буковина 布柯维纳

Буконь, р. 布昆河

Бухара 布哈拉

Бахара, ханство (Еух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布哈拉汗国

Бухтарма 布赫塔尔玛

Бухтарма, р. 布赫塔尔玛河

Бухтарминск 布赫塔尔明斯克

В

Вахан 瓦罕

Вахан-Дарья, р. 瓦罕河

Вахдир 倭海及蕊

Верный 维尔内

Висла, р. 维斯拉河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Г

Галисия 加利西亚

Геден, г. 格登山

Герат 赫拉特

Гималай, хр. 喜马拉雅山脉

Гиндукуш, хр. 兴都库什山
脉

Голландия 荷兰

Гульча 古里察

Гунт, р. 贡特河

Гурьев 古里耶夫

Д

Дараут-Курган 达拉乌特库尔
干

Дарваз 达尔瓦斯

Дардамты 达尔达姆特 (达尔
达木图)

Джамбул 江布尔

Джанарт 札那尔特

Джар-кент 札尔肯特

Джиргалан, р. 治尔噶兰河

Джитышар 哲德沙尔 (七城地
区、南疆)

Джулек 朱列克

Джумгол, р. 朱姆戈尔河

Джунгарский Алатау 准噶尔
阿拉套山

Джыргалан, р. 济尔噶朗河

Дубун 杜邦

Дунай 多瑙河

Е

Европа 欧洲

Енисей, р. 叶尼塞河

Ж

Желез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热列
金斯克堡

Жельтау, г. 热利陶山

З

Заилий, укр. 外伊犁堡

Заилийский Ала-тау, хр. 外伊
犁阿拉套山

Зайсан, оз. 斋桑湖

Зайсанск 斋桑斯克

Зайсанский пост 斋桑哨所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西西伯利
亚

Заука, пер. 扎乌喀山口 (招哈
山口)

Звериноголовская 兹维林诺
戈洛夫斯卡雅

И

Ивановка 伊万诺夫卡

Или 伊犁

Или, р. 伊犁河

Индия 印度

Ионова, про. 约诺夫山口

Иркештам 伊尔克什坦 (伊尔克什他木)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次克

Иртыш, р. 额尔齐斯河

Иссык-куль, оз. 伊塞克湖 (特穆尔图淖尔)

Ишим, р. 伊希姆河

К

Каба, р. 哈巴河

Кабул 喀布尔

Казала (Казалинск) 卡扎拉 (卡扎林斯克)

Казнаковка 卡兹纳科夫卡

Калбинский хр. 卡尔宾山脉

Канада 加拿大

Канджут 坎巨提

Карабуга, р. 卡腊布加河

Карабулакский выселок 卡拉布拉克村

Кара-дабан 喀尔达坂 (喀拉达坂)

Кара-Иртыш, р. 喀喇额尔齐斯河 (黑伊尔特什河)

Кара-Каба, р. 喀喇哈巴河

Каракол 卡腊科尔

Каракол, р. 卡腊科尔河

Каракорум, хр. 喀喇昆仑山

Каракуль, оз. 喀喇库里湖

Карамолда 卡腊莫尔达

Карасуйский пикет 卡拉苏哨所

Каратал, р. 哈喇塔拉河

Кара-тау, г. 喀拉套山

Каратогин 喀尔提锦

Каркара, р. 哈尔齐拉河 (卡尔卡腊河)

Каркаралинск 卡尔卡拉林斯克

Каскелен, р. 卡斯克连河

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 里海

Кастек 卡斯帖克

Катунь, р. 卡通河 (卡屯河、哈屯河)

Кашгар 喀什噶尔

Кашмир 克什米尔

Кеген (Кэген), р. 格根河

Кейтын 克伊滕

Кент-Кольчжат 廓里札特村

Котмень 克特们

Кзыл-Орда 克孜尔-奥尔达

Кизиль-Арт 克孜尔阿尔特
 Кизиль-работ 克孜尔拉巴特
 Киргизский-Алатау 吉尔吉斯
 阿拉套
 Кобдо 科布多
 Коканд 浩罕
 Кокпекты 科克彼克特
 Кокпекты, р. 科克彼克特河
 Коксу, р. 库克苏河
 Коксуйский пикет 库克苏哨
 所
 Кокчетав 科克切塔夫
 Колывань 克雷完
 Конгор-обо 匡果罗鄂博
 Кондерлык, р. 堪迭尔雷克河
 Коныролен 科内罗连
 Копал 科帕尔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雅尔斯
 克
 Крещтадт 喀琅施塔得
 Крым 克里米亚
 Крым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克里米
 亚半岛
 Кудара, р. 库达拉河
 Куйтун, г. 奎峒山(奎屯山)
 Кукуртлюк 库库尔特留克
 Кульджа 固勒札(宁远)
 Куртва 库尔特喀
 Курчум, р. 库尔楚木(科尔沁)

河
 Кушка 库什卡
 Кызыл-Агач, р. 克兹尔-阿加
 奇河
 Кызыл-су, р. 齐吉勒苏河(克
 则勒苏河)
 Кяхта 恰克图

Л

Лагор 拉合尔
 Ладак 拉达克
 Лангар 亮噶尔
 Ле 列城
 Лепса, р. 勒布什河
 Лопсинск 勒布辛斯克
 Лепсы 勒布什
 Ливадия 里瓦吉亚
 Лоб-нор 罗布泊
 Лондон 伦敦
 Любовнинский выселок 柳鲍
 夫宁斯克村

М

Мазар 马札尔
 Май-гапчагай 迈哈布奇盖
 Мальтабар, г. 玛里他巴尔
 山
 Маниту-Гатул-хан(Ак-Тюбе),
 пикет 玛尼图噶图勒汗(阿

克求别)卡伦

Маргслан 玛尔格兰

Марка-куль, оз. 玛尔喀湖

Маркан-су, р. 玛尔堪苏河

Марсель 马赛

Мерв (Мары) 麦尔夫(马里)

Москва 莫斯科

Музартский (Мусартский) гор-
ный проход (пер.) 穆素尔
山口

Музтаг-Ата 慕士塔格山

Мук-су, р. 穆克苏河

Мургаб 木尔加布(六尔阿乌)

Мус-тау, г. 木斯岛山

Н

Надеждинский выселок 纳杰
吉斯克村

Нарын 纳林

Нарын, р. 纳林河

Нарынское укр. 纳林堡

Нарин-Халга (Нарын-кол) 那
林哈勒噶

Нарын-Халга, р. 那林哈勒噶
河

Нарым, р. 那林河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尼布
楚)

Нижгород 尼什哥罗德

Новосибирск 新西伯利亚(诺
沃西比尔斯克)

О

Обь, р. 鄂毕河

Одер(Одра), р. 奥德河

Омск 鄂木斯克

Омь, р. 鄂木河

Оренбург 奥伦堡

Орь, р. 奥尔河

Ош 鄂什(窝什、奥什)

П

Пакистан 巴基斯坦

Памир 帕米尔

Пенджаб 旁遮普

Перовск 彼罗夫斯克

Перовский Форт 彼罗夫斯克
要塞

Персия 波斯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甫洛
夫斯克

Пишпек 皮什别克

По, р. 波河

Польша 波兰

Пржевальск 普尔热瓦尔斯克

Пруссия 普鲁士

Пяндж, р. 喷赤河

Р

Раим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赖姆堡
 Ранг-куль 郎库里
 Рембаковск, поселок 列姆巴科夫斯克
 Россия 俄国(俄罗斯)
 Рошан 罗善
 Ряз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梁赞省

С

Сакмара, р. 萨克马拉河
 Самарканд 撒马尔罕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圣彼得堡
 Санташ 善塔斯
 Сарез 萨雷兹
 Саркан, р. 萨尔坎河
 Сарканский выселок 萨尔坎村
 Сарыджаз 萨雷贾兹
 Сарыджаз, р. 萨雷贾兹河
 Сарыкол, хр. 萨雷阔勒岭
 Сарыкуль, оз. 萨雷库里湖
 Сарытау, г. 沙尔套山
 Сассык-Куль, оз. 萨司克湖
 Саур(Сайрин-ула), г. 萨乌尔岭(赛哩乌兰岭)
 Саянский хребет (Саяны) 萨彦岭

Селенга, р. 色楞格河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 塞米巴拉金斯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 обл. 谢米列钦斯克省(七河省)
 Сергиополь 谢尔基奥波里(阿亚古斯)
 Сикким 锡金
 Смоленск 斯摩棱斯克
 Софийская станица 索菲斯克村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亚细亚(中亚)
 Суек, пер. (Туюн-Суек) 苏约克山口(图永)
 Сузак 苏扎克
 Сума-Таш 苏满塔什
 Сумбе, р. 苏木拜河(松别河)
 Суэцкий канал 苏伊士运河
 Сыр-Дарь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锡尔河省
 Сыр-Дарья, р. 锡尔河

Т

Тагдумбаш 塔克敦巴什
 Талас, р. 塔拉斯河
 Талгар, р. 塔尔加尔河
 Танну-Урянхай 唐努乌梁海
 Тара 塔拉

Тарбагатай 塔尔巴哈台
 Таучубек, укр. 塔乌丘别克堡
 Ташкент 塔什干
 Тегеран 德黑兰
 Текес, р. 特克斯河 (帖克斯河)
 Телецкое, оз. 阿勒坦泊 (捷列茨科耶湖)
 Темирлик, р. 捷米尔利克河
 Терскты пер. 铁列克山口
 Терской-Алатау, хр. 捷尔斯克依阿拉套山 (贴尔斯京山)
 Тибет 西藏
 Тобол, р. 托博尔河
 Тобольск 托博尔斯克
 Токмак 托克马克
 Томск 托木斯克
 Томь, р. 托木河
 Троица 特洛依茨克
 Тузкуль, оз. 图兹科利湖 (达布逊湖)
 Туркестан 土尔克斯坦
 Туркмения 土库曼
 Тургут, пер. 图鲁噶尔特山口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уюк 图尤克
 Тюмень 秋明
 Тюп, р. 土布河

Тянь-Шань, хр. 天山

У

Уз-бель, пер. 乌孜别里山口
 Уй, р. 乌依河
 Уйгенташ (Югенташский), про. 倭根塔什山口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
 Урал, р. 乌拉尔河
 Урджар 乌尔扎尔 (雅尔)
 Урджарская станица 乌尔扎尔村 (乌占)
 Уссури, р. 乌苏里江
 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 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 (铿格尔图喇)
 Уч-Турфан 乌什

Ф

Фергана 费尔干纳
 Ферг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费尔干纳省
 Франция 法国
 Фрунзе 伏龙芝

Х

Хабар-Асу, пер. 哈巴尔苏山口 (哈巴尔素达巴罕)
 Хан-Тенгри, г. 汗腾格里山

Хан-Тенгри, пик 汗腾格里
峰
Харгуш 和什库珠克 (哈尔果
什)
Хива 希瓦
Хоргос 霍尔果斯
Хоргос, р. 霍尔果斯河 (额尔
果斯河)

Ц

Царское село 沙皇村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中央亚细
亚

Ч

Чар, р. 恰尔河
Чарын, р. 察林河
Чарыш, р. 色毕河 (恰雷什河)
Чатырь-Таш 察提尔塔什
Чернолуцкая станица 切尔诺
卢次卡雅村
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ерный Иртыш 黑伊尔特什
河 (喀喇额尔齐斯河)

Чимкент 奇姆肯特
Читраль 乞特拉尔
Чу (Чуй), р. 楚河 (吹河)
Чу-Илийские, г. 楚伊犁山
Чугучак 塔城
Чулышман, р. 敖尔汗河 (楚勒
什曼河)
Чунджи, пикет 春济卡伦

Ш

Шабин-Дабаг 沙宾达巴哈
Шаджан 沙展
Шор-Куль 绍尔库里
Шошанай 朔沙奈
Шугнан 什克南

Я

Яицкий городок 雅依茨克城
(乌拉尔斯克)
Ямыш, оз. 亚梅什湖
Ямыше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亚梅
舍夫堡
Яшил-куль, оз. 雅什库里湖
(伊西洱库尔淖尔)